

战争变为反苏战争，以致没有作好对德作战的准备。

英美的动向

由于法国投降和意大利参战，英国不得不单独地和德意作战了。然而，英国的军队几乎全部被赶出了欧洲大陆，英国本土也被德国从北欧到西欧的月牙形基地包围起来了。英国所能倚靠的只有它在海洋上的优越地位。因此，在法国投降前后，英国最关心的，与其说是法国本身的命运，勿宁说是法国舰队的命运。如果在实力上仅次于英国的法国舰队完全落在德国手里，再和已经参战的意大利舰队联合起来，就足以使英国的海上霸权受到严重威胁。英国首相丘吉尔在6月6日甚至向法国总理雷诺提議：如果法国肯把舰队开到英国港口，英国就可以同意法国同德国停战。英国对法国舰队的这种关怀，也不能不反映在希特勒的态度上。希特勒在停战条件里并没有要求法国移交它的舰队，而仅仅要求法国把舰队集结在本国各港并且解除武装。希特勒的这种要求，在海军力量处于劣势的德国来说，是非常宽大的，这里面含有后面即将谈到的政治上的考虑。然而，英国并不以此为满足。因为：谁也不敢保证德国究竟能遵守它的诺言多久。德法停战的当天，丘吉尔就发表演说提到：“法国舰队的命运对于英国和英帝国的安全的影响，即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极其严重的。”尤其是根据英法两国的协定，地中海西部从直布罗陀直到马尔他岛这段海面的防备是由法国海军担任的。只是法国舰队停止在这段海面活动，对英国来说，就等于失去了地中海的安全。在亚历山大港，经过在当地的双方海军当局的交涉，事情得到和平解决，法国舰队被解除了武装。但是在欧兰和达喀尔港，法国舰队既拒绝同英国合作又拒绝解除武装。7月3日和7日，在欧兰和达喀尔，英国舰队向法国军舰开了炮，并俘获了一大部分。其结果，英法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投

降后的法国政府甚至宣布同英国断絕邦交。

这种情况，自然要严重地威胁英国在地中海的地位。由于德国的胜利而振作起来的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开始了积极的攻势。意大利开始了对北非和巴尔干的进攻；西班牙占领了北非的丹吉尔。在太平洋方面，已经不得不单独对德作战的英国，在对华政策上表示退縮，这就为日本向因宗主国的战败而陷于无政府状态的东南亚殖民地进行扩张，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情况表明，太平洋方面和地中海方面的力量对比已经有了改变，战争已经越出了欧洲大陆的范围，而向世界范围扩大了。1940年9月签订的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就是德意两国适应这种世界战争的局面同日本划定势力范围的一种表现。因此，他们不仅考虑了对英作战的问题，而且不能不把美国当作了对手。

这种情况使美国感到：“美国虽想躲避战争，而战争却向美国逼近”。同时，陷于孤立的英国再三地、死求百赖地向美国请求援助。当时，在美国国内还有很大一部分势力不仅不愿参战，甚至对援助英国也表示反对。（参看本书第三章，第一节）尽管如此，战争已经发展到这种局面，美国的政策也不得不转向积极。同年8月，美国首先和在法理上已经同德国处于交战状态的加拿大締結了共同防卫协定。9月间，美国又以英国提供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为交换条件，把老旧的驱逐舰五十艘让给了英国，加强了对英援助。此外，美国还实行了以两洋舰队为目标的大规模的造舰计划，断然禁止了航空用汽油、碎铁等物资的出口，使它同轴心国的关系紧张起来了。在美国，固然还没有把参战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但是，以上这种趋势迟早要使美国面临参战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

第二节 苏德战争的爆发

德国放弃对英本土登陆作战

希特勒在法国投降后，紧接着在7月14日又一次向英国提出了和平建议，他说：“自己本心并不想打倒或者损伤英帝国”。这一次和平建议决不是一种单纯的策略。因为他趁在英国对法国舰队表示关心以前，就以宽大的条件和法国实行停战，并表明他无意同英国战斗到底。然而英国已经下定决心要和德国作战，因而这个建议遭到了拒绝。于是，德国就不能不面临进攻英国本土的问题了。

8月11日德国空军对英国本土开始了大规模的进攻，在英国上空，两国空军展开了殊死的战斗。德国空军起初以飞机场、军港等军事设施为攻击目标，到8月28日，突然对伦敦施行了大轰炸。一般认为：这是对英国本土实行登陆作战的征兆。事实上，当时德军最高指挥部已经决定要在9月21日开始所谓“海狮作战”的登陆作战。面对这个危机，英国首相丘吉尔作了抗战准备，并声称：“无论付出多高的代价，我们也要坚守英伦三岛”。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多人都对英国的前途抱着悲观的看法，例如：“美国参谋本部就有五分之四的成员认为英国的局势是绝望的”。（戴维斯·林德利：《大战是怎样发生的？》）虽然如上所述，这时美国已经积极支援了英国的抗战，但是不能否认，这种对于英国前途的悲观的预测确实使美国统治阶级中少数派的孤立主义、不干涉主义的活动有所加强。“波士顿出身的实业家、并且和华尔街关系很好”的美国驻英大使肯尼迪曾经不止一次地向本国报告说：遭到德国进攻以后，英国将要屈服。同时，由共和党议员们组成的“美国第一委员会”的活动也积极起来，他们向美国国民散布了孤立主义的思想。

但是，德国到底沒有对英国本土实行登陆作战。英本土登陆作战对于德国來說，并不等于“再越过一道河流，而是要渡过这样一个海洋，它是掌握在做好准备、决心战斗到底的敌人的手里”。(戈林)这样，德国在海洋上的劣势，也就暴露了它的致命的缺陷。也就是說，希特勒以英国的友好作为制訂海軍政策的基础这种作法的一个后果，就是它在英国本土登陆作战上面暴露了致命的缺陷。問題还不只是英国本土登陆作战成为不可能，而且希特勒想要早日結束战争的希望也归于幻灭了。虽然长期战对于軍事潜力不足的德国显然不利，然而它也不得不下决心进行长期战了。不仅如此，法国投降以后的局势是：公然采取压制自由、夺取他国領土的政策、的德意日三个主要法西斯国家同反法西斯各国（只要它們反对法西斯，就会受到維護民主和自由的国内輿論的支持）之間的斗争扩大到全世界范围；与此同时，美国也越来越趋向于参战了。

德軍侵入巴尔干

在上述情况下，希特勒不得不放弃了英国本土登陆作战。根据 10 月 12 日希特勒所发布的指令，英本土作战已經不是首要的問題，只是为了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对英国进行威吓，仍然保留有关这一作战的准备工作而已。德国选择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侵略东方，具体地說，就是打倒法国投降后在欧洲大陆上唯一可以和德国对抗的强国苏联，以便达到它統治欧洲大陆的目的。德国侵略东方的第一步，就是把巴尔干各国納入德国的完全控制之下，并且为了使其在对苏作战时成为可靠的前进基地，在政治上、軍事上对它們进行改組。

开战以来，巴尔干的农产品和矿产对于德国进行战争起了重要作用。尽管英国对德国进行了封鎖，然而德国因为取得了多瑙

河流域的丰富粮食，所以在开战一年以后不仅没有发生粮荒，而且它的粮食储备也原封未动。其次，罗马尼亚的石油资源对德国的生存有着严重意义，这是不用说的。因此，在开战以前，德国就致力于取得巴尔干的资源。战前，在巴尔干各国的贸易总额中，对德贸易竟占百分之四十到五十，通过贸易，巴尔干各国已经和德国密切地结合起来了。但是，巴尔干各国人民并不同情德国进行战争。因此，巴尔干各国从开战以来一贯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并且还为了结成这样的集团进行了活动。再者，德国的战时经济只是迫切需要吸取巴尔干的资源，而这些国家所需要的工业品却无力供应。这种贸易上的不平衡，事实上也不可能从在军事上被德意两国所压倒的英法两国那里求得解决。于是，巴尔干各国为了维持自己的国民经济，就采取了同苏联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的方针。1940年苏联和保加利亚缔结了通商条约，同年5月又和南斯拉夫缔结了同样条约。6月间，苏军进驻波罗的海三国，堵塞了这些地区变成反苏策源地的可能，并使罗马尼亚归还了它夺去的原属旧俄领土比萨拉比亚和北布哥维纳。其结果，苏联国境“向西方扩展了，达到了仅次于伏尔加河的欧洲最大河流、欧洲各国间交通要路之一的多瑙河河畔了”。（莫洛托夫语）

苏联在巴尔干的地位如此加强，自然刺激了德国。法国投降后，希特勒曾发表演说，向英国提议讲和，他说：“我的外交政策的根本方针在于和意大利亲善、和英国合作”，而对于苏联则丝毫没有表示好感，这一点结合当时德苏间的上述对立的情况，受到了各国的注意。因此，德国就是为了准备英国本土登陆作战，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对巴尔干采取外交和军事措施，以便巩固自己的背方。特别是确保罗马尼亚，对于德国说来，是一个在双重意义上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第一个问题当然是完全掌握罗马尼亚石油资源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正在顽强地要求罗马尼亚

归还失地，为了拉攏这两国，德国必須迫使羅馬尼亚让步，使巴尔干各国之間的对立得到緩和。这两个問題在 8 月中大体上都解决了。羅馬尼亚正在担心苏联的“侵略”，德国便乘机向它施加压力，使其向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作了让步；同时又以“保卫羅馬尼亚的石油資源”为名，向那里派遣了十二师军队。在德国的这种軍事外交压力之下，羅馬尼亚首相安特奈斯克和法西斯团体“鉄卫团”进行协商的結果，終于迫使亲英的国王退位，建立了亲德的整体主义体制。至此，羅馬尼亚便完全落入德国手中了。

然而，德国大举侵入巴尔干是在 10 月間放弃了对英国本土登陆作战以后。德国首先假借保卫油田区和訓練羅馬尼亚军队的名义侵入了羅馬尼亚，并使由德国的从中策动而收复了失地的匈牙利与羅馬尼亚一同加入了三国同盟。在德軍进駐羅馬尼亚以前，德国就向羅馬尼亚派遣了一个軍事代表团。希特勒在給这个軍事代表团下的命令中附上了这样一条任务：为了适应对苏作战的需要，“必須为德国军队从羅馬尼亚基地进军作好准备”，在这里，明确地指出德軍进駐羅馬尼亚是以苏联为进攻目标的。面对这种紧急形势，苏联于 11 月要求保加利亚締結互助条約，对此，希特勒在 12 月 18 日下达了名为“巴尔巴罗薩作战”的对苏作战的命令。这一作战的目的是要占領苏联的欧洲部分，并預定羅馬尼亚和芬兰也积极地参加这一作战。

德国的对苏作战准备

1941 年 1 月初，美国副国务卿薩姆納·威尔斯接到一份“絕對可靠的情报”說本年春季德国将要突然进攻苏联。他經過罗斯福总统的同意把这消息通知了苏联駐美国大使。在这期間，德国正在露骨地、迅速地进行对苏作战的准备。德国军队开始大量地向东方調动，仅在羅馬尼亚就集結了六十八万人，其主力是具有最新

式装备的机械化部队。3月間，德国空军部队开始有组织地、大批地侵犯苏联国境，深入内地，进行侦察活动。与此同时，德军又占领保加利亚，使保加利亚参加了三国同盟。

德军侵入巴尔干，是在1940年秋季到1941年这段时间进行的。这件事，虽然进行得很快，但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在1941年中，尽管德意两国依然保持军事上的优势，但是英国却在某种程度上转入真正的抵抗了。德国放弃了对英国本土登陆作战，使英国海军有可能把一部分力量调往其他地方。意大利在法国投降以后，利用它在地中海方面有利于它的形势，侵入了北非和希腊。因此，控制苏伊士运河和保持对地中海的制海权，便成为英国急需解决的迫切问题了。因为不这样，大英帝国本身就无法维持下去了。由于这种原故，英国通过增援迅速地加强了它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在2月間，它竟然直接向意大利的军港进行了袭击。英国在北非和希腊也开始了反攻，结果意大利军陷于苦战状态。同时，得到英军援助的希腊军队也越过国境攻入阿尔巴尼亚。在北非，英军不仅攻入意属利比亚，还击败了占领埃塞俄比亚的意大利军，使得埃塞俄比亚皇帝在离别五年之后重新回到祖国，发表了恢复独立的宣言。英军在地中海上的这种优势，自然会影响到欧洲大陆方面：法国维希政府起了变化，它罢免了最积极主张亲德的赖伐尔，并策动接近美国等等。特别是和希腊、意大利接壤的南斯拉夫对德国的攻势进行了大规模的抵抗。希特勒在3月間曾要求南斯拉夫加入三国同盟，南斯拉夫政府，经过激烈的争辩，曾经一度接受了这项要求，但人民群众坚不承认，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以及各大城市掀起了反德示威游行。在这种压力之下，南斯拉夫内阁垮台，产生了以西莫维奇将军为首的新内阁，废弃了它同德国的同盟。新内阁是亲英的，但在成立后不久就和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采取了正面拒绝德国要求的态度。

在这种形势下，德国在苏联和南斯拉夫締結互不侵犯条約后沒到几小时就侵入了南斯拉夫，很快地占领了这个国家；到4月末，它还派遣軍隊在芬兰登陆。接着在5月間，德軍占领了希腊，从巴尔干驅逐了英国势力，并乘势夺取了东地中海的要冲克里特島。在非洲，由德国迅速地調去的机械化部队开始了反攻，埃及国境再一次被軸心国軍隊冲破了。德意两国在东地中海方面进行的这次反攻虽然暂时取得了胜利，然而这种情况預示着德国在进行战争上面的困难是愈来愈多了，表明了战争結束的希望是更加渺茫了。为了对已經开始真正抵抗的英国施加軍事压力，德国向当时来訪的日本外务相松岡提出要求，要日本进攻新加坡。为此，德国不得不約定把苏联軍隊吸引在欧洲，并且对日本和苏联締結中立条約，双方保持远东国境的和平一事，也不得不加以默認了。然而，德国自然会預料到，日本硬要南进，必然会导致美国参加反对軸心国家的战争。这一点使德国感到左右为难。无疑，德国是打算通过对苏开战来同英美改善关系。5月，阿道尔夫·赫斯飞往英国，就是这个企图。利用統治者的反苏反革命傾向使其放弃战争的办法，虽然在法国身上得到成功；把它用在当时的英美两国，却是完全的估計錯誤。因为欧美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和强大的苏联的存在，已經不允許英美两国政府公然和希特勒携起手来。

如上所述，德国侵略苏联是有准备有計劃的，但是这一侵略并没有經過周密的計算而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实际上，希特勒越是进行准备，就越发感到最初計劃的錯誤和破綻百出。而这种錯誤使希特勒騎虎难下，顾不得有无把握，竟盲目地投入了更大規模的战争冒險。

德軍侵入苏联

1941年6月22日，德国軍隊突然侵入了苏联領土。德国大

使在进攻前向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提出的一些对苏联的指责，诸如：国际共产主义对德国进行破坏活动；苏联对德国所企图建立的“欧洲新秩序”进行妨害；苏联的指导原理在于削弱非共产主义国家；等等，都是抽象的、站不住脚的。然而，德国所投入到这个战争中的兵力远远超过了西欧战场。只是第一批越过苏联国境的德军就有一百二十一个师，其中约有三十个师是完全机械化部队。而且，为了进行这场战争，德国不仅动员了将近欧洲全部的资源 and 生产力，并且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等国也和德军一起进攻了苏联。苏联红军在各个战场上迎击了轴心国军队，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广大战线上展开了旷古未有的激战。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对于作了充分准备的德军是很有利的，尤其在平坦的南乌克兰平原上，德国的进攻更为迅速。在同年夏季，白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的大部分和敖得萨、基辅等重要城市被德军占领，北部的列宁格勒也陷入了德军的重围之中。到秋季，德军进一步迫近了首都莫斯科的郊外，在莫斯科的各机关和外国使馆都迁到了古比雪夫。

希特勒大言不惭地说要在六周以内征服苏联。单从第一阶段的战况看来，这似乎也有可能。然而，后来战争开始进入了胶着状态。首先，德国军队在苏联人民中间，没有能够象在波兰和法国那样找到自己的朋友。在西欧各国，一遭到德军进攻，民众就陷于恐怖和混乱之中而争先涌向道路，以致妨碍了军队的行动，并且影响了军队的士气，然而在苏联，却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当敌军迫近的时候，集体农庄和城市的各种组织都充分地发挥了力量。特别是西部各地区的集体农庄，早已做好应付侵略的周密计划。集体农庄在生产上的各种组织直接地变成了抗敌的组织：一批人担任撤退老人和儿童的工作；另一批人把农产物和机器移往后方，以免落在德军手里；又一批人担任实行焦土战术，不使占领者得到一草一

木；最后主要是青年的一批人隐藏在森林里或湖沼地带，用游击战术来打击敌人。特别是向后方撤退产品和生产资料的工作根据周密的计划进行得很快，有不少工厂整个撤到了东部地区。许多当时在莫斯科的外国人都用惊叹的心情描写了，满载着机器和货物的汽车源源不断地奔向东方的情景。而且，当时在莫斯科以东的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正进行建设新式工厂，苏联最新式工业设施的百分之七十五是在这些地方。因此，虽然在1941年圣诞节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吹嘘说：包括苏联重工业设施的二分之一在内的地区已经落到了德军手里，实际上，虽然苏联所失去地区的产值实际上超过了苏联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以上，但是苏联的全部工业生产还是有了上升，东部地区的工业设施供应了红军所需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军事物资。后来，虽然美国租给了苏联武器，但是这个租借的数量仅占苏联实际需要的百分之四，所以还是由苏联工业自己担任了支援卫国战争的任务。

但是，在1941年年初的战斗中苏联的损失是重大的，德军无疑得到了许多东西。虽然在开战前夕就任部长会议主席领导苏联内政和外交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坚决留在莫斯科指挥作战，但曾经有个时期，列宁格勒的情况非常危险，同时莫斯科的前途也使人不抱乐观。然而随着冬季的临近，苏军的处境逐渐有了好转。逼近莫斯科的德军遭到红军的反击而不得不后退，南部地区的罗斯托夫也被红军收复了。列宁格勒虽然受到敌人的重重包围，但一直是屹立不动，红军的士气丝毫也没有低落。

英美同苏联合作

卫国战争刚开始，欧美各国的许多军事专家都预言苏联将很快地被战败。甚至有人抱着极端的看法，说苏联即使全力抵抗，也只能支持三个星期。因此，在开战那一天，英国首相丘吉尔立即

发表演说，說苏联是对付共同敌人希特勒的同盟者，表示信賴苏联人民的力量和勇气，并指出：“俄国的危險就是我們的危險”一事，引起了深刻的反应，这是理所当然的。接着，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也在新聞記者招待会上表明了支持苏联的态度，他說：“希特勒的軍隊今天已經成为美国的主要危險”，为了保卫美国的安全，必須联合一切反希特勒的力量（不論是任何力量），来打倒希特勒主义。当时，也有另外一些論調。美国參議院議員杜魯門（以后当上总统）在紐約时报上发表过这样意見：“如果德国将要获胜，我們就應該援助苏联；如果苏联将要获胜，我們就應該援助德国。这样来尽可能地使他們互相殘杀。”另外，英国空軍大臣表示希望“德国和苏联两敗俱伤”，也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在当时，就英美本身來說，打倒德国也已經成为目前当务之急，为此，它們必須首先考虑联合一切反軸心力量的問題。当时，英国的情况是，不仅从地中海到非洲和近东的“大英帝国的生命綫”，以及在亚洲的广泛权益直接受到軸心国軍隊的威胁，而且本国的存在本身也陷于严重的危机；同时美国也面临着法西斯侵略在世界範圍內全面扩大的危險。因此，無論对英国說来，还是对美国說来，在反对日德意法西斯的战争中取得胜利，还是保卫自己的帝国主义利益的必要条件。在这种形势下，反軸心陣营内部的相互对立虽然沒有消除，但总算暂时从国际政局的表面上消逝了。这个战争逐漸明显地表现为法西斯主义各国和反法西斯国家之間的战争，美国虽还没有正式参战，但英美的战争目的到这时才算明确起来，这就是反对法西斯。这种形势的变化是和英美两国工人阶级的努力分不开的。英国共产党最初是把英德战争看成是帝国主义战争而采取了反对的方针；到了德国对苏联宣战以后，它为了加强反法西斯的力量，改变了以往的方针，对战争給予了积极的支持。另外，英国共产党还通过成立英苏两国工会委员会等組織来密切两国工人阶级的联系。美国共

产党和美国工会也支持总统趋向国际联合的政策，同策划与纳粹妥协的共和党反动势力进行了斗争。援助独力抗击纳粹进攻的苏联——这就是当时各国工人阶级，包括在社会民主主义影响之下的工人的总意。

大西洋宪章和三国会谈

1941年7月，英国和苏联締結了互助同盟条约，約定不单独讲和；8月，美国宣布中立法不适用于苏联，并且給予苏联以全面的援助。8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上举行会谈，发表了一篇共同宣言，闡述了打倒德国的目的和有关战后維持和平的一些想法。这就是所謂“大西洋宪章”，在这个文件里，首先表明英美两国的目的不是为了侵略和扩大領土，接着写道：“凡未經有关人民自由意志所同意的領土改变，两国不願其实现”；并表示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所賴以生存政府形式的权利；又說“各民族中主权和自治权橫遭剝夺者，两国俱欲設法予以恢复，”表明了它們不承认軸心国家通过侵略所造成的結果的态度。特別是其中第五項規定，为了改善劳动条件、繁荣經濟和确保社会安全，实行国际合作，这可以說是反映了反对法西斯、保卫民主的这次战争的性质。在制訂这一宪章的过程中，英美两国間基本上沒有发生意見的分歧，只是在討論規定世界各国对世界貿易和原料具有平等权利的第四項时，英国举出在英联邦各国之間，已簽有渥太华条约的事实，而主張加进尊重“現有的限制”这样一句话，和美国表現了某种程度上的对立。这件事反映了英美两国爭夺世界市場的矛盾，引起人們的注意。尽管这样，这次大西洋会谈已經注定它必然要隨即发展为包括苏联在內的三国会谈。三国会谈是于5月間，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結果，美国約定全面供应苏联所需要的物資，并在10月向苏联提供了十亿美元的信用貸款。翌

年1月，英国与苏联同伊朗締結协定，保证了援苏物资可以通过伊朗境内。从这时起，伊朗成了援苏物资的主要运输线。另外还有一条危险得多、费用较大的经过北海的运输线。通过这两条路线，到1944年为止，同盟国向苏联输送的物资，包括坦克九千二百十四辆、飞机一万四千六百九十八架、大炮五千五百九十五门在内，总计有一亿一百万吨。

日美参战和同盟国宣言

迫近莫斯科的德军的进攻受到阻止，苏联保卫莫斯科的战斗开始取得了胜利的时候，日本在太平洋发动了全面的战争。但是，日本的参战也给轴心阵营带来了重大负担。因为美国在珍珠港受到袭击以后，立即向德意两国宣战，彻底地加入了反法西斯国家的联合阵营了。

1942年1月1日，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国四国发表了以大西洋宪章为基础的共同宣言，约定为打倒法西斯进行合作，并且不单独讲和。次日，又有二十二个国家在这个宣言上签了字，到战争结束前后，共有五十二个国家参加了这个宣言。这个宣言称为同盟国宣言，它是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共同纲领，是维持战后和平的共同基础。

同盟国在欧洲方面急待解决的问题是加强对苏援助。苏德战争表明：在欧洲，苏联是可以阻止德国侵略的唯一强国。从1942年1月起，经过数次外交谈判之后，在5月间，苏联外交部长访问了英国和美国，就军事和经济合作问题进行了商谈，和英国締結了军事条约，和美国締結了经济协定。其结果，苏联获得了美国的两项诺言：把援苏信用贷款增加到三十亿美元，以及在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这样，同盟国的团结方面有了迅速的加强，但同时，1942年又是轴心国家的威胁最严重的一年。

1941 到 1942 年的这个冬天,对英国来说,是一个黯淡阴郁的冬天。英国人最为夸耀的、在不利的形势下最为倚重的海军,也在这年冬季遭受了严重打击,以致它的实力降到了最低水平。仅在 1941 年 12 月一个月中间就损失了四艘战舰。在马来亚海面,“驱逐舰”号和“威尔士亲王”号两舰被打沉后还不到十天,“瓦廉特”号和“伊丽莎白女王”号二舰又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沉入海底。因此,在地中海的英国舰队也只剩下几艘巡洋舰和若干驱逐舰的程度,在 2 月间,甚至发生了很多德国军舰通过了英国本土跟前的英法海峡的事件。英国在地中海的要冲马耳他岛,在几乎没有进行有力抵抗的情况下,连日遭到了德意空军的轰炸。有时这个小岛在一日之内遭到三百架飞机的袭击,结果岛上居民只好过着完全的地下生活。英国不仅在地中海的制海权遭到了最严重的威胁,而在亚洲方面,由于日本军队占领了马来亚和缅甸,并且出现在孟加拉湾,因而被称为英帝国之宝库的印度也直接受到进攻的威胁了。

在这英国危急存亡的关头,伦敦《泰晤士报》发表了如下的社论(1942 年 4 月 13 日):

“在这个时机,有一个事实,比任何其他事实都更为有力地支配着英国人的心情。这就是苏维埃俄国在拯救我们。如果说俄国没有从战败中把我们拯救出来,至少可以说,它把可怕的空袭火焰从我们的头上和孩子们的卧床上面拨开了。并且,俄国……有着伟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表现了坚强的意志。一言以蔽之,俄国是非常受欢迎的。和它比起来,美国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往好处说,我们认为美国只是作了它应当作的事;如果往坏处说,英国人并不把美国人估价的比自己高。而且英国人一向是不把自己估价得怎样高的。”(卡罗尔编:《撰写中的历史》)

当时欧洲的战争,似乎实际上只是轴心国家和苏联作战。欧洲的命运取决于苏联人民能否打垮希特勒。苏军在冬季中显著地

扭轉了形勢，并轉入進攻。德軍在所有戰線上都受到攻擊。紅軍不但使用騎兵，而且軍隊和大炮都採用了滑雪板，以及利用馬橇和狗橇沖向德軍。蘇聯的游擊隊到處襲擊德軍的通信線路和補給線。蘇軍收復了莫斯科附近的大片土地，并在結冰的拉多加湖上鋪設鐵軌，對於被德軍包圍的列寧格勒進行了補給。在冬季里被紅軍奪回的城市從南到北共有十個以上。此後，德軍在中部以北的戰線上幾乎未能向前推進。希特勒在 1941 年秋季曾夸耀說：“為了消滅蘇軍達到勝利，今後只剩下掃蕩戰了。”然而到了這年冬季，德軍却不得不後撤，不得不面臨紅軍的頑強反攻。

德軍的再度攻勢

1942 年春，冰雪的溶化，給德軍的機動作戰提供了有利條件，希特勒又大舉進攻了。在這次攻勢中莫斯科已經不是德軍的目標了。德軍加強了對列寧格勒的包圍，但是它的主要進攻方向却是南方。堅守在塞瓦斯托波爾的蘇聯紅軍和群眾雖然進行了英雄的抵抗，但是克里米亞半島終於被德軍攻陷。德軍進一步侵入北高加索的一角，并向巴庫油田進犯。然而德軍南方戰線的最大目標是斯大林格勒。攻下這座位於伏爾加河下游的城市，就意味着切斷伏爾加河的大動脈，使高加索不能再向北部和東部地區供給石油、谷物、肉類、棉花、銅、錳等重要物資，給蘇聯的戰時經濟以沉重打擊。此外，情況十分明顯，如果德軍占領斯大林格勒，在伏爾加河畔站穩了腳步，它就能夠對莫斯科和巴庫取得軍事上的有利地位。7 月，德勃克將軍率領的大軍攻陷了頓巴斯煤田，占領了北高加索的門戶羅斯托夫，8 月 25 日，到達了斯大林格勒郊外。於是，對德蘇戰爭的前途具有決定意義的大會戰宣告開始了。

1942 年夏季，戰爭似乎到達了最高潮。北非的德軍重新得到本國的增援，在同年 6 月向埃及開始了全面進攻。6 月 25 日德軍

越过埃及边境，四天以后占领了同盟国军在北非的最大军事基地亚历山大港的前哨基地麦特鲁，7月1日又攻下艾莱门，距离亚历山大港只有大约一百公里了。于是，同盟国方面不仅要考虑亚历山大港的陷落问题，而且要认真地考虑苏伊士运河落到德军手中的问题了。

第二章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确立

第一节 近卫新体制运动

新党运动的初步方案

欧洲战争的爆发以及在战争初期希特勒“闪电战”的胜利，对挣扎在长期化的中日战争的泥潭中的日本统治者来说，不啻是从天而降的救星。他们一向企图夺取南方地区，作为军需物资的新的补给基地，由于纳粹德国席卷了法国、荷兰这两个殖民帝国，英国陷于困境，这就给予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它的野心，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在整个日本统治阶级之中出现了一种论调，即：进一步加强和德国的勾结，和德国的建设“欧洲新秩序”相呼应，来建设一个包括南方地区在内的“大东亚新秩序”。他们的口号是：“不要误了公共汽车”。

在这种情况下，支持米内内阁的各个派系间的不稳定的均势崩溃了，中间内阁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近卫和军部要清算中间内阁的呼声以形势的这种急转直下为媒介结合起来，他们为了迎接即将产生的强有力的“行动内阁”准备条件，发起了一个“新体制运动”。当然，这一运动强烈地反映了当时对于德国五体投地的情绪。因此，新体制运动首先是从组织纳粹式的新党的运动出发了。在这以前，新党运动者们只是常常谈论以近卫为中心成立新党的问题而已。至此，组织新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自从1940年2月发生了斋藤隆夫问题(参看第2卷,第5章,第3节)以来,老牌政党即陷于分裂和矛盾的漩涡中,并走到了最后瓦解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并和军部保持联系的久原房之助、永井柳太郎、前田米藏、山崎达之辅等人,在5月间又

和近卫的亲信风見章、有馬頼宁取得联系，进行策划組織新党，并在5月下旬拟就了“新党綱領草案”。这个草案包括以下三个項目：（一）建設“国防”国家，（二）开展外交活动，（三）确立政治新体制。此外，还附有“諒解事項”，規定新党将不吸收民政党的主流以及久原派中一部分人参加等等。（矢部貞治：《近卫文麿》）关于不吸收民政党主流及其他人士参加一节，据风見章在他的《近卫內閣》一书中所說，是由于他主張“必須存在着有强有力的反对党”，并取得了近卫的同意。但是，当时报纸、广播都一致地宣傳說，德国胜利的源泉就在于希特勒对全国軍民的統一和掌握；而风見章等人的伙伴有馬頼宁也曾向新聞記者宣称，他們这一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仿照納粹的作法，实现国民的政治組織化”。（《东京朝日新聞》6月11日）在这种气氛中，如果被排除在新党以外，就等于立刻失掉政治生命。因此，諒解事項中“不理睬現有政党中不参加新党的人”一語，是意味着对于沒有赶上浪头的民政党主流和政友会鳩山派的一种恫吓。

进入6月，随着德国在欧洲的进攻，新体制运动又有了进展。由老牌政党中亲軍部的、主張成立新党的分子联合組成的“貫徹‘圣战’議員联盟”（同年3月25日組成），在該盟6月3日的大会上通过并发表了“調整政治体制方案”，強調指出：为了“彻底消除国民的不安情緒，給国民指出前进方向，以便举国一致地貫徹国策”，必須成立“一个强有力的新党”。同月4日，有馬宣布近卫的出任已有百分之八十的确实性。同一天晚上，近卫本人也在記者招待会上說明了新体制的必要和自己对于新体制的关心。主張成立新党的分子已經一致表示了推举近卫为新党总裁。近卫出来的消息对促使政党的瓦解以及它們同新党的合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6月6日，主張成立新党的巨头久原会見米內首相，提出了三項建議：（一）清算追随英美的方針；（二）对援华的国家采取断然

措施；（三）确立高度“国防”国家体制。次日，米内拒绝了答复以上建议，于是，久原便立即辞去了内阁参议的职务。这是主张成立新党一派不信任内阁的一种表示。各政党，包括民政党在内，都表示同意久原这一行动。这样，到法国对德投降时，各政党都争先恐后地向政府提出强硬要求，敦促政府改变外交方针，这种情况简直象是在进行政党的大拍卖。所有政党都挖空心思尽一切办法，要比别的政党叫喊得更响，以便在即将产生的新党中取得优越的地位。

其次，政府还遭到了“革新”的右派强硬主张的压力。包括大日本青年党、东方会、国民同盟等等具有代表性的革新右派团体在内的东亚建设国民同盟，对于新体制运动，一方面保持警惕，不使这一运动成为挽救老牌政党的一个运动，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是实现自己主张的良机，企图建立对这一运动的领导权。中野正刚在给近卫的信里曾就成立新党问题写道：“如果聘请安达、末次、桥本和我参加，也就能够得到其他人士的谅解”（矢部贞治著前书），这表明他们对新党的领导权问题抱着多么幼稚的自负情绪。他们在6月23日和贯彻“圣战”议员联盟一道举行了国民时局恳谈会发起人会，通过了一项充满露骨的侵略野心的决议，要求：（一）坚决抛弃不参与世界大战的方针，共同建设新世界；（二）从整个亚洲驱逐维持现状国家的残余势力；（三）由亚洲人掌握亚洲的全部资源（《同盟旬报》7月10日），作为实行这种政策的前提，他们坚决要求“落伍的各种政治势力全部退出政治舞台”。

实现新体制的条件成熟了。近卫在6月24日辞去枢密院议长职务，发表了一项声明说：“愿为建立新体制竭尽绵薄。”在近卫声明以后，贯彻“圣战”议员联盟立即通过了要求政党解散的决议，次日，这个联盟的委员访问了各个政党。政友会久原、中岛两派立即对此表示赞同，而政友会中立派也决定和这两派采取同一步调。

同时，社会大众党也不甘落后，于 24 日发表宣言表明了解散的决心。另外，民政党也向来訪的貫徹“圣战”議員聯盟的委員表示該党无意与新党对抗。于是，老牌政党的瓦解已經是時間問題了。

倒閣运动和近卫的心境

米內內閣本来是在統治階級內部各派系間不稳定的均势和宮中势力的支持下勉强成立起来的，由于近卫出来搞新体制运动，使米內內閣的这两根支柱开始崩潰了。6 月 1 日，一向和近卫研究成立新党問題的木戶幸一继湯淺之后就任內大臣。报纸用“革新气氛在抬头”的大字标题刊载了这条消息。此外，对于近卫辞樞密院議長后的继任人选問題，政府沒有起用被认为已經确定无疑的平沼，而把副議長原嘉道提升为議長。《东京朝日新聞》在 6 月 24 日的晚报上竟用穿通三栏的大标题“首相終未接受近卫公的推荐”，并报道了“政府和新重臣們之間有了隔閡”。不久，这种对立便在木戶的言論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7 月 5 日，木戶听到神风队的余党前田虎雄等人阴谋采用恐怖手段暗杀米內、岡田、原田、湯淺、池田等人的案件被破获以后，曾就这个被破获了的案件向日皇报告說：“他們的言行固屬可恶，但是他們的动机却應該引起为政者深自反省。”（《木戶日記》7 月 5 日；《远东国际軍事法庭审判記錄》，第 59 号）暗暗地对政府表示了責难。在向日皇报告以后，木戶就和近卫討論了更換內閣时应采取的对策。

在这期間，因为近卫已被公认为新体制的中心人物，所以他的言行也就要发生深远的影响。只要新体制运动和內閣是互不相容的，那么就不难想象，近卫也不会希望內閣繼續存在下去，据一般人估計，他辞去樞密院議長的职务，就是証明了这一点。参加新党运动的分子认为，近卫辞去樞密院議長是为他帶着新体制上台开始准备工作，而表示欢迎。此外，当时还流傳着这样的消息：虽然

政府表示願同新体制合作，但近卫却坚决主張不要理睬。而据《西园寺公与政局》一书所載，当时米內曾气愤地說道：“政变是經過近卫同意的”。这样，从第三者看来，近卫的行动分明是在要求內閣下台。

近卫本人的想法究竟是怎样的呢？关于这点还有討論的必要。因为战后发表的近卫手記以及其他有关近卫的大部分著作都异口同声地說：新体制运动同軍部的倒閣运动合流，是完全違反了近卫的意图；并強調說，近卫所要求于新体制运动的，勿宁說是想以强有力的国民組織为背景来約束軍部，想借此造成一种印象：近卫是一个在强大的軍部面前未能貫徹自己理想的“悲剧的政治家”。

然而，《木戶日記》中載有近卫、有馬、木戶三人如下的協議事項。（这是在近卫积极地表示要搞新体制的前夕5月26日，三人秘密協商决定的关于新党的初步方案，这个方案后来在近卫上台期間付諸实施了，虽然形式上稍微有了改变。）

（一）在奉到組閣命令以前，不积极策划完成新党。但由于政党方面自发的行动而产生建立新党的气氛时，可以考虑。

（二）接到組閣命令时应考虑事項：

1. 設置以陆海两軍參謀总长、內閣总理大臣和陆海軍大臣所組成的最高国防會議。

2. 听取陆海軍关于国防、外交和財政的要求。

3. 表明建立新党的决心，对各政党提出解散要求。

（三）只由总理大臣和陆海軍大臣組成內閣，其他各大臣暫定为兼职。但根据情况，可以选任閣員二三人（例如外务大臣等）。

（四）新党成立以后，由黨員中选任其余全部閣員。新党成立前选任的閣員，必須加入新党。

一目了然，他們是想对軍部施加某种約束，然而决不是要压制

軍部的要求。这个文件表明：他們只是想組成一个全面体现軍部要求的納粹式的新党，把軍部也包括在內，并在这个基础上，要把政治放在軍事之上。近卫在6月4日的記者招待会上就新体制和軍部的关系表示：“互相协调当然是必要的，然而也不应该一味地仰承軍部的鼻息，盲从軍部。我們也将吐露苦衷，而軍部也应该寬怀采納，……归根結底，应该向軍部进逆耳之言必須和軍部打成一片向前迈进。”（《东京朝日新聞》6月15日）这段話也包含了上述意图。

那么，近卫对新体制运动和倒閣的关系的看法怎样呢？当时，在近卫与米內內閣之間，虽有不可逾越的鴻沟，然而，据原田直接向近卫詢問的情况，新党派的宣傳和米內的憤慨都是沒有根据的，近卫在回答原田的問題时明确表示：“自己不想倒閣，并且如果政府对于新体制采取合作的态度，我很高兴同政府进行商談。”（《西园寺公与政局》）另外，近卫在7月7日在輕井澤接見記者时也指出，有人认为要建立新体制必須有行政上的权力，然而他并不是这样想法。他說：“虽然会多少有些不方便，我想对这点（指缺少行政权力）采取忍受的态度”，并且还暗示为了弥补这种不方便，他甚至希望政府方面予以协助。近卫在上述5月26日关于新党的初步方案中认为成立新党需要行政权力，并因此而就組閣的方式进行了种种协商。但是到了7月7日，他为什么又不能不表示少許不方便可以忍耐呢？首先可以想到的是，近卫是不是也想极力避免公开表示倒閣的意图从而对倒閣負責。然而这一点还不能全面地說明近卫的曖昧态度。此外，还应该考虑到近卫对反对新体制的势力的顾虑。5月26日拟定的要統一掌握国防国家体制的新党的初步方案，当然要以对官僚势力的某种限制为前提，新体制运动的进展，终于把这一极端困难的問題提到日程上来了。反对新体制的势力搬出“国体”来开始了进攻。担任这次进攻的急先鋒

是所謂的“觀念右派”。他們雖然也同樣地贊成取消旧政党，但是对于以一国一党为目标的新体制运动也大肆非难，认为这是策划“恢复幕府政治”。这种責难似乎給予了近卫的尊皇思想和八面玲瓏的性格以不小的打击。于是，近卫便在国体这面牆壁和搞新党运动之間感到左右为难了。近卫在上述7月7日的同一談話中說：“根据宪法，日本政治要在权力均衡的基础上謀求稳定。而新体制却要求依据国策把一切力量統一地、全面地組織起来，这里似乎存在着問題。然而，新体制当然要以宪法为准則，并坚决依靠运用宪法来进行工作。”这段話可以証明，当时近卫确是在拚命要摆脱这种尷尬处境。也可能就是由于这种尷尬处境，近卫才不敢公开地表明他的倒閣意图。因此，近卫在临近組閣的时候所以表現了一些躊躇，絕不象近卫手記等所說的：因为新体制运动違反了近卫的“理想”，走上了和軍部的倒閣运动汇合的道路；而是由于使他成为独裁者的新体制的初步方案面前，还矗立着一面厚厚的“国体”的牆壁，在这面牆壁之前他表示畏縮了。

米內內閣的倒台

虽然这样，由于米內內閣已經被认为可能要“耽誤公共汽車”，所以不管近卫的主觀願望如何，局势还是在向前发展。至此，已經不存在任何东西可阻止以統帥权独立为武器的軍部攻击米內內閣了。

近卫发表辞去樞府議长的声明的次日即6月25日，陸軍大臣畑俊六向次长以下部內全体軍官作了一次演說。在这次演講中，他对新体制运动的进展表示祝賀，同时还說：“不能陷于腐儒的空談而坐失千載难遇的良机”，表明了軍部对“建設大东亚新秩序”的强硬要求。（《同盟旬报》，7月10日）仅仅在半年以前，作为直接軍事責任者的軍部，还在焦虑怎样才能不失体面地从战争的泥潭

中拔出腿来。正因为这样，他們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許错过了摆在面前的这似乎不仅可以解决侵华战争，而且可以拿到整个南方庞大资源的“千载难逢的良机”。

另一方面，米内内閣已先后就荷印、法属印度支那等个别问题表明了“帝国的深切关心”，这时，它认为应该进一步表明它对整个南方地区的总的方针了。当时，报纸上报道政府已经准备好了“确立东亚自主的宣言”。这个宣言，在6月29日，由有田外务大臣以“国际形势和帝国的立场”为题通过广播加以发表了。（参看第2卷，第5章，第3节）有田在这次广播中把东亚和南方地区的关系说成是：这些地方“有着一种自然的命运，必须互相倚赖互相帮助，有无相通，实现共存共荣，以维持和平和促进繁荣”，企图把“东亚新秩序”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南方地区。据新闻报道，外国的反应都认为有田这次广播阐明了日本的新外交方针，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有田这次广播却出乎政府意料之外地招致了军部的不满。表面的理由是陆海外三省当局在事先就广播内容进行讨论的情形被泄漏出去，而且歪曲了军部的意图。因此，在30日外务省情报局长须磨受到了宪兵的传讯，接着，有田、米内都受到了军部的严重抗议，结果，使外务大臣有田不得不就发表的程序问题表示了道歉（7月3日）。据当时政界的观察，这个事件发生的原因是由于有田抢先发表了军部想说的话，招致了军部反感。因而攻击了政府。在这以前，军部就认为米内内閣的方针和它一贯的对德国的态度是不能够积极地同德国进行合作，因而感到不满，这种不满情绪由于这次政府的态度而爆发了。军部单纯以程序问题为理由向政府进行攻击一事，也是军部公然进行打倒内閣的前奏。

在同一时期，在参谋本部内，中坚层军官向首脑部提出了意见说“以现政府的陣容，絕不可能应付最近的世界局势而有所作为”（《本户日记》，7月8日），参谋总长閑院宮积极支持了这个意见。

据当时的参謀次长塚田攻在远东軍事法庭上的供詞，当塚田往訪陸軍次官阿南惟几傳達参謀总长的强硬意見时，获悉在陸軍省方面，自次官以下全部贊成更換內閣。听到这种情况以后，参謀总长便作出結論說，既然这样，就應該让陸軍大臣辞职。如上所述，畑俊六本人在发言中一貫积极地表达了軍部的意图，只因他在参加米內內閣时，日皇曾經要他支持这个內閣，因而不能公开地进行倒閣的活动。由于陆相的立場是这样，所以就利用参謀总长授意陆相辞职，借此来达到倒閣的目的。7月8日，阿南訪問木戶，傳達了以上情况，并說明了軍部的决心，他說：“米內內閣的做法极不利于和德意进行协商，有誤事的危險。为适应目前重大时期的需要，也只好更換內閣。”（《木戶日記》，7月8日）11日，軍务局长武藤章又去見內閣書記官长石渡，要求政府考虑陆相的困难处境，自动辞职。石渡拒絕了这一要求，于是武藤便悻悻地說“那么，畑陆相可就要辞职了”，随即拂袖而去。米內得悉武藤的要求以后，在次日即12日特召見畑陆相詢問这件事。畑說：“請把他們的意見看作他們私人的意見”，但接着又說这是我私人的意見，我认为：“归根結底，內閣还是辞职为妙”。（《西园寺公和政局》）这件事說明了畑俊六的既要倒閣又不敢公开表示的尷尬处境。不久，陆相畑接到了参謀总长授意他辞职的信件。7月16日，他向米內提出辞呈，內称：“近来內閣的方針和自己的信念不相容，长此以往，将无法統率全軍”云云。

第二次近卫內閣和基本国策綱要

新体制运动为“行动內閣”彻底扫清了道路。于是，近卫便打着确立新体制和“建設大东亚新秩序”这两块招牌登上了舞台。形势的发展已使提名近卫組閣成了定局，因而，討論內閣首相继任人选的重臣會議只开了三十分钟就結束了。因对近卫的前途感到不

安，西园寺在这次會議上竟然放弃了作为元老的特权，沒有提名近卫，然而西园寺的这种态度完全沒有受到木戶的理睬。7月17日，近卫接到了組閣命令。

近卫接到命令以后，立即着手組閣。他的組閣方式是打破前例的。近卫首先选定了陆、海、外三个大臣。19日在荻外庄邀請这三个人开了一个所謂荻洼會議。在这个會議上討論并确定了內閣的基本方針以后，这才进行决定其他閣員的人选。根据荻洼會議席确定的基本方針，后来制定了“基本国策綱要”和“适应世界形势处理时局綱要”，因此，在这个方針指导下組成的內閣中，保證了軍部的发言具有压倒一切的权威。7月22日正式成立了第二次近卫內閣，閣員名单如下：

內閣总理大臣 近卫文麿。外务兼拓务大臣 松岡洋右。
內务兼厚生大臣 安井英二。大藏大臣 河田烈。陸軍大臣 东条英机。海軍大臣 吉田善吾。司法大臣 风見章。文部大臣 桥田邦彦。农林大臣 石黑忠篤。商工大臣 小林一三。
递信兼鐵道大臣 村田省藏。不管部大臣兼企划院总裁 星野直树。內閣書記官长 富田健治。

新內閣在7月26日的內閣會議上决定了“基本国策綱要”，接着，又恢复了第一次近卫內閣下台后中断了的大本营政府聯絡會議，决定了“适应世界形势处理时局綱要”。在这两个綱要中所体现的第二次近卫內閣的基本方針如下。

首先在外交方面，不論在封鎖援蔣活动、結束侵华战争的問題上，或者在控制南方地区、建設“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名詞是在8月1日松岡外相的談話中被第一次公开使用——的問題上，当然都要預料到英美两国的阻撓，因此要把同德意的关系（日德意防共协定）提高到軍事的結合，借以排除英美的阻撓。在这里，所謂南方，大体上包括“印度以东，澳洲、新西兰以北”地区。为了控制这

个地区，在結束了侵华战争以后，固然要“寻求良机，行使武力”（处理时局纲要），即使在沒有結束侵华战争以前，原则上“也要在不与第三国开战的限度內采取措施，而如果内外形势的发展特别有利，也可以使用武力。”（同上）在使用武力时，力求把对象限于英国一国，但同时“考虑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可能必須同美国开战，所以要作好充分准备。”（同上）对于苏联，为了避免两面作战，要“大大調整日苏关系。”（同上）

內政的基本方針是适应外交方針的上述轉变完成“国防”国家的体制。为此，首先在国民中間“树立以效忠国家为第一义的国民道德。”（基本国策纲要）其次，要求“建立坚强的新政治体制，以謀求一切国政的集中統一。”（同上）很明显，內政的中心問題是用政府的力量来推动新体制运动向前发展，然后再利用新体制的政治力量来加强政府的法西斯权力。又次，在經濟方面，大大加强1939年秋季以后陷于停滯的軍需生产，并采取各种措施为新近列入日程的战争作好准备，把“建立一元的統制机构”作为中心任务。这就是說，为了配合国政的一元化，要求經濟統制也实现一元化。

新体制的开始

这时，旧政党已經自动解散了。7月6日社会大众党首先宣告解散，7月16日政友会久原、中立两派召开解散大会，26日国民同盟，30日政友会中島派相继解散，到8月15日，最后余下的民政党也宣告解散了。他們組成了促进新体制同志会，一心期望近卫成立新党，并于8月17日以同志会名义发表了“新体制纲要”，再一次強調成立新党的必要。这一纲要清楚地反映了当时主張成立新党的分子对于新党的看法，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件。根据这个纲要，新体制将“彻底清算政治、經濟、文化各个领域中的旧有的个人主义体制，而以一切归于天皇、万民輔弼的国体观念为

基础”，是“根据领导者原理，反对经济至上主义”的体制。其中，在政治上的新体制即“新政治体制”下，要建立起以政府和军部的有机结合为前提的领导国民的力量，这就是新党。这个新党将“否定必须由当选議員組成的旧的政党观念，……而是一种革新运动领导者的同志式組織”，它将“和政府表里一体帮助政府对国民进行政治指导。”新党的任务是，“对于政府决定国策，通过議會或采取其他适当办法，献策建議；对于政府推行国策，要作好宣傳工作，使国民充分了解和积极支持”，也就是要起到“上意下达，下意上达的有机的桥梁作用”。为此，“必須成立居民組織，作为国民的基层組織，由新党担任这项指导工作，同时，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以及經濟团体和文化团体等也全部置于新党的领导之下。他們最害怕的是，新体制运动变为精神动员式的运动，只搞些加强官僚机构的工作。因为如果那样，不仅起不到新体制的作用，而且他們自己也将沒有立足之地了。

与此同时，政府本身也根据“基本国策綱要”为实现新体制而进行筹备，8月23日宣布成立新体制筹备委员会，由下列筹备委員二十六人、常任干事六人組成。

筹备委員：（貴族院）后藤文夫、有馬頼宁、大河内正敏、井田磐楠、堀切善次郎、太田耕造；（众議院）永井柳太郎、小川乡太郎、前田米藏、岡田忠彦、金光庸夫、麻生久、秋田清；（学界）平賀让；（經濟界）井坂孝、八田嘉明；（外交界）白鳥敏夫；（右翼团体）末次信正、桥本欣五郎、中野正刚、葛生能久；（自治团体）岡崎勉；（言論界）古野伊之助、高石眞五郎、正力松太郎、緒方竹虎。

常任干事：內閣書記官长富田健治、內閣法制局长官村瀬直养、企划院次长小畑忠良、陸軍軍务局长武藤章、海軍軍务局长阿部胜雄、昭和研究会常任委員后藤隆之助（后来追加內务次官挾間茂和同盟通訊社編輯局长松本重治）。

第一次新体制筹备会是在8月28日召开的。非常有趣的是，这次总结新体制运动的第一次大会上，首先发表了暗示新体制运动已经改变方向的近卫声明。如前所述，近卫在已经腐朽僵化的“国体”面前表示了畏缩，而在这次声明中，他竟然把自己“理想”中的“国民组织”的政治力量限定在“国体”这个框框以内了。近卫声明中说：

“这样，这一运动虽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但决不是所谓政党运动。……勿宁说它应该成为使一切政治党派、经济团体、文化团体在公益优先的精神下统一起来的超越政党的国民运动。……身在庙堂之中，肩负辅弼重责的人，必须站在整体的立场上，不允许从事其在本质上属于这一部分同那一部分对立斗争的政党运动。……然而，我们也坚决反对采取所谓一国一党的制度。……不管这种制度在其他国家取得了多么卓越的成就，然而要把它搬运到日本来，那将违背我们一君万民的国体根本精神。在我国，万民都有‘翼赞’的责任，绝不允许某个人或一个政党利用权力壟断‘翼赞’的职责。”

这样，近卫所说的“高度政治性”，归根结底也不过是动听的空话而已。想利用国民组织的政治力量来推行国政的新体制的初步方案也终于落空了。因此，在8月26日最后一次讨论即将发表的近卫声明的常任干事会上军务局长武藤章曾主张从声明稿中把否定一国一党的“近卫总理的声辩”这一部分删去，也是很自然的。（《远东军事法庭记录》第315号）

而且，筹备委员会的人选也具体反映了近卫避免“壟断翼赞”的意图，在委员会中广泛地包括了天皇制下的各个派阀的代表人物。因此，这一委员会也就成了两派人激烈争吵的场所，其中，一派人是追求新体制原初目的的，另一派人则是要把新体制变为八面玲珑的精神运动。在前后六次筹备会和在这期间召开的各种小

組会上，国民組織的核心是否應該具有政治力的問題成了爭論的焦点，圍繞着这一核心应称为“党”或至少称为“会”，还是只称为“运动本部”的問題，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圍繞着国民組織是否應該成为官僚的一个單純的輔助机关的問題，也就是这个組織的總裁由首相兼任，还是原則上由別人担任的問題，进行了爭辯。此外，地方支部长应由县知事兼任还是由民間人士充任，是决定国民組織的性质的問題，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經歷了这些过程以后不久，新体制运动的核心組織“大政翼贊会”宣告成立了。在10月12日翼贊会成立大会上，近卫的致辞又一次使主張成立新党的分子大吃一惊。近卫說运动的綱領以及宣言尽在“实践大政翼贊的臣道”这句话中，无須另行发表。他还肯定地說：“只要我們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崗位上日日夜夜，竭誠为天皇服务”，就一切都解决了。对于近卫的这次讲话，据說只有属于“观念右派”的一小撮人鼓了掌。

近卫所以“改变方向”，不用說，是因为受到了宫廷势力的牽制。日皇曾一再促使近卫注意：“新体制运动不要和宪法的精神相抵触。”这时，现实的木戶已經抛弃了搞新党的計劃。財閥圍繞“經濟新体制”进行的活动直接影响了宫廷势力。

新体制組織被閹割

“基本国策綱要”中列举的“建立一元的統制机构”也是財閥从米內內閣时期就已經提出的要求。財閥企图通过这一步驟，把中日战争以来急剧增多的各种統制法令和統制机关加以整理合并，以便适应掌握各个产业部門实权的財閥康采恩以及它所領導的卡特尔的組織形式，并尽量縮小当时已經迫近的經濟危机的冲击。米內內閣倒台以后，他們很快地就在7月19日再一次強調这一問題的重要性，主張：“如果不能把經濟新体制彻底組織起来，也就难

望實現政治新體制”(中央物價對策協力會議常任委員會決議，見《同盟旬報》7月30日)，並且不等政府的“妥善處理”就自動地着手成立各個產業部門的卡特爾之間的橫的聯絡機關。財閥主張，統制工作應該交給財閥擔任，政府只掌握原則就可以了。他們把這種形式稱為“自治統制”，8月29日成立的鋼鐵、煤炭、電氣等六個產業部門的卡特爾組織的聯絡機關“重要產業統制團體懇談會”就是這種“自治統制”的一個典型。

在同一時期，政府方面也以企劃院為中心進行制訂關於“經濟新體制”的方案，擬就了“確立經濟新體制綱要”草案，並把它提交到11月12日召开的經濟部門閣員懇談會上討論。這一綱要強調企業的公共性，規定統制機構必須以領導組織為基礎，領導者可以由政府任命。財閥認為這種辦法可能損害自己的“自治統制”。他們惟恐別人對自己的王國染一指，因而對這一方案表示了猛烈的反對。在政府內部，小林商相最反對這個方案。最初，小林的入閣是由於商工省次官岸信介的提議。岸信介主張：“加強統制，無論如何是不能依靠官僚來辦。應該利用實業界人士。必須使人感到‘這是某人搞的，所以只好接受’”(矢部貞治：《近衛文麿》)但是岸信介的這個主意完全落空了。小林玩弄各種花招頑強地進行了鬥爭，以致在第七十六次議會上引起了“洩漏機密問題”而受到攻擊。小林完全不擇手段，甚至造謠說這個方案的擬訂受到了共產黨的操縱。各經濟團體，為了聲援以小林為中心的政府內部的反對派，也起來異口同聲地對這個方案表示反對。這樣一來，政府已經不可能不顧一切地堅持原案。如果那樣，這最關緊要的“國防”國家的經濟基礎就要垮台。即使軍部也不得不承認這種情況。正是由於這種情況，及川海相(9月5日任命)在11月29日的內閣會議上代表陸海軍建議說：“施行各種經濟措施，應該把重點放在處理時局的問題上，必須避免因為改革而造成哪怕是一時的生

产下降或人心不安。”（《同盟旬报》12月10日）这项建議意味着陆海軍已經承认企划院的草案必須修改。財閥对于企划院草案的这种反对必然会表现为对于翼贊会的不信任。当时，翼贊会的經費是仰賴住友銀行、三菱銀行等接济的。在圍繞“經濟新体制”問題发生爭吵的前后，銀行方面借口翼贊会要搞赤化，而停止了对翼贊会的撥款。（矢部：近卫文麿；风見章：《近卫內閣》）于是，翼贊会首先在財政方面发生了破綻。翼贊会失去了財政基础以后，天皇制官僚还要进一步夺走它的政治力。

官僚，尤其是內务、司法部門的官僚，最怕新体制将会限制自己的权力。同时，假借新体制运动的名义对官僚进行的攻击也确是相当猛烈。这里举一个例子，10月11日原田曾向近卫談过以下情况：“新体制固然也好，但地方官和行政官却表示非常担心，不知新体制施行以后自己将落到什么地步。……目前在清水一带的桥本欣五郎的徒党，也就是那个大日本青年党的分子，向来就已經够討厭的，而喊出新体制以后，更不把县知事和警察放在眼里。当他們集合听众举行讲演的时候，簡直是在有意識地玩弄政府。实在糟糕得很。”（原田：《西园寺公和政局》）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同时原田說这話也可能有些誇張，但据此也可以看出官僚們是多么不安和反感。他們在新体制的筹备会上始終坚持国民組織的地方支部长应由县知事兼任，也正是由于这种关系。在筹备会还没有就这一点作出决定以前，內务省为要造成既成事实，就在9月1日公布了充实加强村会組織、街道組織和邻里組織的法令，打算把这些东西作为新体制的基层組織。这就是說，內务省认为指导和建立国民組織的工作應該属于自己的权限。此外，在貴族院、樞密院方面也显然存在着不信任新体制的气氛。就在此时，財閥和政府“經濟新体制”問題上展开了爭辯。財閥作为反对企划院草案的理由，除指責这个方案阻碍生产，无視民間的創造性以外，

还說它是“背离国体观念和破坏家庭制度”。这些话是日本經濟联盟会会长乡誠之助在12月4日向經濟界代表发表演說时談到的(《男爵乡誠之助君傳》),可見对于資產階級來說,只要稍許侵害他們的私人利益,就等于是破坏国体和家族制度。配合資產階級的这种論調,內务和司法部門的官僚叫嚷要維護国体。这就是說,企图保持傳統的特权地位的內务、司法部門的官僚們借着这个机会想和利用統制經濟的潮流在官場中不断擴張势力的商工、农林部門官僚相抗衡,来討取財閥的欢心。

翼贊会改头換面

圍繞翼贊会的斗争的趋向已經很明显了。在上述11月29日軍部向閣議建議中,一方面有些气势汹汹地說:“要断然扫除一切不純的政治策动和迷惑民心的流言蜚語”,对当时一部分人发起的倒閣运动表示了反对,另一方面說到“必須从速完成体制,使官民一体都能朝着实践臣道的方向勇往迈进”的时候,紧接着就說必須避免“因为改革而造成生产下降”。由此可見,軍部也同样地不得不避免由于政治改組使統治体制繼續動蕩下去。12月6日,內务、司法部門官僚的首領平沼就任国务大臣。这位一向主張翼贊会“在政策問題上和政府处于平行地位是違反臣道”的平沼的入閣,就是为了剝奪翼贊会的政治力。(《东京朝日新聞》,12月7日)至此,第二次近卫內閣可以說是已經变质,成为近卫、平沼联合內閣了。恰好就在平沼入閣的第二天——12月7日,“經濟新体制确立綱要”以充分採納了財閥要求的形式,通过了閣議,这决不是偶然的。

因为內閣的变质,由于主張成立新党而当上了內务大臣和司法大臣的安井和风見被罢免了,在12月21日,平沼和他的党徒柳川平助坐上了这两把交椅。和企划院串通一气領導“經濟新体制”

工作的岸信介也丢了商工省次官的职务，参加起草企划院方案的企划院调查官稻叶秀三、正木千冬、佐多忠隆等人于12月末以“赤色分子”嫌疑而被捕了。必须指出，“经济新体制”的争论，决没有触动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企划院次长小畑忠良也说过，这番争论，只不过是围绕“怎样使建设高度‘国防’国家的力量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在翼赞会中央协力会议上的讲话，见《同盟旬报》12月30日）的方法问题展开的。这个企划院的草案，如果适逢其时，也可能象德国纳粹党的纲领一样为资产阶级所采纳。

内阁的变质，也给内阁一手培植的翼赞会的性质，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同时，在对于新党的投机上失败了旧政党分子，逐渐对于置身翼赞会议会局中无事可作的情况感到不满，而纷纷离开了议会局。他们指责议会局“作为大政翼赞会的一个组成部分，站在帝国议会和政府中间担负联络结合的任务”（在议会局负责人第一次碰头会上局长前田米藏的致词），认为这是干预宪法保证下的议会的辅助职能。为了离开翼赞会的立场而参加第七十六次议会，他们组成了议员俱乐部。这样，翼赞会最初规定的各种职能一个个被剥夺掉，到1941年2月22日平沼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宣布“翼赞会不是政治结社而是公众团体”以后，便完全结束了生命。在第七十六次议会上，翼赞会被指责违反宪法而受到猛烈的攻击，结果，在议会闭幕后的2月26日，有马赖宁以下全体负责人提出辞呈，中间经过设置副总裁和柳川平助就任副总裁，于4月2日，翼赞会的办公机构被缩小，只剩下总务局、组织局、东亚局和中央训练所几个部分。改组后的翼赞会完全变为官僚的辅助机关，每年由政府拨给八百万日元经费，并完全处于内务官僚挟间茂（组织局长）和熊谷宪一（总务局长）的领导之下。

在这以后，财阀仍继续要求政府在法律上承认自治统制。近卫为了消除政府和财阀之间由于有关“经济新体制”的争论而造

成的隔閡以及尊重財閥的意思，在4月初再次改組了內閣。住友財閥的小仓正恒曾表示：“以往的战时革新政策完全流于概念游戏，不切合并脱离当前的实际情况，因而挫伤了‘企业心’”。（在記者招待会上的談話，見《东京朝日新聞》4月5日）近卫为了根据鼓舞“企业心”的原則来修改以往的政策，聘請小仓担任国务大臣兼首相有关經濟問題的最高顧問。另外，爭論的当事人小林和星野一同下野，分別由丰田貞次郎和鈴木貞一继任。

产业报国运动的产生

随着中日战争的进行，政府对于工人运动的压迫日益严峻，因而工人階級的抵抗逐漸失去了組織性。（参看第2册，第2章，第3节和第4章，第2节）然而，就是这样的抵抗，对于必須准备更大規模的战争的統治集团來說，也是不能允許的，甚至表現为缺勤率、移动率增长等消极抵抗，只要对生产起消极作用，在他們看来，都是很大的威胁和障碍。針對这些情况，他們一方面采取了就业時間統制令、工資統制令、工厂企业管理令等法律措施；另方面策划开展了所謂产业报国会运动。

1938年2月2日，“協調会”設置了时局对策委員會，在委員長松岡均平的领导下，研究了战时和战后的社会政策，并由其第二專門委員會制定了一項“劳資关系調整办法綱要”。产业报国运动就是这一綱要的具体化，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一运动的方針是：在各种企业单位中成立产业报国会組織，作为全国性的組織成立产业报国联盟，根据产业报国的精神，劳資打成一片，共同为国家服务。

“協調会”为了实行这一方案，向全国主要工业城市的企业主和工人进行活动，一方面宣傳他們的方針，另一方面着手建立产业报国联盟，并于7月15日，推举河原田稼吉、成田一郎、长岡保太

郎、松本勇平、町田辰次郎、膳桂之助、三輪寿壯等人为筹备委員，7月20日举行了成立大会。这一运动，迎合时代潮流，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同年年底，已經有一千一百五十八个企业单位(五十人以上)成立了产业报国会的組織。

产报会成立情况

(1938年12月末)

业 别	企业单位数目(A)	成立数目(B)	$\frac{B}{A}$ %
工 业	7,875	1,027	13.0
矿 业	661	80	12.0
运 輸 通 信	625	17	2.5
土 建 业	765	15	2.0
其 他 合 計	10,437	1,158	11.0

产报运动标榜“劳資一体”、“企业一家”、“产业报国”的“理想”，排斥阶级斗争的思想，主張企业主对于从业員应该象父亲对待子女一样，对于从业員的經濟和文化生活加以維持和指导；它的組織形式是以經理、厂长或企业主为会长，把企业主、職員和工人統統包括在內；运动的重点是在培养产业报国精神的同时，提高效率，提高技术水平以及办理福利工作。产报运动毕竟是一种单纯的精神运动，劳資双方都对此表示消极态度，只有想利用这个組織的天皇制官僚和想借此謀求个人地位的旧工会組織的干部們表示积极。例如：社会大众党就对产业报国会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并决定了如下的方針：“重視这一运动发展为产业部門中的国民协力組織的可能性。我党願和支持它的工会組織合作，积极参加这一运动，并坚决以我們的努力促使它向好的方向发展，以便进一步确立起国民組織。”另外，工会會議也在1938年7月10日的扩大执行委員會上发表声明說：“我們虽然认为在产业报国会的組織的运用方面存在着二、三缺点，然而我們要参加这一运动，同大家齐心

协力尽可能克服这些缺点，为实现产业报国会本来的目的——真正的产业报国和劳资协调而努力。”

然而，随着时局压力的加重，工会会议的阵营内部发生了分裂。船员的唯一组织、拥有十一万会员（1937年）并与日本船主协会缔结了集体合同，具有左右船员力量的日本海员工会，当产业报国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迅速地把海员协会和日本船主协会合并组成的海事协同会改名为皇国海上同盟，并强调海上劳动者团体的特殊性而退出工会会议，于1938年10月成立了皇国海员同盟。此外，日本钢铁工业从业员工会也强调八幡制铁所的特殊性而在11月6日退出了工会会议。接着，东京电气从业员工会也在12月25日退出了工会会议。

工会会议不仅由于海员工会和其他有力工会的退出而大为削弱，而且构成工会会议的核心力量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内部也在产业报国运动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的分歧。松岡駒吉、西尾末广等属于原总同盟一派主张在坚持工人的“自主组织”的条件下参加产报运动的脚踏两只船的方针；而河野密等属于原日本工会会议的一派人则主张全面响应政府的国策，解散工会，与产业报国会合并来全面地支持国策。两派各执己见，互不退让，结果在1939年10月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发生分裂。属于原全日本工会会议的一派发表一项声明说：“我们打算运用多年的经验，发扬爱国精神，全力支持政府，来服从重大时局下国家的至上命令”，退出了总同盟并立即组成“产业报国俱乐部”，力图在产业报国运动中争取地位。属于原总同盟的一派重又改回日本劳动总同盟的旧称，继续作为工会的领导干部力求在产报运动中保持自己的地位。

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的成立

世界形势和战争进入新的阶段，迫切地要求生产的飞跃发展。

为了把“只有軀壳而无灵魂的烏合之众”的产业报国会变为“建立新产业劳动体制,发挥全体产业人員一切力量”(金光厚生大臣語)的組織和运动,于1939年4月,政府推开了以往的协调会,亲自出馬,作为这个运动的主体,負責领导工作。由于这种行政权力的推动,产业报国运动总算在組織工作方面有了迅速的发展。

1940年7月成立的第二次近卫內閣,集中全力来充实天皇制法西斯机构。政府大力开展以建設高度“国防”国家为目标的“近卫新体制”运动,打算对政治、經濟、文化各个方面的机构进行改組,以便建立法西斯的統治体制。在这种情况下,产业报国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深入到全国各地,到1940年9月間,产业报国会組織的总数达到七万左右,参加的企业单位超过二十四万六千个以上、会员人数超过了四百一十八万人。政府的方針是只发展产业报国会組織,而不让工会存在,在1940年2月16日的議会上,政府表明“它的方針是希望工会实行‘发展的’解散,并且通过产业报国运动的普及和发展来消除工会运动的必要性。”由于这种統治者的大力推动和一时潮流的影响,再加上“警察方面的‘献身’努力”,产业报国会的組織日益扩大,而工会組織却陸續解散了。

在日本工会运动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劳动总同盟,由于属于原全日本劳动总同盟的一派人的退出,內部出現了解散論和外部法西斯压力的加强,終于1940年7月8日召开中央委員会,自行解散,結束了它的历史。另外,日本海員工会虽曾很快地迎合了产业报国运动組成了海軍协同会,但为期不久,又出現了建立海上劳动新体制的趋势,决定把海运业的所有組織統一起来,建立一个以递信大臣为总长的由官劳資共同組成的日本海运报国团。为了适应这种形势,海員工会在9月30日召开临时大会,宣布解散。其他海員协会、皇国海員同盟、海事协同会也都宣布解散,在1940年11月22日从新成立了实现海上劳动新体制的日本海运报国团。

作为“合法左翼工会”进行了长时期活动的东京交通工会(东交)也无力抵抗当时的潮流,在7月7日决定并入产业报国会,同时大阪市电车工会、大阪汽车工会也宣告解散了。此外,递信从业员会同盟(2月22日)、递信从业员会联合会(4月30日)、“东京煤气工会”(5月2日)、“东京电车职员同志会”(6月21日)、“大阪市从业员工会”(7月10日)、“日本港湾从业员工会”(9月18日)等也先后宣告解散。日本工会会议也在7月19日决定解散。

在1940年2月2日的第七十五次会议上(米内内阁时期),由于民政党议员斋藤隆夫发表批评中日战争的演说而引起了撤销他的议员资格的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社会大众党内部的属于旧日本工会会议的一派和属于旧社会民众党的一派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对立,结果反对开除斋藤的安部磯雄、片山哲、水谷长三郎、西尾末广等八名议员被开除了。被开除的八名立即要另组新党,但是遭到了政府当局的禁止。而落到旧日本工会会议一派手里的社会大众党,一面歌颂政治新体制,一面根据官方和军部的要求主动地宣告解散了(7月6日)。

农民运动也在中日战争以后改变了方针。全国农民协会虽然改为大日本农民协会重新出发(1938年),但是在经不起时局的严重压力,终于在1940年9月宣告解散了。另外,作为最后一个农民运动组织于1939年11月29日成立的农地制度改革同盟(山谷义治、平野力三、三宅正一、野沟胜、须永好),也在1942年被政府勒令解散了。

然而,产业报国运动虽然在组织上取得了以上的进展,但是它并没有能够越出精神运动的范围,实际上,它的组织并没有起到统治者所设想的那样作用,因此统治阶级的期待大大落空了。于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不得不一再进行改组,第二次近卫内阁为了建立强迫劳动和灌输侵略思想的统一体制以便加强战力,终于在

1940年11月決定了一項“確立勤勞新體制綱要”，內稱：“鑑於要完成高度‘國防’國家體制和提高國家生產力，必須大大加強國民的勞動，因此在促使全體勞動者最大限度地發揮創造性和能力的同時，採取措施對勞動者進行教育、培養和適當的安排，以便確立起可以充分動員勞動力的勞動新體制。為此，特就樹立勞動精神、建立資本、經營、勞務三者有機結合的整體——企業單位的勞動組織及其聯合組織，以及充實行政機構，指示如下。”根據這一綱要，作為國內新體制的一環，對產業報國會進行了改組，把它改組為一個“上意下達”的一貫到底的權力組織——“大日本產業報國會”。這樣，在全國八萬四千工場中建立了包括四百五十萬工人的，由內務省和厚生省掌握領導權、從中央指導部以至所有重要職位都為官僚所佔據的，龐大的壓迫工人的官僚組織。產業報國會的組織工作，是在中央的內務省警保局和厚生省勞政局、地方的警察和縣勞政部的督促下進行的。它是一個官僚統制機關，這從它的人事上就可以看出。例如，中央產業報國會的人事配備是這樣：會長是平生釵三郎，理事長是湯澤三千男（前內相）。在部長級幹部中，總務和常務都是縣知事出身；組織部長一職最初打算從警察方面遴選，後來由於這樣作有困難，於是就讓總務局長君島清吉兼任了。此外，擔任組織部副部長的是原任特務科長。厚生局長三輪壽壯、文化部長坂本勝（劇本《資本論》的著者）、同副部長菊川忠雄（勞動總同盟）、技能部副部長高山久藏（同上）都是和工會運動有關的人物。另外一部分幹部來自財閥方面，這就是煉成部長深川正男（三井）以及三菱、住友、川崎、中島、愛知鐘表公司擔任勞務管理方面的一些人。這個組織是和警察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這可以從東京產業報國會最初設在警視廳內一事，得到證明。地方組織的聯合組織，一般是按照警察的管轄區域來決定的。因此，產業報國會的中央機構與各基層單位進行聯繫，一定要通過警察，這是值得注意的。

产业报国会成立情况

年 次	成立这个組織的 企业单位	会 員 数	参加这个組織的 比率(%)
1939	26,963	2,989,976	43
1940	102,799	4,815,478	66
1941	164,377	5,465,558	70
1942	163,740	5,514,320	69

如上所述，一切工会組織——即使由右派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把持的，都从1940年起迅速地被消灭。在1940年6月間，工会組織共有四百二十八个，會員十八万四千人，到这年12月，只剩下四十九个工会組織和九千四百五十五个會員，几乎等于零了。而且就在这种情况下，于1941年12月，工会組織又卤莽地进行了一次严重的冒險活动。

三国軍事同盟

近卫內閣不但完成了新体制組織，从而建立了天皇制法西斯体制，而且在外交方面，又締結了三国同盟，为日美战争开辟了道路。

德国最初通过日本駐德武官大島浩向日本方面提議日德意三国締結广泛的軍事同盟，是在1938年夏季。同年2月希特勒直接掌握了軍权，3月并吞奥地利，开始积极地侵略东欧。作为加强战时体制的一个环节，德国决定就締結三国軍事同盟开始交涉。

日本方面对德国外交当局的探詢工作是以軍部为中心通过大島駐德武官进行的。由里宾特洛甫外交部长提示的德国方案也是由日本參謀本部駐德国的專員带回东京。这个德国方案曾經提交第一次近卫內閣的五相會議进行討論，政府当局也同意了开始这项交涉。第一次近卫內閣倒台以后，这项交涉移交給继任的平沼

內閣，但是由于日本方面意見不能取得一致，因而交涉迟迟不能进展。第一次近卫內閣以来，由于日本叫嚷要建設“东亚新秩序”以及声明否认九国公約，由于茫无头緒的中日战争的繼續扩大，使日本和英美在远东方面的对立日益加剧，在国内，以“革新派”与反对“革新”派为代表的两大势力分成亲英美和亲德两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和傾軋。因此，平沼內閣开了七十余次五相會議，意見也不能取得一致，从而未能作出任何决定。然而这种意見的分歧，归根到底只是由于对于各国軍事力量評價的不同，以及根据这种評價應該在多大程度上避免和英美两国相对立的問題上看法不同，而对于和德意两国締結侵略性的軍事同盟这一点，並沒有从根本上反对的意見。就在意見的这种分歧的情况下，形势不断向前发展，后来在1939年8月，由于德国突然“背信”，和苏联締結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約”，使日本陸軍所建立起来的“防共軸心”的根本观念遭到彻底破产，而逐漸衰落下去的亲英美派又得势了。平沼內閣由于国际局势的“复杂奇怪”的演变而辞职以后，稳健派的阿部信行內閣誕生了。为了改善日美关系，新內閣刚一上台，它的外相野村就同美国駐日大使格魯之間，在东京开始了会談。

1939年9月1日，納粹軍隊大举侵入波兰，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春季，德軍以破竹之势席卷了西欧，到5月底，英法軍隊全面地被击潰，法国并且向德国无条件投降了。德国在欧洲的胜利，削弱了英法在远东的地位，于是，締結三国同盟的主張重又出現了。在这个問題上，德国方面的意图是：以容許日本在东亚的擴張为条件，使日本牵制英国以及越来越靠攏英法的美国。因此，这次三国軍事同盟和过去的三国軍事同盟有所不同，过去的是以苏联为对手，而这次則是以英美为对手了。

以上是在第一卷中也曾叙述过的有关这个問題的大致經過情形。第二次近卫內閣上台后，它把加强日德意三国軸心作为了对

外政策的首要任务。当时，日方签订以前的防共协定的主谋者和加强轴心论者前任驻德大使大岛和外务省顾问白鸟都在东京，本着陆军方面从速缔结军事同盟的意图而大肆活跃；外相松冈洋右也是个狂热的轴心论者，他建议政府立即缔结同盟。

缔结三国军事同盟的基本原则，已在近卫组阁当时所召开的所谓荻窪会议上取得了意见的一致。出席那次会的是近卫、松冈、东条(陆相)、吉田(海相)四人。因为平沼内阁时期米内海相曾对三国同盟表示坚决反对，一般认为海军方面恐怕不能轻易赞同。在第二次近卫内阁上台的初期，海相吉田善吾也曾深感苦闷，并于9月上旬托病辞职。继任海相是及川古志郎大将。当时，日德意三国缔结同盟的谈判已经有了很大进展，近卫非常担心海军的态度，然而及川上任后却立即表示了赞同。不过，海军的态度暧昧，他们表示“赞成是基于政治上的理由，而从军事上看来，尚无对美作战的信心。”

德国在席卷欧洲以后，对于向英国本土登陆的问题则保持了引而不发的姿势，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当时正是德国需要在外交方面展开攻势的时期。同时美国也正在大力加强对英援助，对德国说来，在太平洋方面和日本携起手来，就会成为牵制美国的很大力量。外相松冈就任伊始即训令驻德大使来栖向外长里宾特洛甫探询德国对缔结三国同盟的条件。里宾特洛甫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方面已经酝酿成熟，随即派遣特使斯塔玛前往东京。斯塔玛于9月9日和10日这两天里同松冈举行会谈，双方明确了同盟的具体目标，松冈—斯塔玛会谈的内容如下：

- (一) 德国在对英美本国作战方面不要求日本的军事援助。
- (二) 德国要求日本采取一切措施牵制美国，防止美国参战。
- (三) 德国相信，日德两国间达成谅解或缔结协定，为应付可能发生的危险随时作好完全而有效的准备，是对两国有利的。只

有这样，才能够防止美国参加目前的战争或在将来向日本寻衅。

(四) 只有使美国及全世界都知道日德意三国坚持毅然的态度——一种鲜明而不致被误解的态度，才能够有力和有效地抑制美国。反之，采取软弱或不坚决的态度以及发表此类声明，只能招致侮蔑与危险。

(五) 首先締結日德意三国协定，然后立即同苏联改善关系。对于日苏的友好，德国愿作“忠实的中介人”。

(六) 軸心国家(包括日本)为应付最坏的危险局面，当然要作充分的准备，但另一方面，德国不仅愿竭尽全力防止日美间发生冲突，只要可能，并愿为改善两国国交进行努力。

(七) 斯塔瑪的諾言，可以被认作外长里宾特洛甫的諾言。

这样，締結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的工作，经过松岡外相和德国駐日大使奥托、特使斯塔瑪之间的交涉已经告一段落，于9月2日，在柏林的总统官邸，由日本駐德大使来栖、德外长里宾特洛甫和意外相齐亚諾分别代表三国在军事同盟上签了字。

三国同盟条约共有六条。第一条和第六条规定，三国互相承认彼此在欧洲和亚洲的“领导地位”；第三条规定，在受到第三国——未参加中日战争及欧洲战争的国家——的攻击时，进行互相援助。第五条规定这个条约不以苏联为对手，所以它显然是针对着美国。

由于三国同盟的締結，日本便彻底地站到了和英美法对立的立场。

第二节 战争经济和掠夺殖民地

战时通货膨胀的发展

1937年7月开始的中日战争，一方面加强了日本天皇制法西斯势力，另一方面给垄断资本带来了巨额利润和主要由于军需生

产的大量資本积累。战时經濟通过对日本国内、殖民地、占領地区的工人和小生产者的掠夺发展了軍需生产，借此为壟断資本保証了“最大限度的利潤”。然而日本的战争經濟，从 1939 年春季起遇到了重重困难。

中日战争的长期化使軍費支出逐年增加，此外，为建立战时經濟体制而对整个經濟进行的改組工作和动員工作所需要的財政支出，即所謂“扩充生产力”和“經濟統制”的开支也在直綫上升，以致造成了財政預算的显著膨脹。（参看第 2 卷，第 4 章，第 2 节）另一方面，为扩大軍需生产而投下的产业資金也累增不已，金融机关每年信用貸款的純增額也逐年增加，1937 年为十五亿九千六百万日元，1939 年为五十五亿六百万日元，1940 年为五十二亿九千万日元。同时，为扩充軍需生产而对“滿洲”和中国的投資也有了显著增加，由此引起的日本对日元区（“滿洲”、中国占領地区等日元流通的地区）的出超額，1937 年为三亿五千二百万日元；1939 年为十二亿六千万日元，而 1940 年 1 至 8 月期間，这项出超就达到了九亿一千三百万日元。

以上这种軍費开支的增加和随之而来的經濟轉向軍事生产的范围的逐步扩大，給壟断資本带来了巨額的利潤，然而同时也相应地在国民經濟中造成了再生产以外的消耗（产品不是用于生活或生产上面，而是白白浪費掉）。这种情况，从根本上破坏了資本积累較少、尤其重工业基础和資源基础非常薄弱的日本資本主义的生产力，經濟危机逐漸表面化了。在产业构成上以輕工业为中心的日本資本主义經濟，要想实行軍事化，就必须把輕工业改为重工业。这样，日本資本主义經濟一方面要負担不断膨脹的軍事消耗，另一方面又必須把有限的資金和重要資材全部用来扩充軍事工业。建立在基础薄弱的日本經濟上面的战争經濟的矛盾，由于第二次欧洲大战的扩展及其向世界战争发展的危險性的增大，迅

速地尖銳化了。随着第二次欧洲大战的扩大，特别是战局向西欧的扩展，向来以消费品奢侈品为主的日本出口贸易由于各国限制进口而大大减少，同时，日本对重要工业原料、机械类等的进口，也由于欧洲各国限制出口以及运输船只受限制等原因而逐渐减少了。此外，由于美国实行国防物资输出限制法、废弃日美通商条约、实行禁止对日输出工作母机及其他军需物资的谢泼德·梅法案，使日本更加感到从美国进口这些物资的困难。三国结成同盟以后，各国都采取了禁止出口的措施，这就使得日本进口原材料和机器类的工作陷于极端困难。这样，由于重要物资的不足，使日本的战争经济遭受了严重的限制和打击，其结果，日本战争经济的矛盾也就不能不急剧地尖锐化了。

这种矛盾首先表现为战时通货膨胀的不断加剧。军事预算的急剧膨胀主要是依靠发行公债和增发不兑现纸币来解决的。政府对民间企业的支付款的超支额，1936年是十五亿日元，1939年是五十三亿日元，1940年是四十七亿日元，1941年是七十八亿日元，五年间膨胀到五倍以上。公债从1939年初到1941年年底，由一百零四亿日元增加到三百七十二亿日元，竟增加了二百七十亿日元，这些，都直接间接地构成了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同时，城市金融机关也因为军需生产资金的急速增加而扩大了信用贷款，这种信贷扩大的净增额，1936年为十五亿五千一百万日元，1940年为五十九亿六千二百万日元，1941年为五十二亿九千万日元，这和财政开支的超额共同构成了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这样，日金券^①每月平均发行额也递增无已，1937年为十五亿三千四百万日元，1939年达到了二十三亿七千四百万日元（比前一年度增加百分之二十二点二），到1940年竟达到了三十三亿四千五百万日元

① 日本银行所发行的纸币。——译者

(比前一年度增加百分之四十点二)。与此同时，重要基本物资和消费品的供求关系也陷于极端不平衡状态，尽管政府发布了九·一八物价停止令对物价进行了强力统制，而物价仍然不断上涨，据日本银行的调查，物资批发价格指数上升的情况是这样：1937 年为二三八点二，1939 年为二七七点五，1940 年竟高达三一一点三。

临时军事费项下对民间企业支付额

(单位：千日元)

	1940 年	%	1941 年	%
运输业	84,877	5	276,386	10
商业	308,120	16	338,825	14
机械工业	1,150,604	61	1,626,981	60
纺织染色工业	77,264	4	85,260	3
化学工业	19,740	1	28,234	1
石油业及矿业	46,101	3	61,460	2
皮革橡胶业	38,535	2	43,197	2
食品工业	28,414	2	23,635	1
土木建筑业	36,012	2	46,802	2
各地农会和组合及其他	—	—	—	—
个体经营的商店及其他	—	—	—	—
其 他	78,994	4	116,050	5
計	1,868,661	100	2,706,830	100

(日本银行调查，见井上、宇佐美所著《危机中的日本资本主义的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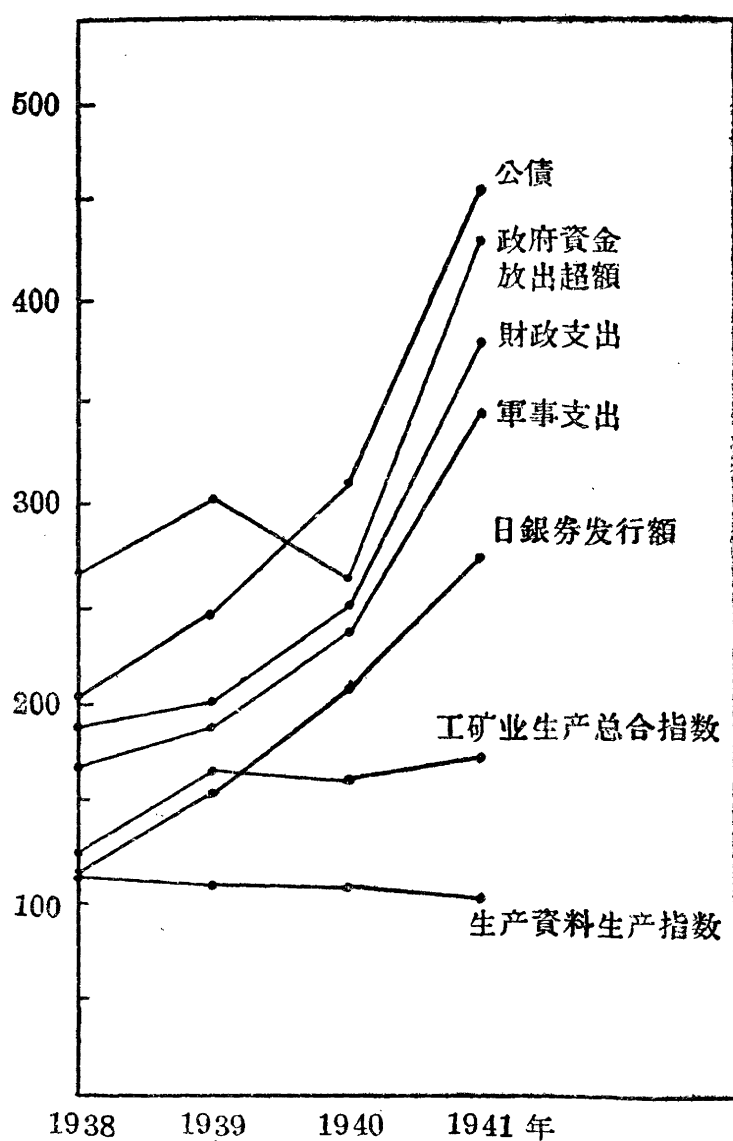
通货膨胀的不断加剧的直接后果是军需品和重要基本物资的涨价。这就使得军事开支和扩充军需生产资金进一步增加，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而这种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的不断加剧本身就意味着战争经济在走向崩溃，所以当局不得不采取抑制通货膨胀的办法以便阻止这一趋势。因此，尽管资金还在不断地向垄断资本集中，而由于生产资金的周转不灵和物价统制的加强，利

潤率反而下降了。特別是為了保證順利採購軍需品而施行了嚴厲的物價統制，根據九·一八物價停止令所體現的低物價政策，政府規定了四萬七千多個公定價格（1941年4月底）；另外，還不得不施行陸軍提出的“適當利潤率核定綱要”和根據總動員法制定的“企業會計業務統制令”、“工礦業成本計算綱要”等等，至少在形式上對成本和利潤進行了統制。這些措施，雖然引起了追求最大利潤的壟斷資本家激烈的反對與非難，但這不過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摩擦，這些統制措施並不是要否定追求利潤的生產，其目的勿寧說為了阻止給壟斷資本提供巨額利潤的戰時經濟的崩潰，保證壟斷資本家可以得到穩定的利潤，從而，是有利於壟斷資本的通貨膨脹對策。這樣，一向是直線上升的壟斷資本進行軍事生產的利潤由於通貨膨脹的加劇以及抑制通貨膨脹對策的施行，使得利潤的增長率有了下降，利潤率開始停頓和下降了。原料價格的高漲與成品價格被壓制之間的矛盾，不能不阻礙了作為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的私營企業生產的戰爭經濟。在這種情況下，壟斷資本悍然提出了“有利於增產的價格提高論”，並要求政府發給財政補助金。於是，政府就把有關煤炭、電力、石油等基本物資的各種補助金加以提高，其結果是：1937年為三億一千萬日元，1940年為六億七千萬日元，1941年增至七億六千萬日元，而這項增加又造成了財政膨脹的原因，同時，這種補助金政策當然是以國家的財政負擔來保證和提高壟斷資本利潤的。其他，和物價統制並行，政府還採取了在通貨膨脹情況下保證壟斷資本利潤不斷增長的強有力措施，這就是：制訂固定資產折舊的例外規定，廢止統一的成本統制，實行承認差別利潤率的個別統制，等等。這些，當然也都成了加劇通貨膨脹的原因。儘管有了這些增加利潤的措施，但仍然未能避免利潤率的下降、產業資金的不足和股票行市的跌落。為了應付由於軍事開支和軍需生產遞增引起的通貨膨脹所造成的矛盾並追求最大限

度的利潤，壟斷資本不得不对本身机构进行加强和改組，以便成为更加有力的掠夺体制。

随着战时經濟的进行而发生的矛盾，表现为战时生产力的直接停頓和減退。日本經濟向进行軍事生产的重工业的迅速改組，使直接生产武器的企业部門以及其他重工业壟斷資本的資本积累

軍事开支、日銀券发行額、生产指数增長的对比
指数（1937 年为 100）



（財政支出为一般會計与临时軍事費的合計淨額，軍事支出为一般會計的陆海軍費、征兵費和临时軍事費的合計。生产指数系根据国民經濟研究协会的調查。）

战时資本积累和战时利潤的增長

(制造业)(单位:百万日元)

年 次	企 业 数	名义資本額或 实收資本額	公 积 金	純 益
1936	87,511	23,959	3,987	1,683
1937	85,042	26,912	4,305	2,009
1938	83,042	30,250	4,823	2,415
1939	85,122	34,026	5,477	2,889
1940	85,836	36,164	6,370	3,364
1941	90,775	39,353	7,279	3,763
1942	92,948	42,801	7,689	3,905

(根据商工省的《企业統計》)

工矿企业收益状况

(单位:百万日元)

年 次	上 半 年			下 半 年		
	实收資本	利 潤	利潤率 %	实收資本	利 潤	利潤率 %
1937	1,535	189	26.0	1,693	207	25.4
1938	1,785	216	24.6	1,897	255	24.3
1939	2,005	255	24.3	2,207	259	24.2
1940	2,364	259	22.4	2,581	281	2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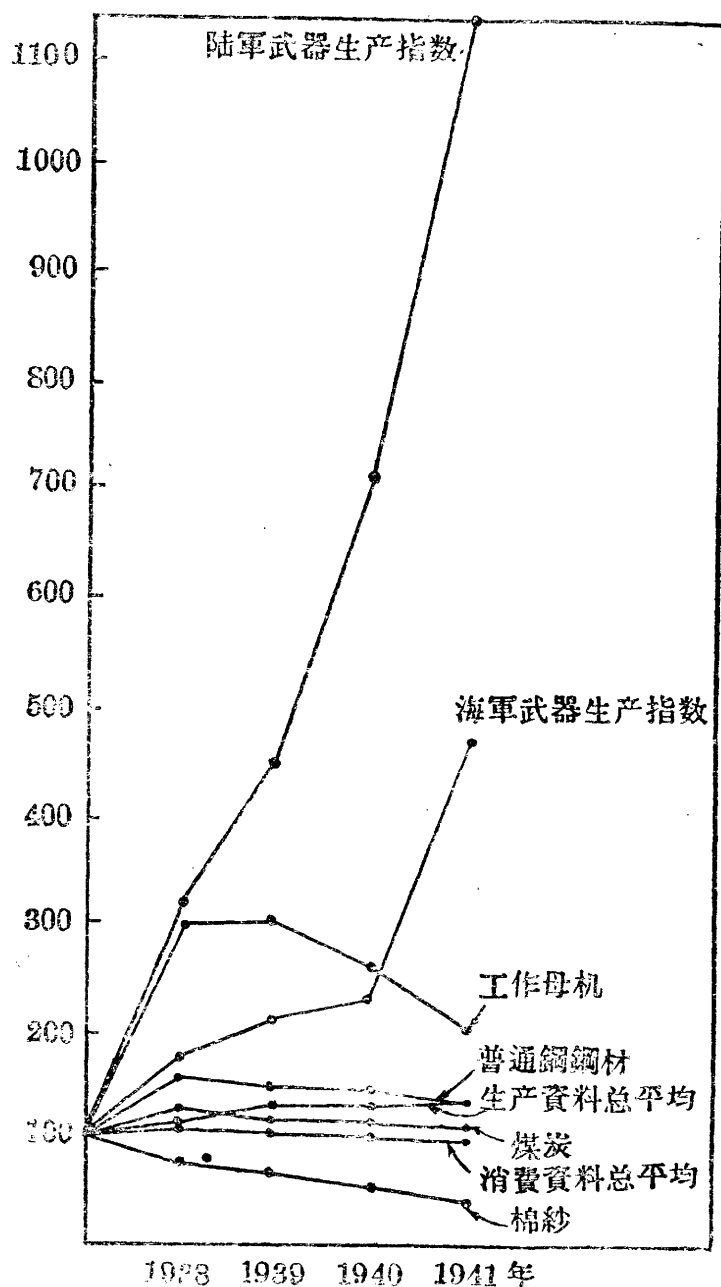
(朝日新聞社就主要工矿企业五十三家所作調查結果,利潤金額系按折旧前数字。)

进行得很快。这种情况,在資本积累少、資源基础薄弱的資本主义日本,只有在严重破坏和牺牲和平产业消費品制造业的条件下,也只有在从先进資本主义各国进口各种基本物資和工作母机等机器設備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因此,尽管直接武器生产有了发展,但作为重工业基础的鉄、煤炭、电力、輕金属以及工作母机等企业的发展却极为緩慢;而随着这些物資輸入的减少和断絕,日本战争經

济的重工业基础开始崩溃了。这样，通货膨胀的加剧和抑制通货膨胀对策之间的矛盾，军事需要的逐渐扩大和重工业基础薄弱之间的矛盾，如上图所示，使重工业的基本产业部门的生产陷于停顿，给垄断资本保证最大利润的战争经济从它的重工业基础上开始崩溃了。

生产的不平衡

生产指数 (1935-1937 年为 100)



(以上指数见国民经済研究协会:《关于实际国民所得的统计》)

战时經濟的矛盾

如上所述,日本資本主义的再生产遭到了危机的冲击,而且这种危机发展得很快。于是,把战时經濟当作追求最大利潤的手段,壟断資本,为了应付上述战时經濟的矛盾的加剧,便不得不在建立强有力的对内掠夺体制的同时,再一次加强和扩大对殖民地的帝国主义統治。米内內閣的总辞职和第二次近卫內閣的成立,就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天皇制法西斯主义,以便在这一基础上扩大和加强独霸远东各地区的殖民統治,并建立起壟断資本实行战时掠夺的統治体制——“新經濟体制”。作为近卫內閣政策的基础的“基本国策綱要”(参看前节),就是要将战争經濟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建立以日‘滿’华为主要环节并包括东亚各地区的‘协同’經濟区”,也就是說,建立起以对“滿洲国”、中国以及南方各地区独占的殖民統治为基础的那种自給自足体制。所謂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即指此而言。对于“滿洲”、中国以及南方各地区,日本統治階級垂涎已久。現在,由于締結了三国同盟以及各国因此而采取的对日紧急措施,更使日本坚定了这种侵略野心。然而,日本統治階級的这种动向,必然地要和一向統治远东各地的势力——以英美为首的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于是,在太平洋区域双方帝国主义的对立进一步尖銳化了。因此,日本統治階級作为在中国进行战争的經濟基础企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走向太平洋战争。从而,日本建立“共荣圈”經濟的活动也就必然会成为对英美开战的准备。

在加强殖民統治的同时,在国内,为了加强作为战时的掠夺体制的战争經濟,进行了建立壟断資本的統治体系——“經濟新体制”。如前所述,由于战争經濟的进行而引起的通貨膨脹以及从事軍需生产的重工业需要的基本物資的缺乏,妨碍了壟断資本借以

追求最大利潤的战争經濟的发展。为了一面应付战时經濟所引起的这种矛盾的加深，一面維持并扩大軍需生产，并由此而取得庞大的利潤，壟断資本需要实行更加有力的經濟“計劃化”和“經濟統制”，換言之，它必須首先直接或間接地掠夺民众，由国民經濟中搜刮递增无已的庞大战費和軍需生产資金。为此目的，它必須加强对整个国民經濟的統制，直接地进一步加强財政金融的計劃化和金融統制。另外随着战争經濟的矛盾的加剧，壟断資本愈发强烈地要求加强对所有經濟部門的“統制”和“計劃化”，其中包括：在基本物資漲价的情况下，保証壟断資本利潤的价格統制，在基本物資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保証壟断資本获得其重要原料的对物資分配的統制及其“計劃化”，以及对劳动力、粮食的“統制”和“計劃化”，等等。这样，从1939年第三、四季度，战争經濟的矛盾以电力和煤炭的不足为开端而表面化以后，壟断資本不仅对于以往由官僚包办的經濟統制日益感到不滿而加以責难，而且主張国家机关进一步从属于壟断資本，并直接参加在这个基础上实行的严厉的經濟統制。这个主張以其建立在壟断資本加强战时卡特尔和扩大这种卡特尔权限的形式逐步实现了。

首先，壟断資本的团体日本經濟联盟在1940年4月召开大会，实行改組，不仅加强了理事会的权限和灵活性，而且通过网罗和选任各卡特尔(以統制市場为直接目的的企业联合組織)的首脑充任理事，使这个联盟成为卡特尔的实际上的代表机关，并将这个組織的任务由單純的建議献策改为真正的“自治統制”，同时还决定采取措施有組織地开展对鉄、煤炭、电力、纖維及其他各种重要物資的統制工作，壟断資本亲自搞起統制来了。同年5月，联盟又向政府提出建議，要求让壟断資本实行自治的統制并授与权力。这项建議里說：“为了消除官僚統制的缺点，必須合并現有的民間經濟团体，使其变为各主要产业部門的强有力的卡特尔。为了鼓

勵民間企業發揮創造性，並使其各自負責實行自治的統制，必須賦與卡特尔以廣泛的統制權”。以這種主要由壟斷資本策劃的企圖加強經濟統制的活動為背景而成立的第二次近衛內閣，聘請了池田成彬、小林一三、鄉誠之助等財閥的代表以及町田忠治（民政黨）、前田米藏（政友會）等財閥的代言人擔任閣員或內閣參議。政府方面的“經濟新體制”草案是由企劃院總裁星野草擬的，名為“星野方案”。這一方案的基本內容也是以壟斷資本的戰時統制卡特尔化為基礎來加強統制的。只因為它主張企業經營者的公共性，主張卡特尔的理事應由政府任命等等，意味著官僚統制的政府對卡特尔的干涉，所以遭到了壟斷資本的猛烈反對，結果，政府還是根據強調資本自主性的民間方案，在 1940 年 12 月 7 日，作為經濟統制大綱決定和公布了“建立經濟新體制綱要”。（參照前節）這一綱要一開始就強調保證私營企業和適當利潤，強調提高折舊以加強各種重要產業，借以貫徹了保證壟斷資本在戰爭經濟中追求最大限度利潤的原則。同時，這個綱要還規定了有關企業的開設、整理的限制措施，亦即確定了有關加強統制以便進一步加強戰爭經濟，以及整頓擴充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權限的原則。此外，綱要還規定了卡特尔將成為在戰時擁有權力的卡特尔，它具有事實上的統制機關的性質與職能。可以說，以上幾點表明了以下原則，即：在戰爭經濟條件下加強壟斷資本的地位；通過使政府機關服從壟斷資本的指揮來加強壟斷資本的統治，並在這個基礎上加強壟斷資本對經濟的統制。根據這一綱要，壟斷資本家的許多團體提出了許多方案，在壟斷資本的主導之下進行了對戰時統制機關的加強工作。

統制會的任务

配合戰爭經濟加強壟斷資本統治體系的工作，是根據 1940 年

12月7日公布的“建立經濟新体制綱要”进行的，这首先是把壟断資本的統治机构卡特尔加以改組，使之具有“战时形态”，也就是把它改組成为“統制机关”，并賦与强大的权力，以加强其統治力量。政府根据壟断資本的卡特尔的联合会——日本經濟联盟的方案，于1941年8月31日公布了“重要产业团体令”，并分別将各个重要产业部門的卡特尔和旧有的“工业組合”加以合并，設立了一元化的統制机构“統制会”。“統制会”对于生产的分担，資金、物資的分配，工人的动員，企业的解散与合并，以至价格和利潤的决定等等具有决定性的权限。至此，战争經濟矛盾的发展所必然引起的“經濟統制”已完全被壟断資本掌握起来，他們把战争經濟当作追求最高利潤的手段而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了。

在“重要产业团体令”公布以前的4月26日首先成立了一个类似統制会的雛形——“鋼鐵統制会”。政府在公布团体令的同时，即筹备成立煤炭、金属、石油、机械工业、化学工业、水泥、羊毛等重要产业部門的統制会。到12月28日，政府第一次对鋼鐵、煤炭、矿山、水泥、电气机械、产业机械、精密机械、汽車、車輛、金属工业、貿易、造船等十二个部門发出了关于成立統制会的指示。这些統制会的具体設立日期是这样，除上述鋼鐵統制会以外，煤炭統制会是11月26日，矿山統制会、水泥統制会是12月18日，其余，都是在1942年以后，以上所有的这些統制会都是在“財閥”的巨大資本的主导下設立起来的。鋼鐵統制会的会长是由三菱 康采恩（由多数企业共同出資成立的联合組織）的重工业部門的代表、半国营性质的托辣斯（企业的联合体）“日鉄”的总經理平生釵三郎担任，煤炭統制会的会长是由三井康采恩的代表、煤炭新迪加（煤炭企业的共同販卖組織）——日本煤炭公司的总經理松本健次郎担任，統制会的权力完全由壟断資本的代表直接掌握，他們通过对生产任务、資金、物資和劳动力的分配，使生产集中到壟断資本，并

压迫了中小企业。在統制会主持下,对作为战时新追加組織的“統制会社”和“統制組合”进行了整理,同时还新設了一批这类組織。壟断資本的这种战时的統治体系,为私人資本的壟断資本积极地强制干涉各个康采恩資本,尤其是中小資本以及工人,提供了“合法的”基础。这样便保証和不断扩大了从事軍事生产的利潤,并使其逐漸集中到了壟断資本的手里。

“經濟新体制”就是以这种壟断資本的战时統治形式的“統制会”为中心而建立起来了。这是壟断資本在自己进行統治的名义下,有效地驅使国家机关以便加强掠夺的一套办法。总之,“經濟新体制”是昭和危机以来就开始的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进一步的加强和完成,是法西斯統治体制在經濟机构中的确立。利用这种統治机构,壟断資本执行了它的战时方針——“有重点的增产方針”,这就是使資金和物資集中到壟断資本手里,使和平工业轉向軍需工业,“整頓”中小企业,以及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强制動員和剝削。其中,使生产和資本集中到壟断資本手里,以及由此而使壟断資本获得巨額的利潤和資本积累,这就是統制会所干出的“成績”。

对金融的統制

与此同时,政府为了保証筹集日益膨脹的战費和軍需工业資金的工作,还进行了在資金方面建立战时体制,即建立財政金融方面的“新体制”的工作。战争經濟的进行和第二次大战的扩大所造成的“新事态”,表現为通貨膨脹的发展。为了制止通貨膨脹并確保战費和軍需企业資金,需要在財政金融方面建立起更加有力的“統制体制”。这就是說,自从进入 1940 年以后,通貨逐月在膨脹,到同年 12 月,貨幣发行額終于突破了四十亿日元,最高发行額竟达到四十九亿三千万日元。而且公債的消化状况日益恶化,公債消化率从前一年的百分之八十九点二下降到百分之七十八点五。同

时，尽管儲蓄增加額在下降，而軍需企业資金的貸款却不断增加。面对这种情况，政府进一步加强了金融統制，也就是政府有必要加强“消化公債第一的原則”和对产业資金进行統制。金融上的这种重点主义是推行战争經濟的重要基础，因而，政府于1940年10月20日根据“国家总動員法”公布了“銀行等資金运用令”，借此实现运用資金的計劃化，也就是使資金集中到壟断資本手里和公債消化的状况趋于順利。此外，由于三国同盟的締結，組織金融机关的工作也有了迅速的发展，在此以前的1940年9月21日，政府已經動員日本銀行、全国票据交換所联合会、全国地方銀行协会、全国儲蓄銀行协会、生命保險协会、信托协会等所有金融机关，成立了“全国金融協議会”。这个組織根据其成立大会上的決議，分別設立了有关消化公債、各种金融机关的整頓合并等項工作的特別委員會，担任战争經濟的基础的金融動員工作。这是对統治机构的一次整頓和加强，其目的在于動員和集中国民經濟中的全部資金，用以消化公債，拼凑战費，并为壟断資本解决进行軍需生产的資金問題。接着在1941年7月11日，政府公布了“財政金融基本措施綱要”，进一步組織了和整理合并了全部金融机关，以便貫徹重点使用資金的方針。这一綱要可以說是在运用資金方面的“經濟新体制”的基础，其內容分为“制定国民資金動員計劃”，“修改財政政策”和“修改金融政策”三項。其中，第一項“制定国民資金動員計劃”是怎样在削減人民大众消費的基础上来拼凑战費和軍需企业資金的“国民經濟的資金計劃化”。第二項“修改財政政策”是以增加稅收和加强銷售公債工作以便拼凑不断膨脹的战費为主要內容的財政的軍事化。第三項“修改金融政策”規定：加强战时金融的心脏日本銀行作为发行和承担公債的机关、作为用通貨膨脹的方法筹集軍需企业資金的机关的机能；必須調整其职能；改革加强金融机关并使之“組織化”；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加强重点使用資金的

政策。所有这些都是把战争经济的基础即战争资金的负担强加于人民大众头上的措施，是为此目的而加强金融资本统治体系的措施。以上改革加强金融机构的决定在走向太平洋战争的过程中都逐步实现了。而在这以前的 1941 年 8 月 4 日，为了实行军需资金的重点分配，已经由兴业银行等十家主要银行组成了“战时共同通融资金团”担任消化公债和筹集军需企业资金的工作。这个通融资金团以后进一步改为全国金融统制会，这个统制会实际上是一种金融新迪加（由银行等金融资本组成的共同通融资金的组织），它作为在战费日益膨胀的情况下筹集战费的机关，构成了“金融新体制”的核心。

对劳动的统制

“经济新体制”的第三个内容是旨在加强对劳动力的强制动员和剥削的“劳动统制”。“劳动统制”的目的是配合军事动员，强迫工人参加军需企业，并采取延长劳动时间和降低实际工资的办法加重剥削，以便确保和扩大垄断资本的利润。当时，由于军事动员的不断扩大和军需工业的迅速膨胀，劳动力不足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1940 年 11 月成立“大日本产业报国会”，以及把它改为“大政翼赞会”的从属机关，就是为实行这种“劳动统制”创造条件，由于这个组织和“统制会”以及“厚生省”的活动，进一步加强了对劳动力的强制动员。1940 年 11 月 8 日，政府制定了“建立勤劳新体制纲要”，决定加强“劳动力统制”，并建立有关组织。另一方面，政府还在同年 3 月修改“从业员雇佣限制令”，11 月公布“从业员移动防止令”，同月又修改“国民征用令”，扩大了该令的适用范围，并实行“青壮年国民登记”办法，在次年（1941 年）3 月实行“国民劳务手册法”，由于采取了这一系列的措施，逐步完成了对劳动力进行战时统制和强制动员的体制。对已往的国民职业能力申报令加以

修改扩充而制定的这项“青壮年国民登记”办法规定，所有满十六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的男子以及满十六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的未婚女子都必须登记。根据这项办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登记的人数，到1940年10月底共计为一千三百万人左右。这项办法的实施和“国民劳务手册制”的实施互相结合起来，就为劳动力的动员奠定了基础。根据这些“劳动统制”办法而被动员的工人，特别是“征用者”，经常处在“寄宿舍制度”的管理下，在法定的罚款与体罚的威胁下，不得不在壟断资本的工厂里以极低的工资从事长时间的劳动。1941年11月，政府又成立了“国民勤劳报国协力会”，使学生和中小工商业者的“勤劳动员”具备了法律根据，加强了这方面的统制体系。这一系列的“劳动统制”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满足壟断军需企业资本对劳动力的日益增长的需要，给他们提供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其次是对于工资的统制。1940年10月，政府根据总动员法公布了新“工资统制令”，进一步加强了工资统制。新“工资统制令”除规定工资的最高额、最低额以外，还按照不同企业分别规定了每小时的最高工资率，企图在熟练劳动力不足和工资上涨的情况下压低工资。工资率是由厚生大臣或地方长官根据性别、年龄、职业、工龄、地区和企业的重要性等条件而规定的。同时，还根据每一企业的每小时最高工资率，规定了各该企业每月的工资基金额，企业主不得使工资超过这个金额。这种办法由于压低工资的支付总额而提高了剩余价值率（资本对于劳动的剥削程度）；同时，资本家也可以在工资基金的限额以内，为了“增加生产”和“加强劳动”而任意地、有利地掌握工资的开支。这种“劳动统制”的加强限制了劳动力供求关系不平衡所引起的工资上涨的趋势，在通货膨胀和生活物资不足的情况下，使名义工资提高得很少，从而实际工资逐渐下降。另外，工资上涨的趋势与工资统制之间的矛盾加剧了工资的不平衡状态，其结果，造成了不熟练工人、征

用工的实际工資的显著下降。

实际工資变动状况

年 次	名 义 工 资 (元)	同 指 数	物 价 指 数	实际工資指数
1937	1.96	100.00	100	100
1938	2.04	104.10	106	95
1939	2.03	103.60	122	84
1940	2.28	116.30	143	81
1941	2.56	130.60	155	84

(名义工資指工厂工人每日平均工資,〔据总理府統計局的調查〕。物价指数是根据冲中恒幸的計算,包括公定价格和黑市价格在內的实际物价指数。)

如上所述,所謂“經濟新体制”,就是壟断資本对財政、金融、生产、劳动等一切經濟領域的綜合的战时統制体系。它是壟断資本为了追求最大利潤而使用强权掠夺群众,借以推行战争經濟的組織形式。

战时粮食政策

在产业实行战时改組、农业劳动力急剧轉入軍隊和城市的情况下,建立在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个体經營基础上的日本农业,于1939年秋收时集中地暴露了它的矛盾,引起了“粮食問題”(粮荒)。由于这种情况,政府不得不对于同年春季开始实行的战时粮食政策从根本上加以修改,而从1940年粮食年度起迅速地公布了一系列有关的統制法規。特别是造成粮食問題的一些根本原因(劳动力不足、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个体經營等)和統治階級拒絶对此进行根本改革的方針,經常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并加剧了劳动力的浪費,使对于粮食的流通和消費的統制更加严苛起来,造成了日本战时粮食政策的特点。政府对“粮食問題”

采取的最初的措施是冻结米价(每石四十三日元)，和实行对稻谷的强制征购。政府在1939年12月到次年4月末强制征购了一千零五十万石稻谷的这段时间里，除先后颁布稻谷配给统制法和基于稻谷统制法的农林省令(1939年11月6日公布实行)以外，又对稻谷应急措施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1940年3月23日公布施行)，并公布了“稻谷强制征购措施”(1940年5月)，到1940年8月，又公布了“临时稻谷配给统制规则”，将稻谷的征购机构改为“市町村农会——贩卖组合——政府”的单一系统，然后公布了“稻谷管理规则”(1940年10月24日公布，11月1日实行)，完成了国家管理稻谷的体制。这样，全国的稻谷，除生产者按一定标准保留的口粮而外，其余部分都被规定为管理米，其中绝大部分都要被政府征购去。

政府对稻谷进行以上统制的同时，从1940年春季起对于麦类及其他主要农产物也逐步实行了统制。在1940年的大歉收以后，1941年3月，政府对“稻谷应急措施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改，把国家征购的范围由“稻谷以及稻谷以外的谷物和谷粉”扩大到“稻谷和稻谷以外的粮食及其加工品”，到6月间，完成了国家对麦类管理体制。这样，到太平洋战争的前夕为止，政府迅速地完成了对全部农产品的国家管理体制。

另一方面，自从中日战争开始以来，以强迫劳动、共同作业和集体转移劳动等形式为主的粮食增产运动，由于有意识地回避最根本的土地问题的解决，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方面遭到失败，加上农业器材的缺乏和农产品价格与工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的增大，因而从1940年粮食年度起，农业生产力显示了由停滞转入低落的必然趋势。1937年秋收时，被强制“狂热地”开展的强迫劳动运动，由于是在旧有的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加上了无计划的动员，也只是造成了劳动力的严重浪费。对于以后的农村劳动力的急剧

外流,虽然从 1939 年起,采取了使工矿业工人和休假士兵的“支援农业”,或用学生、儿童这种未成年劳动力进行代替等措施,但是未能克服本质上存在的矛盾,无法消除浪费劳动力的基本趋向。另外,自 1938 年春季开始、并逐年加强的“共同作业”运动,也由于经常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个体生产之间发生矛盾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不但如此,育秧、耕耘、种植和收割等基本生产过程的共同劳动,还往往受到妨碍,甚至显示了减退的趋势。

共同作业组合的数目,如以 1933 年为 100,则 1938 年的数目如下。(括弧内为实数)其中,有关打谷、调整、防治病虫害的实数和增加率都多于有关育秧、种植等基本生产过程的实数,而前者大大地超过后者。

共同选种	71.1(39,119)	共同收割	} 951.7(67,051)
共同育秧	155.9(12,473)	共同打谷	
共同插秧	225.4(32,739)	共同扬晒	
共同翻整土地	285.9(14,931)	共同防治病虫害	329.3(57,300)
共同灌溉除草	321.73(22,905)		

(根据山下肃郎:《战时农村劳动力对策》,第 101 页的统计)

新泻县共同作业组织数目转变状况

	1933年	1938年		1933年	1938年
共同育秧	520	345	共同防治病虫害	1,631	2,711
共同耕耘	475	160	共同养蚕	167	521
共同插秧	404	271	共同选种	2,117	2,728
共同除草	376	336	共同制粉(下略)	12	107
共同收割	517	201			

(引自前书第 102 页)

大体上利用封建的习惯而组织起来的“共同作业”,几乎不考虑工资核算,不仅造成了劳动力较多的贫农负担过重,促使他们离开农业,而且因为一般地增加劳动强度,再加上自家劳动,这就造成了劳动时间的延长,进一步助长了劳动力流入城市的趋向,也加速了剩下的农业劳动力的减弱。旨在减轻妇女劳动的集体炊爨、托儿所等,也自 1939 年起逐渐被用来促使妇女劳动力集中于农业

生产,反而导致了进一步增加妇女劳动强度的結果。

根据野尻重雄就 1937 年 4 月到 1940 年 4 月期間神奈川、山梨、埼玉、福島、新潟、岩手、青森等七县农村劳动力移动状况所作的調查报告,从拥有土地状况和經營規模的角度得出的劳动力移动率如下表:

基于經營規模的农民离村率

(1939 年 4 月~1940 年 4 月埼玉、新潟、福島、岩手四县专业农户四千八百八十一戶的平均数字)

	现有家属人数 <i>A</i>	因求职而离村者 <i>B</i>	求职离村率 $B/A+B$
不滿 5 段①	2,363	337	12.5
5 段~1 町②	7,191	779	9.5
1 町~2 町	14,549	1,018	6.5
2 町~3 町	5,527	329	5.5
3 町以上	2,147	87	3.9
計	31,777	2,550	7.4

(野尻重雄:《关于农民离村的实証研究》,第 138 頁)

从拥有土地状况阶级得出的离村率

(同上专业农户 5,157 戶的平均数字)

	现有家属人数 <i>A</i>	因求职而离村者 <i>B</i>	求职离村率 $B/A+B$
地主	876	46	5.0
自耕农	10,379	597	5.4
自耕兼佃农	10,760	808	7.0
佃农	10,638	1,145	9.7
雇农	577	134	18.8
計	33,230	2,730	7.6

(前书第 156 頁)

① 面积单位,約合 991.7 平方公尺。——譯者

② 面积单位,一町等于 10 段,約合 9917 平方公尺。——譯者

劳动力流入城市的情况，自 1939 年下半年起更加严重了。这项人数在 1937 年 7 月至 1939 年 8 月之間約为八十六万，而在 1939 年 8 月至 1941 年 2 月之間竟达到一百一十五万，其中，男子約七十五万人，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壯年約为九十五万人。这一事实无疑地使剩下的农业劳动力的质量有了显著的下降。

农村中的疾病、负伤及死亡率的增長情况如下：

（就爱知县碧海郡八町村的中农七百四十四戶、人口四千三百零二人所作的調查，見《医疗組合》杂志第 4 卷，第 3 期。引自山下肃郎：《战时农村劳动力对策》）

戸历年平均患病次数

年次 \ 类别	十天以内	二十天以内	一个月以内	一个月以上	合 計
昭和 11 年(1936)	2.625	0.387	0.228	0.232	3.473
昭和 12 年(1937)	2.947	0.463	0.251	0.226	3.888
昭和 13 年(1938)	3.218	0.434	0.253	0.320	4.125

戸历年平均負伤次数

年次 \ 类别	十天以内	二十天以内	一个月以内	一个月以上	合 計
昭和 11 年(1936)	0.264	0.036	0.017	0.017	0.337
昭和 12 年(1937)	0.293	0.036	0.029	0.023	0.382
昭和 13 年(1938)	0.332	0.052	0.040	0.032	0.457

出生和死亡相抵后人口增加情况

年次 \ 类别	被調查戶 出生人数	同上死亡 人数	同上相抵后 增加人数	同上人口 增加率	同上对于总人口 的增加率
昭和 11 年(1936)	137	51	86	11.50	2.00
昭和 12 年(1937)	124	66	58	7.80	1.35
昭和 13 年(1938)	127	89	38	5.12	0.88

除以上农村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降低的情况以外，还发生了农业器材缺乏及其涨价的问题。农业用钢材和普通铁的分配量在1940年已降低到平时的百分之四十二。（劝业银行：《从战时到战后农村经济的转变》）在化学肥料中，钾盐由于欧战的爆发而断绝来源；硫酸、氮肥由于电力和煤炭的供应减少，从1939年开始减少；而原料输入情况比较顺利的过磷酸石灰，也从1941年以后有了显著的减少。以上这些情况，一部分从1940年起，一般地是从1941年起，不仅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掠夺性生产（在不被供给肥料等生产资料的情况下进行的农业生产）的趋向；而且还和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农业生产关系中的各种矛盾结合起来，促成了农业生产力的全面下降趋向。生产力的下降首先表现在1940年稻米的产量上。同年米的产量为六千零八十七万四千石，比计划指标（七千一百万石）少一千万石以上，比前五年的平均产量减产四百三十一万五千石。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收成不佳的情况，并不限于北海道、九州、四国等遭受稻热病、浮尘子虫害和暴风雨的灾害较大的地区，而是已经广泛地发展到了全国范围。

农产品及农家购进物品的价格上涨率

（全国农业学会：《农村物价调查概要》）

	农 林 产 品	农 业 用 品	生 活 用 品
昭和12年（1937）	100	100	100
昭和13年（1938）	108.9	116.8	120
昭和14年（1939）	137.5	138.5	145.8
昭和15年（1940）	164.2	186.4	190.2
昭和16年（1941）	162.0	180.8	200.7
昭和17年（1942）	173.8	189.4	217.2
昭和18年（1943）	184.5	194.4	244.0
昭和19年（1944）	212.8	201.4	295.7
昭和20年（1945）	408.5	241.1	420.9

然而，在不改变原有的农业生产关系的条件下，专门靠加强农业劳动来解决矛盾的这种增产运动，要想真正达到增产的目的，就不可避免地要加以某些改变。从1940年下半年起盛行的“日本农业改组”论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这一论调本身虽然在一部人中间引起了对寄生地主的反对，但结局还是被模仿纳粹德国的“全国世袭农场法”的、要求维持“日本民族的血的源泉”的新“适当规模论”所压倒。但是，为了贯彻执行以增加农业生产和维持低米价政策为内容的战争经济的最高命令，是不可能长期容许战时粮食政策丝毫不过问土地问题的。在肥料、农业器材供应不足和价格上涨（特别是黑市价格）的情况下，将米价冻结在每石四十三日元的低米价政策，到1940年年初，已经在部分地区引起了用稻米充作马料的现象，到了1940年秋季实行稻谷管理法时，又与该法背道而驰地助长了自然经济化的趋向，给增产政策造成了严重困难。作为解决这种矛盾的唯一办法，当局采取了对每石稻谷发给生产奖励金五日元的方法（1941年8月），这种方法，实际上使生产者的出售价格同佃租价格分离开来，从而降低了地租，客观上导致了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角落崩溃的结果。

据四宫恭二所著《战争、粮食、农业》一书，当时（1940年初）《大阪朝日新闻》上曾刊载过如下的读者来信：

“在提倡增产和节约稻米声中，农家浪费米的现象却非常严重，这是令人不胜寒心的。在一般农户向来用豆饼充作牛马的饲料。去年以来，豆饼的价格虽然根据九·一八物价停止令而冻结为每块四元三角，但实际上豆饼价格在不断上涨，到去年11月竟然涨到每块五元三角五分，而目前则为每块五元八角，并且一次只能买到一块。……已经买不到了。如能买到麦子，还是比较便宜，但目前没有麦子。于是，只好用米充作饲料。这样，比较花六元买一块豆饼还算便宜。因此，最近由于农户用作牛马的饲料而被浪费掉的稻米的数量是很大的。”

“我们村里从1月到7月每一段田地分到的肥料数量是硫酸七百

匁^①，过磷酸鈣六百匁，氮肥三百匁左右。而今天为了实现肥料自給自足，在制造速成堆肥也必需有硫酸銨和氮肥，試問当局，在这种情况下，还可能力行稻米的增产嗎？有机肥料完全要倚靠黑市，这种黑市价格将近公定价格的一倍，并且不易买到。目前，米一袋重十八貫^②价十七元多一点，一袋十貫的豆餅面，黑市价格是十元以上。这样，与其用难以买到的豆餅作牛馬的飼料，就不如将自产的稻米煮熟后喂牲畜反而大为經濟。当局既然断言絕不提高米价，那么就应負責对农户供給足够的肥料。”

另一方面，政府对农业劳动的統制也越发加强了。政府在1940年春季就已經表明了对农业劳动加强統制的方針，这就是通过修改农会法改組村落农业团体和进一步加强共同作业。1941年9月，政府又根据修改后的农会法发布了統制令，决定通过村落农业团体加强了对共同作业和集体轉移劳动的統制，严格地統制耕种，强制共同使用农具、役畜。紧接着在10月間又公布施行了“耕种統制規則”，这项法令規定不仅要保持粮食作物的原有种植面积，而且还要在种植“限制作物”（桑、茶、薄荷、烟草、果树、花卉）的土地上改种粮食作物。国家对于直接生产过程的这种統制的总汇，就是在太平洋战争前夕召开的国家总动员審議会第二十次全体會議上通过的“关于农业生产統制的敕令案綱要”，它以“农业生产統制令”的形式在同年年末公布，而自次年1月起实行。其次，前述1940年稻米生产計劃的未能完成和外米輸入量减少的趋势，使当局在1940年秋季感到必須制定正式的粮食增产計劃和粮食自給自足体制。結果在同年年底，由农林当局制定了在以后十年中开荒五十万町步的“米麦增产十年計劃”，并于次年2月頒布了“开垦耕地法”，5月間根据該法成立了“开垦耕地团”。

在这种情况下所展开的1941年的增产运动是这样：作为十年計劃的第一年度，政府将主要农产物的生产目标規定如下表所示。

① 日本重量单位，合3.75公分。——譯者

② 日本重量单位，合3.75公斤。——譯者

1941 年度主要农产物生产指标

(单位: 米麦——千石; 薯类——千貫)

种 类	生 产 基 数	增 产 计 划	生 产 指 标
稻米	63,465	7,980	71,445
小麦	9,500	1,978	11,478
大麦, 裸麦	12,915	2,871	15,783
甘薯	980,000	455,500	1,435,500
馬鈴薯	490,000	178,000	688,000

(根据《朝日經濟年史》, 1941 年版)

为了大大加强共同作业还强迫学生、儿童参加集体劳动, 并利用地方长官和道府县經濟部长的直接督促, 尤其是“农业报国推进队”的玄虛的精神运动的鞭策, 对农民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然而, 尽管当局作了这种种努力, 但同年的生产计划还是完全失败了。同年的稻谷产量只有五千五百零八万八千石, 和前年比較减产五百七十八万六千石, 距生产指标竟然相差一千六百三十三万三千石之多。麦类比前一年約减产三百万石, 比指标少四百八十万石。这就是增产运动的凄惨結果。

根据工作种类划分的村落农业团体数目

(见帝国农会:《农业年鉴》昭和十八(1943)年版, 第 244 頁)

工作种类	昭和 13 年度(1938)	昭和 15 年度(1940)	昭和 16 年度(1941)
共同育秧	12,473	25,043	33,189
共同插秧	32,739	77,609	80,630
共同除草	22,905	34,465	37,978
共同收割	19,036	32,082	71,132
共同打谷揚晒	33,515	85,271	175,943
共同播麦	不詳	19,800	67,946
共同收麦	不詳	31,814	35,146
共同炊爨	210	3,503	18,364
托儿所	3,045	21,393	30,949
計		330,990	551,277

于是, 政府在 9 月 15 日公布“国家管理稻谷实施綱要”, 指令

征购全部“管理米”的同时发表了对粮食产量的第一次估计。接着又在5月26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了“紧急粮食对策”，制订并下达了有关限制作物的改种，增产麦类和马铃薯，以至于准备对美开战的粮食储备等等广泛的紧急对策。

1941年度学生、儿童被迫参加劳动情况

(见同上《农业年鉴》，第246页)

(春季)	实际人数	参加人次 (秋季)	实际人数	参加人次
国民学校	2,990,006	21,957,861	2,868,073	14,413,652
男子中学	616,258	2,453,838	665,871	2,632,674
女子中学	345,430	1,539,860	369,074	1,725,589
大学高等学校	15,908	53,916	25,613	89,329

根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报告，“1941年全日本的粮食供应水平是：仅仅超过最低生活所必需的热量百分之六点四。”(正木千冬译：《日本战争经济的崩溃》)在这一时期，作为生产力担当者的自耕农、佃农和中农这个阶层开始分化，在他们中间，和政府开垦荒地的政策相反，放弃边际耕地的趋向逐渐增长了。日本农业就是在这种日益尖锐化的生产关系的矛盾之中，以其脆弱的生产力担负着严重的粮食问题，而且受到国家强力统制的束缚，就在这种情况下，被投入了太平洋战争这一前所未有的严重消耗时期。

耕地扩展及荒废面积

(第22次农林统计)

	扩展面积(町)	荒废面积(町)	增 减
昭和12年(1937)	38,130.3	23,874.5	14,255.8
昭和13年(1938)	32,345.9	46,977.6	-14,631.7
昭和14年(1939)	31,721.2	30,951.8	769.4
昭和15年(1940)	30,666.6	34,468.3	-3,801.7
昭和16年(1941)	26,730.4	45,742.1	-19,011.7
昭和17年(1942)	28,834.4	57,808.4	-28,973.5
昭和18年(1943)	21,747.9	66,781.2	-45,033.3
昭和19年(1944)	16,014.6	94,572.2	-78,557.6
昭和20年(1945)	28,164.7	101,457.2	-73,292.5

历年耕地表
(第22次农林统计)

	总 数		水 田		旱 田	
	实数(町)	指数	实数(町)	指数	实数(町)	指数
昭和12年(1937)	6,098,453.3	100.00	3,217,928.6	100.00	2,880,503.7	100.00
昭和13年(1938)	6,078,282.5	99.67	3,208,254.3	99.70	2,870,082.2	99.64
昭和14年(1939)	6,079,246.6	99.69	3,209,298.0	99.73	2,869,948.6	99.63
昭和15年(1940)	6,077,502.5	99.66	3,206,575.6	99.65	2,870,926.9	99.67
昭和16年(1941)	5,860,679.0	96.10	3,172,184.5	98.58	2,688,494.5	93.33
昭和17年(1942)	5,812,392.8	95.31	3,163,863.8	98.32	2,648,529.0	91.95
昭和18年(1943)	5,717,856.4	93.76	3,121,659.8	97.01	2,596,196.6	90.13
昭和19年(1944)	5,513,897.2	90.41	3,059,963.5	95.09	2,453,933.7	85.19
昭和20年(1945)	5,287,874.0	86.71	2,964,487.7	92.12	2,323,386.3	80.66

“大东亚共荣圈”的实质

战时经济的矛盾必然地使对于殖民地的掠夺加剧和扩大，以“满洲”、中国为核心，并包括南方各地区在内，所谓“确立自给自足体系”成了不可或缺的要求，这一点，已如前述。具有半封建因素的日本资本主义由于基础脆弱，为了维持战争经济，不得不依靠不断地加强对于殖民地的统治，因而，就更加露骨地进行了掠夺和侵占。朝鲜和台湾的大米；朝鲜的电力、轻金属、铁合金；“满洲”的铁矿砂、煤、大豆；华北的原煤、矾土、棉花、食盐；南洋的磷酸盐以及荷属东印度的石油、矾土；马来亚的橡胶，以及这些广阔地区的丰富的劳动力，如果没有这些，几乎不可能推行战时经济。

1940年11月5日，日本政府制定“日‘满’华经济建设纲要”，确定了在产业、劳务、金融、贸易和交通等部门实行战时动员的方针。在殖民地和占领区也设立了实行“战时统制”的机构，进行“开

发”重要資源和发展軍需工业，但是这种軍需動員实际上已經碰到了許多障碍和达到了极限。就是說，对于这些殖民地的“开发”上所需要的資金必須由日本帝国主义自己来筹措，但是由于战争經濟的进行而开始出现“破綻”的日本国内經濟却无力負担。因此，来自日本国内的資金器材的供給計劃不得不受到壓縮，而从日軍統治地区以外的地区进口器材，也由于其他国家的对日禁运措施而陷于断絕，于是殖民地的軍事動員很快就遇到了困难。“滿洲”方面，由于受到日本金融市場紧迫的影响，不得不把 1940 年度的事业計劃急忙加以縮小。同年年初制定的總額达二十六亿五千万日元的一百零五家主要公司的事业資金計劃，尽管在通貨膨脹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仍然不得不縮減到十五亿日元。这是因为在同年內，日本的对“滿”投資縮減到十亿一千余万日元，比前一年縮減了九千三百万日元的原故。华北和华中也是一样，同年內日本通过购买“中国公債”及股票对华投資九千五百四十一万六千日元，不及前一年的一亿一千一百三十三万日元，这种“开发”事业的資金困难造成了事业計劃的縮減。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脆弱性所产生的矛盾及其扩大，也表现为殖民地和占領区通貨膨脹的加剧。在民族資本的积累极为貧乏的“滿洲”，与这种資本积累不相适应的巨大的軍事負担和重工业的建設，都必需仰賴日本的資本輸出；一旦日本的資本輸出发生困难，那就只有采取增发紙币的办法来筹措資金了。由于不断增加的軍事开支和产业投資而迅速膨脹起来的“滿洲国”政府的財政預算，1940 年度为：一般會計和特別會計岁出總額为十六亿四千万日元，将近 1938 年度的两倍。这一預算是靠增稅和发行赤字公債来弥补的。因此，政府开支的超支額，1939 年底为二亿二千二百万日元，到 1940 年底，增加到六亿二千四百万日元。同时，产业資金的筹措，也采取了增发紙币的办法，所以“滿洲中央銀行”对一般銀行貸款的递增額，也

从 1939 年底的二亿二百万日元增加一倍以上,达到了四亿六千三百万日元。这种民間信用(对民間的貸款)的膨脹,是通过增加向“滿洲兴业銀行”的貸款来实现的。这样,“滿洲中央銀行”的紙币发行額,到 1940 年底达到了九亿四千七百万日元,比 1938 年底增多了百分之一百一十。在仅仅两年間通貨膨脹就有了这样惊人的发展,这件事清楚地說明了殖民地“滿洲”軍事和軍需工业的动員是依靠通貨膨脹的办法来进行的。这种情况由于重要物資和生活必需品的被掠夺运往日本国内而加倍地发展下去,招致了生活必需品的上漲,不言而喻,这就造成了向当地中国人民的无止境的掠夺。这样,也就进一步迫使中国工人紛紛逃亡和迁移,到了 1940 年下半年,中国工人的离“滿”人数,从上半年的八万六千人一跃而激增到三十七万人。对此采取的措施是,建立依靠宪兵和警察武装力量来强迫施行的囚徒式的劳动制度。1941 年 9 月,“滿洲国”政府制定了“确立劳务新体制綱要”; 10 月 22 日又公布設立可以称为“产业报国会”的在“滿洲”的翻版——“劳务兴国会”。这个組織是以雇用者为会員組成的,在这种对中国工人施行的“囚徒式劳动”和依靠通貨膨脹掠夺到的資本积累的基础上,“滿洲”的重工业,尤其是鋼鉄、煤炭和輕工业等軍需产业发展起来,从而,經營殖民地的新兴財閥的財富也趋于集中了。滿洲經濟的这种投向軍事生产,使輕金属、鋁、鋅和鋼等一部分重要資材的生产有了增加,1940 年和前一年对比,增产百分之二百到百分之三百;但是在另一方面,生鉄、鋼块、鋼材、煤炭、液体燃料和电力等重要資材的生产,却完全陷于迟滯的状态,远远达不到“动員計劃”的指标。由于資金和資材的不足,这种殖民地的軍事动員已經暴露了明显的极限。例如,根据 1937 年制定的五年計劃,原定在 1940 年生产一百万吨的鋼鉄,实际上只生产了二分之一左右的五十五万吨;原計劃生产五百万吨的生鉄,則仅仅生产了一百四十万吨。

华北和华中的重要资源的軍需动员情况也与此相类似。从事“开发”这些占领区的重要资源的产业，统统交由政府投资一半的“国策公司”——“华北开发公司”、“华中振兴公司”以及日本资本和当地资本“合办”的企业组织。日本对“华北开发公司”的投资，到1940年底，总额达到二亿三千九百三十四万日元，仅1940年一年中的投资额就增加了一亿三千四百六十三万余日元。新设立了大同煤矿、华北电业、井陘煤矿、华北煤炭贩卖和蒙疆矿产贩卖等五家公司；同时，对于中兴、大汶口、磁县、焦作和山西等煤矿，以及石景山和山西两座炼铁厂，则与日本国内的有关协会成立联合组织，进行共同经营，这样，“华北开发公司”通过经营二十一个公司和八个联合组织等下属企业，进行了“资源开发”的工作。“华中振兴公司”1940年的投资额为五千一百五十二万六千余日元，向十三个有关公司和联合组织等下属企业进行了投资。然而，为“开发华北”的投资中，百分之七十三投到运输、通讯和港湾的建设上，对矿业的投资只占百分之九，对电力事业的投资只占百分之三。“华中振兴公司”的投资也几乎是集中到日军破坏的各项事业的恢复工作和扩充对军事行动起辅助作用的通讯及运输设施上面，以及经营原有的事业和开发原有的资源，这些都不是把全部投资用于积极地“开发”重要资源，而是把大批资金投到为“开发”重要资源创造前提条件——恢复通讯和运输机关方面。因此，不能期待对这些地区的“开发”工作，很快地就可以提供足够的重要资源，以弥补日军在来自其他地区的供给已经断绝的条件下进行的庞大数量的战争消耗。事实上，成为日本钢铁工业原料的华北及“蒙疆”的原煤产量，1938年为一千万吨，而到1941年则增加到二千四百万吨，其供应日本的数量，至1941年也增加到四百一十二万吨，占日本煤炭进口额的百分之六十三点八；同时，华北供应日本铁矿石的数量，也占日本进口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但是，这些重要原料的提

供，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尤其是对于它的战争经济的庞大数量的军事消耗来说，并不是充足的。特别是“满洲”、华北和华中，缺乏石油、矾土、锡、橡胶和镍等战时经济所不可缺少的资源。因此，为了完成作为垄断资本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手段，和作为推行战争经济的基础的“大东亚共荣圈”，必须对南方各地区实行帝国主义的兼并。日本帝国主义的爪牙们认为“在南方的权益对于今日的日本是有关死活的问题”（1941年2月27日外务次官大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的答辞），帝国主义老爷们的这种主张，清楚地反映在下面的说明中。“我国（日本）1936年的石油产量，只达到全部需要量的百分之十，我们需要量的百分之九十依靠进口，其中百分之六十六来自美国。若将政府直接向美国购买的部分也计算在内，则从美国进口的进口额也可能超过百分之八十。可否考虑从‘大东亚共荣圈’内各地进口，以代替来自美国的供应呢。荷属东印度在1937年和1939年分别生产了石油七百二十六万二千吨和七百九十四万九千吨，其中百分之九十运往宗主国荷兰以及美国和日本。日本如果采取适当的手段与之接洽成功，则每年输入其产量的三分之一即大约二百七十万吨，将是容易作到的。一旦‘大东亚共荣圈’确立起来，就可以保证把荷印出产的全部石油运来日本。”（山田文雄：《统制经济》，1940年10月号）对于荷印的石油的这种要求，同时也表现为对于法属印度支那的锡的要求，以及对于马来亚的橡胶、铁矿砂和镍的要求。这些物资都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战争经济的基础，能否取得这些物资，将对于以后战争经济的发展趋向起决定作用。日本甘冒同美英开战的危险而向南方进行扩张，可以说是垄断资本通过战争经济、掠夺殖民地来追求最大限度利润这一运动规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殖民地企业在日本总生产資本中所占的比重

产业別	年次	单位	日本国内	殖民地 半殖民地					計(A)	总计	
				朝鮮	台灣	樺太	“滿洲”	中国		B	A B (%)
煤	1940	千吨	57,309	6,117	2,827	6,435	21,132	—	36,511	93,820	39.1
鉄矿砂	1940	千吨	1,042	1,258	—	—	3,367	—	4,625	5,667	81.6
生鉄	1940	千吨	3,512	246	1	—	1,069	—	1,316	4,825	27.3
鋼、鋼材	1940	千吨	4,522	76	—	—	404	—	480	5,002	9.6
紙漿	1941	千吨	754	47	48	408	78	—	581	1,335	43.5
水泥	1940	千吨	5,980	1,142	226	—	1,017	—	2,385	8,365	28.5
硫	1941	千吨	1,240	448	—	—	137	—	585	1,825	32.1
紡織	1940	千吨	12,190	153	—	—	207	3,482	3,842	15,672	41.0
水力发电	1943	千瓩	5,605	1,241	267	—	605	—	2,158	7,763	27.8

(引自井上、宇佐美合著:《危机中的日本資本主义的結構》)

对殖民地农业的掠夺

由于日本国内对农业生产的不利条件的积累和对农产品需要量的增长,由于維持殖民地“治安”的必要和准备对美开战等原因,使日本把关于主要农产品的增产、配給統制等“长期的”政策推广到朝鮮、台灣以至于“滿洲”和华北。(关于日本占領“滿洲”以后,日軍后勤部特殊机关等所进行的最露骨的直接掠夺的情况,参看井上晴丸,宇佐美誠次郎合著:《危机中的日本資本主义的結構》)

1938年8月,在农林省的主持下召开了由“日本内外地、‘滿洲’、华北、华中、‘蒙疆’有关官員”参加的东亚农林協議会,就稻米問題等十四項問題进行了討論,并由农林省指令各地区实行对主要农产品的統制及其某种程度的增产。后来,由于1939年发生粮食危机,又迅速加强了对殖民地农业的动員措施,相继召开了

日“滿”农政研究会(1939年9月在长春第一次會議)、日“滿”“華”經濟協商會(1939年10月在日本企画院)和关于日“滿”“華”糧食供求的會議(1939年底在企画院),决定了“日滿華”全区的糧食增产計劃和供求調整措施。就这样,在旧的殖民地朝鮮和台灣,从1939年起实行了稻米增产計劃,預定朝鮮增产一百二十万石,台灣增产五十万石;同时相继頒布实施“朝鮮米谷市場會社令”(1939年9月)、“米谷配給調整令”(1939年12月)和“台灣米外运管理法”(1939年5月)等法令对米糧的流通开始了統制。在“滿洲”,从經過修改了的五年計劃实行期中的1939年6月就实行了“米谷管理法”,同年10月公布实行了規定对大豆进行专卖管理的“重要特产品专管法”,同年11月公布实行了限制高粱、谷子和玉米向第三国出口及加强其收购、配售机构的“主要粮谷統制法”,12月公布实行了“小麦粉及制粉业統制法”;到1940年春又进一步制定实施了“十年增产計劃”。而在华北,也从1939年春开始实行以棉花为中心的增产計劃,同年四月,又把收购机构統一起来設立了“华北棉产协会”。在对农产品的統购及流通統制工作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东洋拓殖”、“滿洲拓殖”等臭名昭著的殖民地公司,“朝鮮米谷市場”、“滿洲粮谷”和“軍粮城精谷”等新設的特殊公司,以及“滿洲”、华北和华中的合作社、“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等壟断資本的分支机构。这些机构以其灭絕人性的掠夺手段和規模的庞大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性;但是它們甚至要排除当地資本而实行直接掠夺的貪婪作法,不断受到当地資本沉重的还击,其結果,反而导致了自己統制政策的失敗。

这种情况,在原有的商业高利貸資本拥有土地和深入而牢固地生根在地方产业中,形成独特的地方經濟单位的“滿洲”,表現得最为突出,对于“日滿華糧食供求計劃”給予了极大的威胁。最初的反击表現为1939年年底各种統制法公布以后,大豆、高粱、小米和

玉米等被統制农产品統购量的銳减，日本企图利用“南滿鐵路”掌握农产品的政策，也由于当地資本采取利用大車从生产地直接运往消費地，或以接力方式越过长城运往华北的作法而遭到彻底的失敗。（横山敏男：《滿洲国农业政策》）同时，利用农事合作社（后改称兴农合作社）企图直接掌握农产品交易市場而排斥“粮棧”势力的政策，以及利用“定錢制”，通过預付农业生产資金等方式企图直接掌握农民的政策，也都因为受到强烈反抗而始終沒有成功。根据各种統制法而发出的指令，其通行范围只能通过省而到达县城，这一点也是殖民統治的必然結果。

自耕农佃农户数

	地 主	自 耕 农	自耕佃农	佃 农	
朝 鮮	3.7%	17.8%	23.8%	52.3%	
台 灣		33.0%	31.0%	36.0%	
东三省	北部	14.7	52.3%	8.9%	24.1%
	中部	19.3	39.0%	13.1%	23.6%
	南部	11.8	58.7%	19.8%	9.7%
中 国	北部		64.0%	21.0%	15.0%
	中部		31.0%	26.0%	43.0%
	南部		27.0%	30.0%	43.0%

朝鮮的情况根据《朝鮮經濟年報》1941年和1942年版（1939年調查）。台灣的情况根据《台灣經濟年報》1941年版（1939年調查）。

东三省的情况是根据日“滿”农政研究会編：《滿洲农业要覽》1940年版編制（調查年份：“北滿”为1934年，“中滿”为1935年，“南滿”为1936年）。中国的情况引自威尔曼斯：《中国农业經濟論》。

拥有土地状况 (东三省)

	南部		中部		北部		
	户数	拥有面积	户数	拥有面积	拥有土地面积别	户数	拥有面积
大土地所有者	4.2%	40.4%	0.2%	3.0%	100 响以上	2.9%	50.0%
中土地所有者	14.7%	35.8%	16.7%	65.8%	50 响以上	3.1%	16.6%
小土地所有者	15.4%	13.7%	17.5%	22.6%	20 响以上	8.1%	21.3%
零碎土地所有者	33.0%	9.7%	16.7%	6.3%	5 响以上	10.5%	10.0%
无地者	32.5%	—	48.7%	2.3%	5 响以下	12.5%	2.1%
					无地者	63.2%	—

(据近藤康男:《满洲农业经济论》)

拥有耕地状况 (中国)

	户数	拥有耕地面积
5 亩以下	35.61%	6.21%
5——9.9 亩	23.99%	11.42%
10——14.9 亩	13.17%	10.63%
15——19.9 亩	7.99%	9.17%
20——29.9 亩	8.22%	13.17%
30——49.9 亩	6.20%	15.54%
50——69.9 亩	2.17%	8.33%
70——99.9 亩	1.31%	7.16%
100——149.9 亩	0.72%	5.71%
150——199.9 亩	0.24%	2.76%
200——299.9 亩	0.20%	3.17%
300——499.9 亩	0.11%	2.63%
500——999.9 亩	0.05%	2.30%
1000 亩以上	0.02%	1.75%
合 計	100.00%	100.00%

(民国 38 年 8 月全国经济委员会调查,引自田边胜正:《中国的农业经济》)

东三省主要农产品产量

	大 豆	其他豆类	高 粱	小 米	玉 米	小 麦	米	其他杂粮
1932	4,267.8	277.6	3,729.3	2,615.3	1,541.8	1,133.0	247.1	1,550.3
1933	4,610.0	304.2	4,021.8	3,184.4	1,758.8	863.4	309.1	1,803.6
1934	3,398.3	277.4	3,469.5	2,123.4	1,502.5	643.1	325.9	1,046.0
1935	3,859.0	326.5	4,103.4	2,967.7	1,902.6	1,015.4	443.3	1,106.3
1936	4,147.2	430.7	4,240.7	3,187.3	2,072.0	959.0	597.6	1,093.1
1937	4,352.4	323.7	4,314.6	3,225.1	2,239.6	1,125.9	639.3	1,069.4
1938	4,624.9	365.3	4,803.0	3,726.5	2,602.5	904.1	723.0	1,410.9
1939	3,955.9	343.5	4,618.7	3,526.5	2,463.6	949.0	790.9	1,294.1
1940	3,799.2	377.5	4,739.3	3,897.5	3,070.7	870.6	647.6	1,370.0

(引自东亚经济恳谈会:《东亚经济要览》,单位 千吨)

东三省主要农产品出口量

	大 豆	其他豆类	高 粱	玉 米	小 米	其他杂粮	豆 饼	豆 油
1932	2,572.5	96.8	374.1	70.3	231.3	33.0	1,422.3	125.6
1933	2,365.4	92.5	155.1	71.3	169.5	35.2	1,075.8	78.7
1934	2,493.3	130.7	201.5	124.3	242.2	53.4	1,232.5	95.1
1935	1,766.2	160.1	71.7	33.2	105.3	28.8	1,023.6	89.4
1936	1,968.0	143.2	186.0	118.7	160.9	30.4	848.3	67.1
1937	1,974.2	112.6	126.9	111.9	127.3	32.9	803.4	70.2
1938	2,164.8	139.3	216.1	222.3	163.3	27.3	869.2	57.2
1939	1,711.8	164.0	223.2	263.3	215.6	14.3	1,219.8	72.5
1940	451.2	73.3	37.6	44.1	43.9	—	400.3	18.3

(引自日“满”农政研究会:《满洲农业要览》,1940年12月版,单位:千吨,年度为历年度,但1940年则截至3月为止。)

朝鮮米、台灣米的產量和出境(口)量

五年平均	朝鮮米		台灣米	
	產量	出境(口)量	產量	出境(口)量
1912—1916	12,302	1,389	4,643	0.808
1917—1921	14,101	2,443	4,841	968
1922—1926	14,501	4,376	5,809	1,700
1927—1931	15,799	6,617	7,005	2,433
1932—1936	17,003	8,735	9,016	4,378
1937	26,799	5,991	9,233	4,842
1938	24,138		9,816	4,877
1939	14,355		9,151	4,106
1940	21,527		7,901	2,956
1941	19,413	5,775	8,393	1,993
1942	24,886		8,198	1,927
1943	15,688	—	—	1,840

(朝鮮的情況是根據井上晴丸：《朝鮮米外運量的基礎研究》編制的；
台灣的情況是根據松野孝：《日台糧食史》編制的；單位：千噸)

農產品的各種增產計劃，未曾開始就存在着重大障礙。這種障礙就是，帝國主義侵略者一向有意識地加以保存下來的極其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分散經營方式，以及寄生在這上面的當地商業高利貸資本。(台灣的“土壟間”和東三省的“糧棧”就是典型，他們通過掌握谷物的流通過程和加工過程[碾米、制粉、榨油和制酒等]和放高利貸，剝削奴役農民。朝鮮的“舍音”本來是住在城市的地主的管事人，但是通過收取租糧和從中勒索剋扣，逐漸具備了同樣性質。)這些障礙，把農業技術和生產力死死地壓在極低的水平上，同時，遇有天氣不佳，便很容易造成歉收，往往使增產計劃成為泡影。造成“糧食問題”直接原因的朝鮮嚴重歉收(1939年)，可以說是這種矛盾的集中表現。由於歷來政策不重視增加生產力，而主要通過地主機構進行掠奪，加上農

民又极度貧困(百分之五十的农民都是所謂“春穷”农民),致使水利設施得不到彻底整修,这就必然要引起旱灾。专靠雨水灌溉的水田和水利設施不完备的水田,到 1935 年,达到了全部水田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五。(《朝鮮經濟年報》,1940 年版)在这种情况下,以增产一百二十万石为目标的 1935 年度产米計劃,竟然以减产一千万石的“成績”而告終了。

在新殖民地的“滿洲”,还存在不同的情况。在这里,在高达收获量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实物地租和殖民地統治的双重重压之下不断趋于下降的土地生产力,一向是依靠大豆、高粱和谷子的輪种制来勉强維持的。由于增产計劃所規定的强制种植和价格統制所造成的种植上的混乱,首先对这种再生产的方式給予了打击,再加上所謂“滿洲通貨膨脹”所引起的剪刀差的扩大和农业資材的缺乏,进一步加重了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同时,由于各种統制法令的施行,严重地抑制了当地資本作为商业資本的活动,并堵塞了它轉化为工业資本的道路,因而加强了土地集中的趋向,結果加重了对农民的压迫。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拚命推行增产政策,但农业生产力低落和自然經濟化的趋向却是无法掩盖的。

所有新旧殖民地的这种情况,加上工业化的进展所引起的当地需要量的增加,不可避免地使农产品运往日本的数量有了减少,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就已經破坏了它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

第三节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到处碰壁

天皇制法西斯統治体系的矛盾和日本垄断資本主义战争經濟的矛盾,产生了爆发太平洋战争的必然性。而为了挽救天皇制法西斯和垄断資本的危机而加强和扩大对外侵略所引起的矛盾的尖銳

化，也使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下面将分析太平洋战争前夕的中国局势，以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在这方面的危机的实质。

国民党政府的动摇

汪精卫脱离重庆(1938年12月)以后，日本一方面对汪的“和平运动”进行帮助和推动，一方面直接向国民党内的投降派进行工作，企图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汪蒋合作的亲日政权，以便消灭抗日力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来达到统治全中国的目的。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梦想似乎也存在着实现的可能性。

从七·七事变(芦沟桥事件)到武汉三镇陷落这段时间内，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受到了严重打击。虽然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使这个损耗很快就得到了补充，但是，到1940年为止，即使作最低的估计，这种损失也相当于最初战斗部队的百分之一百即二百万军队。并且，由于天津、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失陷，中国的工业丧失了百分之九十。

国民党政府发表的正規军的損失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三镇陷落期间，但不包括被俘虏和失踪者)

年 次	死 亡	負 伤	計
1937	124,130	243,232	267,362
1938	249,613	485,804	735,417
1939	169,652	176,891	346,543
1940	339,530	333,833	673,363
合 計	882,925	1,239,765	2,122,690

国民党政府发表的同上期間日軍的损失

(《中国手册》1937—1945年,第300頁)

年 次	死 亡	負 伤	被 俘	計
1937	85,350	170,750	1,480	257,580
1938	148,134	296,756	2,859	447,749
1939	136,245	273,550	5,920	415,715
1940	114,426	229,191	3,070	346,687
合 計	484,155	970,247	13,329	1,467,731

迁移到重庆以后,国民党政府以恢复抗战力量为目的,加强了經濟統制。但其結果,只是实现了官僚垄断資本的集中和加强,并通过这种集中和加强,养肥了国民党統治集团的四大家族(蔣、宋、孔、陈),中小企业家和农民始終受到压迫,阻碍了通过占中国工业絕大部分的中小企业的发展来实现抗战潜力的发揚。(参看本书第2卷,第4章,第1节)1938年3月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決議,內称“为适当調节产业活动,必須統制銀行业务”和“禁止奸商的垄断、投机,实施价格統制”。但是抗战期間重庆市銀行(不論国营或民营,完全掌握在四大家族及其他国民党要人手里)投資的情况是:非生产性的商业投資对农矿工业的投資占压倒优势。商业投資和农矿工业投資的比例是:1939年为百分之八十九比百分之零点一,1940年为百分之九十六比百分之三,1941年为百分之八十九比百分之七,这說明,国民党統治集团本身就是在明目張胆地違背上述決議,瘋狂地进行投机和垄断。并且这一时期,在“自由中国”(国民党統治区),土地投机之风盛行,例如在政府的所在地四川省,据說往往“一块土地在一个月之中要更換八个主人”。(《新华日报》1942年2月2日)因此,在这个地方,农民失去土地和土地向地主、尤其是国民党要人手里集中,成

了一般的现象，“以四川为例：在1937年到1941年五年中，该省地主的地产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九至百分之七十，……和这种土地集中加速的过程相反映的，是地租数目的大大加多。”（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同时，成为国民党政府主要财源的土地税，在四川省，竟高达平均土地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九点五，再加上将军们以“抗战”为名肆意进行的征发，必然地破坏了农民的生活。所以，即使在完全免于战火的“自由中国”，农业生产在1941年以后也降低到战前水平以下。（《中国手册》1937年—1945年），重庆政府，就是这样以牺牲农民为条件，换取外援，作为进行抗战的凭借。例如，国民党政府贸易委员会，为了增加出口，获得外汇，以便增强军事力量，强行征购各种出口物资，后来，还对食盐、糖、燃料及其他多种物资实行了专卖制度。其中，秋茧的一般价格和政府征购价格的每吨差额，1938年为三百元，1939年为一千五百八十元，1940年为二千零五十元，茶叶和棉布等的征购价格也低于成本。在这样牺牲农民及其他生产者的基础上，工业部门依靠外国、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得到了若干恢复。如以1938年的工业产量指数为一百，1939年为一百三十，1940年达到了一百八十六。（《中国手册》）但是，由于人民群众的生活每况愈下，群众对于抗战的积极性受到挫伤，因此，国民党政府就不得不更加依靠外国了。

然而，国民党的首脑们赖以赓续活命的外国援助，前途也并不乐观。英国忙于德国的迅速进攻，在亚洲一味对日退让，1939年7月，根据有田—克莱琪协定发表了“承认在中国发生的事态”的声明，并“赞成中日两国间达成某种和解”。（赫伯特·费思：《太平洋战争前史》上卷）（参照本书第2卷，第5章，第1节）这简直是从侧面援助日本的“和平”工作。次年7月，英国更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同意对滇缅公路实行有限期的封锁。在当时，通过滇缅公路，每月平均用汽车运输物资一千吨，用牲畜驮运九千吨，1939

年运输物资的价額，达到三千一百零九万二千三百三十八卢布。同年9月，日本趁着法国对德投降的机会侵入法領印度支那，封鎖了滇越公路。在沿海各港口失陷以后，中国的軍需品及工业上的必需品的百分之九十八是通过滇緬公路、滇越公路及滇印公路輸入的，所以以上两条公路的被封鎖，給重庆政府抗战力量带来的影响，决不是微小的。同时，蔣介石的最大靠山美国統治阶级，害怕由于日本对华侵略的扩大，将使其在华权益遭到損失，从而加深了和日本的对立。因此，在1940年7月，美国宣布廢除日美通商条約，接着在9月間又宣布禁止廢鉄对日輸出，并积极地对重庆提供援助貸款。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依然打算保持日本成为“在亚洲对付共产主义的有效堡垒”（費思：《太平洋战争前史》上卷），也就是期待日本进攻苏联以及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美国的这种期待，露骨地表现在1941年春季举行的野村—赫尔会谈上面。当时，美国想要承认“滿洲国”和日本在华駐軍，并强使重庆政府对日妥协。这就是說，美国避免实行“可能引起日美冲突的制裁”（費思：《太平洋战争前史》上卷），并在条約廢除后，除了扩大对航空武器的禁运适用范围以外，保留了和条約失效以前大致相同的对日貿易。1939到1940年，美国对日石油和廢鉄的出口額創造了新記錄，1940年的对日出口总额达到了二亿零六十三万八千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1937到1941年期間美国对华貸款的一亿七千万美元。在这种内外两方面的困难形势下，重庆政府内部的和平論即投降論不可避免地抬头了。日本駐南京大使館情报部的报告也提到，1940年7月滇緬公路被封鎖时重庆政府内部主和气氛趋于濃厚；在同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五届七中全会上就和战問題进行了热烈的討論。国民党的这种动摇，表现为从1939年底到1940年秋国民党軍隊对华北和华中的解放区（边区）发动的武装进攻，重庆政府对反共限共政策的加强和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危机。但是，日

本帝国主义并没有能够成功地利用这次抗日統一战綫的危机。蔣介石虽然不肯积极抗战,而不断加强其反共限共政策,然而,仍然表示要继续抗战。日本在拉攏蔣介石工作上所以失敗的原因有:日本的要求过高(参看附录:《日汪基本关系条約》);日本和美英未能充分达成妥协,未能打动由亲美派所操纵的整个国民党;苏联对华援助的加强;从同年10月起,滇緬公路的再次开放等等。但是,使蔣介石不敢脱离抗日陣营的决定性原因是,以中共为主体的抗日力量坚强的发展。武汉失陷以后,蔣介石把嫡系軍隊撤到四川、云南和貴州等大后方,避免和日軍交战,专门进行整編和加强。他的政策是:“經常利用共軍和杂牌軍(地方軍閥)充当抗日的先鋒,借以打击日軍,同时也解决他們(削弱他們的实力),并保存自己的实力。”(《重庆近况》)

避免內战的危机

这样一来,八路軍(华北)、新四軍(华中)及其他中共部队便逐漸代替国民党軍掌握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在华北地区,到1938年年底,日軍消灭了几乎所有的国民党系正規軍。国民党軍的主力有的退到黄河以南,有的孤立向日軍的后方,其中大多数后来都被伪軍吸收了。此后在这个地区从事抗日的主要是,1937年9月在朱德总司令指揮之下从山西省黄土地带以西跨过黄河,逐渐深入到日軍占領区后方的第一一五师(向山西、察哈尔和河北三省交界挺进)、第一二〇师(向山西省北部挺进)和第一二九师(向山西南部进军)等三万八路軍。他們为了抗击十万日軍,避免主力部队的大規模作战,把兵力分散开来,广泛地联系在各地由工人、农民、学生和自由主义者成立的各种分散的抗日組織,把它們培养成为强有力的游击队,对分散在广大地区的日本駐軍及其漫长的补給綫,展开了不断的襲击。起初,日本陸軍藐視了这种游击战。根据

日軍战术的常識，不能設想处在敌人后方連補給基地都沒有的小小游击队会成长壮大起来。在和蔣介石进行的多年战争中受到鍛练的八路軍，利用日軍的这种藐視，运用巧妙的战术，同人民紧密結合和动員群众，成功地在各地建立了根据地，并以此为基点不断地发展起来。1939年以后，共軍运用游击战术連續粉碎了日軍山下奉文和桑木师团长所制定的“封鎖”、“分割”、“扫蕩”三者并用的战术，在华北、华中建立了許多解放区。到1940年秋季，八路軍由几万人发展到四十万，解放人口近四千万。新四軍由一万二千人发展至十万，解放人口一千三百万。（朱德：《論解放区战場》，1945年4月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軍事报告）共軍掌握的地区（边区和解放区）的总人口达到四千余万人^①，在与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統治下的三百三十九县相匹敌的三百三十四县中，經過人民普选建立了县政府。因此，在这个时期，日軍被压縮在从北到南貫穿华北的三条鉄路和从东到西的一条鉄路所构成的丁字形沿綫的各个城市之中了。在1940年8月开始的所謂百团大战中，八路軍动員了一百十五个团四十万兵力从五十个地点一齐展开了攻势。这次战斗历时約三个半月，其結果，日軍死伤了約計二万，伪軍死伤約五千，被俘人数分別为二百八十名和一万八千名；正太鉄路（石家庄至太原）和平汉鉄路的一千里綫路和公路三千里遭到了破坏。八路軍方面也死伤了二万二千名，这是中日战争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激战，給予了日本軍隊以沉重的打击。1941年1月，东条陆相在貴众两院作了如下的发言：“昭和十五年（1940年）重庆方面敌人抗战的特色是作战非常消极，一直到現在，沒有作主力反攻。只有‘共匪’去年8月在华北地区向我展开了大規模的攻击。与此相反，蔣介石的嫡系和旁系軍隊总是采取守势。”这样，一

① 原文中以上各項数字略有出入，根据有关文件作了修改。——譯者

貫輕視八路軍的日軍，由于这次大战也“开始知道八路軍的厉害了”。（《华北中共軍現状》）次年，日本駐华北軍最高司令官多田駿被撤职，由岡村宁次接替，从此，日軍把主力投入了对八路軍的作战。在华中，以长征时期留在江西和福建繼續和国民党作战的項英麾下的五千名共軍官兵为核心，加上由各淪陷区前来参加的工人、学生以及携带着生鏽的长枪、斧头和手榴彈的旧农民自卫队員等所組成的一万五千名新四軍，成了抗日的主力。汉口失陷以后，国民党軍隊从华中地区的大部分地区撤退；日軍占領了主要城市、公路和鉄路，在各地建立起地主階級的亲日地方政权，借以保持占領区。华中地区是帝国主义权益所集中的一个中心地区，同时也是四大家族势力最强大的地盘。因此，即便在国共合作实现以后，蔣介石仍然害怕中共势力进入这个地区，而一直沒有停止过对它的压迫。但是，由于日軍的迅速进攻和国民党軍的潰敗，到1938年4月，蔣介石为了“以毒攻毒”才把旧中共軍改編为新四軍并允許他們在长江南北被限定的地区以內进行游击战。从那时起，他們运用小規模的、但是不間断的游击战，經常威胁分散在各地的日本駐軍及其补給綫。根据爱德加·斯諾的《亚洲的解放》，新四軍“無論在哪一周和哪一天，每天都平均杀伤三十名日本兵”。因此，在新四軍进入这一地区以前，日軍用三个团兵力就統治了这个地区，但是到了1940年，就不得不把駐軍增加到三个师了。而且到同年年底，新四軍在江苏和安徽两省，还收复了相当于这两省的三分之一、約有一千三百万人口的地区，兵力扩大到了十万人。因此，当时即使在南京近郊，日本軍民如果沒有警卫队的森严保护，也是寸步难行，仅南京一地，就需要七千名警卫部队。这就是說，日軍沒有能够把它在战争第一阶段中所获得的軍事胜利，在政治和經濟上加以巩固，它向中国內地的进攻被阻止了。

由于以八路軍、新四軍为中心的抗日力量的这种发展，在另一

方面也加深了企图全面統治中国的国民党統治阶层的恐惧，国民党内亲日派則积极进行阴谋活动，企图和日本勾結起来，变抗战为反共的内战。特别是在华中地区新四軍的发展，更使得蔣介石胆战心惊。随着新四軍的不断发展，蔣介石逐漸削減以至停止对新四軍的补給，限制了新四軍的募兵区域，甚至对于展开游击战所不可缺少的(为了获得人民的支持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也进行妨害。每当新四軍收复了一个县城，国民党立即恢复其原来的通过党部和行政机构实行的一党专政，妨碍成立經過普选产生的人民委员会和人民政权，并压制减租运动。面对蔣介石集团的这种压迫，項英等一部分新四軍领导者，担心国共分裂，不便放手发动群众和扩大解放区。乘着这个机会，国民党軍在李宗仁等的指揮下，从1940年春季起，在安徽省屡次对新四軍举行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到1940年10月，重庆軍事委员会，借口新四軍不听命令，企图在宁、沪、杭三角地带(当时在日軍占領下)建立根据地，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軍全部开往黄河以北。当安徽省南部的新四軍九千余人依照命令开始向該省北部移动时，国民党政府的何应欽竟然誣蔑这支队伍举行“叛乱”，而在1941年1月出动大軍进行了襲击。这就是所謂“新四軍事件”(皖南事变)，在这次事变中，新四軍軍长叶挺被俘，副軍长項英以下几乎全部牺牲。于是，从反共斗争发展为反共内战的危险达到了頂点。这种把局部的内战扩大为全国性的内战，正是符合于日本“和平”工作的最終目的。当时，日軍提出“完成安徽省南部討共”的口号，大举进攻宣城和金坛附近的新四軍；而汪精卫也在南京举行庆祝大会，对蔣介石的“討”共加以贊揚。这一事件发生后，中共方面揭发了为制造这次事件，日軍間諜曾經在暗地里直接进行了策动(《毛澤东选集》)，《本戶日記》1941年6月28日的如下記述，可以說在某种程度上証实了这一揭发，日記写道“东条陆相参見天皇以后来室，就下列各点进行了

說明……。一、对閻錫山工作，对李宗仁、白崇禧工作后来的情况”，当时，閻在华北，李、白在华中已經开始了反共攻势。但是日本的这种企图并未完全得逞，中国内战扩大的危险终于克服了。因为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战及其发展，鼓舞了在抗战初期受到挫折的中国人民的信心和勇气，这时已經把他們的意志集中到抗日上来了。所以，新四军事件一发生，全国各地就掀起了譴責国民党政府的浪潮，国民党内的宋庆龄、何香凝和彭澤民等也向蔣介石提出了书面抗議；自由知識分子和实业家組織“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来的民主同盟），严厉地批判了国民党的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蔣介石如果繼續举行反共攻势，放弃抗日，他势必愈益陷于孤立，因此，在这个事件后的一个时期反共攻势有所緩和，蔣介石对日屈服、发动全面内战的危险完全被阻止了。

日軍占領区的經濟危机

如上所述，迅速解决中日战争的希望已經破灭，日本不得不长期地把庞大的物力和人力资源投入战争，必須确立新的战争体制。在欧洲德军的閃电式进攻和英法的败退，决定了日本的新政策的方向。如上所述，第二次近卫內閣制定的“基本国策綱要”和“适当世界形势演变处理时局綱要”，确定了南进政策和相应的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針（参看本章第1节），在那以后，就力图掌握中国作为南进的軍事和經濟基地。为此，日本必須一方面在軍事上对于已經发展成为抗日力量核心的八路军、新四军加以集中攻击，另一方面，还必须采取政治措施，来緩和一般中国人对于日本侵略中国大陆的强烈憎恨，并使其支持日本南进即向英美帝国主义的挑战。

1940年11月，日本承认伪南京政府和发表“日‘滿’‘华’共同宣言”（11月30日签字），就是这个企图的具体表现。这个宣言表

明：“根据在东亚建立基于道义的新秩序这一共同理想，（三国）作为善邻互相密切合作，以形成东亚持久和平的軸心”，为此目的，“实行基于互相尊重主权、領土和互惠精神的全面合作，特别是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濟合作。”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被大肆宣傳，并企图为日本的战争目的提供理論根据的这一“宣言”的真正意图，无非是要用譴責英美帝国主义的恣态来掩飾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和南方各地区的侵略，而把亚洲各民族驅入这一侵略战争的火坑。在决定承认伪南京政府的 11 月 3 日举行的御前會議上，近卫首相吐露了真情，他說：“必須采取措施大力培养南京政府的政治力量，使其协助我方解决‘事变’，以彻底达成‘事变’的目的”。因此，和“日‘滿’‘华’共同宣言”同时簽訂的“日‘华’基本条約”規定，伪南京政府承认“滿洲国”，承认日本有权在“蒙疆”及华北三省駐兵，在海南島及华南沿海指定地点停泊艦队，以及在以上地区开发和利用軍事資源等等，这就完全違背了共同宣言中的“尊重領土主权”，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要把中国作为南进基地半永久地加以掌握和統治的意图，反而招致了中国人民愈益强烈的憤慨。另外，日本为了配合南进而簽訂了三国軍事同盟和承认伪南京政府，也使日本和英美的矛盾更加尖銳化，从而，对蔣介石集团进行工作就更为困难，总的說来，此后重庆政府内部的投降派、亲日派的势力削弱了。这就是說，由于采取了以南进为目标的新政策，日本反而面临南进的前提——迅速解决中日战争变得更为困难这样一种窘境。这样一来，日本就把主力集中到通过加强南京傀儡政权来掌握占領区，开发和掠夺資源；为了削弱国民党統治区和解放区抗战力量而实行經濟封鎖；并在兴亚院的管轄下設立各种統制公司；为了有效地掠夺軍事資源，加强对占領区的經濟統制。但是，由于日本和伪南京政府的統治地区只有消費性很强的大城市及其周圍，由于日本对中国实行了近于掠夺的低价强制收

购和高价出售的所謂“統制”，使占領区的生产迅速下降，淪陷区的重要物資越过严密的封鎖綫流入国民党統治区和解放区，日本要在內地购买粮食和原料反而受到层层封鎖綫妨碍的現象日益显著，这就加剧了占領区的經濟危机。因此，就連伪南京政府特使褚民誼在1943年6月会见东条首相时也不得不說：“条約的規定被无视，統一受到阻碍，无益的压迫和剝削仍然存在，这并不是同甘共苦，而是使中国方面独自受苦。”同年9月間，陈公博、周佛海也分別向平沼、有田两特使訴苦說：“上海的經濟将在一年內破产！”“据估計，不出半年，經濟就要总崩潰了。”和日本及伪南京政府的这种政治失敗相反，以中共为中心的抗日力量，通过抗日，不断地发展壮大，积极准备举行反攻。

八路軍和解放区的壮大

确定了南进政策以后，日軍为了全面把持因八路軍的进展而遭受威胁的华北地区，把大軍集中到华北，用主力开始了大規模的“扫蕩战”。从1940年起，日本的华北派遣軍最高司令官岡村宁次，为迫使中国民众放弃抵抗意志，彻底摧毁八路軍存在的基础，采用了多种殘暴的新战术。这就是所謂“鉄环包圍”、“監獄战术”、“竹篋清扫”、“馬蹄形包抄綫”和“魚鱗形包圍陣”等新战术，关于这些的特点，美国記者杰克·貝耳登曾經作了如下的描述：

“監獄战术是这样一种战术：日軍把中国軍隊追逐到狹小的地区以后，把队伍編成十字队形，随心所欲地打进去，然后把陷入包圍圈中的中国軍隊加以杀光。日軍把城市当作这种战术上的監獄的鑰匙，沿着鉄路和公路，挖掘寬二十英尺，深度和战壕相等的联络沟，在准备进攻的地区的周圍，橫穿公路和农田筑起土墙。这种土墙延伸得既长，为数又多。据估計，这些土墙如果联接起来，可以圍繞地球一周半。如果有人认为这話是夸大，我可以根据亲

眼看到的情况提出証据。我在穿过平原时，亲眼看到了许许多多碉堡、濠沟和土墙，就在这中间，中国能够存在，这真是不可想象的事。日军筑起土墙以后，接着就沿铁路线修筑公路，并沿着所有公路修筑碉堡。然后，他们象切豆腐一样把这座监狱完全切成碎块，最后使中国军队丧失可以行动的十英尺见方的地段。”（杰克·貝尔登：《中国震撼着世界》上册）

日军为实行这种战术而使用的兵力，1941 年到 1942 年期间，等于前二年的二倍，达八十三万四千人，用一千人以上的兵力进攻的次数，将近以前两年间的二倍，共达一百七十四次，往往一次就动员将近十万大军，一次进攻持续三、四个月。并且在进行这种扫荡战的同时，在“加强治安运动”的口号之下，把华北分为三类地区，即“治安区”（日军占领区）、“准治安区”（双方争夺的游击区）和“非治安区”（八路军所掌握的解放区）。在第一类地区，日军以地主和富农为支柱组织维持会，加强镇压反日因素的特务政策，同时对中小学生施行日语教育，通过“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思想宣传推行“良民化”工作。对于“准治安区”，日军采取了高压和怀柔相结合的手段，主要是通过迫使人民提供劳役和粮食，来考验居民是否“忠诚”，并且常常强迫居民迁往治安区，把这一地区变成无人区，使游击队无法活动。对于“非治安区”（解放区），日军在进行扫荡战时不仅执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所谓三光政策，甚至还使用毒瓦斯和细菌，来企图摧毁中国居民的抗战意志。日本军队这样加强对共军的进攻，起初是收到了很大效果。特别是从 1941 年到 1942 年期间，华北全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饥馑，仅在河南一省，就饿死了二百万至三百万人，八路军和农民都“不得不吃树叶草根，继续战斗”（朱德：《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军事报告》），困难是加重了。加上德国侵苏战争的爆发和接踵而来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以及战争初期德日军队的快速进攻，使重庆政府

内部又一次“对抗战前途的悲观情绪增长起来”（《重庆近况》），蒋介石只顾保存自己的中央军，不给中共以任何军事上和經濟上的支援，反而加强了对解放区的包围和封锁。在这期间，国民党军相继丢失了绍兴、宁波、奉化、福州、衢州和温州等要冲，到1941年7月，把浙江江西两省之间的整个战线交给了日军，高级将领率领的大批军队投降日军，结果加强了汪精卫的伪军。于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中共部队，不得不抗击这个时期在华日军总数三十六个师半，共一百十六万八千人的百分之六十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面临抗战史上的“最大困难”，到1942年年底“解放区人口缩小至五千万以下，八路军减员至三十万。”（朱德：同上报告）但是在这期间，八路军依靠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即军民打成一片，战胜了困难。在“好共产党员就是好生产者”的口号下，广泛地开展了“生产自给运动”，用精兵主义来弥补军队数量的缩小，提高了军队的质量；开展了“精兵简政运动”简化了行政机构，提高了工作效率，为减轻人民负担而进行了斗争。例如：国民党山西省政府财政厅的职员有二百五十人，而晋冀鲁豫边区（包括山西、河北、山东和河南的华北最大边区）的财政厅却只有十六个职员。他们骑着骡子背着行李走遍农村，他们的待遇，在这期间，不论党员或士兵一律降低了一半，每天只领二十五盎司粮食和三仙半的副食费，每月只领三仙的津贴，据说“干部吃的东西比最穷的农民还要坏”（贝尔登的前书）。在减轻人民负担的同时，还开展了一系列运动，诸如：通过组织群众，搞互助运动来发展农业生产，由暂时离开军队和政府机关的士兵和干部所领导的大规模的灭蝗运动，以及引河掘井抗旱救灾运动，等等。

在解放区，为了团结广大人民进行抗战，还彻底实行了减租减息运动，在这个基础上，在各地建立和加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统一战线政府。这样，在这一困难时期，中共和八路军的威信反而

提高，受到了人民空前的热烈支持。例如，在 1941 年 6 月德国侵苏战争爆发，德军大举进攻和日军进行扫荡战的情况下，北京的燕京大学毕业生，十分之七投奔了解放区，十分之二到了重庆，下余最无能的十分之一留在沦陷区（《华北共军现状》，1942 年 5 月），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了上述情况。

由于中共、八路军在政治上取得了以上的成功，也就为军事上采取新的、有效的战术创造了条件。这个时期，虽然八路军正规部队有所减少，而民兵却有了显著的增加，这就表明全民武装化有了进展。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又创造了新的战术，即在日军进攻的同时，实行迂回作战，深入到日军刚刚开拔的地点，袭击铁路和兵营。他们扫荡战一开始，能够立即得到情报。因为在这里，“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是‘情报员’，……例如，利用农民耕种时抡起镢头的方向和高度，……利用钟声、标志或火光，正确而迅速地传递了日军兵力和行动方向的情报。”（《华北共军现状》）同时，成为日军进攻对象的地区的居民，采取有名的“坚壁清野”的自卫战术，在日军进攻之前就把水井、家具、谷物及其他一切重要物质掩埋起来，村民也全部隐蔽起来，使日军无法在当地进行征发。例如，日军占领晋平这座一万人口的城市时，据说一个居民也看不到（同上书），在较小的村庄里，这个办法是容易而且彻底地被实行了。此外，农民还在公路和田地里埋设了无数的自造地雷。对于在挖空的南瓜和石头里装满火药而制成的这种原始地雷，电磁探雷器也不起作用。用猎枪和从日本兵手里缴获的三八式步枪武装起来的民兵狙击队，埋伏在山上和地道里。他们用挖空的粗木料箍上金属和缠上电线制成土炮，然后装上用破壶罐、破锅、碎玻璃和石块等配制成的火药进行射击。八路军正规部队通常以隐蔽分散的办法，迂回深入到解放区的日军的侧后，等待他们在进攻根据地的过程中由于疲惫而分散的时候，就集中优势兵力加以痛击。在

日軍的后方,还针对其“加强治安运动”組織了“武装工作队”,打击日軍小部队,在秘密中发展抗日政权和抗日組織,往往把力量甚且发展到伪政权的干部中間。因此,即使在“治安地区”,日軍也由于鉄路和公路不断遭到破坏而大伤脑筋。农民在自己住宅的地下挖掘地道,和邻村的地道衔接起来。这种地道,往往把几百座村庄連在一起,并在各个村庄周圍,向四面八方挖掘了和战壕一样深、馬車可以通行那样寬的壕沟,阻碍了日軍运用騎兵、汽車和装甲車等的快速部队进行机动战。最大单位分成营的游击队,掩蔽在地道里襲击日軍。因此,在 1941 年的冀中作战中駐华北的日軍包围夺取了平原根据地以后,据說“竟有几乎看不到一名共軍的惊人事例,因为共軍都从地道逃往別处了”。(《华北共軍現狀》)这种情况表明,日軍的“討伐”已逐漸失去威力,他們由于和“无形的軍隊”作无止境的战斗而疲于奔命。

就这样,由于以八路軍、新四軍为中心的中国人民的坚强抵抗,日本不得不在无法“解决”中日战争的情况下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企图“完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进攻共軍的口号)的工作失败了,相反地,它不得不把更多的兵力和物力投入中国战綫,在对英美作战上被拖住了后腿。这样到了 1942 年年底,統治階級中头脑比較清醒的人們,对中日战争的前途可能导致最可怕的結局,开始表明了如下的恐惧:“如果按照現狀这样搞下去,則不仅与中国民族的妥协

中国方面发表的在华日軍兵力

年 度	师 团 数	兵 員(人)
1937	26	832,000
1938	30½	976,000
1939	35	1,120,000
1940	35	1,120,000
1941	36½	1,163,000
1942	42½	1,360,000
1943	57½	1,840,000
1944	58	1,856,000

(引自《中国手册》1937—1945 年)

成为不可能，而且中国人反日仇日的感情将趋向极端，中国经济结构的全面崩溃自不待言，而‘共匪’终将控制中国的大部分国土。这意味着日本在中国受到最大的打击，如果在这种状态下结束了战争，则‘中日事变’颇有转为严重局面的危险。”

第三章 日美矛盾的尖銳化

第一节 圍繞中国問題美日两国的斗争

軍火租借法和美国經濟的軍事化

罗斯福的“新政”，虽然和二十年代的共和党政府的方針有所不同，但是它的真正目的还是救济和加强壟断資本，因此，它并不能彻底解决資本主义的矛盾。由于这种原故，工业生产虽在 1937 年达到了 1929 年的水平，然而到同年 9 月，紐約的股票行市又暴跌了，到 11 月間，若干工业部門的产量，降低到 1932—1933 年的最低水平，直到 1938 年，危机还是不見緩和。面对这种危机，罗斯福政府采取了怎样的政策呢？

美国工业生产指数（1929 年为 100）

年次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指数	83	68	53	63	68	75	94	103	81	98	114

在股票暴跌以后不久的 1937 年 10 月 5 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就“隔离”侵略者的問題发表了演說。这次演說被认为是表明美国放弃了傳統的中立政策，在各方面引起了反应。当然，共和党系的《紐約太阳报》、《紐約先驅論壇报》、《芝加哥論壇报》等报纸对此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但是当时进步的《民族》周刊却支持罗斯福的政策，強調保障集体安全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导致战争。另外，当时的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也在《新群众》杂志上著文欢迎罗斯福的反对中立，并向他保証“共产党給予百分之百的无条件的支持”。的确，如果这种“隔离”不仅仅是一种单纯道义的姿态，那末就必然

要采取具体措施，来制止法西斯各国的侵略。

但是，当时美国无论对于给世界投上了阴影的西班牙内战或者日本的侵略中国，都没有作出任何具体的政策上的改变。1937年1月，罗斯福虽然使议会通过了一项特别法案，授权总统对“内乱”援用“禁运武器条款”，但罗斯福总统仍旧和伦敦的不干涉委员会采取同一步调，对于向法西斯作战的西班牙共和国军队，继续禁运武器，到了1939年，当佛朗哥进入马德里以后，就在4月1日承认了佛朗哥政权。另外，尽管1937年5月通过的中立法，已授权总统当他认为国外存在“战争状态”时，可以实行禁运，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条款适用于中日战争上面。这种对于应该受到“隔离”的侵略者不仅不“隔离”起来，反而把他们置于便于其病毒繁殖的温室之中的一贯政策，在慕尼黑会谈时也没有改变。在慕尼黑会谈开始前夕的1938年9月26日，罗斯福向英、法两国总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及希特勒发出了同样内容的电报，极力呼吁避免冲突，并要求墨索里尼努力使会谈获致成功。罗斯福的这种干涉，对于英法德意缔结牺牲捷克斯洛伐克来回避战争的慕尼黑协定，起了有利作用。（参阅本书第2卷，第5章，第2节）

那篇有名的“隔离”演说并没有兑现。它所起的作用是：向美国

国民宣传了国外战争爆发的危险，并帮助美国利用军需生产来摆脱经济危机。罗斯福在1938年初的国会咨文中说：

“美国政府一贯致力于裁减军备。但是当前国际局势出现了极度紧张和无秩序的状态，各国政府都有责任保证遵守和平解决国际

美国预算内容的变动

年 次	国 防 费	救 济 费
1934	7.4%	27.3%
1935	9.7%	34.7%
1936	10.3%	27.6%
1937	11.1%	30.8%
1938	12.9%	23.8%
1939	14.4%	18.4%

糾紛的各項原則。今天,美国政府願意尊重別国的权利,而为使別国尊重美国的权利,必須保持充分强大的軍备。”

这段話在編制預算上面体现出来了。在新的預算中,救济費所占的比重較前减少,而国防費所占比重却有了增加。这种依靠軍事生产来摆脱經濟危机的政策还体现在 1938 年 5 月制訂的《新文森扩充海軍方案》上面。在此以前的 1934 年 5 月通过的德拉梅尔-法案,目的是在海軍条約的限度內大量建造輔助性舰只;而这次新文森方案的目的,是建造以战艦、航空母艦等大型艦只为中心的举世无双的无敌艦队,所需經費巨大,估計总额达十亿五千万美元。

但是,美国的这种依靠軍事生产摆脱危机的办法,只是到了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由于实行对英援助及擴張軍备才开始实行。这种情况,可以由下表得到說明。

美国产业別生产指数
(1935-1937 年为 100)

年 季	生 产 手 段 生 产 部 門						消 費 資 料 生 产 部 門				
	鋼鉄	机器	飞机	鉄路	造船	非鉄金属	不耐用物品	纖維	皮革	汽車	家俱
1938 第 1	53	88	103	96	103	75	89	69	85	62	81
第 2	51	77	98	61	95	67	89	73	87	51	80
第 3	72	78	94	61	96	73	98	96	97	52	91
第 4	98	86	101	68	97	100	102	103	102	88	96
1939 第 1	93	93	121	83	112	95	104	106	105	102	99
第 2	85	96	153	74	122	94	104	106	100	84	101
第 3	114	104	189	75	133	114	108	113	104	84	107
第 4	163	121	239	121	141	152	116	124	106	103	118
1940 第 1	124	124	290	154	152	143	110	109	97	126	114
第 2	124	125	331	119	163	127	110	104	89	103	113
第 3	159	139	455	133	207	145	112	114	95	91	117
第 4	171	154	587	167	240	170	119	132	104	132	125

1939年年底，美国对英国的投資額达到一百一十三亿六千五百万美元，占美国全部对外投資額的百分之四十二。美国的銀行家和資本家在英国拥有这样巨額权益的事实，自然要反映到美国的对英外交政策上面来。在1939年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同时，美国就对英国开始了援助。同年11月4日，美国国会修改了中立法，使盟国可以在“支付現金和用本国船运输”（Cash and Carry）的条件下，向美国购买武器。1940年4月，美国和盟国武器购入委员会签订了出价值十亿美元飞机的合同。同年9月，又和英国締結了有关驅逐艦、海軍基地的协定，把五十艘驅逐艦貸給了英国。这样，在同年内，美国向英国輸出了大約八亿美元的物資，到次年1月，英国从美国的进口額，竟占美国出口總額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

但是，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所欠美国債務中有五十六亿美元以上沒有偿还，根据禁止向不履行債務的国家撥款及貸款的約翰遜法（1934年4月13日实施），禁止向英国撥款和貸款。而根据禁止向交战国撥款及貸款的中立法（1939年11月4日实施），也禁止向英国撥款和貸款。但是由于1940年6月法国战敗所引起的英国的危机，进一步加深了美国援助英国的必要。罗斯福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于1940年12月制訂了一項法案，規定撥款給美国国内的軍火生产部門，然后把生产出来的成品貸給英国。他在把這項法案提交議會以前，就向英国的采购代表宣布，为此目的将撥款三十亿美元。这一法案在1941年1月10日提交到議會，于3月11日战胜了众議院一百六十五票的反对和参議院三十一票的反对而获得通过，这就是所謂“軍火租借法”。

美国方面通过这种对外援助来扩大国外市場，另一方面，在国内的軍事生产随着战争的发展而有了显著的发展，1940年第七十六届国会期間，又通过了建立两洋艦队法案和加强中立法法案，总

計約一百七十七億美元的“國防費”獲得了國會的批准。這個數字雖然也包括後來使用的部分，然而實際上，到1941年6月30日截止的年度預算中，陸軍方面的經費約達八十七億美元，海軍方面的約達三十三億七千萬美元。

以上的擴大軍事生產的目的，是為了從危機中維護壟斷資本的利益，這一點，可以從在這個時期參加政府而實際擔任執行政策的一批人物的名單，進一步得到證明。1940年夏，史汀生和諾克斯分別就任陸軍部長和海軍部長。史汀生是摩根家族的親戚邦布萊特的外甥，是在胡佛總統手下擔任過國務卿的共和黨內的干涉論者。諾克斯是《芝加哥日報》的社長，也是共和黨內的干涉論者，他在1932年大選時，曾和競選總統的蘭頓一道競選過副總統，並在競選演說中說過：“任何壽險政策都不可靠，任何存款都不安全”。在這同一時期被聘任為國防諮詢委員會產業物資委員的斯退丁紐斯是當時美國鋼鐵公司的董事。而這個委員會另一成員克奴得生是通用汽車公司的董事。

美國的反戰運動

美國並沒有實行“隔離”政策而是向侵略者實行了綏靖政策，1939年8月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以後，執行這樣政策的美國的干與戰爭的作法，也就變成了同德國和蘇聯相敵對的純粹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因此，根據蓋洛普民意測驗，從1939年9月到1940年5月之間，美國人民有百分之九十六以上反對干與戰爭。共產黨機關報《工人日報》和進步的工會、青年團等一起，高舉着“美國人不願參戰”（“The Yanks are not Coming”）的標語，在1940年4月6日舉行了反戰遊行。8月間，組成了“停止干預戰爭保衛美國委員會”，從8月31日到9月2日，在芝加哥召開了“緊急和平動員”大會，由此開展了“美國和平動員”（A. P. M）運動，到

了 11 月 11 日停战紀念日，在三十多个城市举行盛大集会，并且把这一天定名为“美国和平动員日”。1941 年 1 月到 2 月期間，許多代表汇集华盛顿，就軍火租借法和备战政策向政府提出抗議。这一反战运动分別在各地展开斗争，例如在依利瑙州威尔地方，支持了农民反对官方以杜邦財团建設軍火工厂为理由而征用土地的斗争，在南卡罗里納州还支持了抗議不准雇用黑人参加軍事生产的运动。1941 年 4 月 5 日到 6 日，“美国和平动員”运动在紐約市召开了美国人民大会，通过了七条綱領，这七条綱領（尤其是第四、第六两条）可以很好地帮助人們了解这一系列反战运动的性质。七条綱領要旨如下：

一 停止干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反对包括向海外派遣美国軍隊在內的一切干与战争的措施。停止和英国的軍事同盟。

二 維持并提高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 夺回并加强宪法上規定的自由。保卫罢工权，反对限制教育自由。保卫遭到希特勒式迫害的受难者。根絕种族偏見。

四 反对让貧民負担战争費用。沒收兵役稅和战时利得。反对对于貧民的不公正的征稅。

五 征兵时，拥护市民的正常权利。

六 建立和平外交。廢除美国壟断資本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剝削，建立和他們之間的友好关系。不要援助中国的內外敌人，切实援助全中国爭取自由的斗争。給予波多黎各和菲律宾以真正的独立。为防止战争扩大，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

七 爭取人民的和平。爭取建立在各殖民地人民自决权基础上的无賠償、无兼并的和平。

决心要用扩大軍事生产来摆脱危机的美国政府，对于这种人民群众的反战运动，自然要加以鎮压。罗斯福政府以德苏締結互不侵犯条約为借口，声称要对抗“整体主义”的威胁，而交給了联邦

調查局以秘密政治警察的任务，开始了镇压共产党的勾当。1940年6月，美国政府利用“外人登記法”来統制人民群众的思想。1940年9月5日，“美国和平运动”組織在华盛顿举行了大規模的反战示威游行，遭到了警察殘暴的镇压。参加这次反民主的暴力镇压的有，慕尼黑会谈以前成立的第兹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真正目标，可以从这个組織成立伊始被雇用担任調查主任的沙利文的言行上面看得出来。沙利文是反苏宣傳的“专家”，在参加这个委员会以前，曾和美国的反苏乌克兰民族运动有联系，和法西斯团体“銀衫党”、“德系美国人同盟”，也有密切关系。这个反苏委员会为“检举赤色分子”的勾当大卖力气。罗斯福政府对于“赤色分子”的恐怖，不但使它纵容了納粹的第五纵队，以及策划炸毁美国的重要工厂以使战局向有利于德国方向发展的各法西斯团体，而且利用它們作为推行反共政策的工具。

1941年6月希特勒侵入苏联以后，局势有了巨大变化。以工会为首的进步力量，表示支持反法西斯战争，他們在保持民主权利（罢工权等）的情况下，努力生产軍事資材；但是美国壟断資本的反动势力却由于反苏战争的爆发而感到高兴。这种情况清楚地表现在开战后不久参議院議員哈利·杜魯門的言論中。（参閱本书第1章，第1节）美国壟断資本的政策，首先是适当地援助交战双方各国来解决国内的經濟危机，并使它們两敗俱伤，然后，再迫使它們接受由美国統治世界情况下的“和平”。罗斯福政权是代表壟断資本利益的政权。但是它并不是和支持納粹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最反动的大壟断資本（例如杜邦、洛克菲勒、福特等）完全一致。罗斯福既然和最反动的华尔街势力有着一定程度的矛盾，所以，他就要在某种程度上爭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其援助盟国的政策，在輸出武器方面，固然也保障了壟断資本的利益，而在朝着反軸心的方向前进这一点上，特别是当德国侵苏战争爆发以后，盟国

方面具有了反法西斯联合陣綫的性质以后，他受到了美国人民的鼓励，有了一定的进步意义。罗斯福政权是具有这样幅度的一个政权。让我们看看这个罗斯福政权在远东采取了怎样的行动？

中日战争和美国的立场

对于日本在 1937 年发动的侵华战争，美国是不能袖手旁观的。因为第一，这次侵略战争打击美国一向怀抱着的中国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的信念；第二，这次战争也意味着日本将夺去美国的一个很有希望的投资对象；第三，如果日本“开发”了中国这个丰富的市场，就意味着美国大量的棉花和废铁的对日出口将告结束，使美国失去日本这块重要的市场；第四，日本控制了中国，它将占居有利地位，便于夺取美国一向取得橡胶、锡、金鸡纳霜和亚麻等战略物资的东南亚，并进而加深美国完全丧失太平洋区域市场的危险。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不久的 7 月 14 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了关于维护国际条约神圣的声明，接着又要求中日两国停止战斗。10 月 5 日，罗斯福作了“隔离”侵略者的演说，暗中谴责了日本的行动；6 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项声明，指责日本的行动违犯九国公约及凯洛格非战条约。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停留在“口头威吓”，并没有采取阻止日本侵略的具体措施。同年 11 月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九国公约参加国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美国代表戴维森，正如罗斯福总统所表示的，“是在美国政府对于其他各国政府不负有任何义务的情况下参加会议的。”这次会议本来应由美国起带头作用，可是它没有这样作，因此，会议没有取得成果而结束了。（参阅本书第 2 卷，第 3 章，第 2 节）

美国方面所以采取这种暧昧的态度，是因为耽心击败日本的侵略而取得解放和独立的中国将不再成为美国的市场，因为考虑

为了和日本适当地瓜分中国市场，利用日本对付苏联，不应该过份地刺激日本。

但是，美国的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和赫尔的“哪怕是最微小的干涉也要避免”的“强硬”政策，使日本大大地感到放心，于是，日本便按照预定计划，在同年12月把战火扩大到了华南。美国对于1937年12月的“巴纳号事件”^①和1938年5月底日军空袭广州，虽然也分别提出了抗议，但是对于前者，美国政府并没有象美国人民由于激愤而实行抵制日货那样，采取具体行动。

不错，美国也的确对中国进行了物质援助。由1936年到1939年四年之间，中国共有价值七亿三千四十万八千元的白银流出国外，其中大半，根据中美白银协定，为美国国库所收买，作为中国的抗战资金。1938年12月蒋介石政府派代表到华盛顿要求贷款，结果美国通过进出口银行给予了二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而当1939年日军占领海南岛及南沙群岛时，于同年3月间，美国再次给予国民党政府以一千二百八十万美元的材料贷款；此外，美国还在1940年3月通过进出口银行，给予了二千万美元的贷款。

但是，当时美国并不是只向中国进行输出，对于正在侵略中国的日本，也在继续进行输出。诚然，美国政府曾经在1938年6月向制造和出口飞机、飞机零件、发动机、武器、空军用炸弹和鱼雷等的厂商提出要求，不要向用这些武器杀害一般平民的国家输出这些东西。但是这种办法，只是诉诸厂商的良心，不出所谓“道义禁运”的范围，而不具有强制力量。到了1939年，日本南进的意图已隐约可见，美国政府这才感到有必要采取某些具体措施来制止日本。同年5月间，平沼首相在采取轰炸重庆的恐吓手段的同时，向美国提议，要求美国根据日本的方案，同日本合作来维持欧洲和平。

^① 1937年12月12日，日本飞机轰炸并击沉了停泊在南京附近的美国炮艇“巴纳号”。——译者

然而，平沼的提案，期待“富有国家”向“贫困国家”让步，是完全符合轴心国方面意图的。对此，赫尔只答称，在解决全世界性质的问题以前，日本应首先把自己在东亚所造成的混乱局面收拾起来，而并未采取任何箝制日本的具体措施。同年5月20日，英国驻美大使罗西安往访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就共同对日采取报复措施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商谈，这时，威尔斯表示：美国政府不希望和别国建立复杂的联系，而愿走自己的道路。美国对日本采取的这种绥靖政策，便利了7月23日日本外务相有田和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之间进行的“远东慕尼黑会议”的成功。（参阅本书第2卷，第5章，第3节）7月11日，美国国会把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皮特曼所提出的关于授权总统决定禁止对日贸易的决议案，推迟到下届议会召开期间的1940年1月进行审议，而反对党共和党领袖范登堡在7月18日提出的美国政府应通告日本美国有意废除日美通商条约，但在实际上决不意味着对日禁运的决议案，却受到罗斯福和赫尔的欢迎，并根据它，于26日向日本发出了通告。美国这样作的目的无非是促使日本方面考虑“肆意蹂躏美国在中国的权利和权益，将把自己置于何种地步”，以便扩大被认为日本内部存在的“稳健派”的势力，并离间日德关系，使日本的侵略矛头指向苏联。欧洲战争的爆发，给美国政府提供了禁运战略物资的理由，9月26日，总统对一切有关的私营企业提出了停止出口十一种原材料的要求。然而，这是和日本当时所实施的统制大致相同的，是没有实效的措施，因而也不曾引起日方的抗议。

这种表面上似乎“强硬”而在实际上却十分软弱的绥靖政策的实际情况是这样：1937年日本进口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七、1938年的百分之三十四点四、1939年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三，是来自美国的。而且，如下表所示，在日本的进口物资中，废铁、工作母机、生产设备和石油等军需生产上所必需的物资所占比重，与1928

年相比，有了显著的增长。同时，美国的以上对日出口额，比起对华出口来，要多得无可比拟。例如 1937 年，美国对日出口额是二亿八千八百五十八万八千美元，而对华出口额只有四千九百七十万零三千美元；1938 年，前者是二亿三千九百五十七万七千美元，而后者只有三千四百七十七万二千美元。

美国既不希望日本作为战胜者称霸远东，同时，也不想把日本彻底击溃。

美国的意图，在于适当地给予日本和中国双方以军事援助，使双方都疲惫到一定程度以后，在远东建立它自己的霸权。另外，美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日本帝国主义得到一定的满足，使其象在 1938 年侵犯张鼓峰，1939 年侵犯诺门坎那样，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北方”。

日本由美国的进口额

(单位: 千美元)

	1928 年	1939 年
棉花	109,399	42,488
木材	15,636	2,858
肥料	6,205	2,137
石油制品	21,717	45,290
废铁	3,090	32,593
铜	2,358	27,567
机器及设备	862	24,578

日本的南进及其同美国的矛盾

日美通商条约的废弃是从 1940 年 1 月 26 日生效。然而，这只是条约被取消了，并不意味着两国通商已经结束。美国的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废铁，通过私人企业的手，继续被运往日本，支援它在远东进行罪恶勾当。

尽管日美通商条约的废弃本质上是这样，但是在日本看来，和以往供给自己军需品的主要国家美国之间的通商既已变为不稳定，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就不能置若罔闻。日本从诺门坎进攻苏联的失败和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使它深深感到北进的困难；而

如果同美国进行较量,力量又过于弱小。因此,日本在阿部、米内两内阁执政期间只好集中力量解决中国问题和逐步向南方扩张。

拉拢蒋介石政权的工作宣告失败,从而陷入长期战的日本(参阅本书第2卷,第5章,第3节,本书第2章,第3节),为了应付长期战,就注意到了南方的资源。1940年1月,日本通告荷兰政府,废除日荷司法、仲裁和调停审判条约,2月间,又向荷兰政府提出了一项要求,其主要内容是:放宽贸易限制,扩大日本人在荷印经营企业的便利,放宽对于在荷印日本商人雇佣人员和工人入境的限制,以及“互惠地”管理报纸等。日本的南方政策所以更加强硬起来,是由于在欧洲战场上德军取得了优势地位。在德军侵入丹麦和挪威以后的4月15日,有田外相就发表了一项强调维持荷印现状的声明,内称“日本同南洋各地区、尤其是同荷印之间,在经济上存在着互通有无的密切关系”,暗示日本要求取得在上述地区的特殊权益。

在这期间,美国政府虽在口头上对日本向南方的新的侵略行为表示反对,但是并未采取实际行动。赫尔不但不同意财政部提出的关于扩大“道义的禁运”的适用范围的提案,而且一再拒绝参议院议员皮特曼的要求:为使他提出的决议案得到通过,需要赫尔的支持。不仅如此,即使在1940年5月10日德国开始侵入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以后,这些国家在东南亚的各殖民地失去宗主国,从而落到日本手中的可能性增大了以后,罗斯福仍然“考虑”不予日本以侵略的口实,要求就保护荷属西印度群岛问题受到荷兰政府委托的英国政府发表声明,正式宣布英国政府不干涉荷印,荷兰政府不需要英国的援助,以及宣布英法军队立即撤出西印度群岛。但是,美国政府这样做的结果,只是使得日本侵略者更加得意妄行而已。5月16日,日本总领事向荷印经济局长范·莫克“几乎一口气陈述了吊词、要求与暗含的威胁”(费思:《太平洋战争前史》);到18

日，日本又向荷印当局提出了一项书面要求，规定着日本要求荷印供给它包括比以往它从荷印进口的数量多得多的鉄矾土、石油在内的十三种原料、資材的最低限額。从同月 30 日起，美国駐日大使格魯与日本外务相有田举行会談，在会談中，格魯強調：第一，德国的胜利不会給日本带来安全和繁荣；第二，和美国合作，扩大貿易，通过和平途径增进福利，将有助于改善日本的情况。但是，这次会談只是空費唇舌，并未取得任何成果。事实胜于雄辯，6 月 18 日法国向德国投降以后，有田拒絕了美国政府就日美双方交换备忘录，互相确认除和平轉变外，两国政府希望保持太平洋地区的現狀一事提出的建議，并通过广播发表了关于“大东亚新秩序”的演說。（參閱本卷第 2 章，第 1 节）

日本，不只是有田发表了广播演說，而是确实在想利用这个机会侵入南方。日本政府对于同年 4 月間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卡特魯所作的关于停止一切运往中国的軍需品及軍用器材通过法属印度支那的諾言，仍旧不能滿意，而在法国向德国請求停战的次日，东京举行了四相會議，决定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法国同意：不仅法国作出上述諾言，而且为了保証这一諾言的切实执行，日本可以派駐軍事監視团。因为 6 月 6 日德軍突破了魏刚防綫而大举侵入法国境内，荷印当局于 6 月 6 日对于它一向置之不理的日本方面的要求，作了妥协性的答复。但是，有田对于这个答复并不滿意，而逼問荷兰政府是否准备在任何情况下都向日本輸出日本所指定的物資的指定数量。这次逼問也是用类似最后通牒的語气結尾的。日本政府对英国政府，則提出了撤出上海駐軍，并封鎖香港边境和滇緬公路。

对日“禁运”措施

当时，尽管在敦克尔克吃了敗仗，可是已經抱定决心要繼續和

德国作战的英国政府，认为为了防止日本的侵略，可以采取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对日本实行全面禁运，向新加坡派遣軍艦，以便对日本施加压力；另一种办法是向日本提示解决远东問題的优越条件，把日本拉到英美一边。然而美国却不願采取以上这样“强硬的”和“綏靖”的两种政策中的任何一种。因为这时对日本开战，就意味着美国将永远失去在战争結束时把它的“和平”强加于世界各国的机会；另一方面，如果远东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則意味着美国将永远失去其現有的和未来的市場。因此，美国采取了以上两者之間的中間政策。6月底，美英联合委员会为了阻止日德两国对西南太平洋的要求，发表了一项宣言，把子午綫以东的英法領地划归門罗主义适用范围以內。7月2日，罗斯福根据“加强国防法”，对于下列三項物資实行了輸出許可制，这就是：第一，一切武器、軍需品和軍事器材；第二，当时被认为是“非常时期战略物資”的包括鋁和鎂在內的一切原料資材；第三，飞机零件、装置、附件、光学仪器 and 金属制造設備。美国尽管表面上对日本采取了这种强硬政策，可是其所謂門罗主义云云也只是空談，並沒有实际派遣軍隊，而在禁运的三項物資中，也並沒有包括日本最迫切需要的两种物資——石油和廢鉄。同时，这一措施也只是許可制，而不是禁运。决定給予許可和发給許可証的工作，由国务院負責，国务院內特設監督部，專門掌管这项工作。被任命担任这个監督部部长的是約瑟夫·格林，他在西班牙內战时期，“因为害怕預定运往希腊的二十七架飞机落到西班牙共和国的手里，而对这批飞机采取了禁止出口措施”。（本迪納：《国务院之謎》；洛多夫：《圍繞太平洋的美日財閥》）因此，1941年3月，美国向日本出口了价值达一百万美元以上的工作母机，而在1941年第一季度里，又向日本和“滿洲”出口了比前一年同期更多的銅。美国对日本采取这种实际上的綏靖政策，也导致了英国的綏靖政策，这就是英国答应日本的要求，封

鎖了滇緬公路。

德国对于法国的胜利，显然使日本向德国靠攏了。1940年7月上旬，在日本參謀本部內，企图利用德国来解决中日战争的意見占了优势，結果使日本統治集团不得不撤換了反对利用德国的米內內閣。7月16日，畑陆相提出辞呈，米內內閣宣告垮台，正在从事“新体制”运动的近卫接受了組閣命令。近卫在同月19日邀請东条、吉田和松岡等“候补閣員”到荻外庄举行了所謂“荻洼會議”，根据这次會談，决定了“基本国策綱要”和“适应世界局势演变处理时局綱要”。（參閱本书第2章，第1节）第二次近卫內閣的外交政策就是根据了这条路綫。8月1日，日本政府向法属印度支那提出最后通牒，29日，日法之間締結了一項关于向日本提供其所要求的軍事上的便利条件的协定。法国的維希政权以日本尊重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主权为交換条件，承认了“日本在远东的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优越权益”。而日本对于荷印，也在8月中旬派去了以三井物产会长向井忠晴等为首的七名民間交涉員，并于同月27日任命商工大臣小林一三为日本派往荷印的特使。英国政府通过罗西安爵士要求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一向支持荷兰政府以及在荷印的各石油公司那样，支持它們。对此，赫尔表示大致同意。然而，当在这次會談中“受到支持”的范·莫克要求把荷印在这以前在美国购买的武器急速运来时，赫尔却于9月11日作了如下的回答：（一）美国政府为了根据既定方針妥善考虑共同有关的問題，希望繼續接到全面的报告；（二）关于石油問題，在荷印营业的美国公司充分了解美国的意图；（三）美国政府不願干与糾紛，如果不发生援助外国的必要，美国不願自动地登上舞台。美国政府的这种态度完全符合了日本政府的心願。日軍终于在9月23日侵入了越南北部。

在同年9月4日的四相會議上由外务相松岡提出了另一个严

重步驟——締結日德意三国同盟問題。同月 7 日，德国特使斯塔瑪到达东京以后，談判就进入了討論具体問題的阶段。此后，在 14 日的联席會議上，軍令部次长表示对于对美开战缺乏信心；在 19 日召开的御前會議上，一些人在预料日美开战的情况下提出了反对意見，例如軍令部总长伏見就从取得战略物資的角度表示了不安。这种预料确实是有根据的。1936 年 11 月間簽訂的日德防共协定，由于 1939 年 8 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約的締結，已經失去了原来的反苏性质。为了进一步加强这个已經明显地变成反对美英的协定而簽訂三国同盟，对于日本來說，显然是要把美国作为敌国。虽然如此，最后还是因为多数人同意近卫的主張：“德国已和苏联締結了互不侵犯条約，德国不仅要为調停日苏糾紛出力，而且还一定要力促中日‘和平’的实现，认为日美关系的恶化可以避免的論調占了上风，因此，决定締結三国同盟，而于同月 27 日在东京簽了字。

美国对日鋼鉄輸出

(单位: 千磅)

	1940 年	1941 年
廢鉄	47,000	227,000
鉄及鋼板	1,487	5,614

日本政府的这种两面政策，虽然目的在于获得南方的資源，和苏联保持暫时的和解，爭取時間，以便伺机向苏联发动进攻，但是日本在三国同盟

的基础上向南方擴張的作法，显然刺激了美国政府。美国政府作为报复手段，在 9 月 25 日决定追加对中国的貸款，次日又发表了对日“禁止出口”廢鉄和鋼鉄的声明。不用說，还没有面临你死我活关头的美国政府，依然象英国那样希望日本北进，实际上，美国只是对日本采取了对鉄和廢鉄的出口許可制而已。这一点，从上表中也可以看出。

不管怎样，美国采取了这个措施，显然使日本在获得其最需要

的一項物資方面，感到了不安。1940年10月8日，英國政府發出通告，決定重新開放滇緬公路，同時，丘吉爾首相也發表了攻擊日本的演說。英國政府曾經通過駐美大使羅西安再三向美國政府提出了具體的对日共同防禦方案，可是從美國政府那里得到的回答總是：避免採取具體的行動。羅斯福總統在大選前夕，為了爭取美國國民的好感，宣稱他將遵守民主黨的這樣一項政綱：“我們不參加外国的戰爭。除非遭到攻擊，我們決不派遣我們的陸海軍到美國以外的外國領土上作戰。”他雖然強調歐洲及亞洲獨裁國家的侵略行為，但又不採取制止侵略的具體對策；他雖然從文字上和口頭上加劇了侵略國的反感，然而在物質上卻又援助了這種侵略。

第二节 日美交涉

日美交涉的开始

1940年秋冬之間，日本政府根據7月27日決定的“適應世界局勢演變處理時局綱要”，為準備對美開戰而大力進行掌握南方資源的工作。小林一三曾為實現日本和荷印在政治上的合作而努力，但是沒有成功。10月16日，日本、荷印雙方代表發表了一共同聲明，只說：“三國同盟並不妨礙日本荷印間的友好關係”，後，小林便把後事重又交給民間代表向井忠晴，而首途歸國了。雖然荷印向日本出口的战略物資為數相當龐大，但是並不能滿足日本的要求。10月25日，日本政府又決定了“發展‘日本對荷印經濟’的措施”，開始直接奔向獲得油田的本来目的。日本代表在11月29日的通牒中不僅要求對婆羅洲、蘇拉威西、荷屬新几內亞阿洛群島及斯豪頓群島等廣大地區的开发權，而且要求荷印當局承認上述地區為日本的勢力範圍，並支援日本在這一地區的行動。荷印當局感到，日本選定了這個地區，並不是單純為了尋找

油，它把这项要求交给矿业部去研究，而拒绝了急速对这个问题进行研讨。

日本的这种南进，深深刺激了美国，但是美国政府却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来加以解决，尽量避免军事冲突；如其可能，它并希望使日本的侵略矛头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向。日本政府也因为本来的侵略目标是苏联，夺取南方资源只是为达到这一目的准备工作，如果可能，也不想和美国发生武装冲突。日美交涉成为可能的客观条件就在这里。

1940年11月9日，为了开始这个交涉，日本政府任命和罗斯福本人有交情的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为驻美大使。他在1941年2月11日到达华盛顿，2月14日向美国总统递交国书，3月8日会晤赫尔，表示“日本对荷印的要求，基本上是在经济方面”，接着日美谈判就开始了。3月14日，野村在第二次会晤罗斯福时指出：“英德之间的战争很可能成为长期战；这样，如果战争从欧洲扩大到太平洋而成为更加长期的战争，那么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不论战胜国或战败国都要发生社会革命或类似情况”，企图迫使美国让步。（野村吉三郎：《出使美国》）

在日美两国政府进行这种正式交涉的同时，还在暗中进行了所谓“私人交涉”。1940年11月29日，日本产业组合中央金库理事井川忠雄收到了天主教神甫德劳特的一封信，内容是为了改善日美关系要求同井川会晤。信中附有库恩·婁布公司最高董事之一、曾任胡佛总统秘书的斯特劳斯的介绍信。井川秘密地和军务局长武藤章及军事课长岩畔豪雄进行联系商谈之后和德劳特见了面。当时，德劳特补充他对井川的谈话而提出了一份书面建议。这份建议在12月14日送给了近卫，“全文充满着与神职人士不相称的知识用语”，“不难推想它可能具有相当背景”。（矢部贞雄：《近卫文磨》）德劳特的建议是站在一个日本人的立场上写成的，它的

标题是：《特别结合日美关系就日本在远东的地位和政策作具体分析》。这份文件利用“远东门罗主义”这样一个概念，主张把欧洲势力从远东排除，使远东成为日美两国的壟断品，强调存在着加强对苏地位的可能性，建议及早开始日美会谈。这正是远东慕尼黑会谈的基本精神。同德劳特一起参加这次会谈的，还有一个名为华尔希的天主教神甫。他在美国是个相当有名的人物，和总统也很密切，因此就决定，在美国由华尔希和总统联系，在日本由井川和近卫联系，以便交换双方的意见。这两个神甫又曾经策划使日本外相在12月19日日美协会在东京举行欢送野村大使的宴会上发表的演说中，向美国国民表示调整日美邦交的可能性。二人在肯定了日美交涉的可能性以后，于12月28日首途归国。次年1月23日，两神甫会晤总统和国务卿，作了详细汇报，当时，邮政部长天主教徒沃克也在座。25日，接到这两个神甫由美国拍来的电报，内容是：“往访总统的结果，颇有希望，工作在顺利进行，可能进一步开展”，于是，井川和岩畔二人决定前往美国。井川是和野村大使大致同时动身的，岩畔是在3月6日出发的。到达美国以后，井川曾和华尔希、德劳特、沃克等人多次联系，彻底了解了美国政府首脑部的意图，并不断向野村大使和近卫报告了交涉进展的情况。

这样，在完成了准备工作以后从4月2日起，井川、岩畔、德劳特三人就着手起草日美谅解方案。4月5日写成了第一个方案，交日美双方当局进行研究，并采纳了双方的意见，于16日又写成了第二个方案。在这期间，14、16两日，赫尔和野村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会谈。赫尔对第一方案表示不满，他提出了所谓“四原则”（尊重一切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遵守平等原则，放弃用武力改变太平洋地区的现状），但是由于后述的4月13日的日苏中立条约的签字，他看到利用苏联牵制日本的可能性已经消失，而把以往由民间进行的谈判改为由国务卿和大使进行非正式会

談，并表明可以以第二方案作为談判的基础，要求日本方面首先取得本国政府的訓令。这个日美諒解案内容共分为以下七項：（一）日美两国所怀抱的国际观念及国家观念；（二）两国政府对于欧洲战争的态度；（三）两国政府在中日战争問題上的关系；（四）太平洋上的海軍兵力和空軍兵力以及海运关系；（五）两国間的通商及財政合作；（六）两国在西南太平洋方面的經濟活动；（七）两国政府关于实现太平洋地区政治稳定的方針。这个方案，对美国來說，包括了許多对于日本政府的让步，这就是：在第（一）項里，美国沒有把民主主义强加于日本；在第（三）項里，美国約定努力促使“蔣政权和汪政权的合流”，并承认“滿洲国”；在第（五）項里，虽然日美通商条約已不存在，而美国却暗示了締結新条約的可能性，并約定給予日本以大量的信用貸款；在第（六）項里包括美国保証日方获得石油、橡胶、錫、鎳等重要軍需物資，保証意味着美国放弃菲律宾的菲律宾独立。不仅如此，在这次交涉中德劳特还作了一个重大的提議（实际上虽未写进方案中），那就是加进这样一条：如果日本退出三国同盟，一旦爆发日苏战争，美国将援助日本。（野村吉三郎：《出使美国》）

4月18日，日本內閣正在举行會議当中，接到了有关这个諒解方案的报告，近卫立即离开会场，当夜就召集了政府統帥部联席會議。在这次會議上，虽然对于这个方案是否要和三国同盟有所抵触的問題有些顾虑，但是近卫首相、平沼內相、东条陆相、及川海相、杉山參謀总长、永野軍令部长等都表示贊同进行这一交涉，并立即发出訓令，让正在欧洲的松岡外相急速归国。

日苏中立条約

日美交涉正在象上述那样向前进展的同时，締結苏日互不侵犯条約的交涉也在进行，这是根据“处理时局綱要”，作为日本締結

三国同盟条約的一个目的。1940年10月，日本政府通过駐苏大使建川美次向苏联提出关于締結苏日互不侵犯条約的建議，与此同时，它还要求德国进行斡旋。德国拟訂了“里宾特洛甫方案”，在11月間把它交給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莫洛托夫表示原則上贊成，但考虑到将来和日德意法西斯各国的根本对立，因而表明，如果以加强苏联的軍事力量作为条件，苏联也可以加入或支援三国同盟。对此，希特勒大发雷霆，他甚至在12月18日命令政府首脑，要在击破英国之前，首先击破苏联。但是日本却一心要在三国同盟的基础上稳定北方，因此，在1941年2月3日的大本营內閣联席會議上决定了松岡所提出的“对德意苏交涉綱要”，并拟定了和苏联締結条約的具体方案。根据这个方案，松岡于3月12日首途赴欧。他在24日途經莫斯科时，向苏联提出締結苏日互不侵犯条約的問題，——对此，莫洛托夫暗示应締結中立条約，——而于26日到达柏林，和希特勒、里宾特洛甫进行了会談。

这时候，德国把打倒英国作为紧急任务，要求日本进攻新加坡。当时在德国看来，既然美国在援助英国，那么，即使把美国变为敌人也在所不辞，因此，德国就更加坚决地要求日本参战。松岡沒有充分認識到，进攻新加坡必然引起和美国的冲突，而答应了德国的要求。然而，在松岡出国之前，日本統帅部曾一再囑咐他，不要就进攻新加坡之类的軍事行动作出諾言。但是，根据“德国方面的了解，至少松岡外务相个人曾經向德国方面作出了进攻新加坡的諾言”。(《昭和的动乱》)松岡的打算是坚决避免和美国冲突，他甚至在莫斯科，就日美交涉及問題，和美国大使斯坦哈特进行了談話。由于日德間的这种意見分歧，使得松岡尽管从德国方面获悉德苏战争的不可避免，但是为了稳定日本的北方，在归途經過莫斯科时，于4月13日，还是签訂了“日苏中立条約”。因为当时德国大批軍隊集結在整个苏“德”边境，所以斯大林简单地同意了签訂

這項條約。就這樣，松岡作為一個“紅人”，在“日美諒解方案”已經到达了日本的4月22日回到了東京。

苏德开战和日美交涉的擱淺

在4月22日松岡回到東京的同時，“三國同盟”和“日美諒解方案”之間的矛盾重又尖銳化了。松岡不同意就“日美諒解方案”拍發回電，並托辭感冒，一直到5月1日沒有露面。他認為“這次交涉是在自己沒有參預的情況下進行的”，而感到不滿（據松岡在遠東軍事法庭上的供詞）。他研究了美國的原案和陸海軍當局所作的修正方案後，大加修改，而於5月3日提交聯席會議討論，結果，松岡的修正方案大体上獲得了通過。松岡修改的主要部分是：（1）進一步明確了三國同盟的性質。關於這一點，加上了這樣一句：“表明日德意三國條約所規定的有關軍事援助的義務，在該條約第三條（締約國之一未曾挑釁即遭到締約國以外的第三國進攻時，其他締約國立即就提供軍事援助問題進行協商。）中提到的情況發生時，當然要加以履行”；（2）關於中日戰爭部分，統統取消列舉媾和條件，而由日本保留決定媾和條件的權利；（3）表明在日本向西南太平洋方面“發展”的過程中，萬一遇有外部的“挑釁”，它將不得不訴諸武力。但是，松岡並不立即提出這個修正方案，而是在那以前，把一份強調堅信德意必勝、旨在威脅美國的口头聲明交給了美方，同時，還命令野村大使向美方提出締結中立條約的建議。野村在同月7日會見赫爾，就締結中立條約問題探詢了美方的意向，但是赫爾對此未加理睬。於是，野村又在5月12日把上述修正方案交給了赫爾，日美談判重又開始了。赫爾感到“從這個提案中幾乎看不到一綫曙光”。據赫爾說：“實際上，這個方案企圖將太平洋地區置于日美兩國共同統治之下，使日本成為一個占這個地區人口和財富十分之九的區域的統治者，在這裡，幾乎沒有考慮到別國

的权益”；尽管如此，他仍然同意以此为基础来进行谈判，是为了避免“失掉从根本上讨论日美双方提案的唯一机会。”（赫尔：《回忆录》）但事实上，促使赫尔决定这样作的真正原因，是欧洲战局的开展。

罗斯福总统宣称，美国舰艇正在为运输支援英国武器的运输船只担任“巡逻”，而海军上将斯塔克却分明写着：“护航”。总统在5月27日发表了关于非常状态的声明，并把竞选时提出的政纲中“只要不受到攻击”，就不打仗一语，作了新的解释，宣称：在采取闪电战的现代的情况下，“只要足以威胁我们连带的基地（不论南方的或北方的）被人占据，那就是对我进攻的开始”；美国决定把“巡逻”的范围扩大到大西洋以北和以南，并使用更多的舰艇和飞机。6月9日《华盛顿邮报》登载了在这种“巡逻”中击沉了德国潜水艇的消息，掀起了紧张气氛。这时，美国海军在大西洋方面事实上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美德之间的这种紧张局面，使日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地步。

这样一来，日本要想一方面和德国缔结三国同盟，另一方面和美国进行交涉，就更为困难了。松冈强调对德国遵守信义，在设想美国不致对日宣战的前提下，主张进攻新加坡，并试图进一步对美国施加压力。对美国方面来说，和德国的关系越是紧张，那么，从军事上看来，就越发需要拉拢日本，但是从美国的立场说来，它又不可能乖乖接受日本的压迫性的提案。赫尔和野村之间进行过多次会谈，到5月31日，赫尔才把美国的方案递交野村。这是非正式的提案，可说是美国方案和日本方案之间的折中方案。但是野村不肯把美国的原案立即转达本国政府，建议双方指派起草委员，进行修改提案内容，但未能达到目的，乃于6月8日将美方提案转达日本政府。日本在11、12两日召开政府、大本营联席会议，对这一提案进行了讨论，由于松冈表示坚决反对，结果只决定给予野村

“希望在公正的基础上达成協議”的指示。赫尔通过格魯得知松岡一派人阻撓日美达成協議，因此对 5 月 21 日的提案多少作些修改，于 6 月 21 日把这一修正案和另外一項暗中強烈譴責松岡一派人的口头声明，一并交給了野村。这些在 24 日轉达东京政府，而在 22 日，日本政府已經接到了苏德开战的紧急报告。

关于苏德开战一事，日本政府当局尽管在这年春天就已經知道，可是一旦成为事实，它的外交方針立即陷于混乱了。关于当时日本的困境，格魯作了如下的分析：“（一）日本对付德国的双手被軸心国协定束縛住；（二）日本对付苏联的双手被中立条約束縛住；（三）日本和中国的冲突絲毫沒有解决的希望；（四）日本和荷印的談判，沒有取得由于政府的宣傳而被人們期待已久的成果；（五）日本的对美关系，从根本上，而且一步步地恶化了。”（《在日本的十年》）日本政府匆匆地对三国同盟重新进行了研究。这是因为，根据近卫等人的意图，締結三国同盟有两个目的，其一是調整日苏关系，其二是防止美国参战；而由于苏德开战和英法表明要援助苏联，日本締結三国同盟的大部分目的已經落空了。因此，近卫要求松岡外务相和陆海二相从新研討三国同盟，并作为理論上的結論，提出了廢弃三国同盟的問題，要他們加以考虑。

但是，相信德国必胜，在脑子里甚至梦想和德国瓜分西伯利亚的松岡，对此未加考虑；而軍部大臣也估計德国侵苏战争大約“算不上名符其实的战争，将不过是一种警察措施而已”，因此也沒有考虑廢弃三国同盟的問題。

在这种紧迫状态之下，近卫为了决定一个明确的态度，連日召开联席會議，终于在 7 月 2 日的御前會議上决定了“适应局势演变帝国国策綱要”，大体上明确了日本的态度。于是，受到德国支持的松岡的猖狂的立即对苏开战論遭到否决，而决定“暂时不参加德苏战争，暗中进行对苏作战的准备”，“一旦苏德战局变为对日

本有利”，立即向北方使用武力。同时，关于南方問題，决定“为了达到目的，不辞对美英开战”，并根据“对印度支那、泰国措施綱要”（以軍部的提案为基础，内容規定：与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締結軍事、政治和經濟协定，特别是对于法属印度支那，即使訴諸武力也要迫使它向日本提供軍事上的种种便利，例如同意日軍設立軍事設施等。本綱要是經過1月30日的联席會議和2月1日的內閣會議的討論及同日天皇批准而决定的。）和“关于促使对南方措施实现事項”（内容是进一步加强对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的措施，并規定，一旦遭到美英荷兰的妨碍而“忍无可忍”时，即不辞对美英开战。这是在6月12日的联席會議上决定的。），决定进一步加强南方政策。这次會議是决定了以“不辞对美英一战”的态度坚持南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一次划时代的會議。在这次會議上，“虽然控制了立即对苏开战的强硬論，但是作为一种交換条件，却不得不作出进驻法属印度支那的决定。”（近卫：《和平的意志》）尽管如此，近卫却因为暂时避免了对苏开战而感到滿意，并想借此机会促使日美交涉达成協議。但是，“正在举行談判之中，随便决定这样重大的国策的作法，不是进行恐吓，就在发瘋，这等于把用左手作好的工作，用右手毀掉。”（重光葵：《昭和的动乱》）果然，日本政府这一极端秘密的决定很快就被美国方面所偵悉，美国感到日本沒有促使談判成功的誠意，从而对日态度迅速地恶化了。

不过，在美国方面，也从新发生了一种不便立即中断日美交涉的情况。因为美国在苏德开战以后就考虑到，如果日本和德国携起手来对苏开战，或向南进攻新加坡，会对于使德国在侵苏战争中彻底消耗的企图不利。罗斯福于7月4日通过格魯大使寄給近卫首相一封信，表示为了維持太平洋地区的和平，願意开始談判，并要求日本不要进攻苏联。近卫非常重視这一信件，当即征求松岡的意見。然而，松岡对此却并不重視，8日，他交給格魯一封复函，

反而要求美国澄清是否有意参加欧洲战争。17日，美国答复說，对德国行使自卫权是理所当然的，并立即加紧进行参战的准备。美国于7日宣布进驻冰島，就是一种具体表现。

7月8日，野村大使再次請求日本政府对于6月21日的美国提案的答复。美国提案在10日的联席會議上受到了审議，当时松岡特別要求让他的心腹斋藤良卫(外务省顧問)出席，全面地陈述了反对談判的意見。当天晚上，近卫与陆、海、內三相进行了秘密商談，結果在12日的联席會議上，作为海陆軍的共同意見，提出了如下的主張：(1)日本对于欧洲战争的态度，取决于条約規定的义务和自卫的需要；(2)对于中国問題，应以近卫三原則为依据，美国可以提出停战議和的劝告，但不許干預和平条件；(3)日本保留必要时在太平洋地区使用武力的权利。只要把上述三点肯定下来，其余不妨根据美国方案的精神进行談判。松岡虽然最后也表示同意以上意見，但对于12日的联席會議以后制成的最后方案，則托病不予审閱，并在这期間会見了德国大使。尽管这样，还是吸取了松岡的意見，并且在14日才制成了最后方案。但是，松岡並沒有把这个方案立即通知美国方面，而主張首先发出一份訓令，拒絕前述赫尔的口头声明，經過二、三日后再把日方的反建議通告美方。近卫等人鉴于拒絕赫尔声明的訓令中把这份声明說成是“不礼貌、而且沒有道理的”，并含有“美国若不先行撤回該項声明，日本就无法对諒解方案进行研究”这样激烈的詞句，恐怕这将引起对方的反感，于是，坚持停止发出这一訓令，或对其內容詞句加以緩和，至少，应与日方反建議同时发出。为了促成这件事，外务省美洲局长寺崎、陆軍省軍务局长武藤、海軍省軍务局长岡和內閣書記官长富田等曾于7月14日奔走了一整天；而斋藤良卫作为松岡的代表往訪近卫时，近卫并曾要求他轉告外相把訓令和反建議同时发出。尽管这样，外务省还是沒有通过美洲局长寺崎，而以其顧問斋藤的命令只

发出了拒絕接受赫尔口头声明的回电。不仅如此，松岡还命令欧亚局长坂本在把日本的反建議通告美国以前，先秘密通知德国。于是，美洲局长寺崎不得不急忙采取非常手段——在次日（15日）等待次官大桥一上班便立即取得他的批准，沒有經過松岡，就把关于通告美方日方反建議的电报发出去了。（这个回电，因为野村期待第三次近卫內閣会有新的訓令而沒有提交美方。）

赫尔看到日本方面对于他的口头声明作这样解釋，而感到震惊，并于7月17日撤回了这份声明，于是，野村大使立即向松岡表示辞职。这样一来，近卫也感到无計可施，在15日与內、陆、海三相进行了商談，并且說：“或者是更換外务相，或者是內閣实行总辞职，二者必居其一”。在會議上，大体上一致认为，如果罢免松岡，由于松岡正在憤慨美国干涉日本內政，恐怕会引起严重后果，因而决定实行內閣总辞职。天皇和木戶也曾試圖說服近卫是否只让松岡一人辞职，但是近卫考虑当初自己认为只有松岡才能制服軍部，所以不顾反对意見而起用他担任外务相，要是罢免松岡，当然自己也要負責任，因此沒有听从天皇和木戶的意見，而另行推荐平沼为继任首相，于16日向天皇提出了全体閣員的辞呈。

第三次近卫內閣和日軍进駐法属印度支那南部

7月17日，根据天皇的命令，召开了重臣會議，討論继任內閣的問題，結果全体一致同意近卫連任，因此近卫再次接到了組閣的命令。他立即着手組閣，并于18日举行就任式，第三次近卫內閣就此成立了。新內閣人选上的最大特点是丰田貞次郎担任外相。丰田也是主張极力避免同美国冲突的一个人。据近卫表示，当时他曾抱定决心采取丰田——野村的外交路綫，并表白自己的心願說“作殊死努力，使日美談判达成協議，以符合陛下的旨意”。即使他所說的是真情实話，但是实际情况却无情地与此背道而馳。陆海两

軍統帥部的態度是不贊成豐田擔任外務相，但是支持近衛內閣，它們於7月21日向近衛提出了以下三項建議，並受到採納，即：(1)根據7月2日御前會議的決定貫徹國策的基本方針，特別是按照既定方針對法屬印度支那採取軍事措施；(2)加緊進行對南方及北方的備戰工作；(3)在不違背三國同盟的限度內，進行日美交涉。這時，日本已經在北方和南方開始了嚴重的軍事行動。

在這以前，於同年5月6日，日本和法屬印度支那之間簽訂了經濟協定；此外，由於日本的策動，在5月9日，法屬印度支那和泰國之間還簽訂了和平條約。但是，1941年1月間繼小林特使、向井代表之後被任命為特使的芳澤謙吉與荷印當局進行的談判卻沒有取得積極成果。在1月16日，日本的總領事石澤向荷印當局遞交了一份關於放寬對日本人入境的限制，擴大日本人在荷印的企業經營和確保荷印對日供應石油、橡膠、錫等的提案，但是荷印當局唯恐被納入日本的“共榮圈”內，因而遲遲不作答復。於是，在同年2月間，把談判的範圍局限於經濟問題而重新開始了會談，並於5月14日，由芳澤使節提出了第二次提案。對此，荷印當局在6月6日的復文中，拒絕了日本的要求，最後在6月18日，雙方發表了一份聯合公報，會談即宣告中斷，芳澤使節也在27日歸國了。公報內稱：“日荷雙方代表團對於這次有關經濟問題的談判不幸未能取得圓滿結果感到遺憾。但是，這次談判的中斷，並不意味著日本和荷印之間的正常關係因此而有所改變，這是不待言的。”在25日的聯席會議上，重新研究了“關於推行南方對策的方案”，並附上一份由大本營陸海軍部所編寫的以A B C D(美、英、中、荷)對日包圍陣勢為論據的說明，奏請天皇批准進軍法屬印度支那南部。經過這樣一個過程，產生了前述7月2日御前會議的決定。

當時，從7月下旬起，陸軍以“關東軍特別演習”的名義，在“滿洲”動員了十六個師三十萬兵力。但是這一行動還不是下定決心要

对苏联开战,而是等待德国侵苏战争的发展变为对日本有利,后来又经过陆海军之间多次商谈的结果,在8月6日的联席会议上作出了对苏严加防御但极力避免日苏开战的决定,由此,陆海军双方都专心致力于向南方扩张。这样,从7月14日起,日本政府同法属印度支那之间就日军进驻问题开始了谈判,并于同月23日签订了日本法属印度支那共同防卫协定。日本政府于26日公布了这个协定,从29日起,日军开始向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进驻。正是由于这一军事行动,才把日美交涉推到了决裂的阶段。

法属印度支那的问题,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异常关心,当时,赫尔虽然在病中,还是于15日和21日分别通过司长汉密尔顿、参事巴兰坦和副国务卿威尔斯向野村大使探询真相。当24日野村通过斯塔克作战部长的联系拜会罗斯福的时候,罗斯福曾表示美国所以推迟对日禁运石油,就是为了防止这种事态的发生;他还说,现在还不算晚,若能缔结一项协定,使法属印度支那变成瑞士那种情况,则日美关系将不致恶化。这一建议并没有获得日本政府的赞同,当26日日本法属印度支那共同防卫协定一公布,美英两国立即冻结了日本资产,把菲律宾军队置于美军的指挥之下,并向中国派遣了美国的军事顾问团。到8月1日,美国宣布禁止除棉花和粮食以外包括石油在内的一切物资的对日出口。

当美国宣布全面地对日禁运石油以后,日本海军方面的意见也逐渐倾向于与其坐待着石油的“日就涸竭”,倒不如先发制人了。据估计,如果得不到石油的供应,不出二年,日本海军将完全陷于瘫痪状态。当时,坐等一天,就要消耗大约一万二千吨的石油。经济绝交带来的打击是相当大的。日本为了打开已经感到绝望的日美谈判的僵局,试作了努力,这就是利用7月24日罗斯福所提出的关于“法属印度支那中立化”的提案。近卫几乎连日召开联席会议,并对右派也进行了工作,最后在8月4日的联络会议上决定了

向美国提出的照会。但是在这份照会中没有保证法属印度支那中立化的词句，大意是日本方面不向法属印度支那以外的西南太平洋地区扩张，要求美国方面也停止其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措施。所以，在8月6日野村把这份照会递交给赫尔以后，赫尔表示冷淡，他说：“只要日本不停止武力征服，就没有谈判的余地”。8日，赫尔把美国的复文交给了野村，大意是说日本的答复完全是文不对题。井川、岩畔担心谈判将会决裂，乃于7月31日乘飞机离开华盛顿回国。他们回到日本以后曾前往各地积极地宣传了慎重论，但是没有发生作用，不久，岩畔被“提升”为驻法属印度支那部队的团长了。

8月初，在陷于绝境的近卫的脑海里，又浮现了一个可以说是最后手段的想法，这就是和罗斯福举行直接会谈。8月4日，近卫把这件事告知陆海两相，二人当场都未能表明态度，海相在当天以内表示赞成，而陆相则用书面表明了在近卫接受下列两个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赞成，这就是：（一）不同意与赫尔国务卿以下的人物会谈；（二）即使会谈的结果失败，近卫也不辞职，而积极站到对美作战的前列。近卫于6日召开了联席会议以后，即上奏天皇，得到天皇的批准和“从速举行”的指示，于是，他就下定决心，在会谈中，关于陆军所反对的撤兵问题，必要时将从会谈地点直接用电报请示天皇批准，“即使丧失生命”也要使会谈达成协议，在7日将此事通知了野村大使。当野村接到这份训令的时候，罗斯福正在大西洋上与丘吉尔举行会谈，因此，野村便于8日委托赫尔加以转达。

罗斯福结束了同丘吉尔的会谈回到华盛顿以后，立即于17日接见野村，在赫尔国务卿的陪同下，当面交给野村一份坚决谴责日本在南方地区使用武力的备忘录（这是在发表了大西洋宪章的罗丘会谈中罗斯福向丘吉尔约定的），同时，对举行两国首脑会谈虽

表示贊成,但又要求日本“发表一項最清楚地說明日本政府当前的态度和計劃的声明”。日本政府在8月26日举行了联席會議,决定了对于美国总統在17日提出的照会的复文,并通过了“近卫致罗斯福书”。这两个文件,于28日由野村大使直接交給了美国总統。美国总統对近卫的信表示贊揚,似乎抱有举行会談的意向。(野村:《出使美国》)但是,到9月3日,美国总統秘书厄尔利却正式否认了近卫曾經向总統建議在太平洋上举行会談的事实;同一天,总統秘密接見野村,递交了对于近卫来信的回信和美国政府的备忘录。当时,总統表明,由于国内輿論不容許改变一向的政策,因此处境十分困难,对于举行两国首脑会談,沒有表示象上次那样大的兴趣。备忘录指出,美国在6月21日提出的建議一直沒有討論,并希望以此为基础重新开始談判。它还认为,为了近卫和罗斯福的会談得以順利举行,必須提供某种保証,因此建議首先举行預备会談。次日(4日)当野村往訪赫尔时,赫尔的态度更加强硬,他把必須遵守“四原則”作为談判的前提条件。在野村从罗斯福那里接到了二个文件的9月3日召开的联席會議上,日本政府又决定了新的提案,这个提案在9月4日通过双重方式,即同时由外相丰田交給格魯和駐美大使野村交給赫尔,向美国提出了。对于这个提案,美国方面认为它比較8月28日的声明討論范围更加縮小而断然拒絕了。

“帝国国策实施綱要”

这一談判在极端秘密中斷斷續續地进行期間,有关談判的消息在日本方面逐漸泄漏出去,特别是陸軍方面出現了反对意見,进入8月以后,在參謀本部里,甚至包括首腦部在內都大致认为談判无用而主張对美开战了。因此,在9月6日,根据統帥部的要求和提案,在御前會議上作出了一項重大决定:通过了“貫徹帝国国

策綱要”。这个重大决定的内容如下：

帝国鉴于当前的紧张局势，特别是美、英、荷等国所进行的对日攻势，苏联的情况及帝国国力的机动性，决定对于“适应局势演变帝国国策綱要”中有关对南方的对策按照下列各项原则加以执行：

一、帝国为了确保生存和进行自卫，并以不辞对美（英、荷）开战的决心，大体上以 10 月下旬为期，完成战争准备。

二、帝国在进行前项准备的同时，对美、英采取一切外交手段，力求贯彻帝国的要求。

在对美、英交涉中，帝国必须实现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事项及与此有关的帝国可以承诺的限度详见附件。

三、通过前项外交谈判，到 10 月上旬如果仍然没有希望实现我方要求时，立即决心对美（英、荷）开战。

对南方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对策，则根据既定的国策加以执行，特别要积极努力不使美苏结成对日联合阵线。

附件的内容如下：

第一，在同美（英）的谈判中，帝国必须实现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事项：

一、美、英不得干涉或妨碍帝国处理“中国事变”。

二、美、英不得在远东采取威胁帝国国防的行动。

三、美、英必须协助帝国获得所需的物资。

第二，帝国可以承诺的限度：

一、帝国不以法属印度支那为基地，向除中国以外的邻近地区实行武装侵入。

二、帝国准备在公正的远东和平确立以后，从法属印度支那撤兵。

三、帝国准备保障菲律宾的中立。

为了迫使美国接受这种显然和美国利益不相容的条件，日本政府终于给谈判规定了期限。对于石油等战略物资的储备日益减少的日本来说，交涉的时间拖得越长，就越发不利，因此，给交涉规定期限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样就等于规定为10月上旬实行宣战。

据说在这次御前会议的前一日，天皇在听取陆海軍統帥部长的报告时，曾着重指示说“在目前，主要应该以外交作为重点”，并在御前会议上口诵明治天皇的短歌：“当今四海皆兄弟，世界何事起风波！”，重述了“爱好和平”的意愿。（近卫：《和平的意志》）但是，即使在口头上指出了以外交为主，其次再考虑战争的问题，然而对于在规定了开战期限情况下进行的战争准备越来越使外交谈判无法进行，并造成了战争必然爆发的局势，并没有采取任何负责的措施。

近 卫 下 台

在9月6日的御前会议上给日美谈判规定了限期以后，近卫对形势的发展感到焦虑，因而就把最后希望寄托在举行日美首脑会谈上了。近卫认为日美谈判所以竟兜圈子而不能取得进展，关于举行首脑会谈的提案所以未能付诸实施，是因为仅靠野村根据并利用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电报联系进行工作不能充分转达日本的真意，于是在决定了“贯彻帝国国策纲要”的9月6日晚上，在极密中会见了格魯。这次会见，事先曾经获得陆、海、外三相的同意，会见时在座的还有近卫的秘书牛场友彦和美国大使馆参赞道尔曼。

在这次会见中，近卫着重指出，由他的内阁进行谈判，是日美之间取得妥协的最后机会；日方代表人选已经大致决定；以及他和美国总统早日举行会谈的必要。格魯答应把当日会谈的内容向本

国政府报告，并感慨地说：“这个报告将成为自己开始外交官生活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报告。”（格魯：《旅日十年》）

接着在 10 日，丰田外相又接見格魯，暗示近卫和罗斯福会談的必要，他在 27 日再次会見格魯，同时訓令野村为实现首脑会談进行努力。

近卫內閣为实现首脑会談而作的这种最后努力，竟使格魯在 9 月 27 日发出了主張繼續会談的长篇报告。这个报告一方面承认对于日本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必然带有危險性，另一方面又指出，鉴于近卫內閣最近的認真努力，存在着充分的希望，举行两国首脑的会談将把远东形势的恶化限制在最小限度，并可能取得真正建設性的成果。（格魯：《旅日十年》）

但是，日美談判無論在華盛頓或東京，都依然是困難重重。9 月 10 日，格魯提出了一項質問，這是對於 9 月 4 日日方提出的方案的答復，他對日本方案把討論的範圍加以無理的局限避而不談中國問題，進行了嚴厲的譴責。因此，日本方面也採納了陸海統帥部的意見，於 9 月 20 日召開聯席會議，就對於美方質問的答復和中國問題進行討論，決定了最後的綜合方案。這個綜合方案，恢復了以往的日美諒解方案的形式，是針對 6 月 21 日的美國方案的一個修正案。日美談判的難點，至此已經大致趨於明確，在原則方面，是 4 月 16 日以來赫爾一貫堅持的四原則；在具體問題方面，是三國同盟、中國駐兵和機會均等三個問題。在手記中《關於日美交涉》里記載的近衛的想法是這樣。對於其中的三個原則，近衛在與格魯會談時也曾表示“在原則上”沒有異議，所以他本人沒有問題，但是陸軍和外務省方面的一部分人對於原則上同意這一點也表示反對。然而對於這個問題，如果再來從正面加以否定，日美交涉即將陷於無法進行，因此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實在使他煞費苦心。其次，關於經濟原則的問題，日本準備承認對中國的機會均等原

則，并认为日本和中国在地理上的特殊关系，美国也能予以諒解。关于三国同盟的問題，考虑到日本和德国的关系，不使用书面表达意图，但是日方估計，只要能够举行首脑会談，就可以充分进行商討。最后是駐兵問題，因为陸軍方面坚决地反对撤兵，所以他甚至认为只有這個問題最为棘手。由于美国方面所考虑的与其說是駐兵的实质問題，勿宁說是想使日本暫時先撤兵，然后締結新的协定来規定駐兵的形式問題，因此近卫考虑，必要时可以采取非常手段，即从会談地点直接用电报請求天皇批准，并立即在协定上签字。

但是，大本营的陆海軍部却在日美談判停滯不前期間，都以10月下旬为期，緊張地进行了对美、英、荷的作战准备。大本营海軍部于9月1日命令全軍完成战时編制，大本营陸軍部也在9月18日，作为决心开战的准备，命令适应局势变化随时作好作战准备。海軍继去年11月間在实行准备开战的动員的同时对艦队作了重新編組和征用了約計六十三万吨船舶之后，又决定追加征用船只四十九万吨，共計二百六十五艘。陸軍則以关东軍特別演習的名义，开始把駐在“滿洲”的第五十一师团以及在“滿”空軍和地上部队、內地动員部队調往华南、台灣和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在9月25日的联席會議上，陆海軍統帥部长要求政府，根据“貫徹帝国国策綱要”，最迟也要在10月15日以前就和战問題作出决定。据他們表示，为了在10月底以前完成作战准备，至少需要在二周以前下定开战的决心。近卫着慌了。联席會議散会以后，近卫邀請閣員到首相官邸，詢問上述要求是否是坚决的。对此，东条陆相答称：“他的要求是坚决的。不过，与其說是要求，不如說仅仅是重申了9月6日的决定而已。”东条接着又于27日会晤海相及川，詢問海軍方面对于9月6日决定的态度，并表明了陸軍的强硬态度。

10月2日，美国方面交给了野村一份照会。这个照会根本不理睬日本方面在9月27日提出的最后的综合性方案，而以对9月4日方案答复的形式要求日方确认四原则、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撤退一切驻军，内称：“美国政府鉴于日本政府以往就其目的所作的表示，并根据日本政府在這些原则的具体适用上设立限制和例外的情况，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即：日本政府是否在考虑双方讨论的问题必须受到严格规定。如果这个印象没有错误，那么，日本政府是否能够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举行两国首脑会谈，对于两国所怀抱的崇高目的的实现，能够作出贡献。”同时，赫尔还对野村说：美国政府认为，在举行会谈以前双方若不预先在原则上取得一致，则两国首脑的会谈就没有把握取得成就；为了维持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不能仅仅依靠应付一时的谅解，希望缔结一项明确的协定。野村表示：“这个答复，将使东京感到失望，但是我一定转达。”（野村吉三郎：《出使美国》）

这样一来，近卫对于首脑会谈的期待完全落空了。关于日美之间的分歧，如果按照木户的说法，就是这样：情况好比日本劝美国登楼观赏美景，美国说你先说说是什么样的景致，而日本偏不告诉，只说你上来一看就知道了。就这样，终于未能达成协议。（《木户日记》）从9月27日起一直蹲在镰仓苦思焦虑的近卫，一接到上述照会后，立即在10月4日谒见日皇，然后召开了只有首相、陆、海、外务三相、陆海军统帅部长和外务省美洲司长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由丰田外相宣读了对于美方照会的复照草案，因认为有仔细研究的必要，所以未加审议就散会了。在这次联席会议上以及10月5日在荻外庄和东条陆相的会谈中，近卫都极力表明继续谈判的决心，陆海军、政府和大本营等都对美国的照会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各方面的态度逐渐明确了。陆军在10月6日召集首脑会议，决定了以下的方针：（一）陆军认为日美交涉没有取得妥协的希望，

因此，开战是无法避免的；（二）关于駐軍問題，包括其表現方式，不能改变既定的条件；（三）如果外交当局认为有取得妥协的希望，則不妨以 10 月 15 日为限期，繼續进行交涉。

10 月 7 日深夜，以上述强硬决心为背景的东条陆相前往首相官邸会晤近卫，表明了陆军坚决的态度，他說：“关于駐兵問題，陆军方面絕不能接受美方所主張的原則上暫時先撤退全部兵力然后再重新进駐的方式”。这一天，內閣書記官长富田报告內大臣木戶說，陆军认为交涉沒有希望，海軍則希望繼續交涉，但是陆海軍的中坚层却一致要求政府首脑部下坚定的决心。在同一天，据說杉山、永野两統帅部长举行会談，并就陆海的意見取得了完全一致。次日（8 日），陆军次官木村兵太郎向东久邇宫报告說，因为美国的条件无法接受，陆军已經决心停止交涉，对美开战，海軍还对談判抱着希望，所以目前正在和海軍进行商談。根据永野的手記，海軍的态度是这样：（一）如果交涉拖长了，对于作战不利；（二）如果繼續談判，就需要有必成的信心。10 日，东条再次会晤近卫，扼要陈述了大本营的以下三点意見，促使近卫下决心，这就是：（一）鉴于美国沒有表現互让的态度，对美交涉沒有取得妥协的希望；（二）不同意无条件接受美方所主張的四原則和日本在中国駐兵的条件以及对此让步；（三）无意改变 9 月 6 日御前會議的决定。

近卫和丰田仍旧期望通过外交手段打开局面，在 10 月 10 日举行了两次晤談，就日美繼續交涉的方法进行了研究。7 日和 10 日，丰田会見了格魯，9 日，野村往晤赫尔，探詢美方的意图，美方表示坚持 6 月 20 日方案和 10 月 2 日照会的主張，寸步不让；如果日方同意以这两个文件为基础，美方同意繼續进行交涉。至此，近卫已經面临必須就繼續交涉还是停止交涉，是战是和的問題作出决定的最后关头了。近卫在他的五十誕辰——10 月 12 日，还在荻外庄召开了最后一次五相會議。出席者除近卫本人外，有陆相东

条、海相及川、外相丰田和企划院总裁鈴木。在这次會議上，展开了劇烈的爭辯，由于意見紛歧，沒有得出結論，最后，根据东条的建議，一致同意就下列事項进行討論。

关于日美交涉，必須对于在保証：

- 一、不改变就駐兵問題的主張以及与此有关的各項政策；
- 二、不触动“中国事变”的成果；

这两个前提条件下可能获得外交上成功一事，大体上在統帥部所要求的限期內取得充分把握。

在取得这种把握的基础上，可以采取通过外交談判取得妥协的方針。

在进行上述交涉期間，可以停止作战上的各种准备工作。

关于以上問題，請外相研究有无可能。

这些条件和美国的态度是完全对立的，只要陸軍坚持这些条件，显然是不可能取得妥协的。这时，海軍方面据說內心是不願意开战的，但是又不肯說出口来，只好表示关于和战的問題完全委諸首相作决定。海軍在发言中还強調：如果决心开战，就及早决定；如果打算繼續交涉，就要本着坚决取得妥协的精神来进行。陆相东条抓住此点，一方面着重指出駐兵問題是陸軍的生命所系，一步不能退让，同时又詰問首相和外相，究竟交涉能否取得妥协。东条还主張为使陸軍能够控制部下，唯一方法就是由海軍正式宣布不願开战，但是海軍为了保持面子却不肯这样作。这样一来，对于东条停止交涉的主張，首相和外、海两相全都束手无策了。在 14 日的內閣會議上，由于东条不同意从中国撤兵，并主張停止日美交涉，內閣的意見紛歧終於表面化了。在同一天，东条还通过鈴木貞一向近卫表示謝絕会面，并建議內閣实行总辞职。鈴木还在 15 日和 16 日分別向木戶和东久邇宮傳達了东条的这一意图。总之，这无非是表明陸軍對內閣的不信任和进一步发起倒閣运动。东条在

向近卫的建議中还提到继任內閣的首腦問題，主張能够控制陆海軍的只有皇族，并举出东久邇宮最为适任。天皇和木戶接到近卫有关以上情况的报告后，在 16 日正式表示了不同意。理由是在和平时期尚可，但在有爆发战争危险的时期，为皇室着想不应该这样作，也就是說，要避免使皇室担负战争責任。

至此，近卫也终于决定总辞职，而在 16 日傍晚提出了辞呈。这个內閣从成立起仅仅三个月，它的原初目的是要通过交涉来同美国取得妥协，但是在这期间，它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把事态推到必须就和战问题进行抉择的最后阶段而被迫下台了。

第四章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第一节 东条内阁的成立和开战

东条内阁的产生

第三次近卫内阁总辞职以后，在10月17日举行了决定继任首相人选的重臣会议，出席者有清浦、若槻、岡田、林、广田、阿部和米内等前首相，以及枢密院议长原和內大臣木戸等。近卫因不愿出席，托词患了急病，而用书面作了到发生政变为止的经过报告。在这次会议上，若槻提名字垣，林提議由皇族成员出来组阁，然而这些都遭到了木戸的反对，他推举了东条英机。理由是“使充分了解这一事态(日美交涉)的经过情形并对日美妥协实现的困难最有深切体会的东条组阁，并使其力求陆海軍的真正合作和重新研究御前会议的决定，将是收拾时局的最为实际的办法。”(《木戸日記》)内心认为軍部推翻了近卫内阁的重臣們对于木戸的这种意見虽然感到惊异，但也提不出积极的反对理由，在广田、阿部和原等表示贊成的情况下，他們虽然对前途心怀不安，但也只好表示同意了。岡田說这次会议簡直象是木戸和阿部在演“对口相声”；若槻也說他觉得这意味着以毒攻毒，也未尝不可，也就默不作声了。(矢部貞治：《近卫文麿》)

当日下午，日皇下令东条组阁，接着，又召見了海相及川，吩咐二人要遵守宪法的規定，实行陆海軍密切合作。二人退出以后，木戸對他們說这是天皇的指示而讲了以下这段話：“关于陆海軍合作一节，我想陛下适才已經說过，此外，在决定国策的大綱上面，不必拘泥于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定，必須对国内外局势进行更深刻更广泛的研討，然后加以慎重的考虑。”(《木戸日記》，10月17日)

条)

这样,就在10月18日成立了包括下列成员的东条内阁。

内阁总理大臣兼陆军大臣、内务大臣	东条英机
外务大臣兼拓务大臣	东乡茂德
海军大臣	嶋田繁太郎
大藏大臣	贺屋兴宣
司法大臣	岩村通世
文部大臣	桥田邦彦
商工大臣	岸信介
递信大臣兼铁道大臣	寺岛健
厚生大臣	小泉亲彦
(企划院总裁)	铃木贞一
农林大臣	井野碩哉
国务大臣	安藤纪三郎
内阁书记官长	星野直树

东条为了集中权力和加强统制,在这个内阁中纠集了了解以往情况的官僚,他自己则兼任陆相和內相,起用他在“满洲”时期的熟人星野担任书记官长,并把他的心腹爪牙安置在陆军的重要位置上,通过这种任用私人的办法,完全把这个官僚内阁变为自己的“事务机构”。东条“独裁”体制,从此迈出了第一步。

本来,陆海军统帅部认为在当时的局势之下,任何内阁上台,在采取对策上面都将达到日美开战不可避免的结论,而正在忧虑如果出现主张和平的内阁,将要造成完全无视军事上的要求的情况。由于组阁的命令“意外”地落到东条手里,这虽然还不是肯定了日美开战论,但军部的强硬论却受到了很大的鼓励。然而,后来东条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却供述说,若非日皇指示他“一切从头作起”,也许不会接受组阁的命令,自己也认为有“一切从头

作起”的必要，并决心准备这样作，同时在邀请别人入阁，被问到对美交涉的方针时，也都表示要“一切从头作起”。（《东条供词》）关于这点，似乎近卫也很放心，他在给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信中写道，他的辞职，并不一定是由于已经决定对美开战的结果，他认为继任内阁也一定会尽最大努力继续交涉，直到取得圆满结果。他还接着说：“深望您和贵国政府不要由于内阁的变更，或仅仅根据新内阁的外表和印象而过分失望。”（格鲁：《旅日十年》）但是美国政府却由于东条内阁的成立而完全失去了对于交涉成功的期望。美国的报纸和广播都异口同声地把这次政变说成是导致日美冲突的前奏，国务卿赫尔也感到：“我们对于近卫内阁并没有抱多大期待；而对于10月17日成立的东条内阁，则更不能抱期待了。”（赫尔：《回忆录》）就连最初期待东条内阁由于首相是现役军人，可以比前任更好地控制军部内过激分子的格鲁，也在11月3日电告本国政府开战危机已经迫近，他说：“必须指出，低估和平谈判宣告失败以后日本所进行的明显的准备，是一种近视的看法。同时还要指出，美国在决定政策上面，如果把日本的准备仅仅看成是为其高压外交提供精神支持的一种武力威胁，那也是非常近视的。日本很可能采取危险的戏剧性的突然行动，造成美日之间的军事冲突。”（格鲁：《旅日十年》）

另外，10月20日，木户在日记上作了如下的记载：“皇上对于我在内阁的更替上所作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嘉奖，使我感到惶恐。我详细地奏禀皇上，此次内阁的更替，真是只要走错一步，就有意外地引起战争的危险。经过熟虑之后，深信这是打开局面的唯一办法，所以才奏请批准。皇上深表同意，并且说道，这就是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至为感激。”木户的工作是否得到了日皇所说的“虎子”了呢？后来的局势很快地就作了答复。

决心开战

东条内阁首先在10月21日由东乡外相训令驻美大使野村通知美国政府,这个内阁和前任内阁一样具有改善日美关系的诚意,并使野村催促美方对日方9月25日的提案(参看本书第3章,第2节)提出反建议;与此同时,于10月23日召开了第一次内阁大本营联席会议,决定就欧洲战局、日美交涉的前途、以及对开战后作战和经济的估计等各方面的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以后直到30日为止,几乎每天都召开了这种联席会议。这就是东条所谓的为了“一切从头作起”而进行的“对国策重新研讨”。到10月29日,关于对美交涉的前途已经肯定,根据既定的条件,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妥协,决定了日本对10月2日美方照会的反建议案(甲案)。接着在11月1日的联席会议上,就贯彻以上述方案为基础的国策的方法,讨论了以下三种方案:

1. 根据甲案继续进行日美交涉,纵使最后宣告决裂,日本政府也忍耐不动。
2. 就此终止交涉,立即开战。
3. 一面继续进行交涉,力求达成协议;一面下定开战的决心,进行作战准备。

在以上三种方案中,选择哪一种方案呢?关于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反复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统帅部从其开战不可避免的判断出发,认为外交谈判的目标应当放在取得开战的名义并隐蔽作战的企图上;同时还考虑到雨季等气象上的条件,为了不逸失作战时机,主张从速下定开战的决心。对此,外相曾经力图加以阻止,但是他的努力,也只限于尽可能地把停止外交谈判的日期向后推迟而已。最后的结论是采用第三方案,并决定以12月1日午前零时为停止外交谈判的限期。外相从国际形势出发,认为日美战

爭将要长期化而抱着悲觀的估計，关于根据上述第三方案进行交涉的条件，除已經决定的甲案以外，又提出了一个乙案。乙案是甲案不能通过时提出的，目的在于只就为防止战争爆发所必需的项目达成协议，使两国关系回复到日軍侵入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和美国冻结日本资产以前的状态，以使局面得到暂时的稳定。这个方案是由前任外相币原所草拟并经过东乡作了某些修改。陆军方面认为这个方案把解决中日战争的问题撇开不谈，而只是希求“姑息的和平”，表示反对，但由于外相不惜以个人去留来坚持这一方案，结果，经过若干修改后得到了通过。这样，好不容易才得出了国策方案，并提交到 11 月 5 日的“御前会议”上讨论。这一方案内容如下：

贯彻帝国国策纲要

一、帝国为了打开目前的危险局面以达到生存和自卫的目的，并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现在决心对英美荷开战，并采取如下措施：

（一）发动武装进攻的时期定为 12 月初，陆海军应作好作战准备。

（二）对美交涉按另项纲要进行之。

（三）加强和德意两国的合作。

（四）在发动武装进攻以前，和泰国建立密切的军事联系。

二、对美交涉如在 12 月 1 日零时获得成功，即取消使用武力。

对美交涉根据部分内容有所缓和了的方案，即将一直成为悬案的重要事项的表现方式加以缓和和修改而成的另项甲案或乙案来进行，并力求达成协议。

甲案

9 月 25 日日方提案作如下修改，以缓和其表现方式。

一、通商上无差別的問題：

如果根据 9 月 25 日方案絕无达成協議的可能时，可将这一方案作如下修改：“如果无差別原則在全世界得到实行的話，日本国政府即同意这一原則可以适用于整个太平洋地区，包括中国在内。”

二、三国条約的解釋及履行問題：

在进一步表明日方无意随便扩大对自卫权的解釋的同时，并以这样說法应付对方：关于三国条約的解釋及履行，正如屡次所表明，帝国政府根据自己的决定采取行动。此点，諒已得到美方的諒解。

三、撤兵問題：

对这个問題作如下修改以緩和其表現方式：

(A) 日本在中国的駐兵及撤兵。

在“中国事变”中派往中国的日本軍隊，于中日間和平实现后的必要期間内，仍然繼續留駐在华北及“蒙疆”的一定地区和海南島。其余軍隊，在和平实现的同时，根据中日两国另行締結的协定，开始撤退，随着治安的确立，于两年以内撤退完毕。

(注)如果美方关于必要期間提出質問，可答称估計为二十五年。

(B) 日本在法属印度支那的駐兵及撤兵。

日本政府尊重法属印度支那的領土主权。目前派往法属印度支那的日本軍隊，在“中日事变”获得解决，或在远东确立起公正的平时，立即撤退。

此外，对于四原則，应极力避免将其包括在日美間的正式協議事項(諒解方案或其他声明)中。

乙案

一、日美两国政府明确約定不向法属印度支那以外的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地区实行軍事扩张。

二、日美两国政府进行合作，以保证各自从荷印获得其所必需的物资。

三、日美两国政府将其相互間的通商关系恢复到日方资产被冻结以前的状态。美国政府保证供应日本所需要的石油。

四、美国政府不得采取任何行动来妨碍为恢复中日两国間和平所作的努力。

备考

一、必要时，可以約定，在本协定成立时，日本准备把目前駐在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地区的日本军队移駐北部地区；而在中日两国間实现和平或在太平洋地区确立起公正的平时，即将撤退上述日本军队。

二、必要时，可将甲案中所包括的有关通商上无差别原则的规定，以及有关三国条约的解释及履行的规定加进本案中。

11月2日晚間，东条首相偕同参謀总长和軍令部总长将以上决定密奏日皇，并为“慎重”起见，在4日召开了沒有前例的陆海軍軍事参議官联席會議，就“貫徹帝国国策綱要中有关国防用兵問題”作出決議說：“統帥部为应付最坏情况加紧战争准备而采取的措施是适当的。”因此，在11月5日的御前會議上，上述議案便原案通过了。就是說，这次會議决定，一面交涉，一面准备战争，而交涉期間还不到一个月，同时統帥部提出条件，不能由于外交談判而妨害作战。这次御前會議，可以說是事实上决定要开战的一次會議。因为，在这次會議上，外相东乡关于交涉的前途曾报告說：“遺憾的很，交涉圓滿成功的希望很小”，于是作出决定，一旦这一几乎没有希望的交涉宣告决裂，便立即开战。而在这以前，日軍已經为了开战的目的加紧进行了战争准备。海軍方面早在9月底已将联

合艦队的主力集中到九州的佐伯灣作好出动准备,并于11月1日发布了“联合艦队机密命令第一号”,内容为“大日本帝国向美国、英国与荷兰宣战,宣战将在X日正式公布,本令将在Y日实施。”5日,又发出同样命令第二号,内称Y日为11月23日;8日又发出第三号命令,规定X日为12月8日。(朝日新聞法庭記者团:《东京审判》第二輯)陸軍方面也在11月6日下令南方軍与南海支队完成作战編制并作好攻取南方要地的准备,同时又任命了大将寺內寿一及其他將領为南方軍总司令官以及各路軍司令官。(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一卷)

就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了这一阶段的日美交涉。日本政府已于4日把上述甲案和乙案通知了野村,这两个方案在5日的御前會議获得通过以后,立即訓令野村根据甲案开始交涉。日本政府在4日給野村的电报中指出:“这是最后的一次尝试,須知这次我方提出的方案無論在形式上或实际上都是最后方案”;同时还指出,11月25日为进行交涉的限期,希望从速进行。另外,日本政府又接受野村的請求,特派来栖三郎輔助他进行这项工作,来栖于11月6日急忙由东京启程,經香港飞往华盛顿。

野村于11月7日把甲案交給了赫尔。这时,美国政府已經暗中获得了日本政府11月4日拍給野村的訓电,得悉交涉的限期定为11月25日,从而估計到了日本方面备战的企图。而且来栖也并未带来任何新的解决方案,这就进一步使得美国方面大失所望。赫尔对于日本政府派遣来栖到华盛顿的目的作了如下的估計:第一、施用一切压力与說服手段迫使美方接受日本的条件;第二、如果上述办法达不到目的,即用会談拖住美方,直到日本完成其进攻准备。(赫尔:《回忆录》)因此,在7日以及10日的会談中,赫尔与罗斯福对待野村的态度是非常形式的;而在15日的会見中,当野村催促赫尔进行談判时,赫尔竟說“岂有此理”而表示很不

高兴。(野村吉三郎:《出使美国》)在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这份 11 月 4 日的训电成了问题。检察员方面将这一训电列为说明日本政府并无交涉诚意的证据之一。对此,东乡却申辩说,由于野村的交涉方式在政府内部已经引起不满,于是“使用了稍微过于强硬的词句”;同时,美方暗中获得了日方电报后所作的英译也不够完善,例如原文为“本案……为经过修正的最后的让步方案”,竟被译为“本案……为经过修正的最后通牒”等情况也对于交涉的决裂产生了重大影响。(东乡:《时代的一面》)

这且不谈,反正美国方面相信日本政府已经决心开战的情报,并判断日美战争不可避免。在此基础上,它力求避免给予“日本以停止交涉的口实”,换言之,即让日方开头一枪,以使美国获得参战的充分理由,并为此举行了高级官员会议。美国政府之所以这样作,是出于以下的考虑,即:使当时在国会中仍占有相当势力的孤立主义者也同意对日战争,以及为充实军备“争取时间”。(赫尔:《回忆录》)因为这时美国军部尚未完成作战准备,不赞成立即开战。11 月 5 日美国作战部长斯塔克和参谋总长马歇尔向罗斯福提出劝告:目前为了打倒德国,不要举行无限度攻击的对日战争,而应慎重从事,美国在远东方面的防卫力量得到充实以前应该避免对日作战。于是,罗斯福总统也考虑为了争取时间实行日美“休战”和缔结“暂时协定”的问题。而在 11 月 7 日的国务例会上,赫尔着重指出战争危险逐渐逼近,他说:“形势极为严重,我们无法预测将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受到日本的武装进攻,因而必须经常保持戒备。”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决定,使政府高级官员举行演说,强调形势的严重性,以使全国人民的思想能够适应形势的急剧转变。同一天,斯塔克也宣称:“海军已处在大西洋战争之中,但国民并未理会这一点。……无论国民知道或不知道,反正我们是处在战争之中。”(查尔斯比尔德:《罗斯福总统和战争的来临》,1941年版)

美国政府由于9月4日发生的驅逐艦“格里尔号”事件和10月17日发生的“卡涅号”事件而向国会提出的美国中立法修改法案于11月17日宣告成立，它同时宣布要对商船施行武装化并准許其进入大西洋交战区域。上述两事件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材料，都是由于美国驅逐艦受到了德国潜水艇的攻击而造成的，为采取对抗手段，总统才提出了关于修改中立法的要求。但事实上攻击的主动方面毋宁說是美国。（C.C.詹西耳：《从后門溜进战争》）罗斯福違背了自己在1940年竞选时提出的“不受到攻击决不进行战争”的諾言，这时，美国已經开始摘下它“中立国”的假面具了。刚好在这时即11月17日，格魯又从东京拍来一份电报，提請本国政府注意必須严重警惕日本陆海軍突然奇襲尚未被卷入中日战争的地区；格魯还认为，日本可能采取一切于它有利的战术，包括突然襲击和先发制人等手段。（美国国务院：《和平与战争》）

因此，尽管来栖在15日到达华盛顿，并于17日与野村一同会見了罗斯福，然而美方既然怀疑来栖的任务在于掩飾日本的作战准备，因此，这一交涉也就絲毫未能取得实质的进展。于是，为了打开交涉的僵局，野村于18日提出了一个建議，并力图說服赫尔国务卿。他的方案是：有关三国同盟的問題暫且不談，首先实现日本由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兵和美国解除对日本资产的冻结，然后在此基础上重新开始交涉。据野村收到的情报表明，这一交涉的前途是有希望的。然而日本政府在接到野村的这项报告以后，于20日发出一道訓令，全面地否定了把交涉范围比乙案更加縮小了的野村个人的这一建議。訓令指出：“仅仅保証恢复资产冻结前的情况，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解决目前的紧迫局面，……目前已絕无任何先采取緩和局势的措施然后再进行談判的余裕，命令野村下次提出乙案，并且断然指出：“如果以上这样作不能获得美方的同意，那么，即使交涉决裂也沒有办法。”这是一項“十分严厉、近乎叱責

的訓令。”（来栖三郎：《日本外交秘录》）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情况实际上已经使外交谈判陷于无法进行了。在 17 日召开的第七十七次临时议会上，东条首相指出，美英荷冻结日本的资产，是一种“不次于武装进攻的敌对行为”；他在演说中还表明，日本政府有关交涉的坚持不变的基础条件是：第三国不仅不得妨碍帝国解决“中日事变”的工作，不得向日本进行军事威胁，而且还要取消经济封锁之类的敌对行为，等等。对此，贵族院和众议院全体一致作了鼓励政府的决议，众议院议员岛田俊雄并在就其提案精神进行说明时强调停止交涉，他说：“打铁必须趁热，在此意义上，我们希望政府全力以赴地贯彻战争目的，而停止踏步不前的作法。”这种一味强调采取强硬方针的公开叫嚣，一方面使野村来栖的交涉工作陷于僵化状态，同时也使美国政府的态度更加强硬起来了。

赫尔备忘录

11月20日，野村来栖根据日本政府的训令再次向赫尔提出了乙案。赫尔对其中第四项“美国政府不得采取任何行动来妨碍为恢复中日两国间和平所作的努力”的要求，颇有难色，他说，如果日本不澄清它与三国条约的关系，并明确表示采取和平政策，美国很难停止其援蒋行为。在日本方面规定为结束交涉的限期的 11 月 25 日的次日，赫尔作为对乙案的答复向日本大使面交了两份备忘录。这就是所谓《赫尔备忘录》。这是把 6 月 21 日的美国方案与 9 月 25 日的日本方案合并而成的，主要内容是：如果日本真地对于解决问题具有诚意，它就应该接受 4 月 16 日赫尔提案中关于履行四原则的要求，一言以蔽之，它就应该把一切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这个文件第一，提议缔结中、美、英、苏、日、荷、泰间多边的互不侵犯协定（一）；第二，提议有关各国就法属印度支那问题进

行談判(二);第三,要求日本从中国及法属印度支那撤退全部陆海空軍和警察力量(三);第四,規定对于中国,除重庆政府以外不承认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权,而要求不承认“滿洲国”政府及伪南京政权(四);第五,要求在实质上廢弃三国同盟或者使它变成廢紙(九)。对此,米栖說:“如果接受这些条件,日本政府只有举手投降了”,而日本政府也认为这项备忘录簡直等于“最后通牒”,特别是对于急于要发动战争的“軍部提供了良好的口实”。(《展望》1950年3月号,山本熊一的发言)

实际上,在美国方面,也是在决心对日开战以后才提出了这项《赫尔备忘录》。如前所述,美国政府首脑已經預計到对日开战,而正在考虑开战的时机。然而与此同时,在美国政府内部还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一种要推迟战争爆发的动向。11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专家曾向赫尔提出建議,主張有必要同日本締結某种形式的暫定的或临时的协定,到19日,远东司的高級官員又建議为了避免进行和德国与日本的两面作战,應該締結既非“日美协定基础方案”亦非單純的休战方案性质的“太平洋协定”。赫尔虽认为日本在20日提出的乙案是一种“最后通牒”,但根据远东司以上的意見,仍然与总统、軍部首脑以至中、英、澳、荷各国进行洽商的结果,制定了一项旨在“爭取時間”的“休战三个月”的暂时协定方案。赫尔于20日向各国代表提示了这项协定的草案,除中国代表外,其他都无异议,并向本国作了請示。24日,有关各国的外交官員又举行了一次會議,在会上,除荷兰表示支持休战以外,其余尚未接到本国的答复。在这中間,以中国駐美大使胡适为首的中国外交官員和蔣介石本人分別向美国政府当局和輿論界积极地展开了反对休战和阻止美日妥协的运动。因此,形势又向战争的方向急轉直下了。在11月25日举行的美国国务院會議上,討論的中心已經不是休战或者和平的問題,而是对日开战,尤其是“怎样作我

們自己就能够在不遭受过大危險的情况下使对方陷入先放第一枪的状态”的問題了。（比尔德：《罗斯福总统和战争的来临》）

因此，美方 26 日的回答即《赫尔备忘录》是“考虑到輿論反对坐視不救中国的危亡以及日本要人的非和平論調等”情况而草拟的。（赫尔：《回忆录》）27 日，赫尔对陆军部长史汀生說：“現在問題已經掌握在您和諾克斯，即陆海軍的手里了。”当天，陆海軍部即向前綫司令官們发出了“战争警告”。28 日罗斯福又向史汀生提示了三个方案，即：（一）不采取任何行动；（二）再次采取类似最后通牒的措施；（三）立即开战，对此，史汀生選擇了第三項办法，而且主張不事先給予警告即开始进攻。（《史汀生日記》）然而，这种办法既違反 25 日決定的方針（使日本放头一枪），又違反民主党的諾言，因而在这一天的国务會議上，总统提出了向日皇发出警告文书的方案。同时，也决定向美国国会和人民发出警告。就这样，企图站在“被动”立場的美国方面在这期間也积极地进行了战争准备。

然而，日本軍部放弃对于外交談判的希望比这更早，它早就开始在暗中进行实际的軍事行动。箭已經离开弓弦了。就在赫尔备忘录交給了日方的 26 日，日本海軍机动部队由千島的单冠灣向夏威夷出击了，虽然在日本方面也准备了万一交涉达成協議即行返航。而对陆军方面，也在 15 日发出了关于“摧毁美国、英国以及荷兰在东亚的主要根据地”的命令，日本的南方軍和南海支队已經在分別向法属印度支那、海南島、华南、台灣、澎湖島、奄美大島、帛琉島和小笠原群島等地集結。

日本政府接到赫尔备忘录以后，于 11 月 27 日和大本营举行了联席會議，这时，已經不是選擇“和与战”的問題，而是在必然开战的气氛中进行了討論。这次會議认为，赫尔备忘录是最后通牒，日本方面無論如何不能接受，从而得出这样的結論：根据 11 月 5 日決定的以“貫徹帝国国策綱要”而进行的对美交涉已經失敗，因

而只有采取軍事行动了。这个結論經過 29 日的重臣懇談会和 联席會議討論后,在 12 月 1 日的御前會議上,終於作出了最后的决定,即对美、英、荷开战。开战日期定为 12 月 8 日。这是由于考虑到以下几点:(1)日美海軍的力量对比关系到 1942 年 3 月以后,将对日方不利;(2)为了准备北方作战,希望在 1942 年春季以前,基本完成在南方的第一阶段作战;(3)推迟开战日期,将給予同盟国方面以加强备战活动的時間;(4)馬來亞地区 1 月和 2 月的气象状况不利于登陆作战;(5)主要从月令的关系上认为 8 日前后对于登陆作战最适宜。由 11 月上旬起,就以 12 月 8 日为期而进行了开战的准备,而在这次御前會議的次日,即 12 月 2 日,把这一点正式地确定下来了。

11 月 28 日东乡外相給野村大使拍了一封电报,略謂日本方面将于两三天內电告对赫尔备忘录的意見,这样一来,日美交涉势必要陷于完全停頓,但必須注意避免給美方以交涉即将决裂的印象。赫尔暗中获得了这份密碼电报,知道了危机的迫近。12 月 1 日,罗斯福下令远东艦队司令官对日軍在中国南海及暹罗灣的活动进行“防卫性的牒报戒备”,而在 5 日,他又透露說:“在四、五天以內,就要发生美日之間的武装冲突了。”(比尔德:《罗斯福总统和战争的来临》)

事态在不断地走向决裂。12 月 2 日罗斯福写信給日方,詢問在向法属印度支那增加兵力的理由。日本駐美大使館答称这是为了防备在中越边境附近的中国軍隊。6 日,日本政府把一封长文电报分成十四段,一連串地把它拍給了野村,并指示說在接到另外有关提出時間的指示以前,不得提出。这一天,美方收到一份关于日本大使館焚毀了密碼的情报,为了阻止这种“可能成为悲剧”的事态的发展,罗斯福总统以个人的名义直接打电报給日皇,希望日本由法属印度支那撤退陆海軍。这封信在当天午后九时(华盛顿

時間)以“最特急件”發給了駐日大使格魯。當時，羅斯福總統指示，這封電報可以使用灰色密碼(秘密程度最低的一種)，並且說，即使被暗中獲得也無妨礙。這樣作，據說是為了節省譯出密碼的時間，以便儘快遞交；同時也有相反的解釋，即認為這樣做是為了製造美國是被迫進行戰爭的印象而採取的最後的姿態。這封電報雖在一小時以後(日本時間是7日正午)即由華盛頓到达了東京，然而送到格魯手裏的時間已經是午後10時30分，因此，格魯親手交給東鄉的時間是在深夜，確切地說，是在次日(8日)午前零時15分，已經不發生任何作用了。電報投遞延遲的原因何在呢？根據遠東軍事法庭上檢察方面的証言，是由于當時日本參謀本部的一個軍官的要求而被壓下了。

日美斷絕邦交

日本政府对赫尔备忘录的复照是分为十四段即作为十四封电报拍給了野村。電文的譯解是在从6日夜晩到7日(華盛頓時間)，及譯到“应于7日午後1時儘可能交給赫尔国务卿本人”的時候，已接近7日正午，全文的英譯和打字又費去一段時間，結果，野村和來栖到了国务卿辦公室的時候已經是2時20分了。這時是日本海軍開始進攻夏威夷珍珠港的一小時以後，是陸軍在哥打巴魯登陸的二小時半以後。當時，赫尔已經暗中獲得了日本政府復照的電報，獲悉了它的內容，並接到了未經証實的日軍空襲夏威夷的情報。赫尔粗略地看過了野村交來的復照以後說道：“我在五十年的公職生活中從未見過這樣厚顏無恥、充滿虛偽與狡辯的文件”，(赫尔：《回憶錄》)然後用下顎指了一下門。兩大使默然無語地和赫尔握手告別。他二人這時還不知道發生了珍珠港事件。

那麼，是否日方故意地把復照的提交推遲到開始進攻以後呢？在遠東軍事法庭上，這個問題也成了辯論的焦點之一。根據東鄉

的辯解，大致情况是这样(《时代的一面》)：在 12 月 1 日的御前會議上以及次日的联席會議上曾經討論了开战的程序問題，这时，海軍方面为了保証奇襲作战的成功，要求在战斗开始以前不終止外交談判。外相表示反对这个意見，主張无论如何必須作关于終止交涉的通告，因此在 4 日的會議席上，海軍也同意了这一点，并作出决定，于华盛顿時間 7 日午后零时半发出通告。5 日，陆海軍方面又向东乡提出：上次會議所决定的時間有必要再向后推迟三十分钟。这样，到 7 日午前 4 时为止，全部完成了复照电的拍发工作。但由于駐美使館人員的“怠慢与失誤”，竟使递交的時間出乎意料地比原定的午后一时又延迟了一小时以上。东乡似乎沒有被告訴开始进攻的准确時間。但是从他引用了，只要在一分钟以前发出通告就不算是違反海牙条約的論点的情况(前书)可以推想，他已經了解到統帥部是把发出通告的時間紧紧地挨近开战的時間。并且据当时大本营陸軍作战科长服部卓四郎的断言，在就复照問題进行討論并作出决定的联席會議上，“并未討論这份复照必須具有国际法上所規定的开战通告的性质这一問題。”(《大东亚战争史》第一卷)而在远东軍事法庭上，当时的外务省美洲司长山本熊一也作証說：在聯絡會議上，关于复照的递交時間，只是原封接受了統帥部的要求，“並沒有进行任何討論”。这些事实表明，無論軍部或外务省，都沒有对預先通告的問題給予充分的注意。而且，日方的照会是用这样一句話結尾的：“帝國政府鉴于合众国的态度，只能认为今后即使繼續交涉也不可能达成協議，特此通知并表示遺憾。”这个文件的性质是不明确的。东乡认为这个文件实质上就是宣战书，但野村与来栖却沒有这样认为。(《东条备忘录》，来栖：《日美外交秘录》)不难推想，这种情况对于造成在极其短促的時間內从事譯解与英譯电报工作的駐美使館人員的“怠慢”，是发生了影响的。

不过，对美国方面而言，日本进攻夏威夷实质上并不完全是“偷襲”。当美方从旁收到日方复照以后，在 11 时 25 分，有关官員集中到馬歇尔参謀总长办公室內进行了閱讀。馬歇尔把这件事用电话通知了海軍作战部长斯塔克，并且向前哨基地发出了警告。給夏威夷的电报是在 12 时 17 分发出的，內称：“午后 1 时日本在提出实质上等于最后通牒的文件。”这封电报在日本开始进攻的二十二分钟以前到达了檀香山的 C 无綫电信公司。（比尔德：《罗斯福总统和战争的来临》；日本外交学会編：《論太平洋战争的原因》）

即使这样，无疑对美通告的这种推迟使得日本对夏威夷的“奇襲”得到了成功。同时，这事实也使罗斯福政府的参战变得容易了。“但是，”史汀生在日記里写道：“現在由于日本人在夏威夷直接对我们进攻，一切問題都解决了。……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得救了’，优柔寡断就此完結了。危机以使我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的方式到来了。”次日即 12 月 8 日，罗斯福总统发表演說要求国会发表关于“战争状态”的宣言。他在演說中着重指出以下几点：美国还处在和日本进行和平談判之中；他曾給日皇写了信，为和平已經尽到了一切可能的努力；日本的回答是在它开始进攻珍珠港的一小时以后交来；日本的进攻是从几天乃至几周前經過周密计划的純粹的“奇襲”和“偷襲”等等。这样，“不要忘记珍珠港”的口号对于动员全体美国国民团结一致投入和坚持对日战争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二节 开战初期的胜利和失利

日本对美宣战

日本陆海軍的对英美作战計劃是在从 9 月到 10 月初这段時間里制訂的。海軍方面从 9 月 10 日到 13 日，陆軍方面从 11 月 1 日到 5 日，分別进行了“图上演习”。策划用空軍偷襲夏威夷的是

联合艦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他的这项计划是在8月間提交給軍令部的。对此，最初在海軍內部曾經有过强硬的反对意見。反对的理由是：若把即使全部用于南方战綫尙感不足的空軍力量抽出一部分来搞投机性极大的进攻夏威夷的作战，很可能陷于追逐二兔不得一兔的危險結局。然而，到10月20日，还是作出了进攻夏威夷的决定，并且在11月3日发出指示：出动当时可能使用的全部六艘航空母艦投入这次进攻。

偷襲夏威夷计划确是一场孤注一擲的大賭博。首先，是否能够完成这次偷襲而不被美軍发现？其次，即使偷襲成功，美国主力艦队是否停泊在那里？作战的成功与否，完全决定这种“投机”是否得中。既然如此，为什么統帥部竟下定决心要把全部机动部队投入这次战斗呢？原来，統帥部虽然希望速战速决，但又不能不估計到战争长期化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当时，对形势发展的估計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开战后的二年以内是有把握的，而进入第三年以后，就看不透了。因此，为了在第三年以后能够繼續确保南方占领地区，有必要在战争的一开始就給美国海軍以尽可能大的打击。尤其是和对方相比处于劣势的日本海軍，除了在开战伊始采取“出奇制胜”的战术，更无其他办法。开战当时日美海軍可能用于作战的艦艇比数，美国是十，日本是七点五，航空兵力則双方大致相等。但到1942年以后，在海空軍兵力的增加方面，美国显然要占极大的优势。针对这种情况，海軍的作战计划就需要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爭取在开战之初取得胜利，及早举行海上决战，以免形成彼我兵力的悬殊。（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史》第一卷）

陸軍作战的焦点是对馬來亞半島的奇襲登陆作战。为了在短时期內实现突破美国、英国、荷兰的对日經濟封鎖，攻下富有資源的南方地区的目的，对这里也必須在开战伊始采取“奇襲”的方式。

12月2日，日本大本营陆海軍部向联合艦队司令长官和南方軍总司令下达了开战的命令和开战的日期。南云忠一率领的担任空襲夏威夷的部队，在11月26日由擇捉島单冠灣出发向东航行；担任攻取馬來半島的由山下奉文統带的第二十五軍所搭乘的运输船队在12月4日由海南島三亚出发向馬來半島的东岸进发。

1941年12月8日午前7时，广播电台突然用緊張的声調播送了这样一条“临时新聞”：“据大本营陆海軍部宣布，帝国陆海軍在今天8日凌晨在西太平洋方面和美英軍进入了战斗状态。”

在令人窒息般的緊張气氛中經過了几个小时后，11时40分，电台广播了日皇用沉重的語調宣讀的宣战詔书，詔书的第一句是：“仰承天佑、继承万世一系皇統之大日本帝国天皇昭示忠誠勇武之尔等庶众曰”。接着，东条首相以“恭奉大詔”为題发表了广播演說，強調“胜利永远在皇威之下”。这一天里，电台一直在播送着充滿兴奋情緒的节目，街道上不断地响着报販叫卖号外的鈴声，午后8时45分空襲夏威夷的战果发表了，这件事鼓舞了日本国民的斗志，就在这种气氛中，开战的第一天过去了。初战的胜利，对于战争的发动者來說，确实是“理想的”成功，他們一定会感到那是“天佑”。

胜利的幻想——第一阶段

战争是以日本海軍对夏威夷軍港实行的偷襲而开始的。夏威夷時間的12月7日星期日的早晨7时50分（日本時間是8日午前3时20分），首先由机动部队起飞的以轰炸机和战斗机一百三十八架組成的日軍大編队对停泊在珍珠港內的美軍战艦和陆上基地举行了猛烈的襲击；接着在一小时以后，日軍又派出第二批一百七十一架飞机进行了攻击。日軍的偷襲完全取得了成功，結果，击沉了美方战艦六艘、重巡洋艦一艘、油艦二艘，炸毁和炸伤战艦二

艘、重巡洋艦一艘、乙級巡洋艦六艘、驅逐艦三艘、輔助性艦只三艘，炸毀飛機約三百架；此外還給予了地上設施以相當大的損失。日方的損失是飛機二十八架和參加這次偷襲的特別攻擊隊所屬的大型潛水艇一艘、特殊潛水艇五艘。日方機動部隊認為大体上已經取得了預期的戰果，因此沒有舉行第三次攻擊就開始退避并返航了。

陸軍南方軍把作戰計劃的重點放在馬來半島和菲律賓上面，并且準備隨着戰局的進展，再進攻緬甸和荷印。為此，陸軍派第二十五軍和第三航空集團擔任進攻馬來半島；派第十四軍和第五航空集團擔任進攻菲律賓；派第十五軍擔任進攻泰國、緬甸方面；派第十六軍擔任進攻荷印。海軍派遣第二艦隊、第三艦隊、南遣艦隊和第十一航空艦隊參加這方面的作戰。對馬來半島的作戰計劃是空軍轟炸和登陸作戰同時并進，而於12月8日拂曉以前，日軍第二十五軍先遣兵團開始在馬來半島東岸的宋卡和哥打巴魯登陸。10日，由新加坡出動的英國遠東艦隊的主力“威爾斯親王”號和“却敵”號兩艘受到日本海軍航空部隊的攻擊而悲慘地沉沒了。由於這次馬來亞海面的戰役和半年前英海軍航空隊擊沉德國戰艦“俾斯麥”號的戰鬥，引起了對於空軍威力的重新估價，從那時起，世界各國的海軍戰略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由於這次海戰的結果，對日軍來說，馬來亞作戰的危險性已不復存在，第二十五軍的主力得到安全登陸，并指向新加坡開始了迅速的進攻，從馬來半島登陸地點一直向南推進。日軍在12月31日占領了關丹，1月31日占領柔佛，2月8日24時，對新加坡島的登陸獲得成功，11日又占領了武吉智瑪(Bukit Timah)高地。至此，英軍已力竭計窮，2月15日，山下奉文與英國遠東軍司令珀西瓦耳舉行會談，會談結果，這個地區的英軍終於無條件投降了。

日軍對於菲律賓，採取了從正面進攻的戰術，即先用航空部隊

进行轰炸然后实行登陆作战。由12月8日至15日之間，陆軍航空队連日进行了轰炸。由本間雅晴率領的第十四軍的先遣部队在第三艦队掩护之下，于12月10日在呂宋島的部分地区登陆成功，20日，三浦支队又在民答那峨島登陆，并占领了达窩，接着，第十四軍的主力于22日在呂宋島的林加恩灣举行登陆，登陆后，并没受到多大抵抗，繼續前进，而在次年1月2日占领了馬尼拉。美国远东軍司令官麦克阿瑟已于12月24日轉移到柯勒吉多尔要塞，美国軍隊也陸續向八打雁半島和柯勒吉多尔島集結，准备在这里进行长期抵抗。将美軍赶进八打雁半島密林地帶的第十四軍得到增援后，于4月3日开始进攻，9日攻占了整个半島，5月7日占领了柯勒吉多尔要塞。在这以前，麦克阿瑟曾宣称“我将要回来”而逃往澳洲方面去了。

另外，日軍在开战的同时，对中部和南部太平洋方面也展开了进攻。从12月8日起海軍航空队攻击并制压了关島、威克島、和魯島等的空軍基地。12月4日由小笠原島出发的南海支队于10日清晨在关島登陆，傍晚以前占领該島，駐守該島的美軍三百三十名投降了。在同一天，日軍还占领了吉尔貝特群島的馬金島、托拉威(Tarawa)島。对于威克島，日軍在連日举行空袭以后，于10日企图奇袭登陆，但遭到反击，結果损失了驅逐艦二艘而败退了。尔后，空軍再度对該島施行連日轰炸，并且在由夏威夷归还的机动部队的一部参加的情况下，于12月22日又举行了第二次登陆作战。这次，日軍也陷入了极端的苦战，經過激战之后，好不容易才占领了該島。占领关島的南海支队于1942年1月4日接到进攻俾斯麦群島的命令，于1月23日占领拉包尔，不久即占领了整个新不列顛島，建立了空軍的前进基地。

日軍南方作战的最終目的是攫取荷印的資源，尤其是石油。因此，在馬來亞、菲律宾等地的作战得到順利的进展以后，大本营

和南方軍就決定比原定計劃提前一個月實行進攻爪哇作戰。這次作戰計劃是：調遣從馬來亞攻入蘇門答臘的部隊和已經在12月間佔領了婆羅洲、西里伯斯方面的部隊，由東西兩面夾攻爪哇。2月14日陸軍空降部隊突然在蘇門答臘島的巴鄰旁降落，今村均率領的第十六軍立即與此進行配合，而於17日佔領了該地。在這期間，日軍進行了爪哇海海戰（2月4日）、空襲達爾文港（2月19日）、巴厘海海戰（2月20日）、蘇拉巴亞海面的戰役（2月27日）、巴達維亞海面的戰役（3月1日）等數次戰役，通過這些戰役，把同盟國艦隊擊潰了。第十六軍在3月1日開始在爪哇本島登陸，5日佔領了巴達維亞，7日佔領了蘇拉巴亞，9日荷蘭軍宣告投降，至此，日軍在這方面的作戰也告一段落了。

日軍對緬甸作戰具有切斷滇緬路和促使印度反英的意義。擔當這方面作戰的由飯田祥二郎率領的第十五軍首先集結在泰國，然後在1月4日突破緬泰國境，於31日佔領了毛淡棉。2月9日，日軍接到進攻仰光的命令，11日渡過薩爾溫江，3月3日渡過錫唐河，直薄仰光，而於3月8日攻陷了這個城市。接着，第十五軍便轉入對緬甸中部和北部的作戰。至5月1日佔領曼德勒以後，日軍已全部奪取了緬甸的重要地區，至此，緬甸作戰宣告結束了。

轉折點—— 第二階段

日軍第一階段進攻作戰的勝利超過了統帥部最初的估計。這樣一來，一向認為“為了堅持長期戰爭，在戰略上只能採取守勢的情況有了變化，已經產生了在戰略上採取攻勢的形勢”，並提出了攻取和制壓佔領地區外圍的戰略據點的問題。（關於聯席會議對於初期作戰實績的判斷，參看服部所著前書第二卷）這樣，海軍進攻澳洲的主張和陸軍的反對意見取得了妥協，制定了遮斷美澳聯

系的作战计划；实行了对新几内亚的战略要冲莫尔兹比港的进攻作战；并拟定了进攻薩摩阿，菲吉和新喀里多尼亚等地的作战计划。

由南海支队的一部和第四艦队編成的陆海軍协同进攻部队，以拉包尔为基地，在3月8日首先占领了东部新几内亚北岸的拉埃·塞拉摩阿。不久，根据大本营决定在5月10日左右进攻莫尔兹比的指示(4月18日)已经准备就绪的南海支队，于5月4日由拉包尔出动了。然而运输船队的速度每小时平均只有六哩半，迅即被敌机发现，到7日又开始退避。这一天，日美两軍机动部队互相进行了猛攻，日本方面战果极小，反而使航空母艦“祥风”号受到集中攻击而沉沒了。翌(8)日，双方的攻防战仍在继续，由航空母艦“翔鹤”号起飞的六十九架日本飞机攻击美国机动部队，给予了航空母艦二艘以致命的损害(“累克辛頓”号沉沒，“約克”号重创)。同时，日本艦队也受到攻击，“翔鹤”号起火，飞机起落发生困难，但沒被魚雷击中，仅免于沉沒。面对这种情况，日本艦队只好撤离战场，并且发出命令将进攻莫尔兹比改为无限期延期了。虽然联合艦队司令部和大本营海軍部下令进行追击，但美国艦队已经离开战场无处可寻了。与此次珊瑚海海战同时，5月3日虽然未經流血占领了图拉基，但次日即受到美方艦上机的攻击，約有半数艦艇受到损失(驅逐艦一艘、扫海艇二艘、驅潜艇一艘沉沒)。作为第二阶段开始的这次作战，蒙受了开战以来第一次大型艦艇的损失，結果不得不停止下来。在海战上虽然占了一点便宜，但就作战目的而言，还是失败了。这一事实构成了太平洋战争中双方攻守战的一个轉机，紧接着日本又遇到命运上的另一个更大的轉折点，那就是在中途島的失敗。

日本进攻中途島的作战是在3月間关于第二阶段作战的討論中由联合艦队提出来的。山本五十六主張：在航空母艦方面比較

占优势的现阶段，向美国艦队进行挑战，并借此誘致它进行决战。然而，大本营海軍部和陆軍方面則以占領后补給上的困难为理由一直表示反对。經過激烈的爭論的結果，原則上决定了实行这个作战，但未决定日期。4月18日，日本本土初次受到多里特尔率領的美方航空队的襲击，暴露了日本对太平洋方面的防卫有漏洞，于是山本又主張为了推进并加强东方前哨，必須及早实行对中途島的进攻作战。由于他的强硬主張，并以同时实行进攻阿留申群島为条件，陆軍也表示同意，于是，便确定实行这一作战。

5月5日，大本营发出进攻中途島和阿留申群島的命令。在这次进攻中途島的作战中，联合艦队的主力全部出动了。参加艦艇有三百五十艘共計一百五十万吨，飞机一千架，官兵十万人，是一次規模空前巨大的作战。美国方面譯解了日本联合艦队的密碼，事先察覺了日本的企图，因而在一个月以前就昼夜不停地作好准备，集中力量在中途島等待日軍进攻。由于这种原故再加上日本方面作战上的一些失誤，使得日本海軍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日本艦队是在5月27日日本海軍紀念日那天出发的，它一直駛向中途島，并于6月5日黎明前派出了第一批攻击部队。当时，日方判断沒有被敌人发现，但实际上已經和美軍巡邏机相遇了。美方已作好周密的准备等待日軍。日軍第一批起飞的艦上机一百零八架进攻了陆上基地以后，又决定作第二次进攻。正当准备应付美国机动部队的日方歼击机卸下魚雷改装用以进攻地上的炸彈时，突然接到“发现敌人机动部队”的情报。于是，又急忙改回攻击艦队的装备，在完成这一工作将要起飞的一刹那，受到了美軍艦上机三十架的俯冲轰炸，引起了自己的炸彈和魚雷相继爆炸。其結果，被視為日本艦队的法宝的航空母艦“赤城”号、“加賀”号和“蒼龙”号沉沒，而剩下的“飞龙”号也未能幸免。至此，联合艦队司令长官山本也承认战况失利，只好下令停止作战，立即返航。

日本丧失了航空母艦四艘和大部分优秀的艦上机的搭乘人員，致使海上的主动权被掌握到美国手里，整个太平洋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后，日本几乎不再可能展开积极的作战，而由攻势轉为守势了。与此相反，美国方面則在一举而获得优势的机动部队的維護下，迅速地展开了反攻。当时，日本大本营一味隱瞞战敗的真相，仅仅发表“丧失航空母艦一艘，另一艘重創，巡洋艦一艘重創”；与此同时，大吹大擂地公布了同时实行的进攻阿留申群島的作战和占領阿土和基斯卡两島的消息，企图蒙混国民的眼睛。

同盟軍开始反攻—— 第三阶段

8月7日美国海軍陆战队在图拉基和瓜达耳卡納耳島的奇襲登陆，不仅是針對日本进攻东部新几內亚的一項措施，也是同盟軍在太平洋战綫上展开正面反攻的开始。然而日本大本营根据珍珠港的战果，估計美国的反攻要到1943年中期以后才能开始，因此对于美軍这次对瓜島的登陆錯誤地判断为偵察性的登陆，而于8月13日下令在夺回瓜島的同时繼續完成既定的攻占莫尔茲比的作战計劃。

自从在珊瑚海海战中企图消灭图拉基方面的美国航空母艦主力的作战失败以后(5月7日)，由海上攻占莫尔茲比已經变为非常困难，于是又計劃由陆上进攻。第十七軍于7月21日派横山先遣工作队在巴薩卜亚登陆，接着又于8月18日派南海支队的主力，21日派步兵第四十一团先后登陆，开始向莫尔茲比进攻。这支部队穿过了密林，在9月5日进至欧文斯坦利山脉的分水岭綫上，16日进而占領了莫尔茲比东面大約五十公里的地点。但与此同时进行的攻占拉比·薩瑪来的作战已經完全失败，而于9月5日停止进攻；另外，后述川口支队企图夺回瓜島的作战也遭到失败，从而瓜島战局日趋严重，結果南海支队終于不得不奉命开始

撤退了。

日本海軍在5月間占領图拉基以后便开始在瓜达耳卡納耳島上建筑飞机場,当飞机場基本建成的时候,美軍在这个島上登陆并占領了它。第八艦队立即由拉包尔出动,于8日夜間向美国艦队进行了攻击,但对于正在那里卸貨的数十只运输船队并未加以攻击就回来了(第一次所罗門海战)。另方面,第十一航空艦队开往拉包尔,联合艦队为了将其主力向所罗門方面集結,也开出瀨戶內海南下。以前为进攻中途島而編成的一木支队的主力于18日在瓜島登陆,20日夜間开始了企图夺回飞机場的攻击,但次日即遭到美方大举反攻,受到歼灭性的打击。美国空軍从21日起开始向这个飞机場进駐。24日,双方的机动部队又在瓜島东北海面上进行了战斗(第二次所罗門海战),日方航空母艦“龙驤”号被击沉,增援部队的运输船队也受到很大損失。这场战斗形成了飞机的消耗战。其結果,到26日日軍在拉包尔基地上可能使用的空軍兵力只剩下五十二架飞机了。

至此,大本营才觉察到夺回瓜島的重要性,而于8月底改变作战方針,将夺回瓜島放在首位,将攻占莫尔茲比列为次要,但为时已經太晚了。由于制空权和制海权既已掌握在美軍手里,船队輸送极感困难,因此日方只好采取用高速艦艇乘黑夜进行所謂“老鼠运送”(按即夜間偷运之意——譯者)的办法,并且利用被称为“东京快車”的从水雷艇队和潜水艇的炮击来弥补空軍兵力的不足。然而,既然失去了制海权,那么战斗的結局也就可想而知了。經“老鼠运送”而登陆的川口支队和青叶支队在9月12日开始了第二次总攻,但于14日遭到美方大举反攻而被迫退却了。从8月13日到9月下旬之間参加战斗的全部兵力大約六千人之中,已經伤亡了一千二百名。于是,大本营为了取得胜利又计划在10月中旬实行第三次总攻,而从10月上旬起派第十七軍陸續在瓜島登陆

进行准备。在这期间，于10月11日夜在薩波島附近的海战中，美軍第一次使用雷达打中了第一发炮弹。日軍經過連夜进行艦炮射击以后，于10月24日开始总攻，結果伤亡人数竟然达到二千二百名，因而在26日即被迫放弃了进攻。协助进攻的联合艦队在26日又一次与美軍机动部队交战，虽然給予美軍一些損失，但未能挽回战局。

第三次进攻失敗以后，由于补給的困难，瓜島上的日軍开始出现了餓死者。由于饥餓、营养失調、瓜島炎燒症、瘧疾等而死亡的人数日漸增多。11月10日，虽然第三十八师团开到瓜島，但补給船十一艘全部被击沉，困难程度更加严重了。在此期間又进行了第三次所罗門海战(11月12、13、14日)，日本方面被击沉战艦二艘和重巡洋艦一艘，損失很重。因此，大本营于11月15日向第十七軍发出維持現狀的命令。翌16日，日方新編第八方面軍企图挽回頹势，但在沒有掌握制空和制海权的情况下，仍是一筹莫展；而在新几內亞方面向后退却的南海支队，也在敌人追击之下开始崩潰了。

中国战綫

开战初期，日本在中国方面的进攻目标是英国在远东的根据地之一的香港。日本侵华軍自1940年起就已經制定了攻占香港計劃；第二十三軍在开战同时即越过国境进入九龙半島，并于12月14日將該半島全部占領。接着在18日夜間，日軍在香港实行登陆，到25日英軍便挂起白旗投降了。与此同时，日軍为了策应南方作战，于12月24日开始了牵制国民党軍的作战(第二次长沙战役)，而于1月中旬达到了目的。

第一阶段作战取得成果以后，日本方面即开始考虑利用这个成果迫使蔣介石政权屈服的策略。1942年4月上旬，日本大本营

制定了关于处理中日战争的初步方案，并将其下达给侵华军总司令畑俊六。这一方案总的方针：是利用南方作战的成果谋求解决，或者继续维持现状，而由缅甸方面施加压力，迫使国民党政府屈服；其重点则在于摧毁中国抗战的军事力量，瓦解中国的抗战意志。并具体规定在1943年春季实行进攻重庆的作战（第五号作战）。根据这一方案，日本大本营和侵华军立即着手制订作战计划。

然而此后不久，作为美军反攻的先驱，上述多里特尔率领一支空军部队在4月18日空袭了日本本土，事实表明，这次空袭是有计划地利用了华中方面的飞机场。大本营认为如不占领和消灭这些空军基地，就不能根绝这类空袭，于是在4月下旬向侵华军总司令发出命令，使其尽早开始进攻，以便主要击溃浙江省方面的国民党军，消灭其主要空军基地，并根绝美方利用这些基地空袭日本本土的企图。同时，参谋总长又下令用地上部队攻占丽水、衢州、玉山等地的对方飞机场。这次作战称为浙赣作战，计划是用第十三军（司令部在上海）主力和第十一军（司令部在汉口）的一部由东西两侧夹击浙赣铁路（杭州—长沙）沿线地区，并且占领金华、玉山、丽水等地的飞机场。

5月15日第十三军主力由杭州方面发动总攻，而于28日攻下金华，于6月7日攻下衢州，12日攻下玉山，13日攻下广丰，24日攻占丽水。另一方面，第十一军的一部于5月31日由南昌附近开始进攻，于6月2日占领进贤，4日占抚州，12日占建昌，16日占领了贵溪。这样，遥相呼应的东西两军的先锋部队便于7月1日在横峰会师，完成了打通浙赣线的目的。大本营于7月28日命令侵华军总司令在浙江省方面的作战終了以后要继续确保金华附近的要地，直到8月20日前后再撤回原驻地。攻占上述地区的各部队在占领地区停留了约两个月以后，于8月19日开始撤退；而于8月下旬各自返回了原驻地。在浙赣作战结束的同时，大本营关

于作为悬案的进攻重庆作战的考虑也成熟了，于是在9月3日下令侵华军开始作战准备。它的内容是：从9月起着手进行部分的作战准备，至于这一作战计划的实行，还有待于秋季对于全局有了明确了解以后再作最后决定。根据4月上旬大本营订出的作战纲要，这次作战预定在1943年春季开始，以约计十个师为基干的一个方面军由山西南部，以约计六个师为基干的另一路军由宜昌方面开始进攻，攻占重庆、成都及四川省的其他要地，作战期间估计需要五个月。

然而如上所述，美军在瓜达耳卡纳尔的反攻愈来愈趋于熾烈，太平洋战争的焦点已转移到南太平洋。大本营认识到瓜岛争夺的成败具有决定整个战局的重大意义，这才迫不得已地于12月10日向侵华军发出了停止进行进攻重庆作战准备的命令。

陆海两军战略上的矛盾

在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对于战争的结局作了如下的预测：

一、迅速粉碎英美荷在远东的根据地，从而确保日本的生存和安全，同时采取积极措施促使国民党政府屈服；和德意两国合作，首先制服英国，并迫使美国失去继续作战的意志。

二、极力防止作战对象的扩大，争取第三国向有利于战局方面发展（“关于结束对英美荷蒋战争的初步方案”，1941年11月决定）。

根据上述预测，可见日本对于美国并无有效手段可以迫使其停止战争，只是使日本长期处于不败之地，以及迫使中国和英国屈服，以使美国丧失继续作战的意志而已。而且日本在它所重视的制服英国的问题上，又完全依靠德意两国的力量，这就暴露了它对当时欧洲战局的发展下了错误的判断。

日本在开战后立即和德意两国約定不单独同敌方讲和。然而，在談判締結有关共同作战的新軍事协定时，德意两国却拒絕实行对英本土进攻和协助日本进行太平洋战争，这样，关于共同作战問題的談判从一开始便搁淺了。当日本进攻新加坡时曾經流傳英国提出和談建議的消息，而这只不过是一种謠言而已。（东乡茂德：《时代的一面》）就在这时，日本民間一部分人主張，日本应出面斡旋使苏德两国单独讲和，以使德国专力从事对英作战。这当然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而当同年3月駐苏大使佐藤尚武赴任时，陆军省軍事科长佐藤就曾經說道：“絕不希望对于苏德和談問題有所干預；也不希望除例行的外交事务以外，为謀求日苏关系新的开展进行工作。”（守島五郎：《苦悶的駐苏大使館》）由此可見，特别是陆军統帥部方面对德軍的夏季攻势是抱有期待的，他們梦想借此来解决北方問題。再根据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以迫使其屈服的强硬方針等等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作战計劃是根据对于第一阶段战果的过高估价而制訂的。尤其陆军方面，竟然主張在对南方第一阶段作战終了以后，在南方只保留少数兵力，——陆军省主張留二十一个連，但大本营认为太少而表示反对，——其他全部撤离，另一方面，計劃对侵华日軍增加五个师并充实关东軍，以便策应德軍进攻苏联和伺机进攻重庆。

对此，在对美决战中承担主力的海軍自然要表示異議。过去海軍的作战計劃是保卫日本領土；但是在太平洋战争中，它的作战任务則扩大为确保“大东亚共荣圈”的各个占領地，而处于劣势的日本海軍完成这个任务并非容易。日本在进攻珍珠港的战役中虽說得到了莫大的战果，但是在生产力方面美国占絕對优势，随着時間的推移，双方的兵力日趋悬殊，而由于防卫綫过于漫长，日本海軍的消耗也日益增大。根据这种情况，海軍首脑部认为必須速战速决，采用攻势使盟軍疲于奔命。因此，海軍在完成第一阶段的任

务以后,主張进攻澳大利亚和夏威夷。但是,对于这种大规模的向外进攻作战,抱有上述意图的陆军当然要表示反对。当时日本并没有足以调整和统一这种战略思想对立的统帅机构,其结果在实际作战中,陆海两军的问题只有随时妥协而不能得到彻底解决。例如进攻澳大利亚和夏威夷的作战计划,不得不改为以切断美澳间的联系为目的的攻占莫尔兹比和中途岛的战斗。然而,如上所述,前一作战由于珊瑚海海战的失败而遭到挫折,而在6月底进攻中途岛的海战中,日方又失掉新锐航空母舰的主力,这就构成了把战争的主动权让给美方的开端。日本统帅部当初预测美军的反攻将在1943年以后,但是很快地在同年8月,美军就对所罗门群岛的瓜达耳卡纳尔岛开始反攻了。

另一方面,陆军所期待的德军对苏攻势也未能获得预期的进展。1942年6月底德军开始进攻,到7、8月间虽然很快地包围了斯大林格勒,然而苏军坚守不移,结果在11月中反而把德军包围起来了。7月,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曾通过日本驻德大使大岛要求日本对苏开战,但遭到日方拒绝,仅仅同意在东方牵制苏军。翌年,即1943年2月2日,进攻斯大林格勒的由巴罗上元帅指挥的德军三十个师向苏军投降,苏德战局完全改观了。而1942年10月,英美两军在法属北非开始举行登陆作战,这也使得欧洲战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参看本书第4卷,第1章)

其次,为了建立长期不败的体系,必须确保船舶的运输力,以便向日本国内运输重要物资,扩大军需生产。但是在船只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作战和运输的要求发生矛盾,因此,解雇征用船只和重新征用船只这两个问题就成了企划院、陆海军省、统帅部之间发生对立的焦点。原定完成第一阶段作战计划以后,即解雇军部征用的船舶,使其运输重要物资,但是继第一阶段的作战以后,又要发动上述进攻作战,因此不能按原定计划实行解雇;更由于盟军反

攻瓜达耳卡納耳島的結果，又不得不实行大批征用。此外，由于遭到美方潜水艇的攻击，船只的损失也不在少数，而在瓜島战役中一次损失了大批船只，从而使得充分利用南洋资源进行軍需生产发生了困难。在如何使用船舶問題上的这种意見分歧，也同样沒有适当的机构加以圓滿解决，这就越发加深了陆海軍之間、以及企划院、陆海軍省、統帥部之間的矛盾。

如上所述，在 1942 年中，在期待德意胜利的問題上，在运回南洋物資以增强战力的問題上、在盟軍反攻的进度及其他問題上，日本方面的估計全部落空了。

第三节 东条独裁和翼贊政治体制

东条独裁的性质

发动和推行太平洋战争的权力，即所謂的“东条独裁”，究竟性质如何？它又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本来这种权力无非是在战争已經不可避免的局势下，作为現役軍人的东条陆相接任了首相和內相的职务，从而形成了以軍部势力为基础通过天皇制官僚机构发号施令的独裁体制。这种独裁体制排斥軍部以外的政治势力，或者使其从属于自己，以便保証一元化的推行战争的体制。因此，东条內閣是一个由唯东条首相之命是听的一批官僚构成的“事务官內閣”；对于天皇，則在与內大臣木戶合作下，不許除統帥府、政府等的負責官員以外任何人与之接近，防止軍部以外的政治势力的发展，即使皇族重臣也不例外。

开战以后，东条內閣立即以“間諜”嫌疑的名义把宮本百合子等左翼及反战思想家同时加以逮捕；接着，又从 12 月 16 日起召开第七十八次临时議會，制定了“对言論、出版、集会、結社等的临时取締法”。这个法律不仅将原来仅仅需要申报的集会、結社改为批

准制，而且，把已經成立的結社也改为必須重新呈請批准；关于言論、出版不仅禁止发售，还可以勒令完全停止发行。根据这个法令提出申請的五百多个社团中，有立宪养正会等大約半数遭到了禁止。当时既有政党、工会、农会等已被解散，所以除平野力三等领导的农地制度改革同盟稍有不同而外，一般取締的对象当然都是右翼团体。就連右翼团体也被认为是扰乱以軍部为中心的进行战争体制的步驟的存在而受到取締，这一点表現了这个时期的特点。

这种东条独裁，完全是以軍部为背景利用战争初期的胜利气氛，借口进行战争的必要而肆行暴力的宪兵統治。因此，即使在表面上，它也未能获得人民的自发的支持，从而它的基础也就不能不是脆弱的。由于这种情况，对于东条独裁所依靠的軍部内部、特别是陆海軍之間以及統帥部和軍政部門相互間的矛盾，“东条独裁”也是束手无策。对于資材及其他陆海軍平分秋色的不合理現象已經习以为常！对此試圖从政治上加以解决的措施，反而把这种矛盾集中到了东条个人身上。

“翼贊”选举

1942年4月，东条內閣利用开战初期的有利形势举行了“翼贊选举”。但在这次选举中明显地暴露出“东条独裁”的种种弱点。諷刺的是，这个时期的議員是在1937年以社会大众党取得大量議席为特征的大选中选出来的，他們在前一年任期已滿，因为新体制运动变质以后（参看本书第2章，第一节），政府恐怕举行大选会发生摩擦，所以把任期延长了一年。东条內閣在举行选举时为了避免引起“摩擦”，不仅加强了监督，而且还采取推荐候选人制度，召集了貴众两院、翼贊会、实业界、在乡軍人会、言論界等代表，委托他們筹組推荐候选人的組織。其結果，組成了以前首相、陸軍大将

阿部信行为会长的翼賛政治体制協議会；通过協議会及其支部的活动，推荐了四百六十六名候选人。但是，这个推荐制度是不彻底的，政府不得不一再表明，根据明治宪法的精神并不一定要选民投推荐票的票。这是沒有政治势力基础的官僚独裁的悲喜剧。協議会通告各支部作为推荐条件，各个支部至少要在候选人名单中增加一名新人；被推荐的候选人应具有当选的可能性。这一点反映出这个政府的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一方面要利用与既有政党不同的“嶄新”的人选来收攬民心；同时为使推荐的候选人能以多数当选，又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利用旧政党的势力。

在投票两周以前，《朝日新聞》举办了現地特派員座談会，标题是：“热情尚未高漲——不知如何体现翼賛理念”（《朝日新聞》1942年4月16日），人民的毫无热情暴露了“翼賛选举”的实质。由于“当局事先和候选人以及支持者举行会談，提出当局所希望的发言范围，使其“自肃自戒”从而加强了监督（《日本政治青年》第1輯），以致候选人只能主張积极支持政府的政策，把战争进行到底，使得論爭无从展开，候选者也都感到会場的寂寞无聊，报纸上刊载了许多近乎諷刺的竞选演讲会流产的消息。尽管如此，由于各地利用小学生、街道組織及其他各种各样手段强拉选民投票，結果使弃权者显然减少，全国投票率平均达到百分之八十三强。对于官方推荐的候选人，除行政官厅及新近按照中央集权原則实行改組的翼賛壯年团积极予以支持外，政府还挪用临时軍事費作为选举經費，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另一方面，未經推荐的候选人，特别是所謂自由主义者，遭到了殘酷的压迫。选举的結果，被推荐候选人当选三百八十二名，未經推荐者当选八十四名（包括斋藤隆夫）；被推荐者占当选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强。其次，从新旧人的区别来看，新当选者一百九十九名，連选連任者二百四十七名，曾任議員者二十名。新人虽占相当多数，但其結果仍和过去大同小异，

他們並沒有在旧政党的地方势力以外发展新的势力。如果說有何变化,那就仅仅是:“历来在选举中作为骨干分子进行活动的一些人,当时都被动员起来作为骨干分子从事于翼賛会或壮年团的所謂启蒙运动,以致不能再进行旧政党式的活动了。”(《朝日新聞》4月19日所載上述座談会記錄)換句話說,翼賛会和壮年团无非是寄生在属于旧政党势力范围的反动組織之中而已。

翼賛政治会和对国民的統制

大选以后,为了代替翼賛政治体制協議会,同样由政府邀請各界人士召开翼賛政治集結筹备会,并于5月20日正式成立了以阿部信行为会长的翼賛政治会。翼賛会是以貴族众議两院各十二名、各界人士五名共計二十九名总务通过會議制来进行工作的,但事实上是由前田米藏、大麻唯男等人主持的。关于創設翼賛政治会的目的,会长阿部曾在成立当时发表的广播演說中說道:“今后的議會必須与政府表里一体,积极努力,协助政府推行国政”,即与大政翼賛会一同形成政府的两翼,推行战时政策。所以,翼賛会包括了未被推荐的議員在內的貴众两院全部議員(受刑事起訴者除外),加上实业界、言論界代表,一共拥有會員一千三百人,从此,在議會中不再允許組織其他政治团体了。議會权力虽然集中在翼賛会里,但它不能設立地方支部,可以說是无根之木。随后在5月27日召开的議會,正如它的日程表——27日是開幕式,由首相、大藏相、外务相发表施政演說,陆海軍作战况报告;28日举行有关預算的全体會議和特別委員會,29日即举行閉幕式——所表明的,是一次議員們只是鼓掌贊成的“翼賛議會”而已,甚至一个被推荐議員也評論說:“虽然充滿着同心协力的精神和决意”,但是“在翼賛政治会院內机构的运用上,未免过于高明,……以致議事进行的情况令人感到电鈕按得太快,机器轉动得太快了。”(蜡山政道在5

月 31 日《朝日新聞》上发表的談話)

在議會力量进行改編的同时，大政翼贊会也进行了改組。作为新体制运动的核心組織而成立的大政翼贊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違背了一般人期待的官方御用机关。經過以后的历次改組，越来越加重了官僚色彩，在东条內閣成立后曾任“滿洲国”协和会領導人的安藤紀三郎中将就任副总裁之后，这种傾向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致成了專門驅使人民为战争服务的启蒙机关了。改組翼贊会的目的是为了沿着上述路綫更进一步地加强領導。一向作为翼贊会地方支部的外围团体，具有濃厚的革新分子自由結合性质的翼贊壯年团，在翼贊选举以前就被改組，并統一为翼贊会总裁領導下的中央集权的組織，在“翼贊选举”中起了行动队的作用。但是，它越是从事这种强有力的活动，就越发令人感到“壯年团既不是教育团体，也不是政治团体，而是个非驢非馬的組織”。(前述座談会，《朝日新聞》4 月 19 日)翼贊会于 6 月实行改組，过去由內务省、文部省、农林省、商工省等領導的国民組織及国民运动統統被置于翼贊会的領導之下。这就是說，产业报国会、商业报国会、农业报国联盟、海运报国会、大日本妇女会、大日本青少年团等組織都被統一到翼贊会的領導之下，而对村会和街道組織等，翼贊会也要派上工作人員，掌握它們的領導权；同时，改革选举、奖励儲蓄、節約物資、回收物資、推銷公債等运动也都由翼贊会来推动。这样，翼贊会在表面上已經成了統制人民的核心机关；但是实际上，它只是官僚、特別是听凭軍部任意摆布的不能自主的組織，只是給官僚統制起了掩护作用而已。

翼贊会的基层組織街道会、村会和街道小組为了有效地实施对国民的統制而采取的手段，是把这些組織充当生活必需品的配售机构，从而将每一个家庭紧密地束縛在它們的組織里。只要回忆一下当时編制配給卡片以及申請迁移等的許多繁杂手續就可以了

解到，政府是利用街道和自然村的反动組織，使其和基层組織結合起来，弥补了官僚統制的弱点。因此，在改組翼贊会来加强統一的官僚統制时，政府决定“在加强村会、街道会的‘自治’能力的同时，使其成为大政翼贊会領導下的組織，并考虑对它們进行必要的調整”(情报局：《大政翼贊会机能的革新》)，依然保持着作为行政輔助机关的机能。这些統制机构虽然对人民生活的各个細節都进行了严密的控制和監視，企图動員人民的全部力量来协助进行战争，但是并未能得到人民的积极协助。当时群众对街道小組和街道会怨声載道，就是最好的証明。并且也发生过小組长以停止配售来威胁群众一类的刑事案件。当时，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群众来信提到，小組实行配售应该根据人数計算，但是有不少小組根据戶数計算，因而发生了不公平的現象。群众虽然感到不滿，而又有所顾忌不便直言，因此要求公布詳細的配售准則，并建立起对街道小組及街道会的會計檢查制度。(《朝日新聞》6月5日，《鉄帚栏》)在开战一周年的国民运动中虽然提出了改正配售的运动，然而由于这种統制机构虽为人民所不滿，但同时又因为它是反动統治的有力支柱，所以解决这样問題是十分困难的。

組成翼贊政治会和加强大政翼贊会以后，翼政会为了尽量发展政治力量，采取了設立政务調查会以便通过与翼贊会打成一片来确保地方势力等許多措施。反之，翼贊会的情况，正如9月間召开的中央协力會議所作的决定——(一)振作精神，(二)增加生产，(三)实践战争生活，(四)加强国内体制——所表明的，越来越加深了作为行政輔助机关的性质。

大东亚省的成立

当东条內閣通过設立翼贊政治会、改組大政翼贊会来确立翼贊政治体制的时候，也正是日軍經過珊瑚海海战、中途島海战，在

作战上开始失利的时候。作为这种情况的一种反映，“东条独裁”也开始暴露出动搖的征兆。在这以前，陆军軍务局长武藤于1942年1月曾訪晤东乡外相和岡田启介大将，表示为了結束战争希望更換东条首相。4月間，佐藤賢了少将接替武藤担任軍务局长，从而东条派在陆军中央的地位被巩固了。这时，参謀本部的部分人員也有过希望任命专任陆相的呼声，但是所有这些都沒有在政局上面表現出来。然而，在战争第一阶段結束以后，发生了解雇船只的問題时，在联席會議上，文官方面特别是东乡外务相主張为了增加生产应按原議实行解雇，并提議利用当前时机謀求苏德讲和和解决中国問題等意見，而与主張利用开战初期的胜利进一步扩大战争的軍部开始发生了对立。在这一方面，首先成为政治問題而表面化了的是設立大东亚省的問題。設立大东亚省是从5、6月間开始計劃的，內容是将日本駐在“大东亚”地区（日本及其領土除外）的各个机关全部划归大东亚省統一指揮监督；对于“滿洲国”、中国、泰国、法属印度支那等地的問題，除“純外交”事务以外，一切划归大东亚省管轄。这个計劃的目的是動員“大东亚”地区的全部力量来进行战争，同时，对日本駐在中国的各个机构加以整頓裁并，特别是陆军主張大使司令官两位一体制，以便攫取实权。但是最后这一点，由于海軍反对，决定仍以文官充任大公使。

外务相东乡认为这种措施将打乱外交上的統一并有伤东亚各国的自尊心，不但一再引証“兴亚院”失敗的先例而加以反对，并且拒絕单独辞职，企图迫使东条內閣下台；但結果还是他本人于9月1日辞职了。樞密院也认为这个方案是把大东亚各国作为附属国看待而坚决加以反对，并要求将“純外交”——指外交礼节及簽訂条約的形式上的手續等——三字修改为“外交”，經過种种曲折以后，結果为了避免引起政变，终于批准了原案，大东亚省于11月1日宣告成立了。

对华新政策

在这期间，瓜达耳卡纳耳岛的攻守战激烈地展开，从11月起，日军的运输陷于十分困难，以至只能用潜水艇和驱逐舰继续运输汽油。12月31日，大本营会议决定派在瓜岛的部队实行“转进”（应读作“撤退”），并由2月1日至7日撤离，这样，日军终于败北了。和日方的预计相反，由于盟军的迅速反攻很快地扭转了战局。于是，以根据开战初期的胜利而决定的东条内阁的对内外政策也，不得不加以修改了。

在对外政策上，首先是表现在设立大东亚省问题上的以军部为中心的高压政策，不待大东亚省成立即开始修改，其第一个表现就是对华新政策。日本的对华政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就从以往的诱和政策进而采取了迫使中国屈服的强硬政策，并拟定了进攻重庆的计划，但实际上并没有早日解决中国问题的把握。面对上述美军的反攻，把六十万以上的兵力被牵制在中国战场上的陆军方面，要求修改对华政策的呼声日渐高涨，这也是必然的趋势。

另一个原因就是要求汪伪政权参加太平洋战争。这个要求是根据以下判断提出来的，即认为：“中国的民心日益反对日本，‘国民政府’（指汪伪政权——作者）日益削弱，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日本政府从以下的角度：（1）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加强对进行战争的协助，以便增强两国的综合战力（坚决不放弃从中国攫取铁、棉花等重要物资的方针）；（2）彻底加强“国民政府”，（指汪伪政权），加强“国民政府”的政治力，使其能够充分把握民心（12月17日大东亚相青木在联络会议上的发言），对上述要求进行研究，并于12月下旬的御前会议上决定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的对华根本方针”。根据这个方针，日方应极力避免对汪伪政权进行干涉，

并用交还租界、廢除治外法权等措施来加强其政治力,以便“消除重庆抗日的理由”,但实际上,正如“当前对华經濟政策是以更多地取得完成战争所必需的物资为主要目的”一語所表明的,这个方針的目的只是在“对进行战争的协助”的名义下进一步加强經濟掠夺而已。汪伪政权于次年——1943年1月9日,在与日本签订关于交还租界及廢除治外法权的协定的同时,发表声明参加太平洋战争。值得注意的是,几乎与此同时的1月11日及1月14日,美英两国和国民党政府之間也签订了廢除治外法权的条約。继这一对华新政策之后,日本又采取了对“大东亚”新政策,它的具体表现是1943年1月决定了容許緬甸“独立”的方針,以及5月末决定了“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綱”。

独裁制的加强

到了1942年冬天日本在瓜达耳卡納耳島攻守中显然要失敗的时候,翼贊政治体制也开始动搖了。翼贊政治会虽仍然繼續存在,但于同年10月,发生了該会所属議員二百六十名組成了一个旨在提高生产力、改編企业和整頓物资配售机构的“經濟議員联盟”,新当选議員成立“清新俱乐部”等新的事态,以致第八十一次議会上出現了与以往的临时議会有所不同的情况。在議程終了时,众議院議長岡田忠彥致辭說:“关于今后的政治革新,首相及国务大臣坦率大胆地許下了种种諾言。然而这些諾言将来是否会兌現,还有待于議員的监督。所以,虽然議会进入休会时期,但我們的任务并未結束”。这虽然是一种口头上的表示,却值得注意。第八十一次議会通过了包括二百七十亿日元临时軍費在內的四百七十四亿日元的庞大預算和八十九項法案。这些法案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把行政权进一步集中到首相手里,和进一步加强了政府的权限。这些是企图利用加强独裁的办法来解决随着战局趋于

不利而日益尖銳化的國內和国际間的各种矛盾,但是,这种努力已經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反抗。

首先,这次議會根据战时行政特例法大大地加强了首相的权限。这是一項和以敕令发布的“战时行政职权特例”互为表里的法令,它可以为了增加重要物資生产的目的排除現行法律的禁止事項或限制事項,并把领导生产的行政权集中到首相手里。值得注意的是东条首相在对該法进行審議时所作的答辯,他說:“現在出現了独裁政治这样一个名詞……东条个人仅仅是一个草莽之士而已。……只因我被賦与以总理大臣的重責,所以情况有所不同。只因仰承陛下的光輝我才有光彩。假如沒有陛下的光輝,我就等于一块頑石。这一点和被称为独裁者的欧洲諸公情况完全不同。”东条首相是想用天皇的信任和进行战争的需要来为自己集中权力作辯护的。这种集中权力是以他个人作为天皇制官僚的地位为根据的,同时也是东条內閣在政治上陷于絕境时为避开反对势力而采取的措施。与此同时,还通过了設置东京都、修改市鎮村制度、成立工商經濟会等法令,实行了地方制度和地方产业行政的中央集权化,加强了以上机构負責人員的官选制,从而縮小了市鎮村的权限。

其次,在这一次議會中成为問題的是对战时刑事特別法的修改。修改的內容是,把在前一年通常議会上成立的該法中“在战时,以攪乱国政为目的而杀人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的規定加以扩大,从新規定了对于“以攪乱国政为目的,显著地妨害治安,或施加暴行、威胁、或参与以至煽动騷扰及其他妨害治安的罪行”的惩治条款。而且关于国政二字,政府在回答議員质詢时作了如下的解釋:这就是指“国家的基本政治机构,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現實的基本政治机构和这一机构所采取的基本政策”,具体說来,就是指內閣制度、現內閣、現內閣的基本政策而言。例如,如果

有人宣傳應廢棄與中華民國之間的基本條約，而向它宣戰，即相當於“以攪亂國政為目的，顯著地妨害治安”的條款。（2月22日—24日司法省刑事局長野田的答辯）對於這種加強獨裁制度的作法，首先進行攻擊的是東方會的中野正剛、三田村武夫和建國會的赤尾敏等右翼方面的人們，他們對“官僚政治”進行了尖銳的指責。委員會的空氣傾向於否決或修正。由於翼政會幹部要使這一法案原案通過，眞崎勝次（海軍中將，眞崎甚三郎之弟）等九名委員實行辭職。最後由於首相聲明決不隨便援用，這項法案才算勉強獲得了原案通過。

翼贊會和翼政會合併問題

隨著戰局趨於絕望，東條內閣及其走狗翼贊會幹部受到了越來越嚴厲的非難，這種非難的具體表現就是在第八十一次議會前後出現的翼政會和翼贊會合併的問題。翼政會對於自己沒有地方組織，只是一個空架子而缺乏政治力的情況感到不滿，因此表示要與翼贊會合併，以便取得基層組織。對此，政府方面雖然已經在議會召開前表示，把這兩個組織加以合併，以便“發揮強大的政治力量的話，恐怕將要形成幕府式的政治，這種情況在我們日本是不能容許的”（《日本政治年報》第3輯），而加以反對，但是對於政府這種態度的不滿，依然作為政治上的暗流而牢固地存在著。為了擺脫這個危機，東條內閣和贊政會的改革都是不可避免的。

到了這個時期，以軍艦進行曲為前奏而播送出來的戰果已經不足以振奮人心了。由於對戰局的絕望，每當聽到在每次新聞時間里都要大吹大擂地宣傳新几內亞、所羅門島方面的若干戰果的廣播時，人們總是不禁感到“老是這一套”。而在《國民經濟週報》1943年3月6日的時評中有這樣一段話：“最近，到地方去特別令人感到的是，群眾看報的方式有了相當大的改變。……近來讀者不一定

为大字标题所吸引。仔细阅读内容的倾向加强了。譬如，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和从哈尔科夫、罗斯托夫撤退等消息，虽然用了小字标题，但大家总是聚精会神地仔细阅读，一定要了解它的内容实质，认为这类消息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对人民生活压力的加重，对于政府和军部的不信也越来越严重了。随着这种形势的发展，以大政翼赞会为中心的起着对行政辅助作用的“国民组织”，逐渐失去了统制人民的机能。在这种社会矛盾的迅速尖锐化的情况下要想继续统制国民，只有两个办法：或者是进而实行赤裸裸的刺刀统治，或者是建立起鼓励国民在某种程度上实行自主而引起统治阶级恐惧的组织。在对国民的统制方面，也必然要开始转变了。

第四节 战争经济矛盾的发展

战争经济的进展

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前日本战争经济的基础是极其薄弱的。推行战争经济所必需的重要物资贫乏、资本积累水平的低下——这些情况是不可能承担大规模的近代帝国主义战争的。然而，正是因为这种脆弱性，日本的垄断资本和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统治者，才企图通过战争经济来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和扩大殖民地统治而挑起了太平洋战争。日本统治者的打算是：贮存一些重要物资，在战争开始时采用“闪电式”袭击夺取南方各地区并确立自己的统治，从而早日结束战争。

但是，在开战当时日本的库存原料是极其少的。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调查，当时日本石油的贮存量是四千三百万桶，仅够使用一年左右；铁矾土是二十五万四千七百四十吨，按1941年的耗用量计算，仅够使用九个月。铁矿砂的库存量在不断减少，仅有四个月的储备；而碎铁也同样减少到四百四十六万八千吨。因此，

炼鋼設備虽然有了扩大,但由于原料不足,其中的三分之一不得不停止生产。日本的統治者們就以这样貧乏的原料庫存以及为此所限的水平极低的生产力而发动了近代的大消耗战。統治者們唯一的希望就是及早在南方建立統治,利用来自那些地方的供应来建立“自給自足”体制。太平洋战争从經濟方面看来,也是从这种“投机”思想出发而掀起的战争。

由于在战争第一年里对南方地区軍事占领的扩大,使日本統治者們产生了认为这种“投机”已經投中的幻想。日本从南方运回原油是从 1942 年春季开始的,到同年年底为止运回的数量达到了六百二十一万三千桶。此外,还有九百三十五万九千桶原油和石油制品在南方各地区作为軍用被消耗掉了。其次,庫存量仅够九个月使用的鉄矾土,在 1942 年度的进口量达到了四十五万零一百三十四吨的最高纪录。这些重要原料的获得提供了“光明”的前景。但是,从“共荣圈”內获得的这些原料,远远低于当初估計的为确立战争經濟基础所需要的数量,而与迅速增加的軍事需要相比較,其数量是微不足道的。石油的情况是这样:日“滿”“华”三个地区的炼制能力一共是年产量三千五百万桶,这个数量大約相当于一年的必要消費量,与此相比,来自南方的六百二十一万桶原油供应量确实太少了。当时日“滿”“华”的原油及人造石油产量也不过五百万桶,这就显然无法解决战争对石油的庞大需要,并造成庫存的逐步减少。鉄矾土的情况是: 1941 年 12 月开战前夕的庫存量是二十五万吨,尽管得到来自南方的供应,到次年(1942 年)年底已經减少到二十万零九千四百二十七吨了。这种对“南方資源”利用情况之所以不佳,是由于战争的破坏,和該地居民的反抗使恢复生产陷于停滞。

因此,作为战争經濟基础的重要基本工业的“划时代的发展”根本无从談起,生产情况反映出战争經濟的矛盾,出現了停滞以至

下降。开战头一年 1942 年度，除鋁的产量有了增加外，鋼鐵等的产量不过略有增加，煤的产量反而比前一年减少了。其中，鋼鐵产量低下，限制了战争經濟全面的发展。1941 年和 1942 年分別用掉了庫存的鉄矿石一百二十万零七千吨和一百二十万零六千吨，因而，到 1943 年末庫存量仅余二百六十万零五千吨，即使消費不增加，也不敷二年的需要。太平洋战争前的 1940 年日本进口了鉄矿石三百万吨，而在 1942 年中，仅由馬來亞和菲律宾运回了十五万吨而已。

重要原料的产量（单位：千吨）

年度 \ 品目	煤	焦炭 (1)	鉄矿石 (2)	生鉄 (3)	鋼錠	鋼材	矾土	鋁錠
1941	55,602	4,567	6,625	4,982	9,837	5,120	152	72
1942	54,178	4,773	7,669	5,184	7,099	5,166	226	103

(1)瓦斯及化学工业公司的制品除外；

(2)包括国产鉄砂、硫化矿渣及进口矿石；

(3)包括进口貨。

（摘自美国战略轰炸調查团报告書）

尽管基本工业生产出现了停滞和下降的趋势，但武器的生产，由 1941 年到 1942 年期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特别显著的是船舶、大炮和飞机。然而，船舶和飞机的增产是因为前一年(1941)的生产水平太低，因此所能保证的軍需生产总量，还不能满足日本作战的需要。并且，同年对軍火工业工厂设备的投資，实质上是减少了。据美国战略轰炸調查团的报告書的估計，1942 年日本对軍需工业的新投資，按 1940 年的价格計算，約为二十五亿日元，和前一年的二十八亿日元比較，减少了三亿日元。这是因为战时經濟的矛盾，不仅使民用工业縮小，而且使軍需工业也随之縮小了。然而，上述軍需生产的增长，在重要基本資材生产停滞的情况下，只

能通过把非軍需生产轉向軍需生产、甚至限制重要基本工业并且愈益加深由此引起的矛盾这种“恶性循环”的途径。据上述調查团的报告書統計,1942年日本非軍需工业投資,按照1940年价格計算为九亿日元,比1941年的十五亿日元銳減六亿日元。而在同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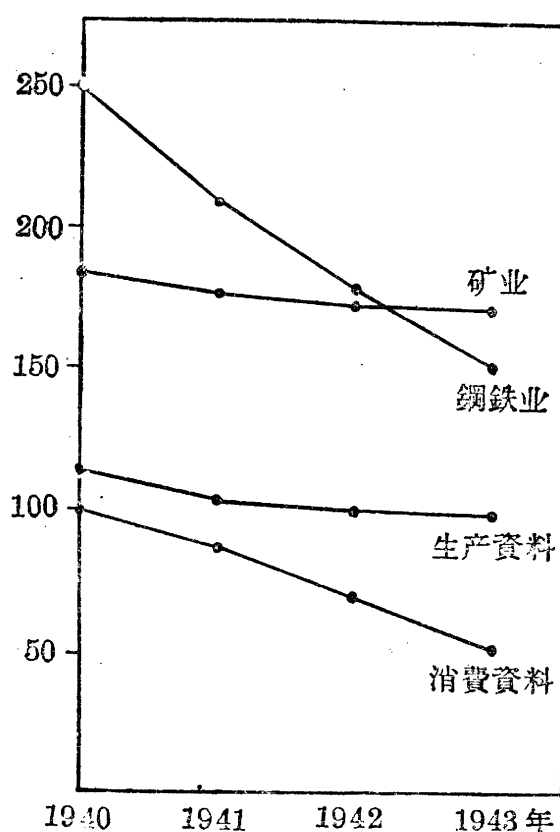
間,广大群众消費总額由二百六十亿日元減至二百三十八亿日元。在破坏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和民用工业的基础上进行的日本經濟的軍事动員,到这个时期竟至采取压迫基本工业,并吃掉庫存的办法来直接增加軍火的生产了。这样,为了摆脱战争經濟的崩潰和进一步攫取最大限度利潤而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在开战初期就已經踏上了經濟崩潰的道路。

尽管如此,日本的統治者,在开战初期的“乐观論”的支配之下,未能認識到这

种战争經濟的危机,只是口头上空喊“划时期的增加生产”,并未认真实行,譬如,从南方掠夺的石油、橡胶等物資,尽管庫存在减少,却无計劃地发放給了私营企业。

1942年底日本在战局上遇到“难关”以后,內部矛盾便异常迅速地发展了。同年8月美軍在瓜达耳卡納耳島登陆,使战局发生了轉变,此后,由于战斗以及美方潜水艇的襲击,船舶的损失日趋严

工矿业生产指数



(1935—1937年=100, 据国民經濟研究会調查)

重,被封鎖的危險急遽增長了。在 10 月和 11 月两个月里,船舶的損失达到四十八万二千吨,商船的保有量降低到开战当时的水平以下。由于飞机的損失越来越多和“制空面”的縮小,使各地越来越感到“战局逆轉”的危机。“划时期地增加飞机生产”,已經刻不容緩了。到 1942 年年底,不得不全面地修訂“物資动員計劃”及其他各种經濟計劃,以生产飞机和船舶为重点,广泛地使民需工业轉向軍需工业或縮小生产,加强对資金、器材和劳动力的統制并把它集中到重点工业。民用生产甚至被減低到維持生活所必需的限度以下,不仅不許对民用生产设备加以修补,而且还把現有机設

生活貧困化指数 (1937 年=100)

項目 年度	实际工資 (1)	主要生活物資每人每年平均消費指数 (2)				衣料纖維 維制品
		食 糖	肉 类	蔬 菜	紙	
1940	81	85.5	92.6	74.6	98.5	57.9
1941	84	76.9	66.9	76.9	97.2	62.3
1942	73	76.3	48.1	76.1	95.8	43.9
1943	74	58.6	51.9	78.2	76.3	36.3

(1)实际工資是根据总理府統計局調查、工厂工人每天平均工資和冲中恒幸所作现实物价指数算出的。

(2)主要物資消費量指数是根据經濟安定本部調查。

各工业部門利潤率的变化

年度 工业部門	1939年	1940年	1942年
紡織工业	10.6	12.1	16.1
机械制造工业	45.4	56.2	69.7
金属工业	—	—	24.5

(上杉正一郎調查,引自井上、宇佐美著
《危机中的日本資本主义》)

备大規模地轉用于重点工业。但是,这一切努力却碰到了資金、器材和劳动力的不足、特別是重型机器的不足、建筑用鋼材的不足、熟练工人的不足等困难。于是,就不得不进一步加强“集中化”,强制

調整企业，强制动员劳动力和彻底削减国民消费。其结果，1943年军火工业的投资，从前一年的二十五亿日元增至四十五亿日元（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调查，根据1940年的价格折合），其中百分之七十投于军需品即飞机、船舶、大炮等的生产设备。因此，垄断资本便在直接军需品工业部门进行了迅速的資金积累和攫取利润的集中化。企业利润总额不断增长，战前1937年是二亿一千万日元，1941年是四亿八千万日元，1942年是五亿三千万日元，1943年增至六亿三千万日元，这些利润通过军需工业集中于垄断资本的手中。与此同时，正如上表所示，实际工资降低了，消费物资的实际供应量减少了，贫富的差别也更为扩大了。

統制机构的改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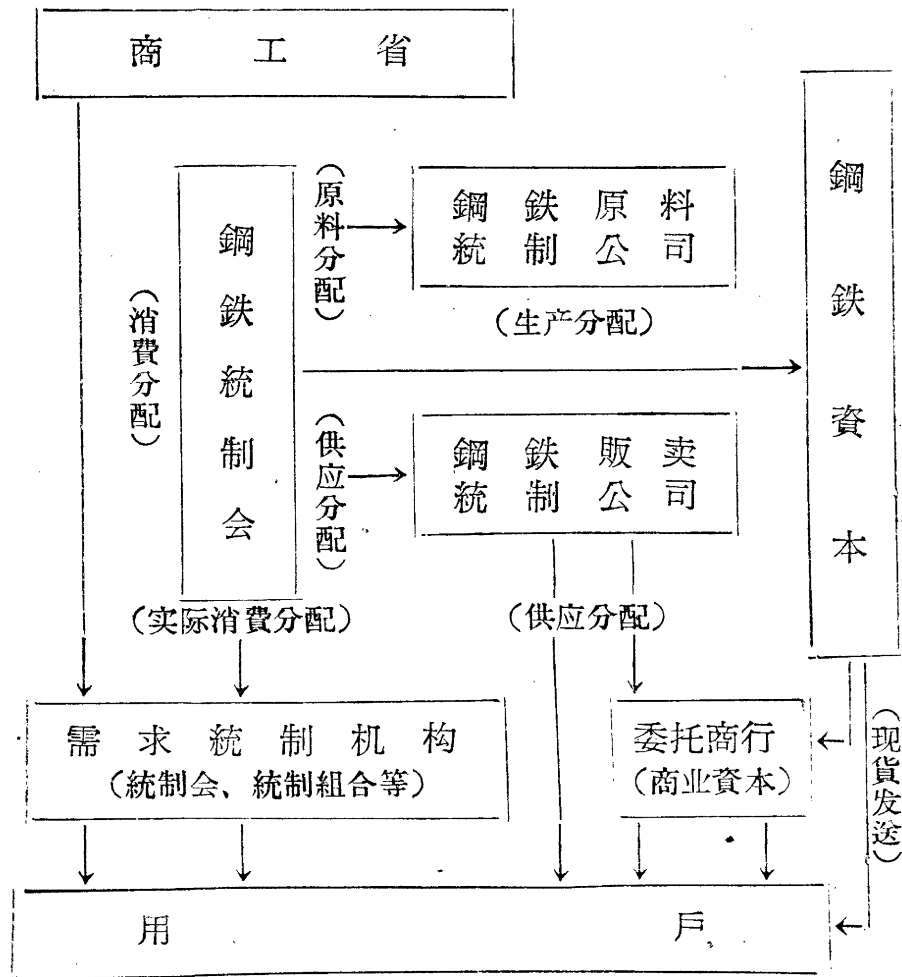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发展，作为垄断资本战时统治体制的“经济新体制”，也逐步加强了。“经济新体制”于1940年年底已经有了一份大纲即“经济新体制纲要”，但迟迟未曾实施。然而，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这个纲要得到迅速地、逐步地实施了。

首先，必须加强战争经济的資金动员体制，即战时财政和金融管理机构，以便能够一面应付不断发展的通货膨胀，一面从国民生产总值中，用牺牲广大群众利益的办法筹集军费和军需生产資金。政府根据前一年7月的“财政金融对策纲要”逐步地加强了管理金融的战时体制。战时金融管理体制是以作为中央银行的日本银行为中心进行了调整和扩充。这就是说，将政府所属各金融机关及一般银行统统组织到日本银行的统一领导之下，以日本银行的信贷为中心实现对战时金融的全面的组织化及其统制。这就是要通过这个机构来消化成为战费基础的公债，并适当地进行军需資金的筹措和分配工作，也可以说是为了利用“有统制的通货膨胀”进行上述工作的一次机构调整。政府在1942年2月24日

公布实施了“日本銀行法”，根据这项法令，日本銀行于5月1日进行了改組。这样一来，日本銀行不仅巩固了作为政府特殊机关和战时金融中心的地位，并通过最高发行限额制度的永久化建立了通貨管理制度，使通貨膨脹政策有了具体的制度作基础；同时还取得了作为“共荣圈”的中央銀行的地位，成为帝国主义統治的樞紐。4月18日又公布了“金融統制团体令”；5月23日，以日銀、营业別統制会、六特殊銀行、四金庫为會員，以日本銀行總裁結城为会长，設立了全国性的綜合統制机关金融統制会。这是以日本銀行为中心对全体金融机关实行統一管理的机构，是財政資本的战时統治体制。营业別統制会是按照普通、地方、儲蓄、信托等各种銀行、人寿保險、儲蓄、証券等各种公司、城市和地方信用合作社、劝农社等九种营业类型分別設立的。其目的在于把一切資金統統放在日本銀行統一管理下加以运用，把日本銀行的控制面扩大到所有金融机关。此外，同年4月又設立了战时金融金庫，其目的在于使一般銀行一面承担提供軍需資金时的危險，同时为軍需生产提供足够的資金。为了整理占領地区的軍票和建立殖民地的通貨制度，于3月30日設立了“南方开发金庫”。这是为了用“南方开发金庫券”回收以往为从占領地区筹集軍費和“开发”資金而发行的軍票，并为将来各地区設立中央銀行发行貨幣券从而建立通貨制度准备条件，这样，旨在掠夺南方殖民地的金融机构建立起来了。

作为壟断資本战时統治体制的卡特尔的統制机关，也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发展而有了迅速的发展。根据“重要产业团体令”所作关于成立第一批統制会的决定于1941年12月成立了矿山統制会（会长为日本矿业公司總經理伊藤文吉）、水泥統制会（会长为淺野水泥公司總經理淺野总一郎）、車輛統制会（会长为火車公司總經理长島要次郎）、汽車統制会（会长为內燃机汽車公司總經理鈴木重康），次年1月又成立了电器机械統制会（会长为安川电机公司

鋼鐵統制机构图（統制組織之一例）



鋼鐵統制协会是由日本国内鋼鐵企业三十七家、統制会二个、
“滿洲”的鋼鐵企业六家、进出口商一家共同組成的。

总經理安川第五郎)、产业机械統制会（会长为理研会长大河内正敏）、精密机械統制会（会长为大阪机械工业公司总經理原清明）、金属工业統制会（会长为古河电气工业公司董事鈴木元）、貿易統制会（会长为日本棉花公司总經理南乡三郎）、造船統制会（会长为三菱重工业公司总經理斯波孝四郎）等。8月4日又根据第二次决定,棉花、人造棉、生絲、人造絲、毛紡、麻紡、化工、輕金属、油脂、皮革、橡胶、鉄軌等部門也分別成立了統制会,而由各該部門壟断資本的代表分別担任会长。这样,就在主要产业部門实行了由

壟斷資本控制的卡特尔化，逐步充实了“統制”支配的机构。1942年2月18日又公布了“向統制会下放权限法”，根据这项法令，政府将对于各該产业部門原料分配和生产规划等广泛的統制权限下放給統制会。这项法令到1943年1月21日公布了施行規則以后才开始生效；根据这项法令，壟斷資本确立了对“統制”的支配权，并在此基础之上，他們在战争經濟的进展过程中越发加强了(1)資金、器材向壟斷資本的集中，和(2)强制中小資本調整企业，从而資本和生产的集中，随着战争經濟的进展越来越加剧了。同时，“統制”权向壟斷資本的轉移，使得对战争經濟矛盾的抵抗手段——“黑市交易”、“黑市利潤”以及隱匿这种利潤成为可能和容易了。“統制会”無論在外表上或内容实质上，都是专门从事扩大战争利潤的壟斷資本的战时統治形式。同年10月，又把与陆軍有关的航空机企业者集中起来成立了陆軍航空工业会，由三菱重工业公司董事长乡古洁担任会长；同时，海軍方面也同样地設立了海軍航空工业会，以往接受陆海軍直接訂貨的直接武器生产部門，也实行了壟斷資本的卡特尔化了。同年4月，作为对日益重要的海运的統制机关的“船舶运营会”也宣告成立，这些，一律都是为了在战争經濟中确保最大限度的利潤。

与这种战时卡特尔的成立和加强同时，还設立了对此起輔助作用的国家机关。这是对于以推行战争經濟为目的的壟斷資本实行統治的輔助性机构，是战时国家壟斷資本主义加强的具体表現。政府为了整頓企业，重点地加强軍需工业而回收閑置設備，于1941年12月設立了产业設備营团。当时，由于“扩大战时生产力”，重要产业有了急剧增长，但因为缺乏計劃，以致因原材料不足而造成許多机器設備停止工作，同时由于一般企业向軍需生产的集中化，在非軍需生产部門也产生了許多閑置設備，据兴业銀行的調查，未开工的設備总值为八十五亿日元，閑置設備为二十四亿日

元。这些未开工設備和閑置設備必須有計劃地集中地投入軍需工业；产业設備营团的任务就是收购这些閑置工厂設備、承包新軍需工厂的建設、对建造商船的撥款和收购商船等等。营团的資本为二亿日元，全部由政府出資，并被准許发行十倍于資本金的債券作为营业資金。这个机构的总裁是由壟断資本的代表藤原銀次郎充任，他的活动范围包括：将紡織工厂改为軍需工厂，建造船只并将其廉价卖给輪船公司，建設制造碱、工业盐、碳黑、人造橡胶等化学工业及炼制鋁、鋼等工厂，在“滿洲”、华北，广泛地經營企业（1942年末投資約七亿日元），以及掌握和調換价值九亿日元的閑置設備等等，这些措施对推行壟断資本的战争經濟，起了重要作用。这个营团的亏损达到二十亿日元，这笔款全部由政府补偿，这就等于政府付給壟断資本一笔补助金。

其次，重要物資的儲存及其适当有效的利用，在推行壟断資本的战时經濟上，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担当这项任务的是 1942 年 2 月設立的“重要物資管理营团”，它的資本金为二千万日元，全部由政府出資。这个营团的設立目的是管理庫存品和对来自南方地区的重要物資进行統一的統制。它首先在 1942 年 5 月与各統制会合作，开始收购剩余庫存品，同年 10 月被賦与强制收购权以后，它便进一步为推行战时經濟而把重要原料器材彻底向壟断資本加以集中了。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的一年中，进行了这种在壟断資本控制下的战时卡特化的改組以及建立了作为它的輔助机构的国家机关。但由于 1942 年年底战局的轉变和由此产生的加强軍需生产重点化的必要，对于这些“統制机构”又一次实行了調整和加强。在 1942 年 11 月 27 日的內閣會議上，決定設立一个以总理大臣为主席，包括企划院总裁及其他有关閣僚与官僚的临时增产委员会，并命令各地方設立地方各机构聯絡協議会作为这个机构的下級組

織，加强了中央和地方为一体的經濟支配机构；此外，于 1943 年 3 月，还公布了赋予政府以强大“命令权”的“战时行政特例法”。这些措施是为了使生产力集中到鋼鐵、煤、輕金属、船舶、飞机等五个重点工业而把强大的“命令权”給予了首相和閣員，但事实上，这些“命令”是由壟断資本发出的。因此，东条首相聘任一批壟断資本的代表为內閣顧問，其中包括鋼鐵統制会会长丰田貞次郎、产业机械統制会会长大河內正敏、产业設備营团总裁藤原銀次郎、日本銀行总裁結城丰太郎、三菱重工业公司總經理乡古洁、船舶运营会会长山下龟三郎、輕金属統制会会长兼昭和电气工业公司總經理鈴木忠治，这些人都是重工业壟断資本的健将。由这批人制定的“命令”，通过加强了的国家权力发布实行了。这是壟断資本更加直接地控制和进一步加强国家机关以及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重大发展。这种趋向进一步发展的結果，于同年年底設立了軍需省。

征用和整編企业

对劳动力的統制动员和軍事奴役式的管理，是“經濟新体制”的重要一面。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几年起，就逐步地建立了这种体制，职业介紹工作成了政府的工作，对劳动力的征用有了法律根据。并且，由于实行“勤劳手册制度”和“国民登記”的办法，工人完全被束縛于强制劳动之中。以往，政府采取了以家为对象限制劳动力移动的消极政策，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发展，进而采取了称为“劳务配置政策”的积极的强制劳动政策。1941 年 12 月公布“劳务供求調整令”，重要产业工人的解雇退職等都必须經過国民职业介紹所所长的批准，甚至包括小学毕业生在內的一切劳动力都要根据指示加以配置。1942 年 2 月又公布重要事业单位劳务管理令，廢除了重要产业部門有关劳动時間和工資的限制，可以由政府派遣的劳务官任意决定，这样，对劳动管理的加强就由通过法律

的間接統制变为直接統制了。統制劳动的最显著的表现——征用工人急剧增加,1939年为八百五十人,1941年为三十一万一千七百二十四人,到1942年竟然达到六十二万三千三百八十五人。这完全是对劳动的一种軍事奴役制。对被征者采用在宪兵和警官監視下的寄宿制度加以管理,利用刑罰和停止配售的威胁进行强迫劳动。这种不折不扣的軍事监牢式的强制劳动由于廢除了劳动時間和工資的限制,大大地加强了劳动强度,因而成了壟断資本家的战时利潤增长的巨大源泉。和这些征用工人一起被迫从事最殘酷的强制劳动的,还有殖民地人民和俘虏。他們主要是充当矿山工人;他們在宪兵和警察的关监閉和皮鞭的威胁和管理下,遭受着苛刻的劳动条件和加强劳动强度的折磨。随着走向太平洋战争,对殖民地工人的利用有了不断激增,朝鮮工人移往日本的人数,1941年为五万三千四百九十二人,1942年增加到十一万二千零七人,1943年增加到十二万二千二百三十七人。战争經濟是壟断資本追求最大利潤的工具;可是对工人來說,却意味着不折不扣的軍事監獄。

如上所述,統制的加强又推动了壟断資本对于中小資本的侵夺。这种情况,在国民生产总值沒有多大增长而要迅速扩大軍需工业的日本,表現得更为突出。这种对小企业的整理和向壟断資本的集中化,把非軍需工业改为軍需工业的所謂“企业調整”,在走向太平洋战争的过程中,为了扩大軍需生产的目的而逐步加强了。担当这项任务的是作为壟断資本的战时統治机构的上述“統制会”,而从事收购和銷售各种設備的則是产业設備营团。1942年5月,政府根据总動員法公布了“企业調整令”,对于調整企业,具备了法律上的强制力。接着又公布了“企业調整合并施行規則”,把广泛的工业部門列为整理的对象。根据这项法令,在1942年实行企业合并的有四百一十件,資本金达二十九亿日元,1943年有五百

七十件，資本金达七十八亿日元。其結果，油漆工厂由三百家减为六十家，水泥公司由二十家减为六家，玻璃工厂由八百家减为九十家，造船公司由二百三十四家减到十家，另外紡織工业由一千三百七十万紗錠被削減了百分之七十七，工厂数也减为十家了。其間，壟断資本則获得了資金和器材，将上述行业改为軍需生产和謀取战时利潤的場所，小資本的工厂被产业营团当作廢鉄来加以处理，企业者根据“征用制度”被送入了統制劳动的監獄。

公司合并件数的变化

行业 \ 年度	1940	1941	1942	1943
工业	90	185	204	289
纖維工业	13	51	36	31
金属工业	15	22	14	21
机械制造工业	19	52	55	114
化学工业	14	26	30	60
食品工业	5	6	15	12
零售业	4	6	5	7
杂品工业	20	22	49	44
矿业	9	14	11	6
其他	117	179	196	275
合計	216	378	411	570
(有限公司解散減資額单位百万日元)	(851)	(1,774)	(3,223)	(3,303)

(根据日本兴业銀行:《調查月报》)

战时生产的集中——按規模別工厂数目的变化

年度 \ 从业人数	五人以下	五人以上	十人以上	三十人以上	百人以上	五百人以上	千人以上	五人以上工厂总计
1939	569,827	75,147	44,888	13,181	3,693	473	380	137,767
1940	554,412	76,810	43,451	13,021	3,622	507	394	137,805
1941	550,619	76,358	43,412	12,407	3,451	452	377	136,457
1942	512,802	63,763	41,142	12,213	3,336	453	425	126,332

(根据《日本統計年鉴》)

其次,由于收买劳动力的必要,对于零售业者也强制地进行了整顿。1943 年前半期,仅东京一地就有一万一千家店舖被迫关门,从业員同样地被征去从事强制劳动。为了清理这些被“整理”的工商业者的资产和负债,設立了国民金融金庫。这个金庫在其为期一年半(1941 年 11 月—1943 年 6 月)的营业期間內,根据政府机关的指示,对于关闭企业的二十一万六千四百人发給了补偿金总计一亿八千五百万日元,每个企业平均只得到大約八百日元而已。而且,他們領到的这种补偿金的大部分,还要被迫儲蓄起来,从而变成为壟断資本的軍需工业資金。

財閥所属公司已繳資本按企业类别在全国資本中所占比率的变化
(只包括日本国内的公司)

	四大財閥在全国所占比率			九大財閥在全国所占比率		
	1937 (%)	1941 (%)	1946 (%)	1937 (%)	1941 (%)	1946 (%)
金融业	22.5	25.2	49.7	23.6	26.8	53.0
重工业	14.6	18.0	32.4	24.9	29.8	47.8
矿业	20.9	22.9	28.3	35.5	34.8	50.1
金属工业	9.2	12.3	25.8	14.7	22.8	41.1
机械制造	18.6	22.9	46.2	31.6	39.9	65.1
造船工业		1.7	5.0	9.5	1.7	47.8
化学工业	11.3	15.4	31.4	18.3	24.1	38.3
輕工业	7.0	7.5	10.7	13.5	13.3	16.3
其他	6.1	5.7	12.9	7.5	7.7	15.5
电力、煤气	3.0	4.3	0.5	3.6	7.3	0.5
陆运	5.4	2.4	4.9	6.4	4.0	5.6
海运	16.2	25.7	60.8	19.2	30.3	61.4
土地、建筑, 仓库各业	16.1	15.5	22.7	21.2	19.3	29.4
商业、貿易	5.3	2.7	13.6	6.4	3.5	20.2
合 計	10.4	12.0	24.5	15.1	18.5	34.5

(四大財閥指三井、三菱、住友、安田; 九大財閥指上述四大財閥加鮎川、浅野、古河、大仓、野村等財閥。摘自《日本財閥及其瓦解》)

在这样的企业整編过程中，非軍需部門的壟断資本，一方面对保留的非軍需生产实行了生产集中，同时还将殘余的資本轉入了軍需工业。紡織壟断資本大日本紡織公司、东洋紡織公司、钟淵紡織公司、富士瓦斯紡織公司、日清紡織公司等企业单位使一部分工厂繼續生产，而把其余部分改成了制造飞机等重点工业。对于这种改变企业，政府采取了保护政策，不仅将其紡織机等机械作为廢金属而加以高价收购(官价每吨八十一日元，收购时价格为一千三百五十四到一千八百十八日元)，而且保証提供信用貸款。企业整編意味着中小資本的破产；但另一方面，“財閥”壟断資本則利用这一措施将其非軍需生产部門改为軍需生产，并且充分地接受政府向軍需工业集中供应資金和資材、給予補貼及課稅上特別照顾等有利措施，力图利用战时条件来加速資本的积累和扩大利潤。总之，企业整編是壟断資本追求最大限度利潤的重要手段，壟断資本通过战时的統制机构——国家机关和战时卡特尔来实行这一整編，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和資本都迅速地向壟断資本集中了。

战时粮食政策的破产

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的日本的农业，在粮食农产品方面根本就不具备自給自足的能力。在落后的农业关系上实行增产运动和配給統制的必然結果，就是依靠进口稻米。这种情况在战局恶化以后，更形成了战争經濟的致命伤。

开战头一年的稻米供給估計量，包括来自朝鮮、台灣的稻米(約九百万石)在內共七千三百三十六万七千石，比需要量(八千零八十四万九千石)相差七百五十万石。以后，不足部分由于需要量的增加和朝鮮米的停止輸入，增至約一千万石。粮食不足問題，从开战头一年起就是采取了大部分依靠进口稻米，其余不足的部分依靠提前吃新米的办法勉强解决的。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稻谷的生产和流通的統制。根据“改正农会法”、“农地耕种統制規則”等已經开始的对生产的統制，由于“农业生产統制令”（1941年12月27日公布，1942年1月10日实行）而臻于完成。根据这项法令，从新規定农会會員以外的农户也負有共同作业和共同利用农业机械和牲畜的义务；由农会訂立生产計劃和統制农民轉业。流通部門根据由国家全面管理主要粮食及农产品的方針进行的統制，由于“粮食管理法”（1942年2月21日公布，同年7月1日实行）的頒布而宣告完成，随着中央、地方粮食营团的成立，从新筑起了推行低米价政策的堡垒。其次，对于“农业生产統制令”还附加制定了“农业生产申請規則”，使农业經營者、农业工人、农业机械和牲畜的所有者負有就其所持有生产手段和劳动力等等进行呈报的义务。

在国家統制这样不断加强的同时，农业用器材及劳动力的供应状况却日益恶化了。农业机械用鉄的分配量，减少到平时的百分之三十六（日本劝业銀行：《战时和战后农村經濟的变化》），由于缺乏石油和胶輪，动力机械逐渐陷于停止使用，甚至一般小农具的供应也感到不足。1942年化学肥料的消費量与1937年相比較，氮肥减为百分之七十一，磷肥减为百分之五十八，鉀肥則减少到百分之一一点二的水平。（經濟安定本部：《第一次經濟白皮书》）1942年1月底开始的“加倍堆肥生产运动”虽然部分地弥补了化学肥料供給的不足，但远远未能挽回施肥总量下降的趋势。

劳动力离乡的趋势，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枯竭、城市粮食供应情况的緊張化、实际工資的降低和劳动强度加强等原因，从1941年起虽逐渐有了緩和，但1942年仍有四十八万人流入城市，男子专业农民的人数比1941年减少了三十九万人，而且农业劳动力质量上的降低依然沒有停止。这种情况和軍事动員的进一步扩大（1944年为三百九十八万人，柯恩：《日本經濟的崩潰》）結合起

来,一方面加强了残余劳动力特别是老人、妇女、儿童的劳动强度,一方面提高了农业劳动的工资,给农业经营加上了新的压力。特别是在新“工资统制令”规定范围以外的农村雇农及日工的工资,在1941年11月,很多地方(北海道、东京横滨、东海道、京都大阪神户、濑户内海沿岸、北九州等地区)已经超过了矿山工人的法定最高工资(二·五日元),有时竟高达十日元。(《日本经济年报》第46辑)为了对此进行统制,于1942年2月3日颁布厚生省次官通令,规定了农业工人的最高、最低和标准工资。

每反水稻施肥量 (单位贯=3.75 公斤)

年 度	氮 肥			磷 肥			钾 肥		
	购入肥料	自积肥料	合计	购入肥料	自积肥料	合计	购入肥料	自积肥料	合计
1938	1.628 (100)	1.326 (100)	2.954 (100)	1.021 (100)	0.576 (100)	1.597 (100)	0.903 (100)	1.177 (100)	2.080 (100)
1939	1.628 (100)	1.326 (100)	2.954 (100)	1.021 (100)	0.576 (100)	1.597 (100)	0.903 (100)	1.177 (100)	2.080 (100)
1940	1.542 (95)	1.423 (107)	2.955 (100)	1.026 (108)	0.620 (108)	1.646 (105)	0.289 (32)	1.266 (108)	1.555 (75)
1941	1.412 (87)	1.509 (114)	2.921 (94)	0.875 (85)	0.661 (115)	1.537 (99)	0.384 (43)	1.348 (114)	1.732 (82)
1942	1.376 (84)	1.623 (122)	2.999 (101)	0.501 (49)	0.720 (125)	1.221 (77)	0.078 (9)	1.458 (124)	1.536 (73)
1943	1.279 (79)	0.703 (53)	2.682 (84)	0.431 (42)	0.760 (132)	1.191 (75)	0.038 (4)	1.534 (130)	1.572 (77)
1944	1.146 (70)	1.861 (140)	3.007 (102)	0.222 (22)	0.843 (146)	1.065 (67)	0.035 (4)	1.632 (139)	1.723 (83)
1945	0.300 (18)	1.861 (140)	2.161 (73)	0.070 (7)	0.843 (146)	0.913 (57)	0.021 (2)	1.688 (143)	1.709 (82)

(摘自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日本农业年报》I)

对于生产方面的这种不利条件的积累,“农业生产统制令”并未提供任何积极的解决办法,仍然是在利用原有的农业机构的基础上片面地加强农业劳动,因而使农业中的矛盾更加激化,反而

促使共同作业的粗放化以及老农和貧雇农发生脱离农业的倾向。这样,在科学方法上找不到出路的增产政策,就轉而求助于精神运动,結果,利用“农业报国联盟”、“内原训练所”、“地方修练农場”来训练“推进队”、“先锋队”一类的办法以及奴役性的增产运动,比以前加强了。1942年11月,农林大臣井野在帝国农会全体会议上发表的演說中說:“在建設皇国农村上面,我想必須揚弃以往从經濟观点进行领导的农业政策,改变施政方針,使它今后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精神运动的性质……。”(帝国农会:《农业年鉴》,1943年版)经过内原“农业增产报国推进队”训练出来的人员,包括1942年3月到1943年1月的第三批在内共約四万人(石原治良:《利用农事训练和团队組織的粮食增产》),这些人陆續分往各地方,成了推行精神运动的核心。

继续实行使矿工和休假士兵在农忙季节支援农村,特别是对学生儿童的勤劳动員,通过1942年10月1日以文部、农林两次官名义发布的通令,被进一步地加强了。而在最缺少劳动力的北海道,从这一年开始实行了农业学校学生的“义务劳动”制。

气象条件比较好的这一年(1942年),稻米实际收获量为六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石,与前五年平均产量比較,增加了約三百三十五万二千石。这个数量表示当时日本农业生产力的极限。然而,这个数量远远低于生产指标的七千一百六十三万九千石,当战况恶化因而被迫放弃依靠外米的时候,粮食危机已达到了一筹莫展的地步。因此,在同年11月26日召开的时局对策审議会粮食紧急委员会上再次决定了“粮食紧急对策事項”,内容包括:加强水田的复种、将种植旱稻、粟、玉蜀黍改种薯类和大豆、縮减果树园和茶园、增产自积肥料、裁并农业团体、加强共同作业等生产对策,以及降低碾米精度(只去一半糠麸)、提高小麦出粉率和米麦混合配售等消費政策。在对农业劳动的統制方面,实行对各种农业团体的中

央集权化，1943年3月，政府公布了“农业团体法”，把帝国农会、产业組合中央会、帝国畜产組合、全日本养蚕联合会、茶业組合中央會議所合并起来成立了中央农业会；改組全日本购买贩卖联合会、产业組合中央金庫成立了全国农业經濟会和农林中央金庫。另一方面，为了征购1942年产稻米的运动，从次年2月中旬起以大政翼贊会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个运动，到3月底为止，摊派了四千一百万石的繳售任务。这样，对各个部門都加强了統制，然而粮食的供应情况却越来越恶化了。稻谷的加工精度一再降低，从去七成糠麸降低到去五成，又从五成降至二成（1943年1月），从1943年起实行了包括小麦片、馬鈴薯、面条、硬餅干等的主食的“綜合配給”，并奖励恢复利用野果、杂草的“乡土食品”。这样，进口外米愈趋困难的1943年以后的粮食供应，只好用吃一部分杂粮和提前吃新粮等項办法来勉强維持其最低的水平。

本来，統治日本农业的封建制度构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性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它同时又必然地造成了日本农业生产水平的低下和使日本依賴进口外米，从而构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五节 战时的思想和文化

彻底統制言論

为了建立战争体制和驅使国民走向战争，对思想、文化方面也采取了激烈的强力措施。1940年8月，内务省計劃設立对各种出版业者統一的統制机关“日本出版文化协会”。表面理由是要克服书籍、杂志的配售机构的缺点，但实质上只是积极地通过分配紙張、干涉編輯出版内容等来建立为国策服务的統制原则，进而为合并或取消各种杂志創造了条件。日本出版文化协会的主要負

責人名单是这样：由內閣情报部长伊藤述史担任筹备委員長，民間方面以石川武美（主妇之友社）、赤尾好夫（欧文社）为中心，并包括金鋼石社（經濟杂志社——譯者）、三省堂、有斐閣等十八家出版社的代表。妇女杂志在战争中曾大量刊载了有关目的在于培养“后方的母亲”和“大陆的新娘子”的事迹，是和上述这批人物有关的。

在《鎮压言論史》（日本記者联盟編）一书的《昭和篇》里，把昭和初年至中日战争爆发这一阶段作为前期，其后为后期，阐述了前后两期鎮压言論的特征。据此，后期的特征是不仅彈压更加凶暴和更加有組織，而且干涉的魔手已經伸到編輯过程和經營組織方面，同时这种干涉在进行“指导”的名义下已經經常化了。除当局的統制以外，业者本身也进行了以互相监督为內容的“自主的統制”，其結果，新聞、杂志等出版物走向規格品化了，禁止发售的件数虽較中日战争爆发前为少，但統制范围大大擴張，竟至把广告也包括在內了。例如，1940年大阪府警察部曾就彻底取締在各种商品、书籍、电影等的宣傳广告中使用过分夸張刺激色情和荒誕不經的詞句发出一項通告，并列举以下实例說明禁止的范围，这就是：“专门宣傳性病药品的广告，今后一概不許登載”；并且“关于妇女药品、性激素剂的广告，如果标题文字和治疗项目流于浮夸，文字設計不够妥当，即不許刊载”，从这种滑稽透頂的“淨化整肅”方針出发，甚至对广告登載的位置等細節都作了詳細的規定。

同年10月，情报部扩大为情报局，吸收了一部分原来归陆海軍及內务省、外务省所管事項，設立五个部十五个科，进一步加强了建立“国内新体制”的活动。由情报部改組为情报局以后，原来由情报部每月召开一至两次的各出版社編輯負責人的“杂志、出版懇談会”，在陆海軍軍官及各情报官参加下繼續举行。在这里还进行“战况报告”，下达“禁止刊载事項”，并强迫刊登“官方稿件”，甚

至要求主要杂志事先提出編輯計劃和預定执笔人名单(1941年5月)。

不言而喻,对紙張的限制不仅因为物資不足,也是为了扼杀被认为对于进行战争有害或不必要的报刊。同时,对紙張供給的限制是結合整理企业同时进行的。根据日本文学报国会所編《文艺年鉴》(1943年版)有关杂志、出版界动态的記載,杂志的停刊、查封合并等現象是在逐年激增。这就是說,政府通过从内部直接干涉編輯內容、編輯人和执笔人,从外部限制用紙数量和整理企业的方式,实行了“統一言論”即鎮压言論的政策,当然,为了使这种干涉和鎮压“合理化”,政府也沒有忘記准备法律根据。具体例子是:1941年1月10日公布“新聞紙等刊載限制令”;同年2月27日成立“国防保安法”;同年12月18日公布“对言論、出版、集会、結社等的临时取締法”等等。在上述各項法令的条文中显明地表达了政府的意图,最直接的例子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次日——1941年12月9日,在情报局第二科召开的“懇談会”上由警保局图书課某事务官所宣讀的“禁止刊登事項”。茲将其中的一部分介紹如下:

对一般輿論的指导方針

一、強調这次对英美战争是为了維持帝国的生存和权威迫不得已而发动的战争。

二、論証敌国出于自私的目的企图独霸世界的野心是这次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

三、強調世界新秩序是从“八紘一字”的理想出发,而以使世界万国各得其所为目的。

具体的指导方針

一、鼓吹不仅战局向有利于我方发展;而且在战略上,我方也处于绝对优势(中略)。

二、特別需要在國民中間培養對英美的敵愾心。（中略）

三、培養進行持久戰的決心。

當前需要嚴重警惕的事項

一、曲解帝國發動戰爭的真意，誹謗帝國公正態度的言論。

二、曲解開戰的經過、誹謗政府及統帥府的措施的言論。

三、認為政府在開戰時曾經期待德意援助的論調。

四、認為政府與軍部之間有過意見分歧的論調。

五、反映國民不服從政府的指示、輿論不統一的論調。

六、宣傳在“中國”、“滿洲”及其他國外地區存在動搖不穩情況的言論。

七、對於助長國民反戰、厭戰情緒的論調，必須格外注意。

八、有助長反軍情緒傾向的論調。

九、足以助長和平氣氛、瓦解國民士氣的言論。

十、足以擾亂後方治安的一切言論。

此外，在同一天里又根據同一精神公布了關於南方問題、對蘇關係和對“軸心國”關係的禁止刊登事項。

只有通過了以上這些禁止刊登事項的羅網的消息，才能傳到國民的耳目。但是，政府之所以不得不這樣極端限制刊登範圍，從另一方面說來也是表明當時在地下仍然有不肯向權力出賣靈魂的人們在進行活動。

為國策服務的文化運動

迎合政府的統制的文化運動就是“為國策服務”的文化運動。文藝家協會和到前綫從軍的“筆杆部隊”相配合，廣泛地開展了“後方文藝運動”。為了介紹這個運動的一斑，茲從《文藝年鑑》中摘引如下的一段：

“後方文藝運動北海道組於8月23日从上野車站出發，先後訪問了函

館、小樽、札幌、旭川、室蘭等地。講演人及講題是：石川達三（《日本性格》）、片岡鉄兵（《精神侵略》）、白井喬二（《關於戰時國民性問題》）、吉川英治（《談談思想準備》）、松井翠聲（《時局漫談》）等五人。24日到達函館，會見全北海道新聞記者。當天夜晚，在新川小學舉行講演，聽眾二千人。25日到達小樽，在寓所接見北方文化協會會員。這天晚上，在商工會議所舉行講演會，聽眾七百人。26日到達札幌，白天全體人員出席北方文化協會的歡迎會，該晚在市公會堂舉行講演，聽眾二千人。27日，出席札幌北海道時報社的歡迎午餐會，會後，即出席在鐵道局集會所舉行的講演會，吉川英治以《科學文化與精神文化》為題發表演說，給鐵道從業員留下深刻的印象。這天夜里，又出席了札幌鐵道局長吉松喬的歡迎晚餐會。28日到達旭川，下午到軍醫院進行慰問，晚間在中央小學舉行講演，聽眾二千人。29日到達室蘭，當天夜里在女子小學舉行講演，聽眾二千人。在登別溫泉逗留一夜，於31日全體人員安返東京。”

從以上的記載可以了解，這一運動的影響是非常廣泛的。根據記載，參加這個運動的聽眾總數達到十萬六千餘人，從這裡可以想見它給地方群眾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農村文化學會也在全國農村開展了灌輸文化和復興鄉土藝術的運動。當然，這個運動不是為了農民的解放，而是把農民當作了有力的兵源，正如由這個協會作詞作曲並極力加以推廣的“農民報國之歌”所清楚表明的那樣。這個運動借助於國家的力量，採取巡迴放映電影、巡迴演劇的形式，將歌頌戰爭的文化甚至帶到了窮鄉僻壤和孤島漁村。不論在城市或者鄉村，對群眾具有強烈感染力的“浪曲”，就其性質說來，是最適用於宣傳國策的有力工具。1940年9月，內閣情報局曾出面動員“日本浪曲協會”和“浪曲親交會”進行合作，——還得到了“經國文藝會”的主動參加，——使其擔當了精神運動的一個方面，產生了所謂的“愛國浪曲”。同時還動員了菊池寬，久米正雄，佐藤春夫等作家根據內務省、陸海軍部及日本紅十字會等所提供的材料創作唱詞，使東西浪曲家進行競賽演出。就這樣，在各個部門都建立起了宣傳國策的機構。在此以

前，警視庁看到“新协剧团”和“新筑地剧团”的演剧运动的中心目标仍然是宣傳社会主义思想，对一般人民的影响很大，就在1940年8月勒令解散，而代之以提倡国民演剧，使剧团采用情报局所許可和推荐的御用脚本，为宣傳增加生产和普及軍国主义思想服务。

1940年正是“皇紀二千六百年”，因而被认为統制国民思想的絕好机会。已經成为御用新聞的各大报社，一律举行“建国二千六百年事业紀念”。它們除在橿原神宮修建建国会館、八紘寮、橿原文庫、野外讲堂、弓道場、大和历史館、相模道場等以外，同时还为青少年进行鍛炼修建了“生駒山道場”(以上朝日新聞社)；或者征集二千六百年贊歌百人一首，献給橿原神宮(讀卖新聞社)；或者組織祭祀神武天皇的全国一百九十九个神社的升格运动和捐献劳軍“宣撫”用放映机运动(报知新聞社)；或者推举东久邇宮为总裁，举办了“光輝的技术博覽会”(以上大阪毎日、东京日日新聞社)。另外，日本广播协会还募选了《庆祝紀元二千六百年歌》。

另一方面，以狂热的皇道主义者蓑田胸喜、三井甲之等的原理日本社为中心，进行了为“皇紀二千六百年”寻找理論根据的“学术研究”。这个团体的机关杂志《原理日本》(第15卷11期，1939年12月)的临时增刊号上刊载了题为：“庆祝‘皇紀二千六百年’前夕学术界空前的不幸事件！”“津田左右吉的大逆思想”的文章，企图抹杀津田左右吉在古代史研究上所取得的科学的成就。津田在《神代史研究》、《日本上古史研究》、《古事記及日本书紀研究》、《上古日本的社会及思想》(均由岩波书店出版)等著述中所作的实証的比較研究，是迄今日本历史学界的最高成就，而“原理日本”却指控它是褻瀆皇室尊严的大逆思想。自从美濃部博士的“天皇机关說事件”起一貫地走在檢查机关的前面为鎮压科学研究而卖力的《原理日本》的控訴，在津田的問題上也奏了效，次年——1940年

3月8日，东京地方検事局以違反出版法为理由，对出版者岩波茂雄和津田博士提起公诉。这一事件清楚地說明了随着中日战争的发展，一切科学的、良心的学术研究逐步被剝夺合法地位的当时的情况。

为了适应新体制，詩坛的統一組織“日本詩人协会”、西洋画坛的統一組織“美术家团体联盟”、雕刻家的統一組織“雕刻家悬談会”等相继成立了。在文坛上，“經国文艺会”的佐藤春夫、国防文艺联盟的戸川貞雄、大陆开拓文艺悬談会的福田清人、“日本笔会”的中島健藏、农民文学悬談会的間宮茂輔、文学建設的海音寺潮五郎、文艺家协会的木木高太郎、幽默作家俱乐部的辰野九紫等联合起来組成“日本文艺中央会”，分別在各自領域內，开始了配合国策的准备工作，这是进而发展为文学报国会的前奏。

在这种气氛中，泛濫着上意下达、下意上达的濫調。在俳句界（俳句为日本的一种短詩——譯者），原有以高濱虛子为領袖的傳統派，以荻原井泉水、中塚一碧楼为首的自由律派和新兴俳句派三个派別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在內閣情报部的动員下，以上各派結束了分立状态，成立了“日本俳句作家协会”。另外，对儿童文化团体也进行了合并，在政府的推动下，由島崎藤村、山本有三、百田宗治、坪田讓治、小川未明、城戸幡太郎等深切关怀儿童文化的作家、画家、教育家、玩具业者、出版业者等成立了“大日本儿童文化协会”。

不仅东京是如此，在地方上，翼贊会文化部也展开了工作，相继成立了：神奈川县翼贊文化联盟（由久米正雄領導）、九州文化学会（由火野葦平等領導）、山梨文化联盟、广島文化协会、山形县文化协会（由結城哀草果等領導）、八王子文化联盟（由瀧井孝作、太田水穂、小島善太郎領導）。这些团体的領導者并不限于艺术家，还有医生、教师、农村領袖等参加。

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科学动员协会编制了全国科学工作者的“户口册”，成立了为战争服务的科学技术动员组织。其初步措施是分发给官、公、私立研究所等所属人员登记卡，调查他们的学历、研究范围和专题及其他有关情况，根据全国科学工作者的研究系统，编成金字塔型的阵容，建立起随时可以承担军部需要的体制。

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这个趋向有了更加迅速的发展。1941年12月24日召开“文学者爱国大会”，接着在次年6月18日在日比谷公会堂成立了社团法人日本文学报国会。在成立仪式上，在新近成为会员的文学工作者二千余人，以及友好团体、出版文化协会、东京各大学的文科学生等参加之下，推选德富猪一郎为会长，随后八个部会的代表即小说部会（菊池宽）、短歌部会（太田水穗）、评论随笔部会（河上彻太郎）、俳句部会（深川正一郎）、外国文学部会（茅野萧萧）、本国文学部会（桥本进吉）、诗部会（尾崎喜八）、戏剧文学部会（武者小路实笃）分别宣了誓。之后，以此文学报国会为中心，从1942年11月3日起在东京召开了为期三天的“大东亚文学家大会”，文学家为战争服务，达到了最高潮。这个大会的目的是使“东亚共荣圈”各地的文学工作者齐集一堂，交流思想，开怀畅叙，大会依次讨论并通过了：“建立大东亚精神”、“大东亚精神的加强和普及”、“通过文学促使思想文化融合的方法”、“文学为完成大东亚战争服务的方法”等项决议。

这个时期的电影，以战况新闻影片最为流行，这种影片大大地被当局用来鼓舞国民的士气。特别是拍摄了太平洋战争开始后迅速进攻场面的镜头，在把亲人送往战场并关怀其安危的国民中间，受到了异常的期待与欢迎。“马来亚战记”、“进攻的记录”、“昭南岛（新加坡）的诞生”、“缅甸战记”、“东洋的凯歌”、“帝国海军胜利的记录”等一连串的长篇战争记录电影相继出现了。一般影片

方面有：文部省推荐的“元祿忠臣藏”、“母子草”、“父亲在时”、“將軍、參謀和士兵”、“南海的花束”、“独眼龙政宗”、“夏威夷、馬來亞海战記”、“英国的末日”等。这些影片不是以战争为题材就是以后方家庭生活为题材，大都质量低劣；据说，“夏威夷、馬來亞海战記”因为是在太平洋战争一周年的十二月开始放映，所以上演的成績是很大的。

获得 1942 年朝日文化奖的有：藤田嗣治的战争画“新加坡的末日”、中村研一的战争画“哥打巴魯”（日軍在馬來半島的登陸地点）、信时洁为《到海洋上》的作曲、岩田丰雄的小說《海軍》等作品。其中在《朝日新聞》上連載过的《海軍》是以参加进攻珍珠港的“九軍神”为主角的作品，在創作上受到海軍的援助，由于軍部和情报局的推荐获得了大量的讀者。

屹立在暴風雨中

在这种形势下，正宗白鳥曾說：以往閱讀杂志时，总认为現在不是讀小說的年月而根本不想看小說部分，只是翻閱有关政治、外交、經濟的論文，以便了解國內外的真实情况。但是在今天却使人感到“堂堂的政治評論好象空話一般地从脑子里烟消云散”；质量不高的小說反而能够仔細周詳地反映现实生活情况而引人入胜。（《杂記簿》，見《改造》杂志 1940 年 9 月号）这种說法本身就是对上述形势的一种抵抗。白鳥还談到言論不自由的問題，他說：即使在德川封建制度的殘酷压制言論的情况下，正如“人口难封”的諺語所表明，一般民众仍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吐露自己的感情，对社会进行了批評。可以想象，当时的历史家和剧作家也不会不去运用适当的手法来表达他們对于人生、对于社会的批評。他还說，“在現代，无疑也是如此，如同妇女們总是躲躲藏藏地喜好华美地裝飾打扮那样，不甘沉默的評論家、喜好自我表現的文学家，似乎也在

拐弯抹角地发表自己的意見。只看表面現象就认为万事大吉的看法，也許还是幼稚的。”因此，“那些檢查人員，要想从每个人的文章里看出作者的真實思想活动，如果不是具有基督教所說的那种上帝的智慧，是不可能的。”这样，白鳥运用文字的表现技巧公然发表了反对鎮压言論的意見。他說：不但檢查人員不能理解作者的真意，而且讀者也不能了解，其結果，就成了作者的自言自語，这种情况，对写文章的人而言，实在是难以忍受的。当然也有写文章留待后世評論的說法，但是沒有比今天更使人深切地感到这种說法是空虛的了。他接着說道：“人从幼小时起花了許多功夫学会了語言，总想加以利用。即使象英文之类經多年努力学会的外文，人們也都想使用。何况自己本国的語言，总想尽量把它加以利用，这應該說是人的常情吧。”

对言論的鎮压是严厉的。然而，正如白鳥所指出的，文化界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伪装进行了抵抗。因为不准发展非法的抵抗組織，文化人士无从参加这类組織，从而他們的活動也就不能不局限于合法的範圍以內，于是，这种抵抗就不能成为有組織的运动而向前发展，以致沒有出現可以称为抵抗文学的文学作品。总之，这种抵抗只能以主观的抵抗而告終，並沒有形成客观的力量。战后出版的神山茂夫的《关于天皇制的理論問題》及其他一系列理論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在1939年至1940年期間写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作在地下党組織的保卫下，經過油印在人們中間互相傳閱。宮本百合子在其战后出版的选集的后記里写道：“《晨风》这部作品，因为作者无法将充滿胸中的思想感情自由地表达出来，簡直如同从被堵塞的口角流露出来的声音一样。也可以說这是只見嘴唇动但听不到声音的作品。在周圍有形无形的压迫下，也只能产生这种殘缺不全的作品。由于处在这种情况下而使作品受到歪曲的，不止我一个人而已。”她又說：“今天重讀我的文章，觉得随着日本战争

的进行,我的文章越来越变为含糊不清的声音了。想說的意思,應該使用的語言,或者被模糊了,或者停留在暗示的程度”。但是,这位女作家从1938年1月至1939年初以及1941年以后先后遭到禁止执笔,因此,在战争期間能够发表上述那样作品的時間,也不过是短短的一年半而已。尽管如此,宫本百合子在这个时期的文学活动是非常积极的。她出版了《向往明天的精神》、《文学的道路》、《我們的生活》等評論集;《朝风》、《三月的第四个星期天》等小說集。这些作品都是“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阴暗沉悶的日子里的理性和良心的火把”。(藏原惟人:《小林多喜二与宫本百合子》)在短篇小說《三月的第四个星期天》(1940年4月出版)里,作者深入到表面上被称为产业战士而受到奉承的青年工人的生活内部,描繪了他們因为战争的緣故而更加苦痛不堪的矛盾和不安。这与窪川(佐多)稻子在描写少年工人的自豪和美梦遭到无情摧殘的阴暗现实的作品《梦想的远景》,有着一脉相通之处。在不能公开反对战争的情况下,能够真实地描繪出这种现实的矛盾和黑暗,可以說是最有力的抵抗。在这个时代里,能够耐心細致地描写人們不理睬战争、和战争不发生关系那一方面的喜怒哀乐,特別是充滿苦难的大众生活的真相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抵抗。在这个时代里,不为战争服务,不把战争理想化的,就被扣上“非协力者”的帽子而受到歧視;以“日本浪漫派”为主的倾向于贊美战争的浪漫派占着統治地位,大肆鼓吹动員国民参加战争的国民文学。高見順的《文学非力論》(1941年6月)就是对于这种傾向的一种抵抗,属于这种抵抗的,还有密切联系实际追求现实的散文精神的倡导者广津和郎的《市井的历史》(1941年1月)以及野口富士男的《风的系譜》(1940年4月)、織田作之助的《夫妇善哉》(1940年7月)等一系列的小說。这些小說引人注意之点在于:各都以女性为主人公描繪出她們虽然一再遭到摧殘打击,但仍然从苦难的深渊里勇敢地站起来,

开辟着自己的前途那种坚韧的生活力。壶井荣的《日历》(1940年2月)也是这类作品之一,貫串于这个作品中的劳动人民健康的感情和明朗的性格,对于孤立 in 阴暗角落里进行抵抗的人们,是一种强有力的鼓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則一貫沈湎于文学的世界里,探索内心的悲伤叹息和得不到健康生活的苦恼,并把自己独有的精神世界展示給讀者的堀辰雄的《菜穗子》(1941年3月)等作品,也应该看作一种文学的抵抗。与宫本百合子并肩前进、在这个时期合法的文化运动中进行了最积极抵抗的是高仓輝。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至战争末期以《青铜时代》、《日本語》等为题出版的一些作品和評論中,对于日本的封建制度、民族的神秘化、非理性主义等进行了毫不容情的批判。当然,为了进行这种批判,需要在文字上运用很大技巧。但是,他在这个时期所以能够进行这种批判,是因为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的,这就是:并不反对战争本身,而是为了进行战争也必须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这种作法,作为对战争的一种反抗来说是后退了一步;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明确地指出了在战争过程中战争主持者中间的矛盾必然地尖锐化,以及尽管在战争期间,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的规律仍然在起作用,这样的重要事实。这种动向,也可以从风早八十二、大河内一男等关于生产力的理论著述中明显地看到。为了进行战争,需要扩大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建设高度的“国防”国家。为满足这种需要,战争主持者们首先是镇压工人运动,并在“牺牲”和“服务”的美丽词句掩盖下加强劳动强度。对此,大河内和风早主张,必须合理地保护产业劳动力,并且对劳动力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才能求得生产力的发展。

石本統吉的《雪国》(1939年)、今泉善珠的《火车头C57》(1940年)、《一个保姆的记录》(1941年)等文艺影片说明了,日本军事生产所引起的生产力的增长是在如何苛刻地加强劳动强度和牺牲工

人的情況下實現的。

高倉輝描繪主張“尊王者必須為百姓而犧牲，不然就不成為尊王”的大原幽學的一生的《大原幽學》，是一部具有積極意義的文學作品。曾經中斷了撰寫《路旁之石》（他在这本小說中想描寫一個受到福澤諭吉“天不生人上人，也不生人下人”的思想影響的、出身於赤貧家庭堅持要克服一切苦難勇敢地活下去的不知名人物戰鬥的一生）而另行發表了《折筆》一文的山本有三，也鮮明地採取了抵抗的態度。在這個時期，新起的評論家岩上順一的著作算是很突出的（著有《歷史文學論》）；窪川鶴次郎則力圖埋頭於文學理論工作（著有《再論現代文學》）；中野重治的《讀齋藤茂吉筆記》，是在1940年至1941年的黑暗時代里傾注全部熱情描寫出追求真實精神的作品。然而，1941年1月，政府禁止了左翼作家進行寫作，其結果，德田秋聲的自然主義文學的最後一部作品《縮影》（連載於《都新聞》），被迫中斷（1941年9月），就連丹羽文雄的《中年》之類的作品也被禁止發售了。

在發動太平洋戰爭以後，政府立即把進步的文化界人士加以逮捕拘押，施行了無法形容的暴行。這既不屬於何者可談何者不可談的問題；也不屬於僅僅用鎮壓言論一詞所能表現的事件。當時，每個文化界人士心裡雖然都懷有難以形容的憤怒，然而沒有能夠作任何有組織的抵抗。開戰的次年，就連中島健藏、三木清、清水几太郎等自由主義思想家也被政府征用派往前線去了。不論任何人，如果不為戰爭服務，則不僅不許發言，而且還要被強迫為戰爭服務，如果還不表示願為戰爭服務，就要受到有形無形的迫害。所以，在當時保持沉默就已經是最大的抵抗了。在已經看不到象樣的文學作品的當時，只有中島敦的《光和風和夢》（1942年8月）、《李陵》（1943年7月）、谷崎潤一郎的《細雪》（連載於《婦女公論》）等少數作品，可說是從戰爭中保護了文學。然而就連這部《細雪》

也仅仅連載了两次就被禁止刊載了。不久，由中央公論社出版的連載这部小說的《妇女公論》杂志也被禁止发售（1943年2月），为了《妇女公論》本身能够繼續发行，杂志社也只好“自肃”地停止刊載这部作品。虽然如此，潤一郎仍繼續撰写这部小說，而在1944年完成了上卷，作为私人印刷品印制了二百本分送給朋友閱讀。对此，有人认为这不是艺术的抵抗而是一种逃避（中村眞一郎：《艺术的抵抗派》），然而，这种作法也未尝不是企图从激烈的战争中保卫文学的一种表现。这种看法也适用于永井荷风的情况：他也是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机会，受到种种迫害，被战火燒毀了住宅而不得不輾轉迁移，就在这种生活里，他仍然坚持創作了《浮沉》、《舞女》、《勳章》、《不問自答》等日本投降后立即发表的許多作品。

战争主持者将写作活动（不管发表或未发表）和相互間的启发运动（朋友間的談話、通訊、不定期集会、书籍借貸等）都納入了治安維持法的适用范围以内。这就表明，甚至在往年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中只能算是微不足道的这类抵抗，現在也构成了犯罪；而从“犯罪者”方面來說，即使作这样的瑣事也必须考虑到被判处死刑的問題。荒正人曾說过：如果仅从表面上看問題而拿昭和初年的坚强抵抗和太平洋战争中的无力抵抗进行比較的話，“就要被认为脱离历史的錯誤观点”；并主張“必須更深入到思想内部，从进行这种抵抗的主观方面来进行估价”。（《近代文学》，1948年2月）由大井广介、小熊秀雄、坂口安吾、杉山英树、平野謙、荒正人、佐佐木基一主办并且有小田切秀雄、本多秋五、岩上順一等人撰稿的《現代文学》杂志，以及由花田清輝、中野秀人、小野三郎等人办的《文化組織》杂志，由中村光夫、西村孝次、吉田健一、平野仁启、斋藤正直、伊藤信吉等主办的《批評》杂志，平田次三郎、波良健、石川道雄、内海伸平等主办的《赤門文学》杂志等等，各都在困难的条件下对于非文学的气氛进行了抵抗。这些人就是战争结束后立即在

創辦《近代文學》并在其他方面開始了積極活動的所謂“三十幾歲”的人們。荒正人說：“記得一直到戰敗的一年以前，非法的小組還定期舉行聚會，只要有一点点可能，就利用合法的機會組織啟蒙活動。參加這個小組的文藝評論家一個時期到過將近十人。這難道不是對戰爭的抵抗嗎？象這樣的抵抗曾無數個。”（荒正人：《近代文學》）當然，不能說這種抵抗直接對戰爭發生了多大的影響，然而，值得重視的是，正是在這種努力的基礎上才產生了他們在戰後時期旺盛的文學活動。

比這些人稍後的一代，即黑暗時代已經到來以後才進入思想個性形成階段的青年們，以及被強制地送到工廠或者戰場的青年們，他們雖然幾乎不具有系統的理論思想基礎，但是，他們根據對這種黑暗的戰爭的切身體驗，也表現了一種可以稱之為抵抗的情緒。從《陣亡學生的筆記》一書中可以看到：有的學生“在被派往前線時偷偷地把托爾斯泰的《人生論》裝進皮囊里；有的在工廠的宿舍里深夜翻閱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儘管報紙上大吹大擂地報道“學生上戰場”的“雄壯”場面，但實際上他們絲毫也沒有感到興奮，而只是在悲哀的氣氛中帶着陰郁的表情走上了戰場。

編 后 記

本卷記述了从 1940 年中期至 1943 年初期，即第二次近卫內閣至东条內閣时期的历史，这是一段包括太平洋战争爆发，从战争初期的胜利走向不利局面的富于变化的历史；其中包括着因牵涉到发动战争的责任问题及战败责任问题而在审判东条当时和现在，在各种意义上成为争论对象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和史料不足，在确定史实方面感到极大困难，但由于从国际、政治、经济等多方面进行了考察，大致取得了比较正确的看法。鉴于种种错误观点：说什么仅仅由东条个人或者军部发动了战争，其他统治者都是“和平主义者”；由于遭到美国的压迫，日本为了自卫才不得已而发动了战争；日本在中途岛海战中偶然的失算造成了战败的原因等等，在今天仍有其广大市场，那么，本书中的研究成果，或许对了解当前形势会有一些帮助。

本卷执笔者如下：

政治：远山茂树、今井清一、荒井信一、川村善二郎、藤井松一、松本贞雄。

经济：宇佐美诚次郎、秋山穰、山本弘文。

文化：松岛荣一、岛田福子、伊豆利彦、红野敏郎。

中国：野原四郎、小島晋治。

国际关系：江口朴郎、荒井信一、岡部广治。

另外，本卷中刊登的照片是由日本近代史研究会提供的（包括第二卷中的照片）。（均从略。——中译本编者）

附录(一) 年表

(1940年7月 1943年2月)

年	月/日 日 本	月/日 东 方	月/日 西 方
1940	7• 6 社会大众党解散。	7• 2 国民党举行七中全会(8日闭幕)。日本設立駐法属印度支那監視員办事机关。	7• 1 法国政府迁往維希。
	7• 7 近卫文麿表明对新体制的意见。东京交通工会解散。		7• 5 法国維希政府宣布断絶对英邦交。
	7• 8 日本劳动总同盟解散。	7• 7 中共中央发表抗战三周年紀念宣言。	7•10 法国决定废除第三共和国宪法。
	7•16 米内内閣总辞职。政友会正統派(久原派)解散。	7•18 日英簽訂关于封鎖滇緬公路的协定。	7•11 貝当元帅就任總統兼总理。
(昭和)	7•18 日本农会总同盟解散。	8• 7 中苏締結新条約(商約)。	7•20 美国通过两洋艦队法。
	7•19 近卫文麿和将出任陆海外三相人选举行获洼会談。	8•20 八路军开始百团大战。	7•21 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脫維亞加入苏联。
和	7•22 第二次近卫内閣成立。	9•22 簽訂日、法属印度支那軍事协定。	7•25 美国对废鋼鐵、石油实行輸出許可制。
	7•25 永井柳太郎等取消派脫退民政党。	9•23 日軍开始侵入法属印度支那。	8•12 德空軍轰炸多維尔、朴次茅斯。
15	7•26 政府决定基本国策綱要。国民同盟解散。	9•26 美国对华貸款二千万美元。	8•13 英德海軍在英法海峡进行海战。
	7•27 联席會議决定針对世界形势演变处理时局綱要。破获路透社記者柯克斯等外国間諜网。	10 苏中民主政府成立。	8•17 德国宣布对英实行完全封鎖。
(年)	7•30 政友会革新派(中島派)解散。	10•14 在江苏的蔣系軍攻击新四軍陈毅支队(苏北事件)。国民党調集二十余万軍队加强封鎖陝甘宁边区。	8•24 英国同意美国租借百慕大島。
	8• 8 促进新体制同志会成立。	10•18 滇緬公路重开。	8•29 德空軍对倫敦实行二次大战中规模最大的轰炸。
		10•19 国民党軍事委员会命令新四軍移駐华	9• 2 英意在东地中海上进行海战。
			9• 3 美英发表就轉让驅

1940	8.15 民政党解散。大日本农会解散。	11.26 汪兆銘通电蒋介石劝告同日本媾和。	逐艦問題 举行談判。
	8.22 向駐美大使堀内等在外外交官发出归国命令。	11.29 汪兆銘就任伪南京政府主席。	9. 7 德空軍大举轰炸倫敦。
	8.23 新协、新筑地两剧团解散。	11 重庆政府停止发給八路軍、新四軍軍費。	9.12 意軍开始进攻埃及。
	8.25 在东京举行日法会谈，签订关于法属印度支那問題原则性协定。	12. 1 美国对国民党政府提供一亿美元信用贷款。	9.16 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国防宣言，通过征兵法。
	8.26 三井合名、三井物产两公司合并，成立三井物产公司。	12. 8 泰国，法属印度支那两軍冲突。	9.23 英海軍进攻达喀尔。
	8.27 小林商相被任命为駐荷印特派大使（担任同荷印交涉）。	12.10 英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一千万鎊信用贷款。	9.26 美国发表对日禁运废鋼鉄。
	8.28 新体制筹备会召开首次全体會議。	12.23 日軍宣布加强对中华南沿岸的封锁。	9.27 日德意締結軍事同盟。
	8.29 基督教各派决定成立“純正”日本基督教会。		10. 4 希特勒、墨索里尼在普倫納隘会谈。
	8.30 松岡、法国駐日大使安利換文。		10. 5 德軍侵入羅馬尼亚。
	9. 1 东京禁止平日午前开放娱乐场所。		10.28 意軍侵入希腊。希腊对意宣战。
	9. 2 成立村会，街道居民組織等。		11. 5 美国选举总统，罗斯福第三次当选。
	9. 5 海相吉田辞职，及川古志郎继任。		11.12 莫洛托夫、希特勒会谈。
	9. 7 德国公使斯塔瑪来日。		11.20 匈牙利加入日德意三国同盟。
	9.13 日荷会谈开始。建川美次就任駐苏大使。		11.23 羅馬尼亚加入日德意三国同盟。
	9.19 御前會議决定締結日德意軍事同盟条		11.24 斯洛伐克加入日德意三国同盟。
			12. 2 英西軍事协定成立。
			12.18 希特勒密令于19 1年5月以前完成对苏作战准备。
			12.29 美国总统罗斯福发

年	月/日 日 本	月/日 东 方	月/日 西 方
1940	<p>約。</p> <p>9・22 日、法属印度支那 軍事协定签字。</p> <p>9・23 日軍进驻法属印度 支那北部。</p> <p>9・27 日德意軍事同盟签 字。就此，日皇頒 布敕語。</p> <p>9・28 小川乡太郎就任鉄 道相，秋田清就任 逓信相，金光庸夫 就任厚生相。</p> <p>9・30 日本編輯者会成 立。</p> <p>10・1 創設总力战研究 所。</p> <p>10・3 参謀总长閑院宮辞 职，杉山元继任。</p> <p>10・8 天皇前往东京帝 大。</p> <p>10・12 大政翼賛会举行成 立仪式。</p> <p>10・14 日本文学家会成 立。</p> <p>10・19 公布公司財務統制 令、銀行等資金运 用令、工資統制令 (10月20日施行)。</p> <p>10・22 东方会解散。</p> <p>10・23 政府和大政翼賛会 决定禁止文化、思 想团体的政治活 动。</p> <p>10・24 公布米谷管理规 則。</p>		<p>表演說主张美国应 成为民主国家的 “兵工厂”。</p>

1940	11· 1 前往荷印的特派大使小林归国。		
	11· 2 大日本产业报国会成立。		
	11· 5 内閣會議通过日“滿”“华”經濟建設綱要。		
	11· 9 公布防止从业員移动令。		
(昭	11·10 举行建国二千六百年紀念仪式。		
	11·13 御前會議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綱要。		
	11·20 元老西园寺公望死去。		
和	11·28 政府統帥部召开第一次聯絡懇談会。		
	11·30 芳澤謙吉就任赴荷印特派大使。日“华”基本条約和日“滿”“华”共同宣言签字。		
15	12· 6 平沼騏一郎就任不管部大臣。成立内閣情报局。		
(年	12· 7 内閣會議通过經濟新体制綱要。		
	12·16 大政翼贊会召开临时中央协助政府會議(18日閉幕)。		
	12·21 内相富田、司法相风见辞职，平沼騏一郎、柳川平助继任。		
	12·23 日泰友好亲善条約签字。		
	12·24 日、荷印財政协定		

年	月/日 日 本	月/日 东 方	月/日 西 方
1940	签字。 12·26 第七十六次議會开幕。 12·27 联席會議决定“帝国对泰国及法属印度支那措施”。		
1941	1·8 陸軍下达《战陣訓》。 1·11 公布新聞紙等刊載限制令。 1·21 日苏漁業临时协定签字。 1·24 泰、法属印度支那接受日本的停战調停。 1·30 联席會議决定“对法属印度支那、泰国措施綱要”。 2·1 施行耕地价格等管理令。 2·6 駐美大使野村到达美国。 2·7 在东京举行調停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紛爭的会談。 3·1 畑俊六被任命为日本侵华軍总司令官。 3·3 修訂国家总动员法公布。 3·7 公布国防保安法。 3·10 修訂治安維持法公布。 3·11 对泰国、法属印度支那糾紛調解成	1·1 泰、法属印度支那两軍在国境綫发生冲突。 1·4 新四軍开始向华北移动。 1·6 伪中国儲备銀行开业。 1·7 国民党軍在安徽南部围攻新四軍（皖南事件）。 1·17 国民党軍事委员会下令解散新四軍。 1·18 中共中央为皖南事件向国民党提出抗議。 1·20 中共中央任命陈毅、张云逸、刘少奇为新四軍代理正副軍长及政治委員。 1·29 新四軍在苏北成立新軍部。 2·17 美国駐华北陆战队开始撤退。 2· 苏联軍事顧問团离开重庆。 3·2 畑俊六就任日本侵华軍总司令官。 3·11 泰国、法属印度支那和約签字。国民	1·6 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关于“四项自由”的演說。 1·13 德軍侵入保加利亚。 1·20 英軍进入北非的托卜魯克。 2·14 野村、罗斯福首次会见。 2·15 美英荷澳就太平洋防卫問題举行会談（在华盛顿）。 3·1 保加利亚加入日德意三国同盟。 3·11 美国軍火租借法成立。 3·13 英空軍轰炸柏林。 3·25 南斯拉夫加入日德意三国同盟。 3·27 南斯拉夫发生反軸心派的武装政变。松岡会见希特勒。 4·1 松岡会见墨索里尼。 4·3 軸心国軍在北非击败英軍。 4·5 苏联、南斯拉夫互不侵犯条約签字。 4·6 德軍侵入南斯拉夫

1941	功。	党中央密令破坏和逮捕中共各级委员会组织。	和希腊。
	3•12 松岡外相出发訪欧。		4• 8 英、美、荷三国举行軍事会谈（在馬尼拉）。
	3•26 第七十六次議會开幕。	4• 2 国民党八中全会閉幕，发表三年建設計劃。	4•10 克罗地亚发表独立宣言。
	3•27 翼賛会事务总长有馬以下全体职员提出辞呈，翼賛会改組。	4•10 泰国、緬甸发表划定国境工作完成。	4•13 日苏中立条約签字。
	4• 1 公布生活必需物資統制令。东京及其他六大都市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制。公布国民学校令。决定日本銀行最高发行額限度为四十七亿日元。	4•25 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五千万美元貸款。	4•16 野村会见赫尔。赫尔要求日本政府就日美諒解方案表示意见。
(昭		5• 1 中共公布陝甘宁边区施政綱領和实行三三制。	4•18 南斯拉夫对德无条件投降。
	4• 2 小仓正恒被任命为不管部大臣。	6• 5 英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五千万英鎊信用貸款。	4•23 希腊对德无条件投降。
和	4• 4 丰田貞次郎就任商相，鈴木貞一就任企划院總裁。	6•22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統一战綫的决定。	5• 6 斯大林就任部长會議主席。
16	4• 9 軍令部长伏见宮辞职，永野修身继任。	7• 2 国民党政府宣布和德意断絕邦交。	5•10 納粹領袖赫斯飞往倫敦。
	4•13 日苏中立条約签字。	7•18 蔣介石的政治顧問拉鉄摩爾到达重庆。	5•12 野村大使提出日方修正方案。
	4•26 鋼鉄統制会成立。	7•26 菲律宾冻结日本资产。	5•20 德傘兵进攻克里特島。
	5• 1 企划院改組。	7•28 荷印冻结日本资产，日本荷印石油协定停止施行。	5•24 英德在格陵兰近海进行海战。
	5• 6 日、法属印度支那經濟协定签字。	8• 8 国民党政府就建立中苏英美四国联合战綫发表声明。	5•27 罗斯福发表非常时局宣言。
	5• 9 日法属印度支那、日泰两議定书签字。	8•12 法属印度支那宣布全面禁止輸出。	5月 法国組成反德抵抗組織“国民陣綫”。
年	5•13 設立农地开发营团。	9•27 日軍占領长沙。	6• 2 希特勒墨索里尼会谈。
	5•15 設立預防拘禁所。		6•14 美国冻结德意在美资产。
			6•15 克罗地亚加入日德意三国同盟。
			6•21 美国针对日本修正

年	月/日	日 本	月/日	东 方	月/日	西 方
1941	6• 6	大本营决定“对南方措施纲要”。	10• 4	日軍占領郑州。		方案提出反建議。
	6• 7	明倫会解散。	10• 8	美、英、荷印公布对日禁运石油协定。	6•22	德軍侵入苏联領土,苏德战争开始。
	6•11	日苏通商、貿易及支付协定签字。	10•10	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五千万美元貸款。		意、芬、羅馬尼亚也对苏宣战。
	6•16	召开第一次中央协助會議。汪兆銘来日。	11•21	陝甘宁边区第二届參議會开幕。	6•30	美总统顧問霍浦金斯会见斯大林。
	6•18	日荷会谈决裂。	11•25	伪南京政府参加防共协定。	7• 1	德、意、羅馬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承认汪記政权。
	6•28	向汪伪組織提供三亿日元貸款。	12• 8	日軍开始侵入泰国。	7• 7	美軍在冰島登陆。
(昭	7• 2	御前會議决定“适应形势演变帝国国策纲要”。	12• 9	国民党政府向日德意宣战。	7•12	英苏軍事协定签字。
	7• 6	大日本兴亚同盟成立。	12•10	日英在馬来近海进行海战。	7•16	德軍占領諾佛果洛德、斯摩棱斯克。
和	7•16	第二次近卫內閣总辞职。	12•12	日軍占領关島。	7•24	美国向日本提出法属印度支那中立化方案。
	7•18	第三次近卫內閣成立。	12•13	日軍在英属婆罗洲登陆。	7•26	美英冻结日本在外资产。
16	7•26	日、法属印度支那就共同防卫达成协议。	12•19	日軍在民答那峨島登陆。	8• 1	美国禁止对日出口飞机用汽油。
	7•28	日軍侵入法属印度支那南部。	12•23	日軍占領威克島。	8• 4	美苏延长通商协定有效期间。
	7•29	日、法属印度支那共同防卫議定书签字。	12•25	日軍占領香港。	8•	罗斯福丘吉尔在大西洋上会谈。
年	8•14	国务相平沼遇刺。	12•26	英国同国民党政府签订軍事同盟。	9 12	通过大西洋宪章(14日公布)。
	8•21	时局共同融資团成立。			8•15	罗斯福、丘吉尔声明援助苏联。
	8•26	近卫首相致书罗斯福总统。			8•25	苏英軍开进伊朗。
	8•30	公布重要产业团体令、金属类回收			8•27	苏英和伊朗停战。
					8•29	希特勒墨索里尼会谈,发表关于建設欧洲新秩序的共同

1941	令。	声明。
	8• 大批文艺作品遭到禁止发售。	9• 3 罗斯福提示对于近卫来信的答复。
	9• 2 翼賛議員同盟成立。	9• 4 美驅逐艦古里亚号和德国潛水艇交鋒。
	9• 4 翼賛会决定翼賛壮年团基本綱要。	9• 7 英空軍大举轰炸柏林。
	9• 6 御前會議决定“帝国国策貫徹綱要”(第一次)。	9•11 罗斯福主张在大西洋战争区域进行防卫。
(昭	9•15 农林省决定米谷管理綱要。	9•20 德軍占領基輔。
	10• 1 实施国民劳动手册法。	9•24 德軍到达列宁格勒郊外。
	10• 5 諾門坎边界协定签字。	9•25 戴高乐成立“自由法国全国委员会”。
和	10•15 縮短大学、专门学校肄业年限。	9•27 駐美大使野村向美方提出日方第二次修正案。
	10•16 第三次近卫內閣总辞职。公布农田耕作統制規則。	9•29 美、英、苏就对苏租借武器問題举行会谈(在莫斯科)。
16	10•18 东条英机內閣成立。	10• 2 美国提交对日方历次提案的备忘录。
	10•22 安藤紀三郎被任命为翼賛会副总裁。	10• 英美举行軍事会谈
年)	10•30 根据重要产业团体令,发表第一次决定。	3- 4 (在馬尼拉)。
	11• 5 御前會議决定“帝国国策貫徹綱要”(第二次)。	10• 6 德軍对莫斯科开始总攻。
	特派大使来栖赴美。	10•13 美国同荷印举行軍事会谈(在馬尼拉)。
	11•16 第七十七次临时議會开幕(21日閉幕)。	10•15 苏联政府迁往古比雪夫。
	11•22 公布国民勤劳报国	10•16 德軍占領放得薩。
		10•19 莫斯科宣布戒严。
		10•24 德軍占領哈尔科夫。

年	月/日 日 本	月/日 东 方	月/日 西 方
1941 (昭和 16 年)	<p>协力令。</p> <p>11·25 防共协定有效期间 延长五年。</p> <p>12· 1 御前会议决定对 美、英开战。</p> <p>12· 8 日軍进攻珍珠港， 在馬來半島登陸。 对美英两国宣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法属印度支那 軍事协定签字。</p> <p>12·11 日德意共同进行战 争协定签字。</p> <p>12·11 第七十八次临时議 会开幕(17日閉 幕)。</p> <p>12·16 加强国民征用令。</p> <p>12·19 公布言論、出版、結 社取締令。</p> <p>12·21 日泰攻守同盟签 字。</p> <p>12·25 第七十九次議會开 幕。</p>		<p>11· 7 野村大使向美方提 出第一方案。</p> <p>11·16 德軍对莫斯科开始 第二次总攻。</p> <p>11·17 美国修改中立法， 許可美国船向盟国 輸送武器。</p> <p>11·20 野村、来栖两大使 向美国提出第二方 案。</p> <p>11·22 德軍占領 罗斯托 夫。</p> <p>11·26 国务卿赫尔将最后 方案(赫尔备忘录) 手交野村大使。</p> <p>12· 1 德軍从罗斯托夫撤 退。英国对芬兰、 匈牙利、羅馬尼亚 宣战。</p> <p>12· 7 罗斯福向日皇拍发 电报。</p> <p>12· 8 美英对日宣战。德 軍进攻 莫斯科 失 敗，宣布东部战綫 进入停頓状态。</p> <p>12·11 德意对美宣战。美 国对德意宣战。</p> <p>12·23 丘吉尔、罗斯福开 始就指导战争举行 会談。</p>
1942 (昭和 17 年)	<p>1· 1 废除汇率以英美貨 币为基准的制度， 实施以日元官价 为基准的办法。</p>	<p>1· 2 日軍占領馬尼拉。</p> <p>1· 4 日軍再次占領长 沙。</p> <p>1·11 日軍在西里伯斯島</p>	<p>1· 1 盟国共同宣言签字 (在華盛頓)。</p> <p>1·27 英美公布战时經濟 协定。</p>

1942	<p>1-16 大日本翼賛壮年团成立。公布战时大幅度増税方案。</p> <p>1-18 日德意新軍事协定签字。</p> <p>1-19 召开第一次重臣會議。</p> <p>1-20 公布实行衣料票购制。</p> <p>1-30 决定以日元为日本占領区的決算标准。</p> <p>2-2 大日本妇女会成立。</p> <p>2-5 成立日本新聞会。</p> <p>2-18 决定贯彻翼賛选举基本方針。</p> <p>2-20 公布南方开发金庫法、战时金融金庫法，自3月1日实施。</p> <p>2-21 公布食粮管理法，自7月1日施行。</p> <p>2-23 翼賛政治体制協議会举行第一次全体會議。</p> <p>2-24 公布修訂日本銀行法，日本銀行經過改組从5月1日起从新开始工作。</p> <p>3-7 联席會議决定战争指导大綱。</p> <p>3-20 日苏漁业临时协定签字。</p> <p>3-25 第七十九次議會閉幕。</p> <p>4-1 取消永久租地权制</p>	<p>登陆。</p> <p>1-19 日軍侵入緬甸。</p> <p>1-23 日軍在新不列顛島登陆。</p> <p>1-26 泰国对英、美宣战。</p> <p>1-23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抗日根据地的土地政策的决定。</p> <p>2-1 毛澤东发表关于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說。整风运动开始。</p> <p>2-2 英国对国民党政府貸款五千万英鎊，美国貸款五亿美元。</p> <p>2-4 日軍与英荷軍在爪哇近海进行海战。</p> <p>2-5 中苏交換軍用品协定签字。</p> <p>2-15 日軍占領新加坡。</p> <p>2-20 日軍在的摩尔島登陆。</p> <p>2-27 日軍同英荷軍在泗水近海海战。</p> <p>3-1 日軍在爪哇登陆，在巴达維亞近海发生海战。</p> <p>3-15 史迪威就任中苏美英联合参謀部参謀长。</p> <p>3-21 美国向国民党政府貸款五亿美元协定签字。</p> <p>3-31 停止用伪“中央儲备券”和旧法币等价交換。</p>	<p>2-6 英美組成联合参謀本部。英德在多維尔近海进行海战。</p> <p>2-19 英国內閣改組，工党領袖艾德礼入閣。</p> <p>3-14 德意經濟財政协定签字。</p> <p>3-17 麦克阿瑟元帅到达澳大利亚。</p> <p>3-18 土耳其发表中立声明。</p> <p>4-1 中、美、英、加举行太平洋軍事會議(在華盛頓)。</p> <p>4-8 軸心国軍在利比亚开始第二次进攻。</p> <p>4-14 伊朗对日断絕邦交。</p> <p>4-18 法国賴伐尔內閣成立。</p> <p>5-12 德軍再次对苏展开攻势。</p> <p>5-26 苏英互助条約签字。</p> <p>5-29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到达華盛頓。</p> <p>6-2 墨西哥对軸心国宣战。美国对匈牙利、保加利亚、羅馬尼亚宣战。</p> <p>6-11 罗斯福宣布美苏就开辟第二战场达成協議。</p> <p>6-20 罗斯福、丘吉尔举行第二次战争指导会談(華盛頓~26</p>
------	--	---	--

(昭

和

17

年)

年	月/日	日 本	月/日	东 方	月/日	西 方
1942		度。	4• 9	英印会談，印度提出国民政府組織方案。		日)。
	4• 6	翼賛政治体制協議会发表推荐候选人。	4•11	国民會議派拒絕英方修正方案，会談决裂。日軍攻下巴丹半島。	6•21	托卜魯克陷落。
	4•16	全国产业团体联合会决定解散。	5• 7	日軍占領柯勒吉多尔島，珊瑚海海战。	6•25	德軍侵入埃及。
	4•18	美机初次空袭东京、名古屋、神戶。	5•23	毛澤东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講話。	7• 1	德軍占領塞瓦斯托波尔，进入爱尔·阿拉眠。
	4•30	第21次大选(翼賛选举)举行。	5•31	中国政府回收旧法币，着手币制統一。	8•12	英首相丘吉尔到达莫斯科，英美苏三国軍事会談开始。
(昭	5• 2	日泰間日元与泰币等价交換协定成立。	6• 5	中途島海战。	8•22	巴西对德意宣战。
	5• 9	日本决定在朝鮮实行征兵制。	6• 7	日軍进攻阿留申群島。	8•25	苏联开始将斯大林格勒的工厂向腹地轉移。
和	5•15	企业整備令施行。	8• 7	美軍在瓜达耳卡納耳島登陆，所罗門海战。	8•31	德軍冲入斯大林格勒。
	5•20	翼賛政治会成立，阿部信行任总裁。	8• 8	印度国民會議派通过英国势力撤退方案，命令开始不服从运动。	9•21	斯大林格勒周围展开大巷战。
	5•26	日本文学报国会成立。	8• 9	甘地、尼赫魯、阿沙特等被捕。	9•23	美国特使威尔基和斯大林会談。
17	5•27	第八十次临时議會开会(～29日)。	8•20	印度各地的交易所被封闭。	9•27	苏联承认戴高乐政权。美国承认戴高乐政权。
	6• 1	陸軍設置空軍司令部。	10• 6	“滿洲国”产业統制法公布施行。	11• 4	英軍在阿拉眠获胜。
(年	6• 9	翼賛会副总裁安藤入閣为国务相。各府县决定設立地方事务所。	10• 8	印度发生反英騷动，死伤三千余人。	11• 7	美英軍在北非登陆。
	6•10	翼賛会全面改組。	10•10	美英声明废除在华治外法权。	11•12	德軍进駐法国非占领区。
	6•18	对泰国供給二亿日元貸款。	10•26	第二次所罗門海战。	11•13	德意軍从托卜魯克撤退。
	6•30	广田特使出发赴泰国(～7月29日)。			11•15	法国任命达尔朗·吉罗为北非法軍总司令。
	7• 1	自本月起报纸改为一县一报制。			11•19	德意軍由本加济撤退。

1942	7•11 大本營決定在南太平洋方面暫緩進攻。	10•28 中蘇美英在重慶召開東亞作戰會議。	11•20 蘇軍開始在斯大林格勒大舉反攻。
	7•18 日、法屬印度支那經濟協定簽字。	10• 晉西北臨時參議會發表施政綱領。	12•24 法國達爾朗被暗殺。
	7•21 三十六個思想團體獲得批准。	10•28 發生第三次所羅門海戰。	
	7•25 通告德國維持日蘇中立不變。	12• 7 國民黨政府公布物價統制法。	
(昭和)	7•28 日本銀行向偽“中央儲備銀行”提供一億日元貸款。根據重要產業統制令發表第二次決定。		
和	8• 5 翼贊會決定調整地方機構。		
	8•20 日美交換船“淺間”號、“康特維德”號進入橫濱港。		
17	9• 1 內閣會議決定成立大東亞省。		
	東鄉外務相辭職。		
	9• 9 決定國民煉成綱要。		
年	9•15 在鎮海、大湊分別設立鎮守府。		
	9•17 谷正之就任外務相，青木一男就任國務相。		
	9•26 決定陸軍防衛召集規則。		
	10•11 國營鐵道實行二十四小時營業制。		
	10•13 決定縮小百貨商店售貨場。		

年	月/日	日 本	月/日	东 方	月/日	西 方
1942	10·14	对重要物资实行强制收购。				
	10·15	設立兵器行政本部。				
	10·19	公布对空袭日本的美空軍人員的懲罰办法。				
(昭	11· 1	設立大东亚省任命青木一男为大东亚相。精簡行政机构。				
	11· 3	召开第一次大东亚文学家大会。				
	11· 7	决定四项增加生产对策綱要。				
和	11· 8	第八十一次議會开幕。				
	11·15	举行关門海底隧道通車仪式。				
17	11·20	文学报国会公布爱国百人一首当选作品。				
	11·28	召开兴亚国民大会。				
年)	12· 4	决定縮短肄业年限等。				
	12· 5	公布朝鮮义务教育实施綱要。				
	12·10	成立中央食粮协力會議。				
	12·12	日皇参拜伊势神宮。				
	12·20	汪兆銘訪日。				
	12·21	御前會議决定“贯彻大东亚战争对华根本方針”。				

1942	<p>12•23 大日本言論报国会成立。</p> <p>12•26 第八十一次議會重开。</p> <p>12•28 三井銀行和第一銀行宣布合并。 第百銀行并入三菱銀行。</p>		
(昭和17年)			
1943	<p>1• 3 斯塔瑪就任德国駐日大使。</p> <p>1• 9 日本向中国归还租界和废除治外法权的协定签字。</p> <p>1•13 禁止发售爵士乐唱片。</p> <p>1•14 联席會議决定容許緬甸“独立”方針。</p> <p>1•16 公布以間接稅为中心的增稅法案綱要。</p> <p>1•19 提高衣料供应量。</p> <p>1•20 分別簽訂日德、日意經濟协定。决定将庫頁島并入日本本国的措施綱要。决定劳动紧急对策綱要。</p> <p>1•27 海軍編成联合航空总队。实行对鋼鐵工厂的国家管理。</p> <p>2•18 公布出版事业令。</p>	<p>1• 9 伪南京政府向美英宣战。</p> <p>1•11 国民党政府和美英締結新条約。美英废除在华特权。日本和汪伪組織締結关于归还租界和废除治外法权的协定。</p> <p>1•20 日本法属印度支那經濟协定签字。</p> <p>1•29 林奈尔島近海海战。</p> <p>2•23 法国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归还租界。</p>	<p>1•14 罗斯福、丘吉尔就战争指导方針举行第三次会談(在卡薩布兰卡, 3月26日結束), 决定迫使敌方无条件投降的方針。</p> <p>1•16 伊朗对日德意宣战。</p> <p>2• 3 斯大林格勒战綫的德軍投降。</p> <p>2• 4 德国公布总动员令。</p> <p>2•14 德軍撤出罗斯托夫。</p> <p>2•16 德軍撤出哈尔科夫。</p>
(昭和18年)			

附录(二) 資料

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約^①

(1940年9月27日訂于柏林,同日生效)

大日本帝国、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政府认为世界一切国家各据有应有的空間是任何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决定在致力于大东亚以及欧洲各区域方面互相援助和合作,其首要目的为在各該区域建立并維持事物的新秩序,旨在促进有关人民的共同繁荣与福利。

此外,三国政府願意对世界上其他区域内有意与三国朝着同样方向共同努力的国家給予合作,俾使三国对世界和平的最終願望得以实现。

为此,日本、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政府同意如下:

第一条 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志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領導权。

第二条 德意志和意大利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領導权。

第三条 日本、德意志和意大利同意循着上述路綫努力合作。三国并承允如果三締約国中之一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經濟和軍事手段相援助。

第四条 为了实施本协定,由日本、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政府各自指派委員組成的联合技术委员会将迅速开会。

第五条 日本、德意志和意大利声明上述各条款毫不影响三締約国各与苏俄間現存的政治地位。

第六条 本协定应于签字后立即生效,并将从其生效日起繼續有效十年。在上述期間屆滿以前适当時間,各締約国如經任何一国請求,应为本协定的延期举行談判。

① 参照《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約》,《国际条約集(1934—1944)》,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278—279頁。——編者

中国事变处理綱要

(1940年11月13日,御前會議決定)

方 針

对中国事变的处理,根据昭和15年(1940年)7月通过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处理时局綱要”作如下决定:

(一) 除繼續軍事行动外,应采取进一步断絕英美的援蔣行为及調整日苏邦交等一切政治和軍事手段,力求摧毀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意志,以迫使其早速屈服。

(二) 及时和积极地改善內外的部署,使其适应于进行大規模的持久战,并恢复和增强为建設大东亚新秩序所必需的帝国国防力量的机动性。

(三) 为此,应充分利用日德意三国同盟。

要 領

(一) 为使国民党政府屈服并实现停战和平,应进行如下工作:

本工作务須在承认新中央政府以前收到实效。

(1) 和平工作由帝国政府負責进行,并由有关机关进行协助。

注: 以往由軍民各方面所进行的和平工作,应全部停止。在进行上述工作时,鉴于以往两国交涉的过程,应特別注意明确帝国的真意和恪守信义。

(2) 和平条件以我国和新中央政府之間即将締結的基本条約(包括与此不可分割的关于駐扎海軍部队及开发海南島經濟的秘密协定)为依据,日本方面所要求的基本条件詳見附件。

(3) 上述和平交涉以汪蔣合作为前提,并以日华間直接进行交涉为原则;但为使工作顺利进行,可請求德国居中調停并利用对苏关系的改进。

中国方面謀求南京和重庆合作的工作,应本諸促进的方针給以側面援助。

(4) 同新中央政府締結条約工作,最迟在昭和15年(1940年)11月底以前完成。

(二) 至昭和15年(1940年)年底仍然不能和国民党政府之間实现和平时,則不論形势如何,大体根据下列要領轉而采取長期策略,努力迫使国民

党政府屈服。

轉入長期战方針以后如果重庆政权屈服时，則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条件。

(1) 根据整个形势进行部署的同时，于适当时期轉入長期武力进攻。

長期武力进攻，在一般形势无大变化时，一面确保由“蒙疆”、华北的主要地区及汉口附近直至長江流域的主要地区和广东的一部分及华南沿海要地，經常保持用兵的机动性；另一方面彻底肃清占领地区确保治安并繼續进行封鎖和空中进攻。

(2) 对于新中央政府，主要使其专事协助帝国为加强綜合战力而采取的各种必要措施的实现，特别是，指导其在我占领地区内发展政治力量。

对国民党政府，最后仍使其与新中央政府合流，但不要使新中央政府急于求成而采取急躁的措施。

(3) 在中国进行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一面配合日“滿”两国的情况彻底开发和取得国防資源，一面借此安定占领地区的民心。

(4) 为适应进行大規模持久战的新事态，应迅速地积极地改善国内的体制。

对帝国在华各机关坚决施行改进和裁并，以便加强方針措施的贯彻执行。

附 件

日本方面要求的基本条件

(一) 中国承认“滿洲国”。

(实行本項的具体方式和时期，可另行考虑。)

(二) 中国放弃抗日政策，建立日华善邻友好关系，并适应世界新的形势，而与日本共同保卫东亚。

(三) 中国承认，为了共同保卫东亚，在必要时期内日本实行如下的駐兵：

(1) 在“蒙疆”及华北三省駐扎軍隊。

(2) 在海南島及华南沿岸特定地点駐扎海軍部队。

(四) 中国承认日本在上述地区开发和利用国防上必要的資源。

(五) 中国承认日本在長江下游三角地带实行一定期間的保証性駐軍(本条根据情况可适当加以取舍)。

注：除上述条件以外，努力切实贯彻我方下列要求：

(1) 汪蔣两政权的合作問題，应在尊重日本立場的情况下，作为国内問題加以处理。

(2) 实施日华間紧密的經濟合作。

对于經濟合作的方式，不必坚持以往的方式，而应根据平等原則在形式上力求尊重中国方面的面子。

(3) 对于經濟現狀的調整，进行充分考虑，以免使日华双方发生混乱。

日汪基本关系条約^①

(1940年11月30日簽訂于南京)

大日本帝国政府及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希望两国互相尊重其本然之特质，于东亚建設以道义为基础的新秩序之共同理想下互为善邻，紧密提携，以确立东亚之永久和平，并希望以此为核心，而贡献于世界全体之和平。为此訂立基本原則，以律两国間之关系，协定如下：

第一条 两国政府为永久維持两国間善邻友好之关系，应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領土，并于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講求互助敦睦之手段。

两国政府相約，互相撤廢政治、外交、教育、宣傳、交易等事項足以破坏两国間友誼之措施及原因，且将来亦禁絕之。

第二条 两国政府关于文化之融和、創造及发展，应紧密协力。

第三条 两国政府相約，对于足以危害两国安宁及福祉之一切共产主义的破坏工作，共同防卫之。

两国政府为完成前項目的計，应各在其領域內剷除共产分子及其組織，并对防共有关之情报宣傳等，紧密协力。

日本国为实行两国共同防共計，在所要期間內，依据两国另行議定，駐屯所要之軍隊于蒙疆及华北之一定地域。

第四条 两国政府相約，在派遣于中华民国之日本国軍隊，依据別項所

① 参照《日汪基本关系条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輯》，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35—237頁。——編者

定，撤兵尙未完成之前，对共同治安之維持，紧密协力。

在必須維持共同治安之期間內，日本国軍隊之駐屯地域等事項，两国另行協議決定之。

第五条 中华民国政府，承认日本国基于历来之慣例，及为确保两国之共同利益，在所要期間內，依据两国間另行議定，得駐留其艦船部队于中华民国領域內之特定地点。

第六条 两国政府，基于取長补短，有无相通之旨趣，并根据平等互惠之原則，应行两国間之紧密的經濟提携。关于华北及蒙疆之特定資源，尤其国防上必要之埋藏資源，中华民国政府允諾两国紧密协力开发之，关于其他地区內国防上必要之特定資源之开发，中华民国政府应予日本国及日本国臣民以必要之便利。

关于前項資源之利用，考虑中华民国之需要，而中华民国政府积极的給予日本国及日本国臣民以充分之便利。

两国政府为振兴一般通商及使两国間之物資需給便利而合理計，应講求必要之措施。两国政府对于長江下游地域通商交易之增进，及日本国与华北蒙疆間物資需給之合理化，尤应紧密协力。

日本国政府对于中华民国之产业、金融、交通、通信等之复兴与发展，应依两国間之協議，对中华民国作必要之援助乃至协力。

第七条 随本条約所規定之中日新关系之发展，日本国政府应撤廢其在中华民国所享有之治外法权，并交还其租界，而中华民国則应开放其領域，使日本国臣民得以居住和营业。

第八条 两国政府关于为完成条約之目的所必要的具体事項，另行訂約。

第九条 本条約自签字之日起实施之。

下列签字人各奉其本国政府正式之委任，在本条約签字盖印，以昭信守。

昭和 15 年(1940 年) 11 月 30 日 訂于南京
中华民国 29 年 11 月 30 日

以日文及中文各繕本条約二份

大日本帝国特命全权大使 阿部信行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長 汪 兆 銘

日“滿”华共同宣言^①

(1940年11月30日)

大日本帝国政府
“滿洲帝国”政府及
中华民国政府

希望三国互相尊重其本然之特质，于东亚建設以道义为基础的新秩序之共同理想下，互为善邻，密切提携，以形成东亚之永久和平，并希望以此为核心，而贡献于世界全体和平。为此，发表如下宣言。

一、日本国、“滿洲国”及中华民国互相尊重主权及領土。

二、日本国、“滿洲国”及中华民国，講求各項必要之手段应以互惠为基础，俾三国間以互惠为基調之一般提携，尤其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濟提携得收实效。

三、日本国、“滿洲国”及中华民国，根据本宣言之旨趣，速行締結协定。

日苏中立条約

(1941年4月13日签字)

大日本帝国和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基于巩固两国間和平友好关系的願望，决定締結中立条約，协定如下：

第一条 締約双方保証維持两国間和平友好关系，并相互尊重締約另一方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第二条 如果締約一方成为第三者的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締約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将保持中立。

第三条 本条約自締約双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五年。如締約任何一方在期滿前一年未通知廢止本条約时，則本条約应視為自动延長五年。

第四条 本条約須經尽速批准，批准书也应迅速在东京互换。

① 参照《日“滿”华共同宣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輯》，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39頁。——編者

日美諒解方案

(1941年4月16日)

日本国政府及美国政府，为了就締結一項旨在恢复两国間傳統的友好关系的全面的协定进行交涉，茲願承担共同的責任。两国政府衷心希望不要就导致两国邦交近来疏远的原因进行爭論，共同防止使两国国民的友好感情趋于恶化的事件的重新发生，并制止其不測的发展。

两国政府殷切希望，通过两国的共同努力，在太平洋上建立起以道义为基础的和平，并迅速达成两国間亲密友好的諒解，以使消除将毀灭文明的可悲的混乱的威胁；如其不可能，則应迅速采取措施，以使上述威胁不致扩大。

鉴于对采取上述决定性的行动說来，長期交涉既不适当而又緩不济事。为了簽訂一項全面的协定，茲特建議写成文件作为从道义上約束两国政府的有效手段。

上述諒解应局限于紧急的重要問題，并交由會議審議，至于两国政府日后可能获致協議的附帶事項，暫不包括在內。

如能就下列各点，加以澄清或改善，則两国政府之間的关系，将能获得显著的調整。

- 一 日美两国所抱的国际觀念和国家觀念
- 二 两国政府对于欧洲战争的态度
- 三 圍繞中日战争两国政府的关系
- 四 关于太平洋海軍兵力和航空兵力以及海运的关系
- 五 关于两国通商和財政互助
- 六 关于西南太平洋方面的两国經濟活动
- 七 关于安定太平洋政治的两国方針

由于上述情况，現已达成如下的諒解：

上述諒解經美国政府修改后，交由日本政府作最后和正式的决定。

- 一 日美两国所抱的国际觀念和国家觀念

日美两国互相承认为对等的独立国和互相比邻的太平洋强国。

两国政府将表明，在希望确立持久和平并开辟一个以互相尊重为基础的信任与合作的新时代問題上两国政策是一致的。

两国政府声明：两国政府的傳統信念是：各国和各民族互相联合形成四

海一家的局面，各自享有平等权利；他們的利益应共同采取和平方法加以調挤；各自追求其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并加以維護，同时承认有責任不对这种利益加以破坏。

两国政府抱有坚定的决心，保持基于两国固有傳統的国家觀念和社会秩序以及作为国家生活基础的道义原則；而不允許与此相反的外来思想的泛濫。

二 两国对于欧洲战争的态度：

日本曾說明：軸心同盟的目的在于防禦性，即在于阻止現在尙未牽入欧战的国家，发生軍事的扩大关系。日本又声明其并不企图規避現存条約的义务；至于对軸心同盟所負的軍事上的义务，只限在該同盟的締約国德国受到現在尙未参加欧战的国家积极的攻击时，日本始发动此种义务。美国政府声明：美国对欧洲战争的态度不論現在及将来，决不援助一方而攻击他方，即决不受攻击同盟所約束。美国政府坚守嫌恶战争，从而对于欧战的态度，無論現在或将来，除考虑本国的福利和安全之外，不作他想。

三 圍繞中日战争两国政府的关系：

美国总统承认下列条件，如果日本政府对此加以保証时，美国总统即进而对中国政府劝告和平。

1. 中华民国独立；
2. 根据日华成立的协定，日軍应自中国領土撤退；
3. 不兼并中国領土；
4. 不賠償；
5. 恢复門戶开放方針，但关于其解釋及适用，将于适当时期由日美两国協議之；
6. 重庆政府与南京合一；
7. 日本应自行約束其对中国領土的大量或集体移民；
8. 承认“滿洲国”。

在中国政府接受美国总统的劝告时，日本政府应即同重新統一的中国政府及构成該政府的人員直接进行和平談判。

日本国政府在上述条件的范围內，根据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及經濟合作的原則，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具体的和平条件。

四 关于太平洋海軍兵力和航空兵力及海运的关系：

1. 日美两国为維持太平洋和平起見，不得配备有相互威胁对方的海軍

兵力和航空兵力。关于其具体細目，由日美間另行協議之。

2. 日美会谈达成協議时，两国互派艦队向对方作友好訪問，以庆祝和平来到太平洋。

3. 中日战事解决后，日本国政府同意美国政府的要求，迅速采取措施使現在服役中的本国船舶中可以复員的，根据同美国訂立的契約主要参加太平洋方面的航运，关于这类船只的吨位等，应由日美会谈决定之。

五 关于两国通商及金融互助

在此項諒解成立并經两国政府批准时，日美两国需要对方国所有的物資时，应由对方国保証供应。另外，两国政府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以恢复日美通商条約有效期間曾經存在的正常通商关系；而在两国政府欲締結新通商条約时，通过日美会谈并依照通常慣例締結之。

为促进两国經濟合作起見，美国願对日本提供足够的信用貸款，以資改善亞洲經濟，发展其工商业，并实现日美經濟合作。

六 关于西南太平洋方面的两国經濟活动：

鉴于日本已提出保証不用武力而用和平手段来謀求其在西南太平洋方面的发展，美国願协助日本取得其所需要的这一地区的物資：石油、橡胶、錫、鋁等。

七 两国政府关于安定太平洋政治的方針

1. 日美两国政府不承认欧洲各国将来在亞洲和西南太平洋接受領土割让或合并現在的国家。

2. 日美两国政府共同保証菲律宾的独立，如其未經挑战而受到第三国攻击时，两国得考虑救援方法。

3. 对于日本向美国及西南太平洋的移民，予以友好考虑，并給予与其他国民同等待遇。

日美会谈

1. 日美两国会谈应在檀香山举行。美国代表罗斯福总统，日本代表近卫首相。代表人数双方均以五人为限，但不包括专家、秘书等在内。

2. 本会谈不让第三国列席旁听。

3. 本会谈，在两国間达成此次諒解后尽速召开之（本年五月）。

4. 本会谈，不得再議此次諒解之各項。两国政府具体議題由两国政府間協議之。

附則：

本諒解事項應作為兩國政府間的秘密備忘錄。關於本諒解事項發表的範圍、性質及時期，由兩國政府協議之。

適應形勢演變帝國國策綱要

(1941年7月2日，御前會議決定)

一 方針

(一) 不論世界形勢如何轉變，帝國將堅持建設“大東亞共榮圈”，以利于確立世界和平的方針。

(二) 帝國依舊為處理中國事變而邁進，並為確立自立自衛的基礎，繼續向南方的擴展，同時，根據形勢的演變解決北方問題。

(三) 帝國為達成上述目的，堅決排除一切障礙。

二 要領

(一) 為迫使蔣政權屈服，進一步由南方各地加強壓力。根據形勢的演變，在適當時期對重慶政府行使交戰權，並接收在中國的敵對性租界。

(二) 帝國為了自立自衛，繼續對南方各重要地區進行必要的外交工作，並推行其他各種對策。

為此，應作好對英美開戰的準備，首先根據“對法屬印度支那、泰國措施綱要”及“關於推行南方對策事項”貫徹對法屬印度支那和泰國的各種政策，以便加強向南方擴展的準備。

帝國為達成此項目的，不辭對英美一戰。

(三) 對於德蘇戰爭，雖然依據三國軸心的精神，但暫時不擬參加，而在秘密中進行對蘇軍事準備，採取自主的立場。在此期間，當然要做好周密的準備進行外交工作。

如果德蘇戰爭的發展對帝國有利時，即行使武力解決北方問題，確保北部邊界的安定。

(四) 在實行前項決定時，尤其是決定行使武力時，應避免過份影響對英美作戰的基本戰略地位。

(五) 對於美國的參戰，根據既定方針採用外交手段及其他一切方法極力加以阻止。萬一美國實行參戰時，帝國根據三國條約採取行動，但行使武

力的时机及方法，应作自主的决定。

(六) 迅速彻底地加强国内的战时体制，特别要努力加强国土的防卫。具体措施将另行规定。

大西洋宪章^①

(1941年8月14日)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斯福和联合王国国王陛下政府代表首相邱吉尔经过会晤，认为他们两国国策中某些共同原则应该予以宣布。他们对于世界所抱有的一个美好未来局面的希望是以此项政策为根据。

(一) 两国并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

(二) 凡未经有关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的领土改变，两国不愿其实现。

(三) 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所赖以生存的政府形式的权利。各民族中的主权和自治权有横遭剥夺者，两国俱欲设法予以恢复。

(四) 两国在尊重它们的现有义务的同时，努力使一切国家，不论大小，胜败，对于为了它们的经济繁荣所必需之世界贸易及原料的取得俱享受平等待遇。

(五) 两国愿意促成一切国家在经济方面最全面的合作，以便向大家保证改进劳动标准，经济进步与社会安全。

(六) 待纳粹暴政被最后毁灭后，两国希望可以重建和平，使各国俱能在其疆土以内安居乐业，并使全世界所有人类悉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亦不虞匮乏的保证。

(七) 这样一个自由，应使一切人类可以横渡公海大洋，不受阻碍。

(八) 两国相信世界所有各国，无论为实际上或精神上的原因，必须放弃使用武力。倘国际间仍有国家继续使用陆海空军军备，致在边境以外实施侵略威胁，或有此可能，则未来和平势难保持。两国相信，在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建立之前，此等国家军备的解除实属必要。同时，两国当赞助与鼓励其他一切实际可行的措施，以减轻爱好和平人民对于军备的沉重负担。

弗兰克林·罗斯福

温斯顿·邱吉尔

^① 《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37—333页。

美日协定基础概略(赫尔备忘录)

(1941年11月26日)

第一項 关于政策的共同宣言草案

美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表明：两国均希望太平洋的和平，国策均以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持久而广泛的和平为目的，两国对上述地区并无任何领土野心，亦无威胁其他国家或对邻近国家进行武装侵略的企图，而在国策上积极支持成为两国間及其共同其他一切国家政府之間关系基础的以下各项根本原则，并实际予以适用。

- (一) 关于一切国家领土完整及主权不可侵犯的原则；
- (二) 关于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
- (三) 关于包括通商上机会均等和待遇平等的平等原则；
- (四) 为了防止纠纷及进行和平解决，以及用和平方法和途径改善国际形势而遵循国际合作和国际调停的原则。

美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同意，为了根绝慢性的政治不安，防止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及建立和平的基础，在两国間及其和其他国家民族間的经济关系上积极支持以下各项原则，并实际予以适用。

- (一) 关于国际通商关系上互不歧视原则；
- (二) 关于废除表现在国际经济合作及对通商的过度限制上的极端国家主义的原则；
- (三) 关于一切国家平等地获得原料物资的原则；
- (四) 关于国际間商品协定的实施上充分保护消费国家及民众之利益的原则；
- (五) 关于成立容许有利于一切国家的主要企业持续发展及符合一切国家福利的贸易手续的支付办法的国际金融机构和协定的原则。

第二項 美日两国政府应采取的措施

美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提议采取如下的措施：

- (一) 美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应为締結有英帝国、中国、日本国、荷兰、苏联、泰国和美国参加的多边的互不侵犯条约进行努力。
- (二) 两国政府应为締結这样一项协定而努力，在这项协定中美、英、中日、荷、泰各国政府一致声明尊重法属印度支那的领土主权；一旦印度支那

的領土完整遭到威胁时，立即进行協議，以便针对这种威胁采取必要而适当的措施。

上述协定規定，美日将为保証作为协定締約国的各国政府在其共同印度支那的貿易和經濟关系上不要求或接受特惠待遇，为確保締約国在和法屬印度支那的貿易通商上受到平等待遇，进行努力。

(三) 日本国政府从中国及印度支那撤退其一切陆、海、空軍兵力和警察。

(四) 美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不給予以重庆为临时首都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外的中国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权以軍事、政治和經濟上的支持。

(五) 两国政府放弃在中国的租界和居留地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权益，和包括 1901 年“拳匪”事件議定书中規定之各种权利在內的一切治外法权。

两国政府为了就放弃外国租界和居留地內各种权利以及包括 1901 年“拳匪”事件議定书中規定之各种权利在內的在华治外法权問題取得英国政府及其他各国政府的同意而进行努力。

(六) 美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了根据美国方面关于提供互惠的最惠国待遇，降低通商障壁以及把生絲规定为自由貨品的建議，就締結美日通商协定开始談判。

(七) 美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各自撤銷对存在各該国内的对方国資金的冻结。

(八) 两国政府同意締結穩定日美元汇率的协定，并为这一目的設立一笔基金，由两国各出一半。

(九) 两国政府同意，不使同两国的任何一方締結了任何协定的第三国对所締結的协定作違反本协定之根本目的即确立及保持太平洋地区的全面和平的解釋。

(十) 两国政府应使用力量使其他国家政府遵守本协定所規定的基本政治和經濟原則，并实际予以适用。

对美备忘录

(1941 年 12 月 8 日)

一 帝国政府根据同美国政府达成友好諒解，通过两国的共同努力确保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以增进世界和平的真摯願望，自本年 4 月以来誠心誠意地和美国政府之間，就調整和增进两国邦交，实现太平洋地区之安定問題，进

行了交涉。現在能够就过去八个月交涉过程中美国所坚持的主張以及最近美国和英国对于帝国所采取的措施率直地向美国政府陈述意見，这是引为光荣的。

二 帝国坚定不移的国策是确保东亚的安定，增进世界和平，以使万邦各得其所。以前，由于中华民国不了解帝国的真意，不幸造成中国事变，但帝国始終一貫竭尽最大努力，一面寻求和平之途径，一面防止战禍扩大，去年九月帝国和德意两国締結同盟条約，其目的亦在于此。

然而，美国和英国不仅采取一切手段援助重庆政权，妨碍日华全面和平的实现，阻撓帝国为安定东亚而付出的建設性努力，而且控制荷属东印度，威胁法属印度支那，妨碍帝国与上述地区互相合作实现共荣理想之企图。尤其在帝国根据与法国締結的議定书而采取共同防卫法属印度支那的措施后，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把它曲解为对于自国領域的威胁，竟然一面拉攏荷兰共同頒布资产冻结令，断絕同帝国的經濟关系，表示了明显的敌对态度，一面加强针对帝国的軍备，建立包围帝国的陣势，造成威胁帝国生存的局势。

尽管如此，帝国总理大臣仍然于本年8月建議，为了急速改善事态，同美国总统举行会談，以便討論存在于两国間的有关整个太平洋的重要問題。对此，美国政府虽表示原則上贊同，但坚持主張必須在两国就一重要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以后才能付諸实行，而不肯让步。

三 于是，帝国政府于9月25日經過充分考虑美国政府一貫的主張以后，以美国方案为基础，加进帝国的主張制成方案，于9月25日提交美方，虽經過反复談論，双方意見总是难于达到一致。因此，日本政府就帝国关于以往交涉中成为难点的各项問題的主張，作了让步，提出修正方案，以求达成協議。但美国政府始終坚持最初的主張，缺乏協調态度，致使交涉陷于停滯。至11月20日，帝国政府为了避免两国邦交的破裂，为了竭尽最大努力就主要、而緊急的問題达成公正的協議，特将上述提案加以精簡，提出包括下列內容的新提案，这就是：（一）两国政府約定，不向法属印度支那以外的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地区实行武装扩展；（二）两国政府互相协助，使两国在荷属东印度获得必要物資上得到保証；（三）两国政府約定将两国通商关系恢复到资产冻结以前的状态，美国对日本提供必要的石油；（四）美国政府不采取可能妨碍日华两国实现和平的努力；（五）帝国政府准备，一旦日华間实现和平或在太平洋地区确立公正的和平，即撤退其現在派往法属印度支那的軍隊；一旦本諒解宣告成立，即将現在駐扎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地区的軍隊撤到法属印度支

那北部。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表示同意美国总统所提出的对于中国問題美国充当日华和平的斡旋者的建議，但要求美国保証，日华两国开始直接交涉以后，美国不阻撓日华間实现和平。美国政府不仅表示不能接受上述建議，并表明其繼續援蔣的意图。继之，美国政府还不顾前此的諾言竟宣布总统提出的斡旋日华間和平的时机尙未成熟，将其撤回。至 11 月 26 日，美国政府終于表示迫使帝国接受它一向坚持的原則的态度，提出了无視帝国主張的提案，这是帝国政府感到万分遺憾的。

四 自这次交涉开始以来，帝国政府始終完全以公正謙让的态度力求达成協議，一再隱忍，尽量让步，在这次交涉中的重要事項——中国問題上也表示协调态度；对于美国政府所提倡的遵守国际通商上平等待遇原則問題，則希望該原則能得到世界各国普遍实行，并表明願适应这一原則的实现，为使这一原則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太平洋地区进行努力。另外，帝国政府还表明并不排斥第三国在中国的进行正当的經濟活动；而在由法属印度支那撤兵的問題上，則极力表现出妥协的精神，即为了緩和局势，如上所述主动提出立即由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兵等等，凡此种种，相信早为美国所理解。然而美国政府，一貫拘泥于理論，无視现实，坚持其不现实的原則，不作任何让步，徒使交涉迁延时日，这是帝国政府所难以理解的。因此，帝国政府不得不就下列各点促請美国政府注意。

（一）美国政府自称为了世界和平而主張有利于自己的諸原則，并迫使帝国政府接受。但世界和平，只有根据现实情况理解对方国的立場寻求彼此可以接受之途径，始能实现；那种无視现实，把一国所自以为是的主張强加于对方国的态度，并不能导致交涉的成功。此次美国政府作为日美协定的基础而提出的諸原則中，就其基本精神而言，也有可以得到帝国政府贊同的。然而美国政府要求立即采納这些原則，这种作法，在当前的世界情況下，不能不认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至于由日、美、英、中、苏、荷、泰七国締結多边的互不侵犯条約的建議，这也是徒然追求陈旧的集体和平机构的想法的一种表现，不能不认为这是和亚洲的实际情况格格不入的。

（二）美国政府在这次建議中說：“两国政府同意不使两国与第三国所締結之任何协定受到違反本协定之根本目的即确立及保持太平洋地区的全面和平的解釋，这种提法被认为出于这样的企图，即将来美国参加欧洲战争时，可以借此束縛帝国履行三国同盟条約所規定的义务，这是帝国政府所不能接

受的。

必須指出：美国政府由于一向受到自己的主張和观念的迷惑，而在企图扩大战争。美国政府一方面謀求太平洋地区之安定，巩固自己的后方，另一方面援助英帝国，企图利用自卫权的名义积极地向为建設欧洲新秩序而奋斗的德意两国进行攻击。这种做法，是和用和平手段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安定基础的各項原則性的主張完全背道而馳。

（三）美国政府一面坚持反对用武力处理国际关系的主张，一面和英帝国等一道用經濟力进行压迫。这种压迫，在某种情况下，比武力压迫更加不人道，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手段，是應該受到排斥的。

（四）美国政府的意图，只能认为是拉攏英帝国及其他国家維持并加强其一向对于中国及其他东亚各地的統治地位。亚洲各国在过去百余年中在英美帝国主义的剝削政策之下，被迫維持現狀，不得不甘当两国繁荣之牺牲品。这种历史事实，是和帝国使万邦各得其所的根本国策，完全背道而馳，是帝国政府所絕對不能容許的。

美国政府此次提案中关于法属印度支那的規定，可以认为代表上述态度的典型例子。对于法属印度支那，撇开法国，而由日、美、英、荷、中、泰六国相約尊重該地区的領土主权和貿易通商上实行机会均等，这是企图將該地区置于六国政府共同保护之下，即使不問其完全无視法国的立場，也應該认为这是把使亞洲陷于糾紛的最大原因之一的九国公約式的体制进一步扩大到法属印度支那，这是帝国政府所不能容許的。

（五）美国政府就中国問題向帝国提出的要求，不論是要要求帝国全面撤兵，或者无条件地适用通商均等原則，都是无視中国之現實，企图推翻帝国作为东亚安定势力的地位。美国政府在此次提案中要求不得給予重庆政权以外的任何其他政权以軍事、政治和經濟上的支持，采取了否认南京政府的态度。这可說是从根本上破坏交涉的基础，和上述拒絕停止援蔣一样，証明美国政府有意阻撓日华間正常状态的恢复和东亚和平的恢复。

五 总之，美国政府此次建議中，如締結通商条約，相互解除資產冻结令，穩定日美元汇率等通商問題，以及廢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等問題虽然也包括某些本质上可以考虑的条款，但另一方面，这个建議无視了帝国在持續四年余的中国事变中之牺牲，威胁帝国的生存，損伤帝国的权威，因此，整个說来，帝国政府无论如何不能把它作为交涉的基础而加以接受，这是十分遺憾的。

六 另外，帝国政府，由于希望交涉迅速成功，曾經提議在日美两国达成

協議時，願和英帝國政府及其他有關國家同時簽訂協定，並已獲得美國政府大體同意。而美國政府似乎經過與英、澳、荷、重慶等多次商談的結果，尤其在中國問題上迎合重慶方面的意見而提出了上述各項建議，根據這種情況，帝國不能不認為上述各國與美國同樣無視了帝國的立場。

七 想來，美國政府不僅要和英帝國等勾結起來妨礙帝國通過建設東亞新秩序以便確立和平的努力，而且要使日華兩國互相搏鬥，借以維護英美兩國的利益。此種意圖，通過此次交涉，已經暴露無遺。這就使得帝國政府調整日美國交、與美國政府共同維持和確立太平洋和平的希望終於落空了。

鑒於美國政府採取的態度，帝國政府不能不認為：即使今後繼續進行交涉，也無法達到妥協。特此通告美國政府，並深表遺憾。

詔 書

（宣戰詔書 1941 年 12 月 8 日）

仰承天佑、繼承萬世一系皇統之大日本帝國天皇昭示忠誠勇武之爾等眾庶曰：

朕茲向美英兩國宣戰，陸海將兵奮其全力從事交戰，百官有司，克勤職守，全國眾庶各盡本分，務須億兆一心，徹底發揮國家之總力，以達成征戰之目的。

夫確保東亞之安定以利世界和平，實為列祖列宗之宏猷，朕所拳拳服膺無時或忘者也。而與各國敦睦邦交，同享萬邦共榮之樂，亦帝國一貫之外交方針也。

今茲不幸與美英兩國肇啟兵端，洵非得已，豈朕本願哉。前者，中華民國不解帝國之真意，妄自滋事，擾亂東亞之和平，終使帝國操戈而起，于茲四年有余矣。幸而國民政府有所更新，帝國與其結善鄰之誼，互相提携，而重慶之殘存政權，恃美英之庇蔭，兄弟鬩牆，罔知悔改。美英兩國則支援殘存政權，助長東亞之禍亂，假和平之美名，遏制霸東方之野心，並進而勾結與國，于帝國之周圍增強武備，向我挑畔，並對帝國之和平通商橫加阻礙，終于斷絕經濟關係，給予帝國生存以重大威脅。朕飭政府通過和平談判恢復事態，雖一再隱忍，而彼方毫無退讓之精神，徒事推延時局之解決，近則日益加強其經濟軍事威脅，企圖使我屈從。長此以往，帝國多年來爭取東亞安定之努力，勢必化為泡影；而帝國之存在，亦將瀕于危殆。帝國勢逼處此，為生存與自衛計，惟有

毅然奋起，粉碎一切障碍。皇祖皇宗之神灵在上，朕深信尔众庶之忠诚勇武，必能恢弘祖宗之遗业，鏖除祸根，确立东亚永远之和平，以保持帝国之荣誉，朕实有厚望焉。

御名御璽

昭和 16 年(1941 年)12 月 8 日

內 部 讀 物

統一書號：11017·120

定 价： 1.20 元